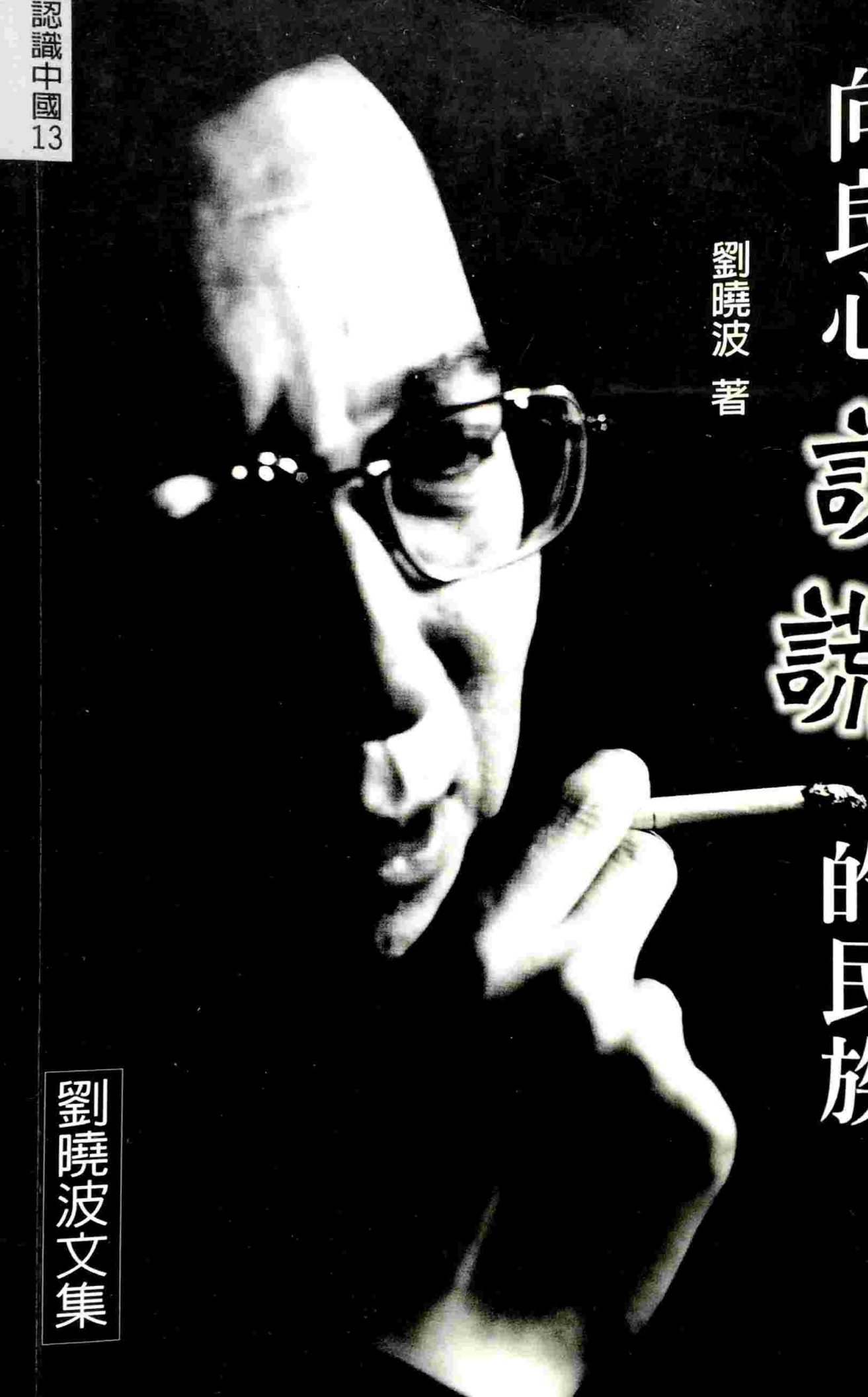
認識中國13

向良心說謊的民族

劉曉波 著



劉曉波文集

向良心說謊的民族

——劉曉波文集——

2010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

劉曉波◎著

捷幼出版社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向良心說謊的民族：劉曉波文集 / 劉曉波著.
--初版.--臺北市：捷幼，2002〔民91〕
416面；14.8×21公分. 認識中國
ISBN 957-8523-56-4(平裝)

1. 政治--中國大陸--文集

574.107 90020894

ISBN 957-8523-56-4

向良心說謊的民族——劉曉波文集

作　　者／劉曉波
編　　輯／黃秀鳳
出 版 者／捷幼出版社
發 行 人／李明賜
發 行 所／台北市信義路四段134號11樓
電　　話／(02)27002735
劃撥帳號／1485552-2　捷幼出版社
總 經 銷／聯合發行公司
地　　址／台北縣新店市寶橋路235巷6弄6號2樓
電　　話／(02)29178022
定　　價／320元
出版日期／2002年元月初版一刷
　　2010年10月二版一刷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書前

向良心說謊的民族

這本文集中的所有文字，都寫於六四大屠殺之後。

儘管十二年過去了，但那個被刺刀挑起血腥黎明仍像刺刀尖一樣，扎進我的雙眼。從此以後，我看到的一切都帶著血污，乃至於我寫下的每個字的每一筆，皆來自墳墓中亡靈們的傾訴。我，作爲末世大屠殺的幸存者和苟活者，自知無法正面表達亡靈，但我想懺悔和贖罪，可以從反面表達：

攥住監室中的鐵條
這一刻
我必須放聲大哭
我多麼害怕下一刻
已經欲哭無淚
記住一個人無辜的死
必須在眼睛正中
冷靜地插進一把刺刀
用失明的代價
換取腦漿的雪亮

那種敲骨吸髓的記憶
只有以拒絕的方式
才能完美地表達

一個殺人的政權，是令人絕望的；一個容忍殺人的政權和冷淡被殺者亡靈的民族，更令人絕望；一個大屠殺的幸存者無力爲死難者討回公道，又尤其令人絕望。

中共鎮壓法輪功本來就是獨裁者的「權力恐懼綜合症」的過敏反映，是一切專制制度虛構敵人進而製造敵人的統治傳統在當代的延續。但是，改革開放以來，除了六四大屠殺之後的高壓時期，要求人人過關的表態之外，中共政權的這種恐懼還很少通過全國性的批判來進行如此淋漓盡致的表達。因爲鄧小平時代的中共執政集團，握有最高決策權的元老們，對毛澤東時代的全民動員式的大批判政治有著深刻的切膚之痛，所以鄧小平在執政後才從《憲法》上廢除了賦予群眾性大批判運動以合法性的「四大」。鄧小平的地下亡靈萬萬沒有想到，他欽定的接班人出於山窮水盡的無奈，現在又不得不玩起毛澤東時代的政治遊戲。

正當江核心對於越鎮壓越頑強反抗的法輪功一籌莫展之時，天安門自焚事件給了中共一個完全不是藉口的藉口，使他們似乎有理由（儘管只是強詞奪理的理由）把驚懼萬狀的心理通過強權轉嫁給全社會，恐懼和既得利益的雙重要挾，使全國上下只有一個歇斯底里的變態聲音——堅決擁護和堅決批判，類似文革時期的大批判和表忠心運動又如火如荼地展開，咬牙切齒的語言暴力又在全社會復活，小康時代和互聯網時代的大陸中國，再一

次倒退回「以筆作刀槍」的毛澤東時代。然而，與文革不同的是：文革時的全國一致表態還有幾分盲目的誠實，而現在的人們則不得不向自己的良心說謊(如果大陸中國人還有良心的話)。

這是改革開放以來，繼六四大屠殺的人人過關的表態之後，又一次由執政黨發動的全社會的公開的出賣良心運動。當中央電視臺播放著各地聲討法輪功的百萬人簽名活動，當各級組織和各類協會召開批判法輪功的各種座談會，當大中小學向全國的青少年發出「校園拒絕邪教」的公開信或倡議書……之時，我們這個古老的民族已經墜入了萬劫不復的道德淪喪的深淵。

也許，因爲我本身還自認爲是個知識分子，所以在觀察中共發動的對法輪功的全國性聲討時，對知識界的反映更爲關注。2月10日的大陸各大報刊，都發布了中國作協召開的在京作家揭批法輪功的會議的消息。我看了《光明日報》等中央級大報的報導，真的很佩服中共宣傳機構的智慧，居然把兩個曾經是死對頭的著名作家揭批法輪功的言論放在同一段落裡，使九十年代中前期在文化界鬧得沸沸揚揚的王蒙和瑪拉沁夫，終於在對法輪功的義憤中走到了一起。

想當年，因六四而下臺的文化部長王蒙，被民間輿論作爲社會良知而受到敬重，他受到因六四而重新掌控作協大權的瑪拉沁夫的惡意攻擊，更激起了社會對他的同情和聲援。瑪發動自己控制的報紙指控王蒙的小說《堅硬的稀粥》影射總設計師鄧小平。這一招確實很損，如果得到鄧小平的首肯，很可能在社會地位上置王蒙於死地。王蒙一邊著文反擊，一邊聲稱要訴諸於法律，指控有人對他進行人格及名譽的誣陷和誹謗。在法院不可能受理這類起訴的無奈之下，王蒙也只能以眼還眼以牙還牙，用流氓對流

低的手段糟蹋瑪拉沁夫的人格。他把在文化部長任上時瑪拉沁夫以謙卑的姿態寫給他的求職信公之於眾。當然，以王蒙的聰明絕頂，決不會不知道在未徵得還活在人世的寫信者本人授權的情況下，在公共媒體上公開私人信件是侵犯個人隱私權的違法行爲，而且赤裸裸地與文壇小人嘔氣，也有損於文壇良心的聲譽。所以，他把瑪拉沁夫的信混在數封信中一起在《收穫》雜誌上發表，而且除了幾封文壇元老的信件之外，大部分信件都是一副對文化部長的諂媚相，並不是只有瑪拉沁夫一個人如此向權勢者獻媚。這批信的發表，在當時贏得了許多六四後受壓抑的文人的由衷歡呼。

雖然在媒體上這樣處理兩個曾經是兩個文壇死對頭的報導，未必使王蒙和瑪拉沁夫滿意，但是在揭批法輪功這樣的事關黨、民族、國家的穩定的考驗面前，作爲黨員的王、瑪二人，應該而且必須拋棄個人恩怨，想不一起表態都不可能。老左派瑪拉沁夫的義憤還能讓人理解，而誰會相信像王蒙這樣自稱社會良心的大作家的義憤填膺是完全出於真心？據報載，王蒙認爲，與邪教的鬥爭能否取勝，不僅要深入揭批，更重要的是作家應該爲人民提供更多更好的精神產品。如果你在私下裡問這些自稱有理性有良知大作家的真實看法時，他們不會承認這是在強權的威逼利誘之下對自己的良心說謊，反而會聲稱那是他們對自焚事件及法輪功的真實看法。再說了，參加這樣的御用座談會，以表明自己的「政治正確」的作家，如何能創造出更好的精神產品？

還有什麼樣的制度，比逼著人們向自己的良心說謊的制度更野蠻呢！還有什麼樣的知識分子，比用謊言來掩蓋謊言的人更懦弱更無恥呢！還有什麼樣的民族，比這種權力與知識相互結盟的

說謊更墮落呢！政治權力的腐爛還不能完全證明一個民族的徹底墮落，人們還可以寄希望於社會良心的道義力量，而一旦代表社會良心的知識群體也腐爛了，就是上帝也救不了我們。

或者，從來沒有過人的生活的人們，也就談不上人的良知，向良知說謊就更無從談起。

劉曉波

2001年2月15日於北京家中

編者按：2010年10月8日，挪威諾貝爾委員會以劉曉波「長期以來以非暴力方式在中國爭取基本人權的奮鬥」以及他長期「推動中國民主化的努力」。宣布將2010年諾貝爾和平獎頒發給劉曉波。劉曉波成為中國建國以後的第一位本土籍的諾貝爾獎得主。

隔天正在遼寧錦州監獄服刑的劉曉波，在太太劉霞探監並轉告獲獎的消息之後，激動地哭了，劉曉波說，這個獎，是給六四亡靈的，不只是他個人的。當說起亡靈時，劉曉波哭了。

劉曉波簡歷

- 1955年12月28日生於吉林省長春市。
- 1974年7月作爲知識青年插隊到吉林省農安縣三崗公社。
- 1977-1982年就讀吉林大學中文系，獲文學碩士學位。
- 1982-1984年就讀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獲碩士學位。
- 1984-1986年在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任教。
- 1986-1988年就讀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獲博士學位。
- 1988年8月-11月應邀赴挪威奧斯陸大學講授中國當代文學。
- 1988年12月-1989年2月應邀赴美國夏威夷大學講學。
- 1989年3月-5月應邀赴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做訪問學者，後因回國參加「六四」而中斷。
- 1989年6月6日-1991年1月因參加「六四」運動而被捕，關押20個月。1989年9月被開除公職。
- 1991年1月-1995年5月在北京從事寫作及民運。
- 1995年5月18日-1996年1月因從事自由寫作及民運、呼籲「六四」平反、保障人權而被囚禁8個月，完全失去自由。獲釋後繼續從事上述運動及自由寫作。1996年10月8日-1999年10月7日又因上述原因而被捕，勞動教養3年。
- 1999年10月7日獲釋，在北京從事自由寫作。作品散見於《信報》、《爭鳴》、《動向》、《開放》、《中國之春》、《民主中國》等。
- 2008年12月8日，因起草呼籲中國政改的「零八憲章」遭拘留，2009年12月25日以「煽動顛覆國家罪」，遭判刑11年，剝奪政治權利兩年，目前被囚禁於遼寧錦州監獄。
- 2010年10月8日，挪威諾貝爾委員會以劉曉波長期以非暴力方式，爭取中國基本人權奮鬥而獲頒和平獎殊榮。成爲第一位得到諾貝爾獎的本土中國人。

目次

書前：向良心說謊的民族 ……i
劉曉波簡歷 ……vi

壹、文化篇：野蠻的享樂

小康時代的文化鴉片——獄中看電視小品的隨想 ……3
享樂是野蠻的——僞享樂時代的搞笑文化 ……12
作秀與戲子中國——從大陸傳媒作秀談起 ……21
割去社會的舌頭 ……35
在恐懼和利誘中學習無恥 ……42
豬的哲學 ……50
沉默即死亡——我看錢鍾書 ……66
魯迅的悲劇——「酷評」中的魯迅 ……75

貳、政經篇：無奈的改革

九十年代中國的政治保守主義 ……91
九十年代中國的極端民族主義 ……106
九十年代中國的御用經濟學 ……120
老人政治的悲劇性悖論——鄧小平與政治改革 ……136

中共第二代的終結——胡耀邦、趙紫陽的政治悲劇 ……158
青天的無奈和末路——朱鎔基與政治改革 ……173
獨裁政治的戲子化——江澤民和政治改革 ……192
強盜式資本主義——權貴家族與政治改革 ……213
孫中山的遺產——辛亥革命90周年隨想 ……230

叁、時論篇：安慰與恐懼

「嚴打」和大蓋帽的合法傷害能力的擴張 ……237
和平：唯一選擇　民主：最佳前提 ……248
中共政權合法性來源的錯位 ……275
中國人眼中的美國形象 ……280
「韜光養晦」的底線 ……284
日本人爲什麼不肯道歉 ……295
盛宴換不來應有的尊嚴——簡評大陸媒體對APEC會議的報導 ……305
弱者的「正義」 ……309
最大的安慰和最大的恐懼——有感於卡斯楚的講話 ……335

肆、自省篇：吶喊與見證

我從十一歲開始吸煙——「文革」30年而作 ……345
真誠自省是最好的紀念——「六四」12周年作 ……354
心牢中的女人 ……368
社會良知的整體失敗和腐爛——自由知識界與政治改革 ……373
只配跪著接受皇恩的民族 ……396
附錄：《零八憲章》全文 ……403

壹

文化篇：野蠻的享樂

小康時代的文化鴉片

——獄中看電視小品的隨想

電視中又在播小品，趙本山和宋丹丹外加名牌主持人崔永元。致富了的兩口子老農民，住上二層小樓，連吃飯都用電話招呼。他倆與中央台大腕談天說地，從自己的初戀到柯林頓的桃色緋聞，從改革開放的讚歌到嘲諷霸權的打油詩，最後以亮相姿態抒發小康時代的豪情：「風景這邊獨好！」而既供兩人調情又被他倆追逐的明星——倪萍和趙忠祥——在貴賓席上笑得老樹開新花。

大陸小品有政治的目的

小品，近幾年大眾文化中最陰毒的精神調笑，如果僅止於娛樂和休閒，這樣只供一笑的庸俗和無聊還有正當的存在理由和權利，誰也無權禁止人們選擇平庸的娛樂，更無權強制性地要求人們只能欣賞高雅藝術，哪怕是李賀的詩、達利的畫和瓦格納的音樂！但是，大陸的小品不是美國的「脫口秀」和港臺的「肥肥姐」，

決不會很單純地「爲娛樂而娛樂」，而是要「寓教於樂」，使之具有主流意識形態的幫閒功能，一定要在淺薄、無聊、庸俗、噁心的調笑中，加入大量民族自尊、太平盛世、「三講」(講政治、講正氣、講學習)後的廉潔正直和「真善美」的道德說教，諸如「美國人倒著刷盤子」，「美國鬧緋聞俄羅斯換總理環顧全球冷暖風景這邊獨好」……皆贏得了最熱烈的掌聲，被評爲一等獎。

我讀大學中文系時，「寓教於樂」是社會主義美學的最主要原則之一，來自毛澤東著名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但是，毛澤東時代並沒有很好地實踐這一美學原則，在階級鬥爭的狼煙四起和陰謀重重的險惡之中，除了階級敵人的陰險冷笑和革命英雄的仰天大笑外，還能抖出笑料的人肯定居心不良。李鐵梅高舉紅燈的一臉正氣，誰敢在樣板戲裡調戲觀眾？

只有到了小康時代，「寓教於樂」這一毛澤東的文藝思想，才得到普及化實踐。八十年代是相聲的黃金時代，九十年代小品紅極一時，它是調笑心態的舞臺化和程式化，是世紀末中國人精神的準確外觀。任何社會和任何時代的大眾抒情都是模式化的，在這點上，自由制度和獨裁制度沒有什麼區別，美國人追逐麥當娜和中國人歡呼劉德華，都是明星發燒友。離開了某種流行的模式，大眾、特別是現代大眾就不會抒情了。

台港與大陸小品文化之差異

如果說，源於老上海灘的港臺的悄聲軟語是中國人的主要抒情模式的話，那麼，小品就是大陸人特有的調笑大餐，有沒有受歡迎的小品節目，已經成了社會衡量電視中的各類晚會和綜藝節

目重要標準之一。以陳佩斯、趙本山、趙麗蓉(已故)、宋丹丹，潘長江、黃宏、郭達等人爲代表的小品，是大眾的精神鴉片；上演小品的各種大同小異的晚會，類似於具有多種娛樂功能的「精神大煙館」，主流意識形態本身所完成不了的灌輸功能，借助於舞臺小品這種精神鴉片的致幻效果來完成，而且是超額完成。

這幾年，與小品的火爆並行的是古裝戲泛濫成災，從《宰相劉羅鍋》、《戲說乾隆》到《康熙微服私訪》、《還珠格格》，而這些電視劇的人物對白和情節設置，都有幾分小品的調笑風格。帝王們既威嚴而不失人情味，如同關於毛澤東、周恩來的回憶；又清明而滑稽，頗有幾分宮廷弄臣兼開心太監的角色。過幾天，中央電視臺的黃金時間，繼《水滸》、《雍正王朝》之後又要播出大型連續劇《戰國》。主旋律不敢直接觸碰現實，只好在故紙堆中尋找灌輸資源和消費市場，至多弄出點「劉羅鍋」和「雍正」式的借古諷今，仍然脫不去幫閒功能。清官最終一定在聖上的支援下戰勝貪官，正如中共的紀委書記或檢察院院長一定在黨委書記的支援下，搬倒不可一世的腐敗家族。用古代帝王銳意改革和公正廉潔的開明形象來包裝今天的執政者，用古代的清流讀書人的空談誤國來貶損今天的具有批評態度的知識分子。電視劇設計了雍正對讀書人「造反」的鎮壓而有利於改革大計的情節，正是別有用心地爲中共壓制言論自由和學生運動正名。如果吳晗能看到今日遍地開花的影射式古裝戲，他該怎樣評價自己因一齣《海瑞罷官》而自殺的抗爭呢！

粉飾太平盛世和向執政者獻媚，是這類古裝電視劇的主要意識形態功能，而調戲觀眾是其收視率的保證。

即便是娛樂大於道德灌輸的台灣電視劇《還珠格格》，在打

打鬧鬧和蹦蹦跳跳的嬉戲之中，也借助於通行全世界「灰姑娘」的故事原型，淋漓盡致地表現著對權力的嫵媚、羨慕和渴望。不同時代的不同民族有著不同版本的醜小鴨變白天鵝的故事，好萊塢影片《漂亮女人》也是這類原型的現代翻版：賣淫女郎由一夜風流而榮升爲億萬富翁的所愛，大飯店的豪華套間與貧民窟的擁擠公寓之間的巨大反差，夜遊在街頭的性感超短裙和散步在綠草如茵的貴族式莊園的拖地長裙之間的鮮明對比，征服了全世界的中產階級和平民社會。而這類「灰姑娘」的流行故事變種到官本位的大陸中國，決不會是單純的「富」，一定要有權力之「貴」；決不是西方式的由富而貴，而是中國式的由貴而富，億萬富翁的頭上要戴一頂皇冠。

流落街頭、住在大雜院、與社會的下九流廝混的皇家私生女，經過複雜、驚險、惡作劇百出的尋父認父過程，終於認主歸根，得到了乾隆帝的確認和整個宮廷的接納，從此過上雍容尊貴、僕侍成群的生活。其中貫穿著宮廷式的富與貧、貴與賤、善與惡、忠與奸、智與愚恩與威、冷酷與溫情、權力與人性、文雅與粗俗、勇敢與懦弱之間的鮮明而淺顯的對比。「小燕子」趙薇成了生長於改革背景下的一代孩子們的偶像，不僅大城市中衣食無憂的家庭「小皇帝們」特別喜歡此劇，就連一些偏遠農村的窮孩子，都把《還珠格格》的招貼畫貼在家徒四壁的炕頭。

權貴私有化時代提供了太多一夜暴富的示範，加之學校中、家庭中和社會上的耳濡目染，都在幼小的心靈中播下了攀權附貴的種子，使富貴攀比成爲孩子們的正常心態。他們自然羨慕小燕子在一夜之間由街頭浪兒到皇家千金的幸運，向往她所具有的那種既衣食無憂又可肆意妄爲地發揮青春天性的特權。在「我是瘋

兒我是傻」的兒童式自白背後，是庇護著這種胡作非爲的皇族特權，與改革開放時代的一個個暴富的權貴家族正好相互映襯。中國幾千年的官本位傳統早已深入民族的骨髓，現在又有太多的事實向孩子們展示著「好父母」的諸多方便，誰不想出身於權貴之家，有一對大權在握的「好父母」，有一個人人爭相羨慕的好血緣，所謂「一人得道，雞犬升天」是也。何況小燕子和紫薇的得道升天的曲折經歷所具有的傳奇性及戲劇性呢！

今天的中國，執政黨通過大眾傳媒進行著雙重控制：既操縱著有關政治經濟文化等社會問題的主導意識和合法性辯護，又通過提供只值一笑的文化垃圾腐蝕人們的精神。一方面鼓蕩起公眾的攀權附貴的狂熱，另一方面把百姓訓練成冷漠的消費者，讓他們別無選擇地只能追求短暫的感官享受，而不關心任何嚴肅的社會問題。民眾的強烈反腐敗要求，與其說是出於對社會公正的道義要求，不如說是出於「吃不著葡萄就說葡萄酸」的嫉恨心理。實際上，法律之外的腐敗式交易，才是人人都追求的最佳獲利方式和人際關係的常態規則，政治權力才是人們最想得到的稀缺資源，當官才是人人羨慕和嫉妒的職業。大陸公開發表的關於大學生擇業調查表明，最受關注的職業中，「從政」或「當官」始終是大學生擇業的優先目標。

許多外國人來中國，都爲北京等大城市的巨大變化和驚人繁華而感歎。但是，他們走馬觀花式的印象，掩蓋著極爲醜陋的人性和懸殊的貧富差異。老外們很難想像，爲北京、上海和廣州等大城市中的燈紅酒綠提供血肉的，正是對農民的嚴重剝奪、對失業者的漠不關心；支撐著權貴們一擲萬金的，正是教育的日漸荒蕪和環境的日益耗損，以及被屠殺被監禁被驅除的無辜者的呻

吟、乞求和沒有回應的抗爭。

在大眾文化的風靡中，腐朽的傳統政治與墮落的現代消費結合起來，冷酷的現代專政和冷血的大眾找樂融爲一體；政權和商業的共同操作所創造的文化消費市場，把自卑自傲的民族主義和虛張聲勢的反霸權變成暢銷讀物，把一夜暴富的渴望製作成看不完的肥皂劇，把壓抑以久的性慾變成現實中的「包二奶」和「泡小姐」，再包裝成文化產品中的沒心沒肺的婚外戀矯情和放蕩的床上尖叫；把毛澤東加格瓦拉式的無產階級造反革命，變成準知識貴族的雞尾酒會；把爲弱勢群體鳴不平的吶喊，通過商業炒作變成文化賣點和高額的市場利潤；把用大資本家的錢支援的學術評獎，變成了掌勺的學術青紅幫私分大鍋飯（正如權貴們把企業上市變成代理人瓜分公共資產一樣）……本來應該承擔社會批判與公眾啓蒙的責任的知識分子，一方面成爲執政集團的附屬物，成爲執政黨操縱大眾的辯護工具；另一方面變成了文化商人，操縱著精神鴉片的生產和銷售。他們在自艾自憐地感歎人心不古和知識分子邊緣化的同時，卻仍然以獨霸的話語地位進入權力的中心和文化市場的旋渦，既當執政黨的高級幕僚又做大資本家的高級打工仔，通過出賣學術誠信和道義良知來完成了與權力與金錢的結盟，順便也完成了自己的私人資本積累，弄個上市公司的董事長、總經理或常務懂事幹幹。

於是，在沒有基本的制度常識、權利常識和做人常識的畸形社會中，成爲知識界的口頭禪的「多元化」也變得非驢非馬，甚至就是指鹿爲馬。一方面，在官方意識形態霸權的強制性在場的背景下，「多元化」根本沒有法律的保障和倫理的依託，被政治恐懼籠罩的知識界刻意回避爭取自由權利的言說和行動；另一方

面，在政治高壓和商業誘惑的雙重作用下，知識界又高聲呼籲絕對的「相對主義」和「多元主義」，縱容和鼓勵一種泯滅一切價值的「怎樣都行」文化流氓，十足的犬儒態度成爲「以無厚入有間」的利器，無論在何等處境中皆能逍遙地「遊刃有餘」，達致如入無人之域的化境。

特別是當前的人文理論和作爲顯學的經濟學，成爲權力與金錢的雙重附庸，與權錢結盟所共同形成的社會控制同進共退。「腐敗」有利於改革，「權威」有利於制度變革，加強中央財政有利於宏觀調控，政治冷漠有助於避免全民政治，人民公社、鞍鋼憲法和文革是真正的大眾民主，大眾文化代表了中國文化與國際社會接軌，甚至造成巨大生命和財產損失的大水災，也成了有助於刺激內需和拉動經濟高增長的寶貴資源等等。他們製造的文化產品，不再具有任何批判意識與啓蒙功能，而墮落爲辯護意識與休閒消費。當學者變成了小康時代舞臺上的明星戲子，學術自然蛻變爲裝點繁榮盛世的晚會上的小品。所謂精英的平民化，在某種程度上就是知識分子的戲子化和人文精神的小品化；所謂知識分子的邊緣化，不過是知識人放棄知識而進入文化市場而已；學者明星成爲小康時代最醒目的文化標誌。

《河殤》是一部帶有啓蒙和改革意識的電視片

八十年代末的電視政論片《河殤》，無論有多少遺憾有待彌補，但它畢竟是知識分子利用大眾傳媒進行嚴肅的公共啓蒙的第一次嘗試，而現在看來，所有遺憾中最大的遺憾，就是它成爲這種嚴肅嘗試的終結。六四之後，儘管進入影視傳媒的知識人成幾

何基數增長，但是《河殤》類的具有嚴肅啓蒙意識和改革激情的電視政論片已經絕跡。大量被聘爲各類電視欄目的策劃或顧問的知識人，僅僅是有著高額利潤的傳媒產業的雇員，至多是高級白領。他們是明星主持人臺詞的製作者和文字潤色者，是各類晚會導演的暫時幕僚或高參，是長篇電視劇的總策劃或「捉刀人」，是提升某一欄目文化品味的嘉賓，是影視精品節目的知識點綴，是趕場般地參加各種座談會的「捧哏」(名嘴)者，甚至是「電視購物」中的導購小姐或先生，是「電視紅娘」中初戀者們的客串知心熱線……知識界的批判意識墮落成完全的空白和指鹿爲馬的誤導，學術討論變成了市場炒作和商品交換，個人自主性批判變成了名星表演，社會的鑒賞品味自然就變成了對港臺式的「玻璃心」的咀嚼，如同口香糖的消費。從閱讀中汲取精神營養變成了影視畫面的追星群體，人們淺薄到只聽通俗歌曲，只看港臺影視，只欣賞調笑小品的地步。即便還有對社會責任、公民權利、個人尊嚴和欣賞品味的關注，也大多是理論說辭，而且抽象得一個詞概括宇宙，空洞得一百萬字論證一個詞，晦澀得滿眼亂譯的洋概念包裝中國的普通常識，而很少具有現實的針對性和健全的人性常識。

從來沒有過個人權利意識的民族，在還沒有爭取到這種權利時，就已經放棄了一切個人權利。媒體中曝光最多的所謂民告官的行政訴訟，百分之九十是有關商品消費的賠償案例，消費時代的過早降臨，使消費者的物質權益成爲唯一的保障物件。畸型的權利意識，導致了類似王海現象的爆發性效應，「維權」的動聽吶喊變成了出名與發財的工具。這是一個沒有良心自責、社會批判和靈魂拷問的時代。知識分子要麼成爲孤立於社會之外的被放

逐者，要麼融入社會成爲既是操縱的工具又是被操縱的附庸。五四傳統賦予知識分子的權力批判和公眾啓蒙的雙重角色，如今變成了對權力的順從和滿足公眾消費欲望的雙重奴隸。

在西方，公共領域經由自由主義批判時期的啓蒙，轉變爲福利時期的受現代的商業和傳媒所操縱的消費性休閒。二戰後，法蘭克福學派以對現代傳媒和大眾文化的激進批判而聞名於世，阿多諾爾的《啓蒙的辯證法》和本雅明的《機器複製時代的藝術》是其代表作，他們甚至認爲，大眾文化正在抹平人們的審美品味，已經窒息了懷疑衝動和批判意識，導致了一種「富裕的疾病」和「喜氣洋洋的災難」。這是文明由種族滅絕的野蠻變成享樂化的野蠻之災難，是高貴墮入時尚化的平庸之疾病。

而在中國，沒有經過成功的自由主義的批判啓蒙，也沒有自由制度中的權利保障和富足生活，但是，我們似乎直接進入了後現代的消費性休閒的時代：令世人驚歎的經濟高速增長和小康式的衣食無憂，北京長城飯店的著名夜總會「天上人間」中的高消費糜爛，長安俱樂部的雍容華貴，三里屯酒吧一條街那喧鬧的夜生活……這一切使我們可以理直氣壯地說：小品化享樂就是小康時代的文化精神。

每一次文明的進步，未必就不是向更高級野蠻的倒退。在物質生活邁向小康的同時，精神生活正在以更快的速度倒退回野蠻，而且是喪心病狂的享樂化野蠻。

2001年4月12日於北京家中

享樂是野蠻的

——僞享樂時代的搞笑文化

1989年6月4日，坦克結束了啓蒙的吶喊之後，緊接著來臨的就是享樂的小康時代，這之間沒有任何時間上的過渡，哪怕是故做姿態的空白都沒有。大陸中國人真幸運，什麼都沒有錯過，總能搭上通往幸福生活的便車。沒有什麼人發出明確的指令，恐怖的氣氛就足以使人不再沈溺於痛苦，理直氣壯地去追求歡樂。八十年代呼風喚雨和爭奪意識形態霸權的文人們，先是滿目淚花閃閃，繼而眯起眼睛，目光變得曖昧而模糊，在被剝奪了一切真正的自主發言權之後，他們終於眼睛雪亮地爲自己發明了一種自我辯護的權利——歷史的缺席權。於是，作家們開始批判激進主義和皈依保守主義，開始利用模糊的時間背景和似是而非的虛構歷史，製造一個個遠離塵世是非的神話：沒落的城市、古老的家族、幾近消失的民俗、一片廢墟的傳統、從沒有過的神祉、窮鄉僻壤的浪漫、怎麼也死不了的活著、外加玄學的沈思和哲理……他們對現存秩序最激烈的批判，也就是張承志祭起伊斯蘭信仰和毛澤東的造反旗幟向大眾文化示威，也就是梁曉聲懷著一腔民族義憤

寫給柯林頓的愛恨交加的公開信。其他的文化空間全部由享樂時代的搞笑添滿。

中共決不允許任何超出幫兇和幫閒的批評

雖然，九十年代中期，出現了王小波這樣健全而清醒的社會良知，他的睿智而深刻的批判意識、幽默而鋒利的說理語言，爲這個已經殘缺得連起碼常識都不具有的社會，注入了人的常識和制度的常識；九十年代後期，自由主義知識界和一批新生代，以思想隨筆的方式接續了八十年代的啓蒙和批判，其中青年評論家葛紅兵、余杰、摩羅、任不寐等人的崛起引人注目；王朔也在98年推出了反省一代人在紅色年代的私生子式的成長經歷的小說《看上去很美》，以及一系列引起轟動和挑戰性的言論，確立了這位「頑主」的全新批判姿態；還有《國畫》、《官場秘聞》對官場腐敗的揭露，但是這一切很快遭到了來自官方的各種形式的封殺和警告。中共權威決不允許任何超出幫兇和幫閒之界限的批評。

作爲九十年代大陸人精神生活的標本，趙麗蓉追悼會的盛況是一個典型的事件。成千上萬的平民百姓自願地爲這位明星送行，許多人流淚，還有人爲了最後看她一眼，而與維持秩序的保安發生口角，差點釀成身體衝突。社會輿論一邊倒地讚美趙麗蓉，稱她是頂尖的喜劇演員，誇她的親民風範和簡樸坦誠，是罕見的沒有明星架子的明星……等等，一個專以搞笑爲職業的喜劇小品演員，一下成了「德藝雙馨」的典範，享受了其他文化名流都無緣得到的身後哀榮——官方和民間的一致讚美，恰好證明了大陸中國已經進入精神

的僞享樂時代，人們在挖空心思地搞笑。湖南衛視的「快樂大本營」頃刻風靡全國，數家電視臺爭相模仿，大批的文化名人也加入其中，逼得中央電視臺這樣的欽定老大，也不得不鬆弛一下板著的面孔，在周末的黃金時段弄出個「開心詞典」。

如果說，九十年代初期《編輯部的故事》的調侃中，還有深藏的悲憤和強權之下的無奈；王朔的四卷文集，通過邊緣小人物的「千萬別把我當人」的生存自賤，通過褻瀆、嘲笑、調侃、愛誰誰的姿態，表現了價值虛無和平民立場對正統意識形態的僞強大僞崇高的反叛和顛覆的話，那麼，《渴望》已經開啓了大眾娛樂時代的大門，後來的《我愛我家》式的情景喜劇、趙本山等人的喜劇小品，就只剩下供人一笑的調侃和對現存制度的獻媚，沒有生命質量的享樂象毒品包裹在所有形式的消費品之中：喜劇小品式的搞笑成了大眾的精神鴉片，文人小品文式的悠閒成了知識分子或準知識分子的靈魂毒品，趙本山和余秋雨是小康時代的大眾偶像。

特別是余秋雨，在各級政府官員的接風、餞行和陪同下，做著表演性的「文化苦旅」，對傳統文化失落的痛不欲生，並不能使他忘記在每一聲歎息的昇華處對某市長某局長的恭維。這位博學的教授也學會了在大眾簇擁下，暫時躲進香港高級住宅區的大房子裡，邊眺望大海，邊品味孤獨，把酒足飯飽之後的瞌睡當作民族危亡的焦慮。這樣的表演遠遠勝過江澤民的外交秀，既能爲愛國主義的主流意識形態幫閒，又能爲大眾提供精神休閒，所謂的眞善美和民族憂患使粗俗品味有了優雅的外觀，正如全國各地拔地而起的仿古建築和僞民俗村一樣。屬於這類大眾毒品的文化消費專案，還有「布老虎」文學叢書以及明星們的多如牛毛的自傳，以及張藝謀、馮小剛的電影，《雍正王朝》、《大明宮詞》、《來

來往往》、《貧嘴張大民的幸福生活》等電視劇，這一切的確配得上小康時代的虛假繁榮。它們猶如愛滋病時代越來越保險的性消費品，既享樂又安全。同時，只能產生《廢都》這樣的士大夫文學情調的大陸，僞享樂之中還有一種殘忍——在風景如畫的島國新西蘭的殺人犯顧誠，這位被家庭、女人、文學愛好者和整個社會寵壞了的自私老兒童，卻被大眾媒體炒成了殉情殉詩的文化英雄。這些供成年人享受的搞笑，直接開啓了以「酷」著稱的新新人類。

新新人類「美女作家」登場亮相

正是在粗俗的僞享樂氛圍中，新新人類閃亮登場。現在，海外一談起大陸的新新人類作家，第一個想到的就是「美女作家」衛慧，這種錯覺先是來自出版商的促銷，顯然「美女作家」在市場上比「俊男作家」有賣點，以大陸人現在對粗俗的敏銳，是個年輕的女作者都能被媒體炒成「美女作家」。接著是中共的意識形態主持者對《上海寶貝》的封殺，爲衛慧作了一個世界性的大廣告。最後一個原因就是她對性經驗的誇張而大膽的描寫，正好迎合了大眾對男女隱私、婚外戀的嗜好。在此之前，通俗文化已經爲肉體寫作的火爆作了充分的鋪墊，前有《廢都》、《英兒》、《白鹿原》、《一個人的戰爭》的赤裸裸的性描寫，後有美國小說《廊橋遺夢》和記實文學《絕對隱私》的暢銷，以及電視劇《牽手》、《來來往往》的火暴。衛慧的被禁，並沒有影響三角戀《一聲歎息》的上座率，人們依然亢奮於性欲的尖叫，依然陶醉於第三者的刺激，與官員們和大款們走邊祖國的大好山河，處處「包二奶」的現實正好相配。

其實，在新生代作家中，衛慧的相貌和作品都不是「美女」級的，在她被封殺甚至在她成名之前，另一個年輕女作家棉棉早就小有名氣，她的掙扎在社會底層的體驗以及文字工夫，都遠在衛慧之上。另外，一批如丁天、石康、張池等新生代男作家，其才華也遠遠高出衛慧。在這群新一代愛誰誰的頹廢作家中，衛慧的作品是最少原創性的。《上海寶貝》完全是洋包裝的「準嬉皮士」風格，人物的一切——從衣食住行到精神嗜好——都是仿西方的「COOL」，西式的名牌包裝身體、西式的酒吧點綴夜生活、西式的音樂烘托情調、西式的頹廢渲染靈魂沈淪，就連性交的方式、迷醉、高潮都是由洋雞巴創造的，極端自戀的矯情也是由具有同性戀傾向的洋女人完成的，每一章的開篇前的引語全部來自西方的作家、詩人、哲學家、修女……，惟有女主人公時不時發出的人生感歎，其無病呻吟的做作和淺薄是衛慧自己的。讀這部作品，有點像在大陸的某一酒吧裡，渡過赤裸地展示床上技巧的聖誕之夜。在中國即將加入WTO之際，衛慧以尖叫的肉體，搶先擁有了國際化的性資本。中央電視臺著名主持人白岩松出過一本自傳，書名特別裝蒜，叫做《痛並且快樂著》，把這個名字稍微改一下，變成「快樂並且痛著」來命名衛慧的作品最爲合適。

與衛慧相比，棉棉、丁天、張池等人的頹廢無賴相，不是在「準白領」式的無病呻吟中完成的，而是在社會邊緣群體的無所事事無可奈何的扭曲中完成的，具有一種苦中作樂惑以苦爲了的瘋狂勁兒，「我不是傻逼誰是傻逼」是他們生活態度的新宣言。在他們的作品中，有明顯的八十年代的王朔、劉索拉、徐星等人的痕跡，加上九十年代走紅大陸的日本作家村上春樹和村上龍的強力影響。但是，他們沒有王朔等人成長於文革中的背景，也就

沒有了對制度的叛逆和顛覆。他們的自我沈淪來自酗酒、吸毒、性交中的肉體放縱和精神自殘，他們顛覆的僅僅是自己的肉體，其反抗由於極端的自戀而失去了目標，無論怎樣都要活著都要找樂，卻沒有任何價值和意義。

這類以顛覆生命來尋找快樂的新生代作家，並不是新新人類審美情趣的主流，而僅僅是邊緣，如同八十年代後期以崔健爲象徵的憤怒青年和以王朔爲代表的痞子青年是當時的邊緣一樣。大陸主流的新新人類不是「頑主」或「嬉皮士」或「搖滾青年」，而是一群盲目追逐外來時尚的受寵不驚的兒童。他們先是多愁善感，追逐「四大天王」，送生日卡、聖誕卡，疊千紙鶴、過情人節、相互贈言，他們唱《同桌的你》、《玻璃心》，讀《女友》等雜誌上的「美文」，看日本和港臺的青春偶像劇，男孩都想成爲「好瀟灑好瀟灑」的白馬王子，女孩都要做「好純情好純情」白雪公主。緊接著就是玩「酷」時代的到來。他們穿袋袋褲、大頭娃娃鞋、風帽T恤裝，戴漁夫帽、背斜式臀包；他們追逐最新時尚，從卡通片、「弗比」電子寵物到玩具總動員，從港臺的陳小春的《古惑仔》、張惠妹的「我是我」、謝霆峰的「帥呆兒」、范曉萱的「脖子扭扭屁股扭扭」、周星弛的《大話西遊》，到大陸趙薇的「我是瘋兒我是傻」、「青春美少女」和「花兒」等樂隊的「快樂寶貝」，自稱「有些年少、有些單純、有些天真、有些盲目、有些躁動」，所以他們用「蹦蹦跳跳玩玩鬧鬧」來表現青春的反抗。他們的口中永遠有吃不完的零食，正如其精神食糧是港臺版的《愛情爆米花》、《俏皮乖乖女》、《美味甜姐兒》、《改裝神偷壞丫頭》、《你聰明，愛情不是傻瓜》、《來電ABC》，席絹、秦真真、于晴、蘇丹等人的新言情小說代替了八十年代的瓊瑤，沒有相思

離愁和纏綿悱惻，只有打打鬧鬧的惡作劇和兒童式的過家家。他們無法忍受白紙黑字的雜誌，喜歡以圖像爲主的閱讀，如《希望》、《時尚》這樣的刊物。於是，小說退化爲連環畫，歌曲退化爲童謠。現在，最酷的是來自香港的「無厘頭」，即沒有任何緣由的搞笑，管它是什麼，管它怎麼樣，只要高興就成。這代說著一口港臺普通話的新新人類，有人戲稱他們是「後兒童」，二十左右的年齡，卻只有八歲的心智，「裝嫩」成爲最新時尚；有人嚴肅地稱之爲「獨生子女綜合症」，父母祖父母的寵愛使這一代人告別貧困，可以盡情享受生命，即便是下崗職工的家庭，父母輩也發毒誓：「再苦也不能苦了孩子！」

港臺腔是享樂時代最需要的腔調

無論任何時代，大眾抒情都必然是模式化的。毛澤東時代是高調的泛政治化大抒情，改革開放的前十年是多種模式的混雜，到了九十年代就逐漸被港臺模式的世俗小情調所主宰，港臺明星在大陸舞臺上的示範，大量港臺電視劇和小說佔據了大陸人的夜晚和閒暇，使大陸文化迅速港臺化，特別是被家庭嬌寵的新新人類，不分哪個階層，只要一抒情就必是港臺腔的，離開了周華健他們真的就不會抒情了。就連余秋雨這樣一把年齡的人，筆下也出現了「殷殷地期盼著」這類矯情。由此可見，港臺腔是享樂時代最需要的腔調，特別適於那種情感的小波瀾、小曲折。再過十幾年，當在港臺腔中成長起來的新新人類成爲大陸文化的中堅力量時，中國人的抒情模式就會達到大一統，即全部統一到「港普話」上。而從歷史淵源上講，老上海的靡靡之音的抒情方式，就

是後來港臺腔的正宗源頭，只不過這種抒情方式在大陸被共產主義紅色風暴所中斷，卻被資本主義的港臺所繼承並發揚光大，現在，大陸上港臺腔的風靡，才使其抒情方式又回歸到中國人欣賞趣味的正宗。

我之所以說九十年代的大陸以「港普話」爲主要模式的抒情是「僞享樂時代」，並不是說港臺式的抒情方式沒有存在的理由，恰恰相反，在人的權利和自由得到基本制度保障的前提下，大眾有權選擇自己的抒情方式，有權把獲得世俗的幸福作爲生活的追求，港臺的大眾文化即便再庸俗也有充分的理由存在。我只是說，就大陸的制度現實而言，抒情方式和享樂方式的港臺化是強制性的，是政治高壓下別無選擇的選擇。因爲大陸既沒有港臺的富足也沒有港臺的自由，大陸人是沒有任何理由如此歡樂的：令全世界震驚的血案剛剛發生，政治高壓和制度性腐敗同時強化，公共資產大量流失和潛伏的金融危機，城市失業人口遽增和農民受盤剝日重，即便中共執政當局最引以爲傲的經濟增長，實際上是靠執政黨不斷地變賣全民資產來維繫的，在經歷了「南巡泡沫」的膨脹和破滅之後，也進入了滯緩時期。然而，強權之下的大陸人必須是健忘的和乖巧的，八十年代以沒有墳墓的死亡告終，九十年代卻以鉅額耗資的大慶結束，鮮血迅速釀成美酒，啓蒙瞬間墮落爲共謀，全民反抗變成全民馴順，心靈哀樂變成肉體歡歌。文化產品的生產和供應，恰逢其時地爲一種僞享樂製造了垃圾般的消費品。更重要的是，官方意識形態不再像八十年代那樣限制港臺俗文化的入侵，而是敞開大門，讓港臺的所有影視歌星全部在大陸登場，這種由專制制度刻意營造和縱容的享樂，散發著喪心病狂的冷酷和野蠻。

如果說，良知的麻木可以使人在任何處境下獲得非人的享樂的話，那麼大陸人所沈溺於其中的正是這種享樂。如果在一個制度下，大眾只有選擇卑賤的享樂才是安全的和有利可圖的，那麼無權者出於無奈的選擇就是再野蠻再冷酷，其主要責任都必須由制度以及制度的最大受益者和維護者來承擔。

2000年11月22日於北京家中

作秀與戲子中國

——從大陸傳媒作秀談起

太監中國的戲子化

把古代中國稱爲「太監中國」，大概會引起大的爭議，因爲炎黃子孫們讀過的課本上，只有正人君子，就算有過太監，按人口比例也是極少數，何況自從中國變成紅色之後，肉體上的太監已然絕跡了。但是，肉體上的太監之絕跡，並不能證明太監的精神遺傳完全根絕。事實上，「精神太監化」一直是最具中國特色的文化之一，中共執政後的五十年尤其興盛，被迫的精神閹割和自願的靈魂自閹相結合，把「太監中國」推向了後現代傳媒的泛濫之中。

這種太監化中國的主要標誌，我稱爲戲子化的中國。這個詞大概不會有太多異議，因爲後現代的特徵之一就是大眾傳媒的普及，上至總書記下至祖國花朵，都充分利用了這一後現代提供的方便，作秀的功課人人門兒清且大都勤奮。而就這種作秀對人之

精神的虐待和腐蝕而言，無異於「靈魂自閹」。在此意義上，把江核心時代的中國稱之爲軟性「精神蠶室」，是一點也不過分的。那些影視主持人就不必說了，他們是全國人民的典範，眼淚、笑容、沈痛、正經……說來就來，趙忠祥、倪萍、周濤擠出來的各種笑，多親切多自然；「焦點訪談」的幾位主持人的道德判官的表情，足以讓人相信他們都是鐵面包公的遠房侄孫。就是他們光臨「婚戀秀」節目，也照樣不苟言笑，一臉對白頭到老的真愛的沈思、感動和向往。比如，大牌主持人白岩松作爲湖南衛視周末專欄「玫瑰之約」的醒目嘉賓，爲參加此節目的年輕人戀人們上了一課，他講了最讓他感動的一幕，就是在他採訪一對文化名人之時，相依爲命的兩位老人相互對望時的眼神。他說：「那一瞬間的眼神，讓我理解了愛情的真義。」（大意如此）白岩松屬於大陸電視臺中的龍頭老大的名牌主持人，且是最嚴肅、最受歡迎的欄目的出鏡率極高的主持人，尚且要來地方台做這種酷哥酷妹的娛樂秀，看來，作秀和當官或掙錢一樣，會上癮的。

當然，在老毛的時代，中國人也作秀，比如尼克森訪華之前，爲了反帝的需要，雲南的一個女人，到處做報告，控訴在抗戰期間給予中國以巨大幫助的美軍陳納德的飛虎隊隊員曾強暴了她，她在敘述被強暴的惡夢時，講到關鍵處就會當場氣昏在講臺上。但是後來，在不同地點聽過她作報告的人們，才知道這是一種演練了無數次的表演，因爲她每到一個單位，都是如此昏倒。在當時的中國，這類「控訴秀」和「活學活用秀」遍地開花且長盛不衰。

只是那時沒有現在的刻意表演的高覺悟，更沒有目光綠瑩瑩地盯著鈔票的功利心，而是不自覺地就懷揣著一片忠心，老毛揮

手就前進；毫無心理障礙地黨叫幹啥就幹啥，讓咋表演就咋表演。而且，那時的作秀，品種單一、方式單一、風格單一，獻花的紅領巾、握槍的雷鋒、憶苦思甜的老貧農、滿身臭味的老工人、高舉紅燈的李鐵梅，舞姿剛健的洪長青、包括敬愛的周總理揮舞受傷的手臂指揮大家唱歌，紮著白羊肚手巾出席黨代會的陳永貴，用一隻手撐著劇痛的肝在鹽鹼地上迎風而立的模範縣委書記……所有的表演加在一起，也只有「政治秀」一種。而最大的戲子非老毛莫屬，最大的政治秀就是他導演並自任主角的八次接見紅衛兵。天安門城樓，多氣派的舞臺；世界上最大的廣場，多壯觀的劇場。老毛只用極爲簡單的揮手動作，在城樓上從東到西，停停走走，間或用濃重的湖南口音喊一聲「人民萬歲」，就會產生類似神奇大師發功的無邊效力，使偌大的廣場如醉如癡，讓億萬人心肺顛倒。

如今不同了，小康時代總要有點後現代的樣子，國門一開，先是各種「秀文本」接踵而來，讓人眼花繚亂，目不暇接，模仿得手忙腳亂；接著就是創造性的本土化發展，不但「政治秀」被創造性地加以豐富的娛樂包裝，使大眾在笑出眼淚的過程中就被閹割了靈魂；而且又新開拓出更爲花樣翻新的「商業秀」的廣闊天地，使任何資源哪怕是垃圾也能爲高贏利服務。決不能小看商業，錢的魅力會讓人神魂顛倒，生出許多意想不到的新花樣。

特別是在人們被高調理想狠蒙了一回，落得吃不飽穿不暖之後，一旦見到錢就特別狠，特別冷血。比如，顧城這個被社會捧爲純真詩人的殺人犯，過著賈平凹筆下的那種士大夫式的妻妾成群的生活。當那一妻一妾因忍無可忍而逃離之時，他就開始了血腥的屠戮。他剛殺完人又自殺後，國內的各媒體把他作成了真正

詩人的「殉情秀」，那把滴血的斧頭充滿了詩意的浪漫。《英兒》一書的版權拍賣及其各方爭奪被炒的沸沸揚揚，更有淵博的學人還找來國內外歷史上許多的著名文人的自殺案例，來論證顧城之死對中國文學和文化的重要意義。但是，很少有人爲倒在他斧頭之下的謝燁說句公道話。他的爹顧工也爲了金錢加入詩人秀的集體大合唱，除了誇兒子、痛兒子，借兒子之死炒自己，和別人爭奪顧城遺作的版權外，對他的兒媳、對謝燁的父母連句道歉的話都沒有。劉湛秋這朵昨日黃花也跟著起哄，耐不住寂寞地想老樹開出新枝綠葉，發文披露往日的風流，詳述他與英兒之間的曖昧戀情。一般而言，像他這樣的昔日名流，往往對這類婚外情避之猶恐不及，他卻具有反潮流精神，主動以自己的三角關係介入這次作秀，實在也算是一大勇猛無比的奇觀。只有詩人芒克還有起碼的良心，出面替謝燁說了句公道話。

顧城先是被我們這個殘忍的社會寵壞的，他從一開始就戴著假面具，直到殺人才本性畢露。小時家庭寵著他，寫了幾首詩後社會寵著他，結婚後女人們寵著他，出國後老外寵著他，殺人後，父親、朋友、社會還寵著他，生生把一個詩人寵成殺人犯還要繼續寵。在名利的驅趕下，整個社會都在炒詩人之死，大作殘忍之秀了，太無恥了。中國人在指責某人殘忍時常說「禽獸不如」，我要說中國人的殘忍遠甚過禽獸，在動物中，沒有任何一種動物的同類相殘達到過人與人之間的殘烈、陰險、惡毒的程度。如果貓狗豬們也會說話，會用語言相互指責，它們一定會指著那隻殘忍的豬說：你連人都不如。因爲動物們起碼無能力把一個殺人犯炒作成充滿詩意的「殉情秀」。

筆者實在無力一一論及百花齊放的各類秀，在此只就「孩子

秀」和「犯罪秀」略加分析。

孩子秀

孩子的身體，嬌嫩、弱小；孩子的表情，天真、直露；孩子的聲音，童稚、動聽；故而，孩子是很好的作秀資源。

農村的窮、孩子的失學和當局主導的希望工程，爲慈善秀提供了豐富的資源。大導演張藝謀善於作秀，自然不會浪費這些廉價的資源，一定要把它利用到極致。他曾經是政府不太喜歡的先鋒導演，在人們毫無心理準備之時，突然就高奏起主旋律，隨後就得到政府的大宗訂單。他立刻投桃報李地蒙太奇和慈善秀齊飛，在拍農村失學兒童的影片《一個也不能少》的百忙之中，爲該片外景地奉獻了一座希望小學。既得了國際大獎又贏得了窮孩子的大救星的美譽，處處透出民族主義的愛國心和平民主義的慈悲情懷。這類慈善，也是近年來一些文藝界的大小「腕」們最愛作的秀種，義演和義賣、捐校舍和認養失學兒童，滿世界的明星慈善家。然而，細一琢磨，發現這些明星的慈悲情懷，只作黨中央提倡的慈善秀，也等於幫助那些希望工程的主持者們進行個人的原始積累。而對諸如芳林村小學的爆炸慘案，他們的慈悲心就暫時睡著了。無怪乎，國家、企業、社會各界、特別是名流們同心協力的希望工程，絲毫無助於農村教育困境的改善。

演藝精湛者，莫過於輪椅上的張海迪，現在已經表演成政協委員和孩子們的知心大姐。她雖非演藝界明星，但其演技之爐火純青比那些明星們更有魅力，自從她被團中央發現、在人民大會堂做了一次淚水、微笑和歌詠相混合的報告後，她就成了保爾·

柯察金的「身殘志堅秀」的中國版的當代傳人，專門爲青年人和兒童上演身殘心不殘的大型連續劇。最近她又在兩會(全國政協、人大)開會期間爲孩子們的身心健康操勞，與幾位委員聯名提出限制網吧的議案。這是權力對殘疾資源的挖掘、利用和獎勵的典型表演，在權力操縱下展示殘疾式效忠之醜陋，並強迫孩子們和其他殘疾人欣賞這種醜陋，藉以顯示獨裁政權的慈悲和恩惠，用一個名利雙收的醜小鴨變白天鵝的政治秀來提供效忠的激勵。

然而，孩子秀絕非大款和名流的壟斷資源，孩子們的教育者幼稚園也要利用爲自己創收。前幾天，朋友講到他孩子所在的幼稚園，爲迎接一位大款慈善家的視察，他的女兒和另外六個孩子，在阿姨的導演下，一直排練到晚上九點多鍾，只爲了唱好一首慈善家的家鄉小調。據說，這位好心腸的款爺，出生在竹林七賢的故鄉，又最愛故鄉的民歌，他能有今天的地位和心腸，就因爲遺傳有竹林七賢的魏晉風骨，且哼著家鄉的小調出外闖蕩的。故而，阿姨們就選了七個孩子爲他唱家鄉民歌。我的朋友對此稍表不滿，阿姨說：這是你女兒的榮幸！

由此自然會聯想到各類晚會上孩子們的表演，大致與這所幼稚園的訓練差不多。銀河合唱團的孩子們大概是所有孩子的典範：動作誇張、表情嫵媚、聲音甜美，心跳一律。這類秀，要麼爲了政治上的榮譽，要麼爲了經濟上的實惠，當然，榮譽和實惠的主要佔有者是成人。

據說，想在中央電視臺的重要晚會上露一面，爲以後的作秀積累資本，首先就要有大量的投入。我在回父母家的火車上，碰到過一位大連籍少女，喜歡唱歌且嗓子不錯，父母便通過私人關

係帶女兒來北京，進入了一個少女合唱隊。爲了在中央台的某個晚會上露一面，從上到下一路打點，甚至連燈光師都要塞足夠的小費，起碼幾百元。我問她大概需要多少錢，那位母親只是說：「反正夠黑的。」在我們閒聊時，少女正趴在火車的小茶桌上趕寒假作業。

而孩子，一旦被做成政治秀，實在讓人快樂不起來。政治本身具有先天的殘酷性和表演性，區別只在於，民主政治的表演性大大高於殘酷性，而獨裁政治的殘酷性遠遠超過表演性，而且它的殘酷性隨表演性的提升而成幾何級數加強，表演性增一分，殘酷性就增十分；臺上的表演越精彩越文明，台下的現實就越粗俗越野蠻。被獨裁政治利用的孩子，要麼升入虛幻的天堂，要麼墜入真實的地獄。法輪功信徒的孩子，燒焦的身體作爲「反科學、反社會、反人類」例證，通過現代媒體展示給全世界，電視播音員的配音是：李洪志指引的升天就是下地獄，李洪志鼓吹的所謂圓滿，就是生命的自戕和毀滅。而被莫名其妙奉爲民族英雄的孩子，就會得到全社會的呵護，從最高領導人的懷抱和貼臉，到大款們的慷慨解囊。那孩子將來幹不成別的，起碼童年的記憶會把他或她培養成職業作秀者。

某年的世乒賽，一個16歲的女孩拿了冠軍。她在打球時，父親去世了。她特別愛父親，家人就沒敢告訴她。可她拿到冠軍回國後，媒體就拿著這件純個人的痛苦說事。先是她一下飛機，記者們圍上去問到她父親的死，那女孩一下就傻掉了，她還不知道這噩耗。最可惡的是中央台的「綜藝大觀」欄目，著實利用這女孩的親人之死狠狠地作了一把愛國主義秀。他們把拿了諸項冠軍的中國乒乓球隊請到演播現場。周濤這個一臉假笑的主持人，先

是聲聲悲淒地向全國億萬觀眾說明了女孩父親的死，接著一臉親切地說這女孩如何如何愛父親，最後才引出死人加孩子秀的主題，聲調高亢，表情深沈地說這女孩如何如何堅強，如何如何化巨大的喪父之痛爲更巨大的強國動力，一舉拿下了世界冠軍，爲國爭光之類。這還沒完，因爲那女孩如果不順著主持人的煽情表表態，這場秀就不完整，此台悲劇和榮耀共同表演的愛國秀的資源還沒有全部挖掘出來。果然，周濤在半擁抱著那女孩的亮相姿態中，自己熟練地完成了由悲痛到同情再到堅定再到高亢的一系列激情秀之後，親切稍微低下頭，把話筒送到女孩面前，非要讓哽咽得說不出話來的女孩講些大義凜然的話，唱唱愛國主義的高調。這女孩完全有理由拒絕這類近於強迫的無理要求，我當時真希望那個女孩，摔掉周濤遞上去的話筒，轉身走開，讓這場精心策劃的愛國秀砸鍋。

但是，這不可能，在中國，愛國主義本身就是一種難以抗拒的要挾和敲詐——以民族、國家和人民的名義，個人幾乎沒有力量也沒有意識與之對抗，何況背後還有政治強權爲支撐，何況又是在中央電視臺的演播廳內，和當紅主持人一起面對億萬觀眾。這個態一定要表，這是國家的利益、民族的要求、觀眾的期望和黨的命令。還好，女孩只是象徵性地說了幾句諸如感謝領導和全國人民關懷之類的話，就再沒有聽從周濤的進一步煽動。

這樣，一種純個人的痛苦，在這麼個無聊的節目中，變成了一樁愛國主義壯舉並向全國的億萬觀眾展示。周濤那甜蜜而溫存的外貌，代表的卻是一種野蠻的力量，逼迫女孩爲了抽象的整體利益而放棄個人痛苦。多冷酷，滿臉堆笑的周濤。多殘忍，把個人痛苦作爲政治宣傳的素材，創作出舞臺上供億萬人觀看的愛

國秀，而且是一個年輕女孩的痛苦。我們這群人這個社會這個民族，從來沒有學會過應該怎樣尊重人、愛護人，把人當作人。個人的一切包括痛苦都要作成各類爲政治或爲商業服務的表演秀，一個也不放過，孩子嬌嫩的身體不放過，孩子痛苦的心靈也不放過。

犯罪秀

最近，在大陸的三大網站，敲進「張君」這個名字，馬上就有數百條相關內容出現，比如新浪網，就396條。中央電視臺現場直播張君案開庭審訊，這個全國聞名的殺人犯，已經享受了與法輪功這樣總書記欽定的重大政治事件，與陳希同、胡長清、成克傑這些高官腐敗案相同的媒體待遇，這大概是連張君本人也從來不敢想的奢望。

這位自認爲在中國的犯罪分子中他的個人素質是數一數二的罪犯，又在法庭上聲言「我要做中國的第一殺手」。自1991年6月至2000年9月間，張君用過八個化名，單獨或組織、指揮近20人，在重慶、湖南、湖北等地持槍持械搶劫、故意殺人、搶劫槍支彈藥22次，致 28人死亡，5人重傷，17人輕傷，搶劫財物價值人民幣536. 9萬元和出租轎車5輛，搶劫執勤警察的微型衝鋒槍2支及子彈20發，而且多次在光天化日之下，在都市繁華地區公然持槍搶劫銀行、金店，開槍殺人。非法購買了手槍15支、子彈2500餘發，霰彈獵槍23支及子彈2000餘發，手榴彈1枚，手雷2枚。公安局追捕六年才捉拿歸案之後，他搭上現代傳媒的超速警車，被無數媒體警察簇擁著，遊遍全國的每個角落。關於張君其人其

事，張君牽連的人的其人其事，與這些被牽連人有關的人的其人其事……每個細節都被媒體放大後再交給讀者，張君案被完全戲劇化甚至虛擬化了，變成了一種被媒體操控的犯罪表演，變成中國最大的「犯罪秀」。

文革時，只有十一、二歲的我，經常看到罪大惡極的死刑犯被遊街示眾，幾輛陳舊的大卡車上，被五花大綁的死刑犯一律剃了光頭，或後脖頸了插一塊尖形的牌子，或胸前掛著一塊長方形的牌子，白底，粗粗的黑字，正中是罪犯的姓名，字寫得很大，下面的小字寫著罪名。每個罪犯的兩邊站著兩個戴著鋼盔和白手套的軍人，車廂的四周站滿了戴鋼盔的荷槍實彈的士兵，那些即將被處決的犯人，有的想昂頭以示不怕死，但是軍人會使勁把他的頭按下去；有的已經完全癱軟，需要兩個士兵用力向上提著，其中一士兵還要用戴著白手套的一隻手，使勁搬著罪犯的禿頭使其後仰，這種姿勢才能讓圍觀者看到他那嚇得鼻涕橫流的臉。最醒目的是黑色名字上的大紅叉子。我當時，最羨慕的是士兵頭上的軍帽和雪白的手套。

法國哲人福科在《規訓和懲罰》中，對18世紀的斷頭臺處決犯人有過生動的描述和精闢的分析。每當有絞刑或斷頭的處決時，工作停頓，酒館爆滿，人們罵罵咧咧興高采烈地奔向處決現場，斷頭臺上是罪惡、恥辱、血腥、恐怖的展示，台下是人頭攢動的喝采、叫喊、亢奮、甚至狂歡的沸騰場面。他認爲，這種處罰與其說是司法儀式，不如說是政治儀式更準確。權力借此種司法程式來展示其威嚴和恫嚇，萬眾歡呼、群情激憤的壯觀禮贊著社會對死亡和屍體的暴虐。然而，權力者恰恰沒有預料到的是，這同時又是一個把罪犯轉化爲英雄的過程，罪犯受刑時表現的越

瀟灑越坦然，其綠林好漢的榮耀就越燦爛越輝煌，人們開始漫罵司法機構，譏諷官員、警察和劊子手，甚至向他們投擲石塊。結果是榮辱的完全顛倒：公開示眾的處決儀式，原本僅僅是爲了顯示君主的威懾力量，卻變成了狂歡的民眾對法律的顛覆，對權威的嘲弄，罪犯在圍觀者心中變成了英雄，台下看客的呼喊與臺上罪犯的凜然融在一起，鼓勵著對權力及其法律的冒犯。

雖然，在嚴打期間，張君沒有像其他重大罪犯那樣，享受到體育場、廣場的開公審大會的幸運，沒有身臨其境過萬眾矚目的場面，但是現代傳媒的巨大力量，使他的公眾效應遠遠超過爲威懾犯罪而舉行的這類集會式的公開展示。「電子遊街」把罪犯在法庭上的狂妄形象和一言一行傳遍整個中國，人們將從網路、電視、廣播、報紙等媒體的五花八門的報導中，更多面、更細緻、更快捷地瞭解罪惡的細節和案情的進展。

甚至，張君案開庭那天，他已經知道了中央電視臺的現場直播計劃，他本人太清楚這是人生最後的一出大戲，一定要在法庭上把秀作足，這樣也好爲媒體炒作提供更多的資源，讓十三億人都看看自己最後的作秀，是何等的大義凜然！他刻意要扮演一個明星罪犯、反面英雄、被模仿的楷模，以此來引起民眾的關注和歡呼。就連與張君打了六年交道的重慶市公安局副局長文強也承認張君很會表演：「一旦面對公眾面對媒體，張君就馬上表現得很從容。」

的確，張君做到了，從容得狂妄，從容得引導媒體爲自己製造出耀眼的光環。媒體對開庭的報導，煽情得像是過某個重要的節日一樣。看看這些隨手拈來的標題：「張軍在法庭上口吐狂言」、「張軍揚言要當庭殺死出賣他的情婦」、「張君案庭審波瀾

起屍檢照片血腥旁聽者不忍目睹」,「殺人惡魔創中國犯罪史上的數個第一」、「張君一生離不開槍和女人」……有些新聞標題就直接引用張君在法庭上的原話,如:「我當初沒殺了你你要謝我」、「誰對不起我,我就要殺了他全家!」、「我不會對任何人有感情,只是利用」、「想做領袖成名,肯定要犧牲要打死好多人」、「如果不把對手滅掉,就當不了英雄,成不了領袖」;其中還不乏人情味和正義性的噱頭,比如「張君曾想綁架記者寫自傳」,「自傳的書名叫《上路》想要穿布鞋」,「張君殺貪官爲民除害」;還有報導的題目直接就是少女對張君的崇拜:「少女何以愛張君,張君本是癡情種」。

這是新經濟時代的「遊街」,從一個城鎮的幾條街道走向互聯網的四通八達的電子街道。在這個過程中,張君充分展示了自己的邪惡魅力,不僅在事實上,而且在公眾形象上實現了「我要做中國第一殺手」的誓言。這難道不是福科說的一種展示、一種表演、一種由罪犯到英雄的神奇轉化嗎!

這既是古老的司法政治化的儀式,又是21世紀作秀時代的最新品種,從整個追蹤報導看,媒體先把罪犯做成恐怖秀:張君,從1991年犯第一次罪和從1993年殺了第一個人之後,便橫行四方、殺人無數、搶錢數萬、情婦成打、無惡不作、轟動全國。盡力渲染手段之殘忍、智慧之傑出、膽量之超人、場面之血腥,特別是受害者和追捕張君的警察們的追述,更是細緻入微,甚至讓人聯想到那些影視作品中的黑幫老大。

接下來是「二奶秀」,一個個情婦姘頭如數家珍,娓娓道來,細節越細越好,情節越戲劇化越引人入勝:張君怎樣以男子漢的魅力周旋於無數女人之間,使女人們不僅把肉體和愛全部奉獻,

而且在關鍵時刻不惜把生命陪給張君，甚至可以用上湯顯祖《牡丹亭》中的愛情名言：「愛可以使人生，可以使人死，亦可以使人死而復生。」文強副局長告訴記者：他審問過的與張君有關係的女人很多(決不僅是四個陪張君一起上法庭的情婦)，但是沒有一個女人說張君壞話，而且她們個個都相信，張君最愛的是自己。文強感歎道，像張君這樣的大惡魔，居然沒有犯強姦罪！他搞了那麼多女人，我們在審訊時卻得不到任何他強暴女人的證據。無怪乎有「張君本是癡情種」新聞標題。

再接下來是政績秀，公安部對張君專案組的表彰，英雄的武警介紹經驗，上級領導如何重視、破案難度如何大、追捕過程如何曲折漫長， 在每一個關節點上如何與罪犯鬥智鬥勇……看這樣的報導，甚至讓人懷疑是拷貝三流警匪片；但是，也有較真的媒體質問道：追捕張君的過程長達六年，通緝令發出後張君仍然長時間肆無忌憚地殺人越貨，我們的政府部門、公安部門就沒有責任，就不該追究追究，反而大肆表彰！

最後，小康時代的一切炒作的核心，還要落實到商業秀上，誰讓党叫咱發財呢。張君這個名字，可以使媒體增加點擊率、收視率和發行量，可以讓製片人把他的罪惡改編成長篇電視劇，書商要立馬攢出一本以他爲主角的暢銷書，西安一壯陽藥要以張君爲雄起的象徵大作廣告，就連小吃店的老闆也新上市了「張君包子」，記者問老闆娘爲何這麼幹，人家的回答充滿嫉惡如仇的正義感：吃著解恨！

其實，類似張君這樣的兇殘還是體制外的非法行爲，這類行爲在任何社會都難以完全根絕；對張君案的媒體炒作，不過是借嚴打之風的「政治正確」來名正言順的作一把商業秀。而在如今

中國，最殘忍的還是體制本身的野蠻，不僅傷害人的肉體，對人的精神的閹割更令人不寒而慄。儘管商業的衝擊和媒體的泛濫，可以給赤裸裸的制度殘忍包裝成現代的各種「秀」，但是內核裡的中世紀野蠻依舊。權力壟斷、媒體壟斷和文化壟斷的完美結合的產物「政治秀」，難道比福科所敘述的18世紀的斷頭臺更文明嗎？

2001年7月15日於北京家中

割去社會的舌頭

在大陸中國這樣實行嚴格的言論箝制的社會，每天只能看按主旋律的要求出版的報紙、雜誌和播出的電視節目，但只要是有心人，仍然透過極爲有限的冰山之一角，從電視上和出版物裡，發現令人震驚的事件。

大陸部分公安目無法紀

從三月底開始，《山西青年報》、《周末》、《羊城晚報》、《齊魯晚報》、《滇池晨報》、《人民公安報》等媒體都報導了一件駭人聽聞的野蠻暴行：年僅20歲的農民李綠松，因爲經常舉報農村中的種種黑暗現象，於1999年12月11日突然被傳喚到山西省嵐縣公安局，理由是涉嫌盜竊了縣政府機關大門口的牌子。而直到小夥子因瀕臨死亡被釋放，公安人員也沒有澄清事實的真相。《南方周末》對此執法違法、惡性傷人的事件進行了跟蹤採訪和報導。

眾所周知，在大陸，警察是經常故意尋找藉口亂抓人的，有時根本不用任何藉口。此次抓李綠松，不過是想用「無產階級專政」的鐵拳，教訓教訓不願安分守己地做順民的好事多嘴的人。

這個20歲的年輕農民，在看守所裡被用各種刑具打得遍體鱗傷，昏死過去。當他醒來後，發現自己被捆得緊緊的，他的周圍站著一些人，一個個面目猙獰。小夥子只認識其中一個叫楊旺元的副局長。李綠松從進了看守所後，除了被審訊和挨打之外，沒吃過東西，沒喝過水。他以爲有副局長在場，警察們總該收斂一點兒吧。於是他就向公安人員要飯吃、要水喝。萬萬沒有想到的是，那個姓楊的副局長不但沒有給飯吃給水喝，反而惡狠狠地說：「尿也不給你喝。」小夥子急了，就罵這些喪失起碼人性和職業操守的警察：「你們是狗官、貪官，操你們家娘！」他還唾了這些警察。姓楊的副局長居然又說：「老子讓你永遠不能唾和罵！」於是，警察們找來鉗子、刀子想撬開他的嘴，小夥子死不張口，他們就用電棍第六次把小夥子打昏。

當小夥子再一次醒來時，滿口是血，嘴痛得無法忍受，想說話卻發不出聲，這才使他意識到，原來他的舌頭被割掉了半截，鼻子也挨了刀。整整12天，李綠松一直戴著手銬和腳鐐，被捆在監號的門板上，雙手和雙腳浮腫，口腔潰爛，身上的傷疤也爛了，臭氣熏人。他不吃不喝，靠強行灌流食。12天後，警察們看小夥子被折磨得快不行了，怕出了人命不好交代，就把奄奄一息的李綠松送進了嵐縣人民醫院搶救。經檢查，他的傷勢觸目驚心：舌頭被割去1.2～1.5釐米；鼻尖有S型傷痕；雙腳踝、腳後跟、手腕處都有大面積的傷疤和很厚的血痂；臀部和後腰也有多處傷疤。他入院後的狀態在醫院的入院病歷中記載有：「消化道出血，營養不良，褥瘡，不言不語，不吃，以鼻飼、輸液支援，……」不到半個月，他原來150斤的體重，只剩下50多斤，用骨瘦如柴來描述也決不過分。雖然李氏父子以公安局非法抓人、刑訊逼供、

致人傷殘的理由，上告至縣檢察院，但是四個多月過去了，至今沒有任何就此立案的消息。

這些公安人員之所以如此肆無忌憚，就在於這是一種制度性行爲，他們知道官官相護的規則，何況這是爲了咱政府的高大形象呢！往小裡說，這是維護縣政府的權威；往大處想，這是爲了中共政權的安全。有了這些崇高的目的，無論多麼殘忍，也不會得到公正的追究和制裁，反而會受到制度的保護甚至慫恿。要不然，何以解釋此類暴行的綿綿不絕。這種割掉人的舌頭的殘忍暴行，決不是某個職業道德低下或生性殘忍的政府人員的個人行爲，而是極權社會的統治者的集體行爲和制度行爲。爲了維護專制權力，再殘忍的暴行在極權者看來都是可行的。爲達目的而不擇手段，目的崇高就更可以肆無忌憚地爲所欲爲，已經是在獨裁之下苟活了幾千年的中國人的共同心理和行爲常態。1957年毛澤東在莫斯科參加國際共產主義會議，談到可能發生的世界大戰時居然說：「要設想一下，如果爆發戰爭要死多少人？全世界二十七億人口，可能損失三分之一，再多一點，可能損失一半……極而言之，死掉一半人帝國主義打平了，全世界社會主義化了，再過多少年，又會有二十七億……」1989年，鄧小平爲了中共政權的安全(穩定壓倒一切)，不惜出動全副武裝的軍人屠殺和平請願的手無寸鐵的民眾。所以，那些割掉李綠松的舌頭的公安人員，非但得不到法律的制裁，說不定日後還會被加官進爵呢。

這起爲了封人之口就殘忍地割掉人的舌頭的事件，發生在文革結束和改革開放二十多年之後，不能不令人想起文革中，同樣是爲了封人之口，遼寧籍的張志新在處決前被割斷了喉嚨，江西籍的女政治犯李九蓮在被處決時，用竹簽子穿透她的雙唇和舌

頭。最近，大陸對自由知識界進行口誅筆伐，對出版界嚴加整頓（措施包括禁止發行、關閉出版社、停業、撤職甚至逮捕），《光明日報》連續發表文革式的聲討文章，加之以開除公職、停止授課、中斷研究專案的政府資助等手段，無非是爲了打壓還敢於直言的人。

香港名報人金庸要求新聞界向解放軍學習

這種極權社會的箝制輿論的高壓，連實行「一國兩制」的香港也未能倖免。九七之後，香港原有的輿論自由的空間日益萎縮，老報人金庸、徐鑄成，全不顧及他們在香港的多年新聞從業經驗，也不顧及他們作爲保障言論自由制度的最大受惠者的事實，出賣良知地先後發表有違於言論自由、討好中共政權的言論。金、徐二人的言論，善意地想是因爲歲數大了，老糊塗了；往惡裡想就是被收買了。誰讓自己偏要在大陸也混個體面而安全的社會地位呢。他們的言論與大陸的政協委員們的表態已經沒有根本的區別了，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特別是金庸，簡直就是自我作賤自我嘲諷。他筆下的人物的那種俠風道骨、肝膽柔腸，儘管有些不食人間煙火的虛假聖潔，畢竟還感動過許多人。但是作家本人卻太精於世故人情和利益計算，還沒等大陸的高官們提出要求，先就耐不住寂寞地急於「自我約束」且教導年輕一代了：要新聞從業者向中國人民解放軍學習。可也是，毛主席早就教導過：一個槍桿子，一個筆桿子，奪取政權要靠這兩桿子，保衛政權也要靠這兩桿子。筆桿子向槍桿子學習正是深得老人家教導之三味，且有發揚光大之創造性。這也讓我想起了《人民公安報》

上發表的那篇關於李綠松事件的報導。這篇報導出自《山西晚報》的一名記者的筆下，他曾於4月24日跟隨山西省公安廳的官員去醫院看過李綠松，他居然寫道：「記者看到李綠松的舌頭沒斷」、「如果李綠松戴上械具後安然不動，一般不會造成這樣大面積的傷害」……顯然，這位記者喪失了作爲一名新聞從業者的職業道德和作爲一個人的起碼良知，甘願充當野蠻政府的馴服工具。不知道這篇報導是否符合金庸老先生最新的新聞從業標準？

最近，中共駐港官員王超鳳，居然在中央政府信誓旦旦要求駐港官員不得干涉港人自治，且有《基本法》的明確規定的情況下，就因爲某媒體對臺灣當選副總統呂秀蓮的採訪，公然警告香港的新聞界什麼可以發表、什麼不可以發表。在言論自由已經融入人們的思維習慣和行爲方式的香港，他之所以敢如此明目張膽地冒天下之大不韙，就是因爲他知道自己的背後有一個龐大的一黨獨裁政權的支撐。以當今的國際環境而論，中共在無力對香港的言論自由進行公開的或直接的強行管制的情況下，可以通過類似特首選舉式地的方式來操縱立法進行限制。如果達不到暗中操縱立法來限制言論自由的目的，中共最起碼可以通過類似王超鳳式的警告和金庸式的利益收買，使香港的新聞界保持一種明智的「自我約束」，從而達到其政治目的。

在古代的專制社會，維護政權的手段除了暴力之外，靠的是愚民和大眾的沉默。或者說，古代的專制還留給人們保持沉默的權利。而現代的極權統治則連沉默的權利也給剝奪了，它強迫人們表態；它對人的控制和追查深入到人的大腦的最隱秘之處，甚至連夢都不敢做錯；它或強迫或賄賂，讓人對自己的良知說謊。這是最殘忍的剝奪。因爲如果被統治者還有保持沉默的權利，至

少其良心能得到無奈之中的最後一點點道義上的安慰，沉默的同謀總要比公開的辯護少一點無恥和殘忍。但是極權主義連這最後一點點可憐的自我安慰都給剝奪了。

在當今世界，大陸中國一定是人們公開表態的典範——從對毛主席的「三忠於、四無限」到高舉「總設計師」理論的偉大旗幟再到團結在「江核心」的周圍。大陸中國的政協就是執政黨眷養的最溫順的表態工具。說政協是「花瓶」，我以爲已經是莫大的恭維了。各界名流的薈萃之地，實際上是一群爭搶極權政治的殘羹敗葉的乞丐。

大陸的改革開放只是表面而已

現在，一提起鄧小平所開啓的改革開放，人們都人云亦云地說，這二十多年的變化之大爲中國歷史之最。但是，我卻看不出這個獨裁社會有什麼根本的變化。與「五四」時期相比，現在的大陸中國簡直是行屍走肉，所有的變化都是表面的，在生活水平提高的同時，人性的墮落極爲迅速。「小康生活」的許諾，養肥的是那些特權階層的大大小小的社會蛀蟲(貪污犯)。肉越多，靈越瘦；肉體的腦滿腸肥之時，就是靈魂的皮包骨頭之日。

雖然在西方的古羅馬時代，割喉是刑罰之一，但是隨著保障言論自由和禁止酷刑的近現代文明的到來，這種殘酷的政府行爲早已絕跡。在20世紀末，羅馬天主教教皇對宗教法庭曾經燒死了布魯諾、審判了迦利略的歷史，進行了沈痛而真誠的懺悔，並爲迦利略平反。

由此反觀中國，上溯幾千年帝制時代的歷史，爲了封人之

口，割斷喉嚨、切掉舌頭是合法的刑罰，被殘害的直言者代不乏人。從秦始皇的「焚書坑儒」到明清的「文字獄」，從毛澤東的「文革」到鄧小平的「六四大屠殺」再到江澤民的「鎮壓民主黨和法輪功」，雖然我們的祖先早就有「防人之口，甚於防川」的古訓，但是專制者的本性決定了他們非要做這種「甚於防川」的蠢事。在言論自由已經成爲人類公認的基本權利和社會公正之標準的今天，大陸中國統治者從來沒有對自己的暴行做過任何懺悔，沒有對那些因言論而受迫害者做過一次哪怕是裝點門面的道歉。言論自由仍然是一種即使付出鮮血和生命的代價也爭取不到的公民權利，大陸的警察仍然可以採取蒙昧時代的野蠻手段——割掉舌頭——來扼殺人們說話的自由。

從古至今，無論時代怎樣變，只要極權制度不變，所有的極權者爲了維護其絕對權力不受挑戰，他們就必然要控制言論，而控制的方法萬世一宗——先用小恩小惠收買社會的舌頭，收買不成，再用強權的暴力之刃割掉社會的舌頭。

2000年5月5日於北京家中

在恐懼和利誘中學習無恥

令人心寒的對比

大陸知識界的人聚餐，酒酣耳紅、談興正濃之時，法輪功肯定成了佐餐的主要話題之一。他們談論最多的，不是弱勢群體的無助和悲慘，而是高層決策的愚蠢和低能；不是對法輪功信眾的堅韌和頑強的敬意，而是爲中共政權陷入無法自拔的泥潭而幸災樂禍；不是對信仰及言論自由的權利被野蠻剝奪的義憤，而是旁觀者看熱鬧的冷漠。他們最爲氣憤的，不是專政機器的殘忍和僵化，而是李洪志的貪生怕死、懦弱猥瑣——不敢回國面對獨裁者的監獄，爲他的信徒們承擔苦難和責任，白白浪費了既能置中共於無法收場的窘境、又能成就爲信仰而殉難的當代耶穌的大好時機。我忽然想起了八九運動的某些細節：1989年5月中旬，我在天安門廣場爲絕食的學生募捐，共募捐到四千多元錢，捐款者絕大多數是普通百姓。最令我感動的，是一位來自河南農村的中年農婦。她來北京上訪，把僅有的回家路費50元硬塞到募捐箱中。我執意不肯收，她竟哭了，幾乎要以下跪來求我收下，她邊哭邊

說：「別看不起我這個平民百姓。我也有一肚子苦水要倒。大學生們是拿性命替我們說話呀！我寧可走著回家也要捐這個錢。」時至今日，我仍然非常清晰地記得，她臉上的皺紋之多和皮膚之粗，顯然與她的實際年齡不符，長期的田間勞作和艱苦生活，使她的外貌過早地衰老。但她那皺紋中的淚痕、那不標準的普通話，所呈現的卻是善良、樸素、真誠的心靈。

十二年前的八九運動，主角無疑是大學生和知識分子，他們得到了各階層民眾的廣泛而公開的支援，而且在長達半個月的反抗戒嚴的過程中，市民已經由支持者和同情者變成了運動的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正是由於廣大社會弱勢群體的強有力的反抗，戒嚴部隊才遲遲不能進城。可以說，沒有民眾廣泛而持久的聲援和支援，八九運動絕對無法堅持一個半月之久。更令人肅然起敬和痛心負疚的是，在六四大屠殺和隨後的整肅之中，付出代價最爲慘重的也是一般的老百姓。被槍斃和被判重刑的「暴徒」是他們，大多數死於或致殘於劊子手的槍彈的也是他們。看看丁子霖先生收集到的六四死難者名單，絕大部分是那些默默無聞的百姓。

然而，十二年後的今天，中共對主要由弱勢群體組成的法輪功信眾的長達近20個月的鎮壓，手無寸鐵的普通信眾爲了捍衛信仰自由和言論自由而不畏強暴、進行頑強的抗爭，一邊是除了堅定的信仰和殉難的精神便一無所有的弱勢百姓，一邊是沒有信仰卻擁有全部國家機器的執政黨。面對如此懸殊的實力差別，如此鮮明的善與惡、正與邪之間的對比，大學生和知識分子所表現出的冷漠，恰恰與八九運動之時老百姓對他們的熱情支援，形成了令人震驚的鮮明對照——他們對暴行保持整體的沉默，不但沒有群體性的公開性的聲援、支援和鳴不平，連個體性的公開同情的

文字都極爲罕見(只有李慎之、鮑彤、楊子立、任不寐等極少數人公開譴責中共對法輪功的鎮壓)；不但沒有同情和支援，反而在執政黨的政治恐怖和利益收買的雙重要挾下，一些著名知識分子(如王蒙、劉恒等，還有遠在海峽那邊的李敖也來湊熱鬧)和大學生公開加入對法輪功的文革式批判和聲討之中。

他們之中的有些人，以法輪功的荒謬、信徒們的愚昧和李洪志的人格低下爲藉口，替自己的沉默乃至公開與執政者同謀進行辯護。但是，稍有現代常識的人都清楚，人們之間的信仰或觀點的歧途是一回事，政府依仗強權暴力剝奪信仰、思想、言論的自由權利是另一回事。即便是荒謬、愚昧和人格低下，也不能成爲「不准信仰」或「鎮壓有理」的正當理由。在其他場合(如某次會議或某篇文章)，他們會振振有詞地宣揚自由主義理論，無數次地引用伏爾泰的名言：「我可以不同意某人的觀點，但我要用生命捍衛每個人說出自己觀點的權利。」但是，當剝奪平民百姓的信仰和言論的自由權利的暴行就發生在眼前、在身邊之時，他們卻毫無道德負擔地對之視而不見。

這樣的對比實在令人痛心且沮喪：當知識分子走上街頭、反抗暴政和要求人的基本權利之時，老百姓給予了巨大的支援，並爲此付出慘重的代價——自由、鮮血與生命；而當老百姓走上街頭、爲捍衛人的基本權利而反抗獨裁政權之時，知識分子卻冷漠旁觀、幸災樂禍甚至助紂爲虐。如果將來又一次八九運動爆發，知識分子還有資格指望獲得老百姓的熱情支援嗎？我們因恐懼和懦弱而對別人的無辜受難閉上眼睛，就沒有資格指望當同樣的災難降臨到自己頭上之時，我們會得到別人的聲援和幫助。

中國的歷史有多長，中國人的人權被肆意剝奪的歷史就有多

久。在捍衛人權的事業中，每個人都沒有理由做旁觀者。無論何時何地，政府對某個人的人權的強制性或暴力性剝奪，都是對所有人的人權的非法侵犯。當一個社會在人權問題上普遍採取明哲保身的態度時，不僅是受害者的人權被全社會出賣，而且每個人都在向暴政出賣自己的人權。

年輕的面孔　古老的面具

從大連回北京，火車上人滿爲患。在散發著惡臭的車廂裡，隔著過道上七倒八歪的旅客，我的側面坐著六個大學生，四男兩女，他們一直在小聲議論法輪功。其中有一個女生的家人曾經癡迷於法輪的旋轉，經過無數次恐嚇式的教育，現在不再外出護法，只在家中偷著練功。另外幾人對女同學家人的遭遇表示了應有的同情。我看著他們年輕的面孔，忽然想到，如果中央電視臺記者把話筒伸向他們，讓他們就天安門自焚事件說幾句觀感，會如何回答？

其實，最近的電視節目已經給出了答案。在由中共發起的全民聲討法輪功的運動中，官方傳媒製作了大量的專題和隨機採訪。看這類節目，我發現電視螢幕上出鏡率最高的群體有兩個，一是轉化了的信徒，一是大學生。在校園、在宿舍、在街頭，大學生出盡了風頭。有人正在反邪教長卷上簽名、有人正走在大街上、有人正在宣讀拒絕邪教的倡議書、有人正在收看電視新聞……那一張張對法輪功充滿憤怒的年輕面孔，那一套套咬牙切齒的暴力語言，恍如回到了大批判的年代，莫非他們就是當年狂熱投入造反的紅衛兵?!

我非常吃驚，這些出生於八十年代的新新人類，沒有親身經歷過什麼大的政治運動，更由於官方的封鎖，他們對文革大劫難和六四大血案也沒有什麼深刻的記憶。他們平時對政治對意識形態都很淡漠甚至反感。他們在九十年代大行其道的發財欲望、大眾文化和網路遊戲的熏陶下成長，他們在物質生活上是小康承諾的受益者，大都衣食無憂、熱衷於享樂。他們最熟悉的應該是港臺式的嬌聲軟語，最驕傲的應該是「比酷」、「裝嫩」的生活方式，最熱衷的應該是網上的虛擬世界，最羨慕的應該是一夜暴富的年輕IT和瞬間成名的各類明星……但是，當他們在中共發動的高度政治化和意識形態化的「校園拒絕邪教運動」中接受媒體採訪時，怎麼滿口全是我這代經歷過大規模政治運動的人才耳詳能熟的暴力語言和仇恨腔調，而且他們能夠在話筒面前極爲流暢地、甚至不假思索地滔滔不絕，什麼「狼子野心」、「滅絕人性」、「陰險毒辣」，什麼「罄竹難書」、「禍國殃民」、「充當國際反華勢力的走狗」……似乎這套語言系統和表達方式，經過反覆的灌輸和訓練，已經成爲一種不假思索的本能，滲入到骨髓裡。

改革開放以來，被普遍認同的中共意識形態的日趨破產，並不如人們預想的那樣樂觀。實際上，它在國人身上表現爲日益明顯的人格分裂：私下裡，幾乎所有的人包括中共黨員，都對主旋律的意識形態宣傳不屑一顧；而在公開場合，幾乎所有的人包括先鋒藝術家、學院知識分子、玩酷的新新人類，其說辭都能毫無心理障礙地變成黨報的頭版頭條。這次全民揭批法輪功運動，充分證明國人普遍犬儒化的人格分裂的嚴重程度。中共長期的強制性意識形態灌輸的巨大作用，越是在執政黨最需要的時刻，發揮得越是淋漓盡致。它在某種程度上能把人腦變成了電腦，操控者

似乎把四項基本原則變成了「晶片」，編出一套固定程式輸入，一旦執政者需要人們公開表態支援其決策時，只要輕輕按一下滑鼠，程式就迅速啓動並通暢運行，源源不斷地向外界輸出有利於執政黨的一整套資訊。

中共在維持其獨裁權力上，有著豐富的操控經驗和宣傳技巧。在這次聲討法輪功的運動中，對自焚事件的利用，特別是對一個正值似玉年華的女大學生和一個12歲小學生的利用，使這種經驗的發揮和技巧的運用達到了改革以來的高峰。中共之所以在電視媒體上把大學生作爲重點的暴光群體，就是想向外界證明其政權有著最廣泛的民意支援。因爲，令中共最頭痛的不安分群體之一就是大學生，特別在經歷了以大學生爲主體的八九運動之後，能否獲得大學生的支援，成爲中共政權的民意支援度的最具象徵性的指標。一個社會的未來精英的主要來源是大學生，他們年輕，代表著未來；他們有知識，是社會精英的主要後備群體。一個政權如果能夠得到這一群體的自覺支援，就等於提前把握住了未來的執政權力。如果說，八九運動是改革以來大學生挑戰中共政權之最，那麼，當前「校園拒絕邪教運動」如火如荼地展開，就是改革以來大學生支援中共決策之最。

在資訊時代，網路上的虛擬世界預示著人類生存方式的又一次飛躍。而我們中華民族生存方式，並沒有隨著科技的飛速進步而有實質性的改變，從竹簡時代到影視時代，從平面傳媒到立體傳媒，從驛站到互聯網，凡是在需要公開表態的公開場合，我們一直生存於虛擬世界之中。我們在毫不瞭解西方的時候，就言之鑿鑿地把白種人視爲魔鬼；我們根本不知道劉少奇到底做過些什麼對不起毛主席的罪惡勾當，但我們卻可以完全按照別人爲我們

準備好的理論和證詞聲討「大叛徒、大內奸、大工賊」。現在，我們中的大多數人根本沒有讀過《轉法輪》，對李洪志的生平和行跡所知寥寥，對眾多的法輪功信徒的生存狀態和言行也毫不關心，但是我們可以完全按照官方提供的一面之詞和定性，聲討「反社會、反科學、反人性」的邪教，甚至在我們不相信或半信半疑的情況下，也可以眞誠地做出義憤填膺的表情、發出咬牙切齒的聲音。換言之，強權下的恐怖政治和謊言宣傳已經把我們訓練成了別人的面具，且運用起來很是得心應手，隨時準備著登臺表演。我們可以不看證據、不經思考、不要良心，在一個完全由別人虛擬的舞臺上進行虛擬的表演，而根本就不會顧忌這樣的表演對他人、對自身、對人性、對尊嚴的傷害和作踐。我們這樣做的時候，並不覺得失去了什麼，反而還可能暗自慶倖名利雙收。

這些在電視螢幕上的年輕面孔，自覺地充當了古老獨裁統治的雙重面具，既裝飾著統治者爲顯示民意支援而導演的盛大化妝舞會，又裝飾了個人對參加這一盛事的熱衷；既使政權達到了充分動員民眾支援其決策的目的，又使個人通過面具表態達到在現行體制下的既得利益最大化。特別是那些受到執政黨表彰的年輕學子，等於爲自己的利益最大化提前投資，現行體制將會保證當他們走出校園時，其投資已經有了成倍的收益。這種心口不一的處事習慣，私下行爲與公開表演的全然分裂，完美地統一於坐穩了奴隸地位的生存策略。這是我們這個古老民族源遠流長的傳統，大公無私的官方口號下，牟取的恰恰是個人私利的最大化，所謂「無私方能成大私」，此之謂也。

一群生活在人權高於主權時代的大學生，一個經歷了無數人爲大災難的民族，面對無助的弱勢群體和以生命殉信仰的信徒，

居然仍然安於從搖籃到墳墓的假面下的生存，而沒有任何自省和內疚。我們習慣了把祖國稱爲母親，難道這位母親遺傳給後代的只有謊言?!難道我們真的在子宮中就必須開始學習無恥了嗎?!

2001年3月6日於北京家中

豬的哲學

新世紀的中國，除了多了一座至今仍未完工的「世紀壇」之外，一切照舊。利益至上的平庸深入骨髓，正義和邪惡之間的界限，也幾乎被對既得利益的共同貪婪模糊掉了。小康承諾所購買的，恰恰是爛透了的靈魂——幾乎沒有一個官員是清白的、沒有一分錢是乾淨的，沒有一個字是誠實的。

有人會說，平庸是現代化的特徵，因爲現代化本身就是世俗化，世俗化就是追求利益的合法化，總不能要求不講利益的世俗化吧。的確，現代化過程中產生的民主制度——即多數決定的規則——肯定是以利益交換爲核心的世俗化甚至平庸化的遊戲，但是，第一，利益交換必須有明確的規則，即由外在的法律和內在的良心共同支撐的公平交易規則。而在中國，利益取代了法律和良心，成爲人治秩序和厚黑學的唯一支撐；第二，也是更重要的，支撐民主制度的價值基礎——自由——則具有先天的超世俗的高貴品質，沒有自由優先的價值取向，民主不但可能導致希特勒式的暴政，導致以人民的名義實施的個人或政黨的獨裁，而且會使人性的高貴、尊嚴和美被無名氏多數的平庸所同化。在民主的規則中，多數具有天然的合法性，多數一旦動員起來，既可以爲任何理

想、哪怕是烏托邦理想而慷慨赴死，也能夠充當野心家的工具和不惜血流成河的劊子手。中國從來不乏民眾造反的「大民主」傳統，卻壓根沒有自由優先的民主傳統，麵包之下，自由難存。

現代化是日常生活的世俗化，民主化是政治生活的平庸化，對於大眾來說，他們要的就是這種世俗的平庸的幸福。如果我們中國人已經有了現代化和民主化，世俗一點兒，平庸一點兒，也就罷了。可悲又可笑的是，我們還什麼也不擁有，還在面對一個專制政權，而包括精英在內的整個社會，就已經世俗得純粹、平庸得透明。

領導人的平庸是精英們的懦弱所造成

作報告時屢屢念出錯別字的李鵬，在國內的政績乏善可陳，在國際舞臺上又不太會自我控制，很容易脾氣暴躁。只因爲外國政府沒能按照他的要求制止對他出訪的抗議，他就會突然改變早已安排好的日程，給接待國政府臉色看。對李鵬來說，看不看歌德的故居完全是小插曲，重要的是泱泱大國執政者的尊嚴。何況，本來這種日程的安排，就是附庸風雅大於對偉大詩人的內心敬重。

會說多種外語的江澤民很善於表演，剛在五十年大慶上檢閱完三軍，又於新千年零時登上沒有竣工的世紀壇祭祖，講完了「三講」又講「三個代表」，鎮壓了民主黨又滅了法輪功，並時不時地以大國主宰的自信頻頻進行國際巡迴演出，在莫札特用過的鋼琴上歷經坎坷地彈完了「洪湖水」，然後又伸手搶過外國元首授予的勳章，急不可耐地自己給自己戴在胸前。

就連一度被國際社會和國內民眾寄以厚望的朱鎔基，在剛就任總理的記者招待會上，以赴湯蹈火、萬死不辭的充足底氣，語驚四座。接著出訪美國，受到破格接待，頗有大國領袖的風采。但是七月份訪問德國，朱鎔基以黑金政治和不到40%的選票作爲論據，輕蔑地向全世界宣布：臺灣大選是個民主的笑話。於是，他宣布的這個笑話，就在國際上成了關於民主常識的最大笑話。

朋友相聚聊天，常發感歎：如此平庸、甚至連基本常識都缺乏的中共第三代執政者，爲什麼在大屠殺之後，在中共政權的道義合法性幾乎喪失殆盡的危機中，還能夠穩坐最高權力的交椅十年？這難道不是大陸的知識精英們的恥辱嗎？沒錯，是恥辱。但是，這決不是傻子統治聰明人、懦夫指揮勇士、平庸領導高貴的恥辱，而是一個擁有十三億人口的民族，別無選擇地必須服從平庸屈從粗俗的恥辱。正是被統治者本身、特別是精英們的懦弱，才造就了平庸的統治者。反過來，握有絕對權力的平庸的統治者又使整個社會的智慧和人格平庸化。執政者和精英們之間的遊戲，要想達到「雙贏」的結果，只能玩低智商的平庸遊戲，遊戲的規則乃是「惟利是圖」。智商一高，要麼玩不下去了，要麼就是大陰謀大詭計大殘暴。

香港的著名大俠、《明報》的創辦人金庸，對新聞自由的好處，應該比任何大陸的新聞從業者，都有更深更豐富的體認。但是，他一旦決定接受大陸某大學的文學院院長之聘，便在演講時聲稱：無論在哪裡都沒有絕對的新聞自由。所謂的新聞自由，在西方不過是各媒體老闆的自由，打工仔決沒有自由。更讓人難以理解的是，他居然號召新聞記者向中國人民解放軍學習，而軍人的天職是絕對服從。到底是武俠小說的高手和著名報人，才會如

此執著地「語不驚人死不休」。有人會問：作爲知名報人的金庸，其報業的成功完全受惠於香港的言論自由制度，他怎麼可以無視幾十年的新聞從業經驗，說出這樣有違於良心的屁話？獨行於香港的大俠，怎麼一來大陸，立馬就變成了一切行動聽指揮的解放軍士兵？

而這，就是大陸中國的獨特魔力。在這塊土地上，再高貴的品質和健全的常識都無法生存。同質化的平庸抹平了一切其他的差異，滿腹經綸的碩儒、腰纏萬貫的大款、紅得發紫的明星、一手遮天的高官……面對制度性的絕對權力，他們的表情完全一樣，訓練有素的肌肉運動，只能做出滿臉媚態和一身酥骨。來自香港的金大俠尚且如此懦弱，大陸的精英的蕞瑣就更讓人不忍目睹了。

「長江讀書獎」評審自肥遭人非議

6月初揭曉的「長江《讀書》獎」的評選結果，就是這蕞瑣的最新例證。《讀書》雜誌聲稱堅持民間立場，這已經很可疑了，因爲目前的中國還沒有一家正式的民間出版機構，三聯出版社也不例外。再看評選結果：評委會名譽主席費孝通獲「特別榮譽獎」，《讀書》主編汪暉獲「著作獎」，評委錢理群獲「文章獎」，其中還有若干評委的著述被推薦入圍，可惜最後落選。名譽主席、主編、評委的作品入圍，這已經有違公認的評選規則了；最後又得了獎，就是拿屁股當臉的無恥了。世界上好象還沒有這樣的比賽規則：裁判兼球員，結果還進了球，通贏其他的競爭對手。即便比賽中不能完全避免的黑哨黑球，也至多藏著掖著，那敢像

「長江《讀書》獎」這樣明火執仗且義正詞嚴，用誰也無從把握、內功頗深的「本質正義」，取代可以一目了然的不怕公開的「程式正義」。像費孝通或汪暉這樣的一貫幫閒的文人如此下作也就罷了；像《讀書》在《中國青年報》上發表正式聲明，爲其違背最起碼的學術公正和世俗常識的行爲進行強詞奪理的狡辯，還拿起訴之類的法律手段嚇人，像主編黃平接受採訪，那種顧左右而言它、不觸及問題實質的圓潤，也可以一笑了之。因爲《讀書》近幾年早就變味了。

但是，像錢理群這樣在九十年代最受學生歡迎的教授，儘量保持清白名聲，一直自稱「堅持獨立寫作」且有些文章寫得好看，居然也不顧起碼常識而以評委的身分獲獎，居然沒有拒絕，居然面對社會上的異議而沒有任何內心不安，反而聲稱：他儘管作爲評委獲獎，卻沒有感到此次評獎中有任何學術腐敗?!出任一種重要獎項的評委，這本身就是很高的榮譽，榮譽也會作爲象徵性資源帶來巨大的無形利益；而獲得此種獎是另一種榮譽，利益也會隨之而來。但是，人不可太貪婪，貪婪就要過界、犯規，鬧出有違起碼常識的笑話。如此簡單的公理，決不會比魚與熊掌不可兼得更難理解，難道他居然就不明白嗎？曾經有朋友對我說：「現在，拿出十萬元錢就可以收買任何一個大陸學者。」當時，我覺得他說得太絕對了，而「長江《讀書》獎」一出，方覺如斯言哉。著作獎十萬，文章獎才三萬。

「六四」之後的改革只是經濟面而已

曾有過不止一個老外問我：「六四這麼大的血案，捲入那麼

多的人，死了那麼多人，怎麼一夜之間，說平靜就平靜了？屠殺真的能夠殺死正義嗎？中國到底是怎麼回事？」當時，我似乎無言以對。現在，如果有人再問我同樣的問題，我就會把「長江《讀書》獎」的故事講給他聽。怎麼可以指望一個隻產生如此見利忘義的精英階層的民族，能夠見義忘利呢！這無疑是以竟相無恥方式向社會公正和學術良知挑戰。在中國，以無恥的方式向道義挑戰的勇氣，幾乎人人具有。但是，以道義的勇氣向無恥的現實挑戰的人，卻幾近滅絕。

「六・四」的血腥恐怖使中國陷入倒退的泥潭而難以自拔。雖然1992年鄧小平的南巡打破了死一樣的沈寂，但也只是經濟上的鬆動，和文化上的極盡渲染太平盛世的貧血喧囂。而在人權上政治上思想上，先是一片肅殺之氣中的萬馬齊喑，繼而是一種無奈的以學術化爲藉口的冷漠。港臺文化的大舉登陸、本土的大眾文化的沸沸揚揚，伴著以「三講」和愛國主義爲核心的「主旋律」，人們似乎陶然於繁華和享樂之中，鄧小平用「小康」購買著民眾的記憶，不僅歷史上的無數大悲劇被遺忘，就連最近期的慘案也被淡化得幾近於空無。在這種全民族的遺忘和麻木之中，精英們形成了一股與主流意識形態共謀的平庸主義，或可稱爲「豬的哲學」。它緊緊地攀附於「以經濟建設爲中心」話語霸權，把所有的智慧都用於論證怎樣才能保持穩定以發展經濟的「小康哲學」——怎樣讓豬們吃飽了就睡，睡醒了就吃，至多讓它們停留在飽暖思淫欲的階段，再不能有其他的非分之想。在中國目前的制度背景下，任何改革決策都是政治決策，任何人文理論的話語都必須對這一制度的獨裁性強制在場作出回應。怎麼就能把經濟改革弄成不受任何政治污染的處男呢？

經濟上的「強中央」的國家主義理論和「幕僚派」、「奏摺派」的中立經濟學；政治上的「告別革命論」、「新左派」和「市場派」；文化上的幾乎覆蓋所有角落的瘋狂的民族主義和學術的「本土化」……皆是犬儒化的豬哲學的組成部分。耐人尋味的是，這些來自五湖四海的精英們爲了一個共同的目標走到一起，並沒有事前的預謀，而完全是不由自主、不約而同，自發地走進了「豬圈」，想控制都控制不住，如同他們中的一些人在十一年前自發地捲入「八九運動」一樣。似乎只是一夜之間，他們就那麼自然地，由決策層的高級幕僚變成了理直氣壯的大賺髒錢的董事長或總經理(如被排擠出高級幕僚層的趙紫陽時期的精英們)，由先鋒詩人變成了黑了心的書商和文化掮客，由先鋒導演變成了登上50年慶典觀禮台的貴賓和希望小學的捐建者(如陳凱歌、張藝謀)，由向往西方的自由主義者變成了抵抗西方霸權的民族主義者和「新左派」(如甘陽、李陀)；就是極少數堅持自由主義價值取向的知識分子，其中也有一些人，大談西方自由主義的遺產中來自英美的保守主義，把「消極自由」作爲唯一正宗的自由主義，其潛臺詞就是把「六·四」作爲政治上的激進主義和「積極自由」之實踐的失敗的最近例證。胡平曾在《犬儒病》中精闢地分析過有中國特色的「消極自由」，我在這裡借用其大意：

對伊塞亞·伯林(Isaiah Berlin)提出的兩種自由之分的翻譯本身，就表現出一種下意識的懦弱心理。原文是negative liberty和positive liberty，既可以譯爲「否定性自由」和「肯定性自由」，也可以譯成「消極自由」和「積極自由」，我們就一定要譯成後一種。如果把這種中文再直譯回到英文就變成了passive liberty和active liberty。這種在兩可之間取「消極自由」而舍「否定性自由」

的翻譯，可謂用心良苦。因爲，在漢語中，「消極」一詞，最容易使人聯想到「被動」、「逃避」上去。於是，望文生意，把「消極自由」作爲躲避現實的同義詞，近似於毛澤東的《反對自由主義》的「事不關己，高高掛起，明知不對，少說爲佳，明哲保身，但求無過」。西方的自由主義在我們的自由主義者筆下變得如此犬儒，才是「有中國特色的自由主義」。正是在有中國特色的「消極自由」的庇護下，「歷史的缺席權」、「思想淡出，學術凸顯」、「遠離現實，退回書齋」、「莫談國事」的政治冷漠、……成了精英們拒絕直面嚴酷的專制現實的堂皇理由。既然正宗自由主義認爲管得最少的政府就是最好的政府，那麼，民眾最不關心的政治就是最好的政治；既然消極自由是「免於他人干涉和強制的自由」而不是主動「去做……什麼的自由」，那麼我們就不必去主動爭取什麼。於是，老莊式的遁世主義被所謂自由派知識分子冠以自由主義之名，這就是十足的豬哲學了，被趕進或逃進豬圈等人來餵就是了。

傳統的老莊式遁世主義對懦弱的包裝，是一套「人法道、道法自然」的以柔克剛、以無統有的處世哲學和陰謀政治，而當代中國精英們把基於懦弱和利益計算的逃避用自由主義來進行包裝和辯護。古代犬儒和「有中國特色」的犬儒，可謂時隔幾千年，靈犀一點通。而歷史的事實是，凡是有自由的地方，不論是「消極自由」還是「積極自由」，沒有主動的爭取、去做，就沒有任何自由。即便是被這些知識分子津津樂道的英國式自由，也要經過「光榮革命」的爭取才能得到。

血腥屠殺對中國人的主動而積極地爭取自由的政治激情和青春叛逆的暴力閹割，首先嚇壞了學生精英和知識精英，大面積

的逃亡使我們失去了能夠支撐人性高貴的最佳時機，接著便是毛時代之後，爲自由奮鬥的主要道義象徵者的陸續流亡，道義資源的大量流失和盡情揮霍，不僅使中共輕易地清除了直接的政治對手，而且使當年的八九運動的普通參與者，感到他們的道義激情和犧牲換來的只是幾個流亡者的名利，就必然萌生一種被少數精英玩弄的受騙感和恥辱感。因爲，在一個全面專制的社會裡，無形的道義資源是我們對抗擁有所有有形資源的獨裁政權的唯一支撐。最血腥的時刻也是道義最具有感召力和凝聚力的時刻，如果在最血腥恐怖時刻，我們仍然有巨大的道義象徵不畏強暴地屹立著，那麼，民心就仍然有凝聚的核心，中共的屠殺所造成的也只能是外在的有形的暫時的失敗。但是，我們沒有肩扛黑暗閘門的高貴骨頭，精英們的懦弱和短視所導致的道義資源的流失和浪費，造成的是一種內在的無形的長遠的失敗感、失望感甚至絕望感。看破紅塵的人就會視道義如無用的垃圾或謀取名利的工具，變成唯利是圖之徒。

這十年唯一沒有改變的，是早在八十年代就被排擠出最高決策層的毛派或極左派。「六四」和蘇東驟變給了他們充足底氣，來捍衛毛澤東的政治遺產。整個九十年代，他們連續發表了四份萬言書，皆是從防止「和平演變」、保證中共的政權安全、保衛社會主義制度和爲下層民眾謀福利的極左高度，來論證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變化。他們有充足的經濟資源，辦了三份全國性刊物（《真理的追求》、《當代思潮》、《中流》），經常在自家的言論陣地上，不點名地公開批判現行的重大決策，從朱鎔基的推動中國加入WTO到江澤民的最新傑作「三個代表」，甚至用當年批判赫魯雪夫的「九評」口氣，指責江澤民的「代表最廣大人民的根本

利益」之說，是想把作爲無產階級先鋒隊的中共改造成資產階級的「全民黨」。儘管毛派一直很活躍，不斷向「江核心」發出挑戰，但是沒有人敢於對他們進行政治上的高壓和審查或停辦他們的刊物。因爲中共政權的根本性質決定了「左」永遠比「右」理直氣壯，永遠比「右」安全。近些年由一群放過洋的學人炒紅了的「新左派」，也沒有任何不安全之憂，在自由知識分子連一塊自己的言論陣地都沒有的今天(劉軍寧主辦的年刊《公共論叢》，本來就生存得極爲艱難，隨他本人被社科院開除，未來的處境可想而知)，「新左派」不但有《讀書》、《天涯》等言論要地，而且最近又有由李陀出任主編的大型理論刊物《視界》面市，刊物的版式設計不錯，只是重頭文章皆由哥兒們包辦的「準家天下」辦刊方針很可疑。正如最近炒得沸沸揚揚的「長江《讀書》獎」，剛一出籠就已經用名譽主席、主編、評委的獲大獎，公開宣布此獎乃「家天下」私產一樣。

知識分子的懦弱令人絕望

自由知識分子又如何呢？他們的行爲方式就是前面提到的「消極自由」說辭的實際踐行。在時緊時鬆的制度繩索提供的伸縮尺度內，他們與體制之間的關係，常態是若即若離、異態則神合貌離。無名的想叛逆，有名的想撈錢，名利雙收的想被招安，至少想維持現狀。與此相應，他們自身的行爲也處在一種分裂的或言行不一的尷尬之中。一方面，他們喜歡把自己定位在民間立場上，喜歡稱自己的研究和寫作是獨立的，但是，另一方面，在他們中間，還真找不出幾個不捧體制飯碗的人，從工資、職稱、

學術地位到住房、醫療等各種福利待遇，皆爲政府所賜；從趕場般的出席各種研討會到雲遊四方講壇，其身分必須具有官賜的合法性。官方對這些人的打壓，經常採用的手段之一，就是以開除公職或解聘相要挾(劉軍寧被社科院開除，秦暉被清華解聘，就是例證)。一方面，他們公開的學術和私下的言論皆以自由主義爲皈依，有時還頗爲大膽，去碰一下專制者的軟肋；另一方面，他們的生活方式卻循規蹈矩，沒有任何自由主義的氣息，甚至見利忘義，連做人起碼的道義和誠實都沒有，決不會招惹頂頭上司。

所以，屢屢受到政府打壓的自由知識界，他們既不會爲了保護自己的言論自由權利而公開向政府挑戰，更別說形成有組織或准組織的民間壓力團體了；他們也不會爲被割了舌頭的青年農民而發出集體呼籲，主持社會公正。他們的自由主義只是一個人龜縮在書房裡，各自爲戰，進行散兵遊勇式的打擦邊球式的文字抵抗，決不會在行動上完全公開地撕破臉，捅破那層雙方都心中有數的窗戶紙。說穿了，就是在與現行制度長期周旋的遊戲中，他們心中形成一條的無形的安全底線，只要守住這條底線，他們個人的人身和既得利益都是安全的。官方壓一壓，我就收一收；壓得狠一點兒，我就收得多一點兒；再狠點兒，我至多保持一段時間的沉默。曾經頗爲振奮人心的戴晴、邵燕祥等十名文化名流聯名上書、爲民請願事件，在當時被譽爲中國版的「我控訴」，但是，由於沒有更廣泛的公開支援，九屆人大一開，民主黨一被鎮壓，控訴就變成了沉默，最後不了了之。自由精英的經驗似乎驗證了這樣一種無形的規則：只要不是訴諸於行動的公開叫板和群體抗爭，官方決不會下死手。自由主義知識精英的這條底線，既是一種外在的恐懼內化後所形成的自我約束，也等於是向官方作

了一個無形的承諾。

問題是，這條沒有法律保障的無形底線保險嗎？在目前仍然是人治高於法治的中國，任何遊戲都沒有可以讓執政者必須遵守的規則，人爲底線的設定的主動權和決定權，完全掌握在權勢者一方。所以，知識界心中的那條自我設定的無形底線，實際上沒有確定的邊界，邊界劃在哪兒，完全操於他人之手，也就是由執政者規定。而執政者的確定底線邊界，又不取決於有形的法律，只取決於他們對自身政權安全的主觀感覺，即內在恐懼的程度。他們的恐懼一旦達到了自我承受的極限，就會無視真正的外在危險是否達到足以顛覆其政權的程度，而作出完全非理性的決策。由此可見，自由知識界自我設定的任何底線都不是底線，都不會從根本上保證其安全，更不會對執政者的行動有任何實質的約束力。

說到底，在中國，沒有任何一個人具有絕對的安全感，不要說組黨和言論可以獲罪，即便在小康哲學的庇護下發了大財的老闆，一夜之間，萬貫家財說沒有就沒有了。一批批不惜花上幾萬美金和冒著生命危險偷渡到西方的中國人，之所以鋌而走險，根本的原因就是沒有安全感。所以，自由知識界的底線和大小官僚、大小商人的底線一樣，由於都是自我設立的，所以是等質的，只能是權宜之計和得過且過——爲了當下的既得利益而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鐘。在此意義上，自由主義精英和御用精英之間的行爲方式沒有根本的區別，牌坊一定是要立的，只不過是尺寸大小的表面區別罷了。一個寫著「自願賣笑賣身也賣人」，另一個寫著「賣笑賣身不賣人」，再一個寫著「賣笑實出於無奈，但只賣笑不賣身」。可以說，無論是各種形式的有意的幫兇和幫閒，還

是在制度的脅迫下自我劃線的抗爭者們，都在迎合主流意識形態的「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都對中國大陸的豬哲學添上了協調的一筆。

正是在政治恐怖、精英懦弱和利益誘惑的共謀中，從八十年代就逐漸興盛的經濟的和物質的塵世法則，完全代替了精神之夢和道義之基而成爲靈魂的主宰；經濟唯一和利益至上的豬哲學，在反思的藉口下開始了對激進主義的批判和對理想主義的清算，本土化學術的冷漠取代了對自由主義思想的激情，甚至包括被譽爲「抵抗文學」的、以對抗大眾文化爲主旨的泛道德主義，無一例外地皆以與現存制度的共謀爲前提。無論從民族文化的再生或重建的意義上，還是從普適性人性的健全或提升的意義上，九十年代的中國都是醜陋的糜爛的，一種醜陋而糜爛的平庸，已經成爲時代的醒目標記。

問題不在於物質的經濟的塵世法則本身，因爲現代化本身就具有強烈的世俗化取向，韋伯所指出現代理性的「祛魅」過程也就是世俗化的過程。特別是中國人，在經歷了極度的物質匱乏的苦行僧生活和「靈魂深處爆發革命」的毛澤東時代之後，對經濟利益、物質享受的塵世法則的認同，作爲普通民眾和人性本身的自發要求無疑是正當的和合理的，曾幾何時，我們連追求世俗幸福的權利都被強行剝奪了，誰也無權再像毛澤東那樣強制性地剝奪普通人追求世俗幸福的權利。但是，這種經濟至上的享樂主義在中國精英階層的出現，卻並非生存困境的自然產物，而是對制度化恐怖的人爲屈從，對八十年代的批判性反思所遮蔽的，正是難以啓齒或令人不齒的普遍怯懦，是對恐怖政治秩序的逃避和基於精確計算的生存策略。因此，學術話語對思想話語、經濟對策

對政治參與、生產力標準對人權標準、大眾文化對精英文化的取代，構成九十年代中國的時尚，而在這一切的下面，仍然是強權政治的主宰性的恐怖和收買。

本來，在自由主義價值及其制度安排，已經成爲人心所向大勢所趨的世界主流文明的今天，反對一黨專制應該具有充分的道義資源、合法性和正義性，但是，在大陸，隨著基於道義合法性和全民動員的「八九運動」的被鎮壓，隨著各類精英所造成的道義資源的日漸流失，爭取自由的運動也在經濟的物質的世俗法則或「小康哲學」的主導下，由道義優先變成了純粹的利益優先，連道義與利益的平衡都不要了。沒有了道義資源的民間政治反對派和自由知識分子，在與專制制度周旋時，連講點策略的資本都沒有了。現在，無論是動員體制外的民間反專制力量，還是推動體制內的開明改革力量，都必須首先讓人感覺到其既得利益的不受損，這才是底線——不是道義、也不是道義和利益兼顧，而是利益——赤裸裸的眼前的當下的既得利益——成爲人們衡量一切的底線。一旦意識到投入反專制運動的結果，可能是利益受損，甚至要賠上身家性命，誰也不會再去堅守道義的立場。當一些流亡海外的精英，指責西方政府被中共允諾的市場和定單所收買，置商業利益於道義人權之上時，是不是先該問問我們中國人自己做的如何？在道義與利益的天平上，我們自己更看重哪一頭？難道我們比西方政府做的更好，始終置道義以優先的地位嗎？難道我們不應該捫心自問：「我們自己已經浪費了多少靠鮮血積累起來的道義資源？我們的道義品質和政治智慧，是否無愧於我們的前人已經付出的代價與國際社會給予我們的巨大支援？難道流亡所帶來的安全，沒有使我們自己也在充當這個反人

性制度的反面的點綴和裝飾嗎？我們不是也在被迫地爲『穩定壓倒一切』的獨裁秩序做貢獻嗎？」

現在的中國之醜陋，恰是極權恐怖之醜、人性懦弱之醜和貪婪之醜的完美結合，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平庸之最。

當然，我不是說絕對沒有自由主義知識分子敢於捅破那層窗戶紙，如李愼之老人，而是說，李愼之只是極個別的，整體上的自由主義精英不敢學李愼之。我也不是說在這些年中，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一無所爲，而只是想指出他們所處的實際狀態。這些年，他們在清理歷史、針砭時弊、宣揚自由主義理念等方面，其成果是有目共睹的。在余秋雨的文化口紅、陳凱歌的爲五十周年大慶拍升國旗的MTV、張藝謀的捐獻希望小學的「政治秀」等民族主義的大合唱中，他們的言論畢竟有激憤之情、理性之明和醒世之效。

「六四」失敗得再悲慘，畢竟顯示了普通人性的善良、正義感和犧牲精神；畢竟一個十七歲的年輕生命的倒下，喚醒了兩位在中共教育下成長起來的知識分子沈睡的良知、凝聚起受難者群體；畢竟讓人們認清了獨裁政權的本質，不再相信中共統治的道義合法性和意識形態說辭；畢竟造就了公開的、持續不斷的民間反對派運動；畢竟造就了中共執政以來、第一位爲道義而甘願放棄總書記的權力和相關利益的老共產黨人，以及使一大批體制內精英走上叛逆之路；這一切將成爲對高貴的自由和尊嚴之激情的永恒記憶；或者說，直到今天乃至將來，「六四」仍然是我們生命中最寶貴的道義激勵，因爲她畢竟爲我們這個懦弱而平庸的民族，提供一次活得勇敢、活得有尊嚴、活得高貴的機會。

在人的基本權利仍然可以被強權任意剝奪的一黨專制之

下，爲了建立一個人人都有自私的權利和追求世俗幸福的自由制度，就必須具有基於人類正義的無私和高貴；爲了具有免於他人干涉和強制的消極自由，就必須有主動、積極地去做去爭取的自由精神。我們需要麵包，但，作爲人，我們更需要自由。那些不甘於豬的生活的人，那些還想以道義的勇氣和智慧凝聚起中國的道義資源的癡心不改者，必須是先天的高貴者，具有面對道義廢墟的近於絕望的希望。

2000年7月3日於北京家中

沉默即死亡

——我看錢鍾書

在當代中國，有很多著名的文化人成爲供人研究的專門學問，爲此還要成立專門的研究機構，出版專門的學術刊物，如「魯迅研究」、「郭沫若研究」、「茅盾研究」等等，但是這些被作爲專門學問的人物大都已經作古，很少有著名的文化人還活著的時候，就被政府和學術界作爲專門學問供人研究，並且進行廣泛宣傳和大力提倡。

「錢學」已變成一門專門的學問

然而，改革開放後的中國，產生了一門新學問，叫做「錢學」，爲此設立了專門的研究機構「錢鍾書研究學會」，出版不定期的研究專刊《錢鍾書研究》。雖然錢鍾書於九十年代末已經作古，但是，「錢學」作爲一門專門的學問，從八十年代就出現了。毛澤東文藝思想的權威解釋者周揚，就把錢鍾書稱爲真正的學問家，把《管錐篇》稱爲學術研究的典範。新世紀伊始，中共政治

局委員、中國社科院院長李鐵映，在《光明日報》發表整版悼念長文，讚美錢鍾書的學問之博大精深和人格之崇高正直。錢鍾書活著的時候，以江核心爲首的中共第三代，對「錢老」都很尊敬，逢年過節或錢老的生日，都有政治局級的人物登門探望。在中國，能享受到官方如此「敬重」的文化名人，大都是類似珍貴古董的重量級統戰物件，如作家巴金、冰心、物理學家錢學森、梵文專家季羨林等。

統治者與著名文化人之間的統戰遊戲古已有之，從先秦的君主豢養大堆食客就開始了。中共是此傳統最具有創造力的繼承者，無論是執政前還是執政以後，都玩得既得心應手又殘酷無情。看《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對一些積極要求入黨的社會名流，毛澤東從實用的角度、完全憑個人主觀感覺處理這個問題。名流們能不能入黨，端視對中共統治好處的大小而定。所以，當年，中共高層對社會名流積極要求入黨的申請，完全根據其政治需要，採取分別對待的策略。是繼續做政治花瓶還是成爲執政黨的一員，決定權不在社會名流手裡，而在執政黨的高層手中。這種實用主義態度的最典型表現，首推周恩來當年說過的一句統戰名言，大意是：社會名流在黨外發揮的作用比在黨內還要大。具體到像錢鍾書這樣的學者，成爲重點之重的中共統戰物件，是在鄧小平時期。

錢鍾書的學問沒有獨創性

錢鍾書是有學問，也很清高。但是他的清高成爲媒體的關注熱點，則是從錢鍾書成了「錢學」之後，他的名字在公眾中迅速

升溫乃至大紅大紫，得力於電視劇《圍城》及其媒體炒作。社會是很勢利的，越是大名人就越應該、越有資格清高，有些類似怪癖的習慣，放在一般人身上就是生活惡習，而放在大名人身上則是有性格或清高。從媒體的報導看，錢鍾書的清高比較走極端，他是愛誰誰，拒絕國內媒體的炒作，「東方之子」的採訪也吃閉門羹。他更拒絕國外名牌大學的高薪邀請，管你是牛津、哈佛，沒戲。而恰恰是這種拒絕，又變成了另一種炒作，許多人拿錢鍾書的這種拒絕說事兒，把錢鍾書作爲抵禦世風日下的楷模。

「大隱隱於世」。錢鍾書的清高，使這條古訓又有了當代踐行者，越隱越顯，越拒絕越有人格高潔的美名。此種生存策略在中國已有幾千年傳統，有文字記載的歷史有多長，隱士成名的傳統就有多長。我弄不懂這種隱士文化到底是什麼——所有的隱士都極有名，且都是「歲寒之松柏」之類的高潔之名。有時，細一想，這種「隱」出來的「顯」，確比那種汲汲於功名的張揚高明，但也僅止於高明而已，並非真的視功名如糞土。於是，你就很難確定，這是一種真正的對世俗功利的超然，還是一種精打細算的生存謀略(類似於政客的陰謀)？

我以爲：錢鍾書的這種拒絕，是一種古已有之的人格上的盲點或無知——狂妄到極致甚至透明的程度。在官方的提倡和主導下，大家莫明其妙地把他捧到了「錢學」的位置，他也就當真了，以爲自己是中國、乃至世界最大的學問家，狂妄到連牛津、哈佛這樣的高等學府，許以高薪都請不動的地步。對高薪的拒絕本身無可挑剔，最可疑的是他拒絕的理由——「人家聽不懂他的學問」，他去牛津、哈佛講學，似乎是對牛彈琴。要是別的理由還有幾分誠實，但是，說人家聽不懂他講的東西，在我看來，就太不知天高地厚了，

因而也就流於淺薄了。不要說他後來的成名，受惠於早年在西方著名學府的留學生涯，應該心存感激才是。就是假定他完全自學成材、變成著名學者，也沒有任何理由如此狂妄。

我還以爲：凡學者總要心存某種敬畏，像牛津、哈佛這樣的學府，出過多少影響人類歷史進程、甚至改變人類思想命運的大思想家、大學問家，一個學人被邀請去這種學術聖殿，不僅應有榮譽感，更應該懷有一份敬畏和謙卑，就像教徒走進教堂——如果還是個學者的話。而錢的態度既無受惠者的感激，更無學者的敬畏和謙卑，有的只是目空一切的人格無知及由此產生的狂妄：自以爲無所不知。給我的感覺，似乎是這世界上，只有他自己能聽懂他的學問，剩下的人皆是附庸風雅之徒。我不禁要問，錢鍾書你是誰？你以爲你是誰？你有什麼真正的東西，可以使你高傲到狂妄到「一覽眾山小」的懸崖上？心中沒有敬畏的學人，決寫出不好東西。這種敬畏是自己賦予自己的。當你提筆時，要時刻想到，有一雙明察秋毫的眼睛高高在上，命令你必須保持知識上的誠實、道德上的謙卑和敬畏。

中國的文化傳統，從來就推崇無所不知、無所不能的人格，它所養育的聖賢文化的最大盲點，不是知識上的無知，而是人格上的無知：人，一旦被捧成聖賢，就自以爲無所不知無所不能，加之社會上的眾星拱月之勢，最後就活生生地楞把凡人變成了神。進，可以平天下；退，可以齊家修身；隱，可以俯仰天地、呼風喚雨；死，可以陰魂不散，朗照永世。所有的界限都沒有了，政治家可以成爲學術權威，作家可以成爲繪畫或音樂權威，物理學家可以在經濟決策上說三道四，結果攪得一團糟。正是這種自以爲無所不知無所不能的人格神，給中國帶來一次次巨大的災

難，捧得越高，災難就越深重。中國人很難眞正懂得：無所不知無所不能者，恰恰一無所知一無所能。

錢是有學問，但也僅限於特定的注經學領域。他既沒有思想上的發現、也沒有方法上的獨創。他的《管錐篇》不過是中國從漢代經學就開始的注經傳統的墓誌銘。俗話說：先秦之後沒有「子」。中國的學術史、思想史，在春秋戰國時期的百家爭鳴之後，就是一部不斷地把智慧消耗到注經中的歷史。孔子放個屁都沈甸甸，都能考證出一堆微言大義，都能注釋出治國之策和修身之道。1949年後，由注孔子轉爲注馬列主義注毛澤東思想，老毛打個噴嚏都是最高指示，只看口形猜出來的半句話，也是治國的既定方針。改革開放以來，又改成注鄧小平理論和江澤民學說。不論物件怎麼變，反正就是個死心眼地注、注、注。從中國學問的注經傳統的角度講，錢鍾書在當代中國堪稱一絕、無出其左者，爲一桌雞毛蒜皮，也要找來五湖四海的洋佐料。他聲稱別人聽不懂，他那個《管錐篇》壓根就是有意賣弄，爲讀者設置人爲的閱讀障礙，不想讓人懂。來來回回說些廢話，犄角旮旯地掉書袋子，一弄就一大堆旁徵博引。據說，考錢鍾書的研究生，要會5種外語，我不知道，這是招收研究生還是借此炫耀賣弄語言天賦。

知識上的不誠實，必然導致道德上的不負責任。錢有獨特的方法嗎？沒有。有原創的思想嗎？沒有。有對血腥的歷史和現實的深刻反省與人文關懷嗎？更沒有。「錢學」的產生很可笑，我想不出那些捧「錢學」飯碗的人，究竟研究些什麼。《圍城》嘲諷那種洋涇濱的知識分子，而我認爲「錢學」是對思想和學術的最大嘲諷。在思想發現的層面上，「錢學」研究界的智商等於零。

因爲，一個既無思想又無方法的專門掉書袋子的注釋者，怎麼就能成爲一種需要後人專門研究的學問？這種荒唐事只有當代中國才會出現。至於《圍城》，也就是部酸甜小說，決非上品，一些人卻衝著錢鍾書的虛名把它捧上了天。就我的經驗而論，讀錢夫人楊絳的《洗澡》，閱讀快感遠超過讀《圍城》。在小說中，錢也時時忘不了炫耀他的趣味和學問，他並不想嚴肅地說點什麼。我甚至可以說，錢鍾書從來不想真正嚴肅地負責任地說點兒什麼，他的學問與其說是服務於學術目的，不如說是服務於他的處世之道和人格炒作。

初讀錢鍾書，是念大學時看《談藝錄》。與錢鍾書他們那代人相比，我們這代人出生於五十年代，幾乎生長在文化沙漠之中，沒見過奇花異草，沒經過文化大世面。所以，一翻開《談藝錄》，真如初涉水的人面對大海，以爲這就是一望無邊，自己肯定游不過去，或要耗盡終生才能游到一半，不在半道溺水就算造化大了。但讀完了，裡面除了東拉西扯和用牛角尖紮人外，不會給人任何智慧上的啓迪。後來，我又尋遍錢鍾書的文字，發現沒有一篇可以稱之爲給人警醒的東西。知識視野開闊了之後，才知道中國的傳統詩評的那種評注式感悟式的方法，有王國維的《人間詞話》，足矣。王國維不但有學問、有思想、也有真性情。他的學問紮實，卻無一絲賣弄；他的靈性躍動，卻無一點淺薄；他的性情撼人，能夠以生命殉一種垂死的文化。這讓我想起魯迅的名言：敢於扶叛徒的屍體而痛哭的人，方爲真脊梁。

錢鍾書的孤傲和狂妄說穿了，只是一種表面的做作，一種精心計算的名人策略。早年，他對吳宓的不仗義，還只是常人難免的窄心眼兒。而1949年之後的一招一式，才透出了他爲人處世的

絕頂聰明。他深知，在中國的傳統和現實中，怎樣作學問才能作出安全、悠閒且名利雙收的活法。他知道什麼時候對什麼人應該拒絕，什麼時候對什麼人不能拒絕。一方面，他拒絕外國名牌大學的邀請，拒絕中央電視臺和其他媒體的採訪，冷淡當著後生們的面表示關懷的權勢者；另一方面，他從不拒絕高層領導人的親臨府上的探望，不拒絕爲胡喬木這樣的大人物修改詩詞，不拒絕政治局給他送來的生日蛋糕和祝壽的花籃、條幅，不拒絕官方爲他從事學術研究多少多少周年，而舉行的盛大、隆重的紀念會和研討會(大陸幾乎所有的文化恐龍，都不會拒絕這些來自官方的關懷)……在這種鮮明的對比中，我看到的不是清高，也沒有了狂妄，而只是一副既老奸巨滑又奴顏媚骨、既冷血又世故的面孔。

由此可見，錢的淡泊名利是做給社會看的，同時又是一種生存策略：既對苦難和社會不公正保持沉默，又能把自己塑造成超凡脫俗的似神人格。這種生存策略也適用於錢、楊二位對歷史的重構。

錢鍾書與楊絳的沉默是一種生存之道

那些對錢鍾書的讚美，除了關於他的深邃學問和脫俗人格之外，大都講錢鍾書的「文革」厄運。但是，他在此前和此後的境遇還是相當不錯的，比許多人的命運都好，甚至與文革中被寵倖的哲學家馮友蘭相比，也差不到哪兒去。在這裡，我要特別提到錢夫人楊絳的回憶。不知道爲什麼，從目前公開見諸於文字的楊絳回憶看，只能見到他倆在文革中的厄運，但是說來說去也就是「五．七」幹校的事。就是在「五．七」幹校，他倆的處境也比

同命運的許多人都好(如顧准、駱耕漠、林立夫、吳敬璉……)。這點兒受難史賣完了，就講文革中與鄰里打仗的事，講得對手陰暗狠毒、仗勢欺人、落井下石，講得自己磊落仁慈、忍無可忍、智慧剛烈。

前些天，《南方周末》還就楊絳的回憶進行了多角度的歷史事實的清理，有楊絳的說法，有鄰居的說法，有第三者的目擊回憶。兩方當時者的敘述，自我偏袒的可能性最大，故而我更相信第三者的立場。而第三者的記憶與楊的記憶差別很大。楊說，打仗是由於鄰居的蠻橫引起的，結果是錢、楊二位大知識分子吃了虧，並由此引申出造反派對知識分子的迫害。而第三者說，那次打仗，最後是錢、楊得勝，鄰居吃了虧，衝突是雙方的責任，談不上迫害，也就是日常的鄰里糾紛。通過這種對比，楊絳的回憶，從小裡說，她把打仗的責任全歸罪於別人，這有欠做人的厚道；從大裡講，她還要把這種鄰里之間的糾紛，硬是上綱到知識分子被造反派迫害的受難高度，這就既是文革整人手法的重演，也是爲了用苦難給自己貼金，不惜歪曲事實，編造歷史了。楊絳的對這次鄰里糾紛的回憶，與她的幹校回憶如出一轍，其中貫穿的是毫無自省和自我美化，就是爲了讓人覺得他倆49年以後似乎盡受苦了，且苦大而仇不深，一副淡泊名利的大胸懷。但是楊絳從來不談眾所周知的錢鍾書受寵，欽定進入毛澤東著作編委會和毛澤東詩詞翻譯委員會的經歷。其目的，無非是爲尊者諱，且是自我親諱，使這兩位德高望眾者更加德高望重。

楊絳夫人的這種經過精心剪裁的個人歷史，與錢鍾書本人一直對歷史、對現實保持沉默，兩者的實質是一樣的：無論是對他們自己還是對社會，都是瞞與騙。在中國，面對那麼多苦難與無

恥，面對那麼殘酷的專政和下流的陰謀，保持沉默似乎成了屢被迫害的文化人的一種美德，一種良知。而我以爲，沉默非但不是美德，反而是一種巧妙的無恥——一種生存策略。

無論多大的學問家，在事關社會正義的大是大非面前，一旦太珍惜自己的羽毛和既得利益，就將喪失天良。西方大哲海德格爾曾經效忠於納粹，並在二戰後，不接受好朋友雅斯貝爾斯和情人漢娜·阿倫特的善意規勸，拒絕自省和懺悔，對種族大屠殺保持沉默。故而，在西方，這位大哲被稱爲「坐在教室裡的希特勒。」法蘭克福學派，以對納粹的不妥協的深刻的批判而聞名於世，該學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阿多諾說：種族滅絕的大屠殺之後，寫詩是可恥的。我說：面對那麼血淋淋的歷史和現實，沉默更是可恥的。知識分子的社會責任感和道義良知，難道就是，對外，拒絕名牌大學的邀請，對內，在制度性的殘忍和謊言面前保持沉默嗎？這讓我想起了三十年代的高爾基面對兩個喪失人性的獨裁者的不同態度：對希特勒的義憤填膺的聲討和對史達林奴僕媚骨的讚美。看來，極權制度下的大知識分子的生存策略基本相同——怎樣才能安全而巧妙地保持自己的名聲及其既得利益，就怎樣做。

不在沉默中爆發，就在沉默中死亡。特別是對於每天必須面對現實的種種無恥和野蠻的知識分子來說，對無恥的沉默即無恥，無恥即知識和道義的雙重死亡。

2000年6月24日於北京家中

魯迅的悲劇

——「酷評」中的魯迅

近幾年，「酷」(COOL)這個詞，在大陸走紅，影響遍及生活的方方面面，「酷」風浩蕩，席捲之處，文壇也未能免俗。

在衛慧、棉棉、周潔茹等「新新人類」作家，以「酷」的沈淪方式閃亮登場的同時，文化批評界的所謂「酷評」也應運而生。正像「酷」本身並無準確的界定一樣，「酷評」也是個非常模糊的詞，大致是指一些針對文化名人的隨筆類的批評性文字。這類批評中的大多數，沒有嚴謹的論證、紮實的資料、甚至沒有一種起碼的誠實態度，只是印象式的、隨想式的、點評式的即興評論。王朔、王蒙、金庸、錢鍾書、巴金、余秋雨、姜文、張藝謀、趙忠祥、聶衛平等等皆未能倖免。而在被「酷評」的文化名人中，引起爭議最大的自然是魯迅。

對魯迅的批評實際上從八十年代就開始了，九十年代中後期尤甚，但是這些批評並沒有引起太多的注意。使魯迅批判成爲文壇上的醒目話題的人是王朔。新舊世紀之交，王朔對金庸的批判引起轟動效應，之後便一發而不可收，在他新出版的隨筆集《無

知者無畏》中，在他爲《三聯生活周刊》寫的專欄中，對老舍、張藝謀等大家提出一針見血的批評。特別是他發表於《收穫》上的「我看魯迅」，認爲魯迅並不是文學大師，其作品也並非都是傑作，甚至《阿Q正傳》也不是那麼優秀。王朔的這幾句對魯迅不敬的話，顯然是以1949年後神化的魯迅爲背景的。王朔的知名度和他坦率而幽默的文風，使近幾年對魯迅的批判性重新評價，成爲最近的大陸文壇的一個引人注目的話題。《北京晚報》、《南方周末》等有影響的報紙都對王朔的批評性言論進行報導和評論，《中華讀書報》就此問題展開了專題討論。

但是，由於大陸的特殊制度背景，凡是敏感話題的討論，都無法直來直去，總要九曲十八彎地說話。最近，中宣部就收到來自魯迅的家鄉紹興市作協的上告信，指責現在文壇刮起了一股否定魯迅的歪風，強烈要求黨的宣傳部門出面制止。據說中宣部已經發出指令：停止一切關於魯迅的討論。與此同時，左派刊物《真理的追求》在今年第七期發表了朱振國的〈不能聽任《收穫》雜誌嘲罵魯迅——致中國作家協會的公開信〉。我以爲，這種表態並不能說明中共敬重魯迅，中共所要保護和維持的，僅僅是靠強權和謊言製造的意識形態權威與偶像，魯迅只不過是其中之一而已。這類禁令的最終目的是爲了維護官方意識形態的正統地位，從而保證政權的穩定。所以，關於魯迅批判的話題，無論是魯迅的批判者，還是魯迅的捍衛者，都不會直接觸及在三十年代、特別是1949年之後，魯迅被毛澤東及中共所利用所歪曲所捧殺的事實，而只能暗示或打「擦邊球」。

批判者只能：或指出魯迅的文學成就並不像被諸多文學史教材吹噓得那麼偉大，魯迅的人格也決不像毛澤東欽定的那樣高

尙；或委婉地把神化了的魯迅變成人間煙火味頗濃的魯迅，把無所不知的魯迅還原爲所知有限的魯迅，尤其是他對自由主義的價值觀及其制度安排的不甚了了，他對以胡適爲首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攻擊，更成爲魯迅批判的重點之一；或把思想鬥士的魯迅變成難容異己的文壇霸主，他與當時文壇各路人馬的交惡，成了重新評價魯迅的重磅砲彈……這其中矯枉過正的傾向極爲明顯，特別是論及作爲思想家的魯迅，惡意的中傷和不負責任的主觀臆斷，成爲魯迅批判的特色之一。比如，在揭示了魯迅作爲一個人的弱點和他思想上的盲點的同時，也把魯迅的不妥協的戰士姿態，漫畫化爲內心黑暗、心胸狹隘、與一切人爲敵的小人形象，並以自由主義的標準貶低魯迅作爲獨立不羈的自由鬥士的形象。還有人繼續三十年代對魯迅的攻擊——魯迅與中共、與蘇俄、與日本人，都有極爲曖昧的說不清的關係。甚至像韓東這類狂妄到自以爲能夠比肩卡夫卡、博爾赫斯的江南小詩人，把魯迅貶爲又臭又硬的石頭。

在思想言論的管制如此嚴酷的環境中，非但不應該反對、反而要全力支援破除毛澤東時代靠強權樹起的神化偶像，特別是像魯迅這樣的不能碰的偶像，也不反對對魯迅的作品、思想和人格進行重新的研究和評價，這也是清算毛澤東遺產和瓦解正統意識形態的一部分，更是研究中共是怎樣玩弄知識分子於股掌之上的一個突破口。總之，無論對魯迅的遺產本身的真正價值而言，還是對當前的思想建設而言，1949年以後的假魯迅都必須破除。關鍵的問題是：1949 年後被偶像化的魯迅，他自身的遺產應該負責嗎？如果魯迅本身有一定的責任，這責任究竟在哪兒？在破除了魯迅的神化偶像之後，我們還要不要魯迅式的不妥協的鬥士姿

態？魯迅對中國傳統的近於絕望的批判，對任何專制政治的厭惡和棄絕，對轉型時期的中國是否仍然是一筆不可替代的寶貴的思想資源。

被毛澤東捧紅的魯迅

魯迅的命運既幸且悲。幸的是，他生逢中國文人最有獨立性和寫作自由的時代，他雖然寫了《紀念劉和珍君》，卻能以自由之身終其天年；悲的是，他死後被他曾經同情過毛澤東所利用所糟蹋——被個人極權用於打斷知識人的脊梁和割掉社會的舌頭。我們這代人最初所瞭解的魯迅，是1949年後那個又高又大又全已經成神成聖的魯迅，他是毛澤東之外唯一不能碰的神，但他只被毛澤東用於看門和咬人，如同農家院門口貼的驅鬼去魔的咒符，只要有誰招了毛，不但是當時招了他，過去招了他也要新仇舊恨一起算。魯迅不過是毛澤東打擊異己的棍子而已，而且是在不具有任何反抗能力的條件下被利用的。

在毛的手中，魯迅神聖得像萬金油棍子，逮誰掄誰，不分青紅皂白，不講起碼的事實。批胡風就拿魯迅說事，全不顧及歷史事實——魯迅對胡風的信任以及兩人之間的交情：文革中批周揚及「四條漢子」，魯迅就更是現成的工具了，三十年代周揚等人與魯迅、胡風的論戰，全成了罪過；文革後批「四人幫」，魯迅又成了口誅筆伐的武器，在文革中最擅於把魯迅作爲棍子四處開花的姚文元，也成了反對魯迅的罪人。

事實上，早在四十年代的延安整風時期，毛澤東就開始翻雲覆雨地利用魯迅，他一方面把魯迅奉爲骨頭最硬的思想家和戰

士，號召知識分子學習魯迅，以筆爲刀槍與國民黨作戰，投出匕首一樣的魯迅式雜文；另一方面，他又針對在延安提倡魯迅式雜文的知識分子指出：「在給革命文藝家以充分民主自由、僅僅不給反革命分子以民主自由的陝甘寧邊區和敵後的各抗日根據地，雜文形式就不應該簡單地和魯迅的一樣。」換言之，毛澤東要求的魯迅筆法的應用，是有嚴格時空限制的，只能在中共還未取得政權的國統區用於對敵，而不能中共掌權的延安用於對友，更不能在中共奪取全國政權後用於對執政黨的批評。延安整風就是要整整那些把魯迅筆法用於中共統治區的文人。

這種偶像化的、棍子化的魯迅，肯定不是什麼好東西。但是1949年後的魯迅被弄成偶像、棍子和垃圾筒，與他本身基本無關。魯迅的偉大是有目共睹。他在語言上最有創造性的，那種又黑又冷又沈又熱又鋒利又幽默的語言，是五四一代人的語言中唯一不可模仿的。魯迅的獨一無二既是思想深度上的、鬥士姿態上的，也是語言上的。他的語言中有我最喜歡的唐代詩人李賀的陰森、鬼氣。他的詩既沒有文以載道的道德面孔，也沒有「詩以抒情」的婉約情調，與其他的詩人完全不同，也與《聊齋》的鬼故事毫不相似。李賀的詩，讓我想到《呼嘯山莊》、美國詩人狄金森，感到長著毒牙齒的愛和地獄中的黑色汁液。可惜，李賀死得太早且被中國的正統文學史所貶低。

但是，一個死去的人被如此利用，打遍天下無敵手，他自己肯定也提供了某些口實。中共即便想利用，我也不相信，毛澤東可以像利用魯迅那樣利用胡適的思想遺產。如同中國人半個多世紀的對外開放，在西方那麼多主義中爲什麼偏偏要利用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史達林主義，還不是這些主義中有可以利用的豐富資

源。毛澤東早在三十年代就對魯迅情有獨鍾，這也從另一個角度證明瞭，毛澤東在魯迅那兒發現了他們的共同點：就是自以爲是神，誰也碰不得，碰了就倒楣。如果翻翻魯迅後期與當時文壇上的眾人交惡的那些文字，就覺得他是個記仇記到骨髓裡的人。魯迅的光芒全在前期，參加「左聯」之後的東西基本上難以卒讀。不僅是他對自由主義知識分子、資產階級乏走狗的嘲諷，和對無產者文學的推崇，實在是思想觀念上的糊塗，而且他對別人批評的反擊中充滿了人身攻擊，這就已經是氣量上、人格上的惡習了。

但是，「酷評」中最常提到的魯迅與林語堂、「新月派」包括周作人之間的交惡，則並不像表面上那樣簡單。我認爲，魯迅與他們的最大差別是生命深層的東西。魯迅的陰、冷、黑、沈、尖、辣、烈都是中國作家中獨一無二的。他對中國的絕望是骨子裡的，無餘地的，他看到了中國人骨髓中的腐爛，所以他不僅在態度上而且在語言上也不跟中國的傳統有任何調情。特別是在「三・一八」慘案的大是大非上，魯迅的道義勇氣和思想深度，在當時知識分子中，的確是其他人難以企及的。一篇《紀念劉和珍君》，就可以使魯迅蔑視大多數知識分子。魯迅與林語堂曾經是同路，共辦《語絲》，關係很好，也曾在「三・一八」慘案發生時，站在一起譴責劊子手。後來兩人的分歧乃至互爲「仇敵」，表面上是由於兩人對「新月派」的不同立場，實際上則由於在「三・一八」慘案之後，二人對知識分子角色的不同態度。魯迅對「死老虎」和「落水狗」也決不手下留情，而林語堂、周作人則一味「費厄潑賴」。魯迅尤其不能忍受的是：林語堂及梁實秋和新月派的那種旁觀者的冷嘲熱諷，故作閒適姿態的超脫。在他看來，目睹過全副武裝的政府對手無寸鐵的年輕學生的殺戮之

後，林語堂等人的姿態即使不是幫兇，至少也是幫閒。如果是在平時，在面對其他問題時，一種源於道佛的悠閒，作爲個人的人生態度本來無可厚非，但是面對這個製造過「三・一八」慘案的社會，這種閒適的態度就幾近於冷血，與促使魯迅棄醫從文的中國人看日本人殺同胞時的麻木之間，至多是五十步笑百步而已。正是這種角色的歧途，林語堂才把魯迅的戰士姿態漫畫化了：「不交鋒則不樂，不披甲則不樂，即使無鋒可交，無矛可持，拾一石子投狗，偶中，亦快然於胸中。」

魯迅和林語堂都批判過中國的傳統和國民性。但是兩人的深層態度則非常不同。把林語堂的小品文與魯迅的雜文比較一下，差別太明顯。魯迅是不留任何餘地的決絕，愛之深與恨之切難解難分，其語言尖刻而沈痛、智慧而辛辣，有種挖祖墳的力透紙背。這也是魯迅與當時大多數知識分子的區別。而林語堂則是怨恨和厭惡之中的纏綿。他的《吾國吾民》確實把中國傳統文化罵得挺狠，貶得很低，但他的語言是美文的，宋詞婉約派的，極盡風花雪月的纏綿和飄逸輕盈的瀟灑，我就想不通一個人在罵人時，怎麼還能保持一種談戀愛式的或對著青山綠水抒情式的語言。也許經過西方文化的熏陶，養成了一種喜怒不形於色的紳士風度吧。後來林語堂移居美國，用英文寫的《人生的藝術》，在西方影響挺大，他說中國文人受老莊、佛家影響的這一路人生，是種藝術化的人生。我以爲，這才是他骨子裡的東西，才是他罵中國傳統罵中國人罵得那麼溫柔敦厚那麼紳士的原因。他好像不會尖刻，至多是幽默，而主調是感傷。他討厭傳統，從他定居美國可以看出。但他骨子裡是傳統文人，作爲個體，他沒有魯迅的力量，去擺脫和突破傳統的遺傳。

綜觀中國現代歷史，魯迅的文學成就、思想鬥士的姿態和肩扛黑暗閘門的殉難精神，確實無人能夠與之比肩而立。要想超越他，不是多讀幾本書、多積累點兒知識、多寫多少萬字所能做到的。要有一種天賦的個人的深度才行。我一直不同意林毓生對魯迅的評價。與同時代的其他知識分子相比，魯迅是現代中國知識分子裡，最少傳統的束縛、最具尼采精神和殉難勇氣的文人，正因爲如此，他才有《野草》中的那種孤魂野鬼式的絕望和彷徨。魯迅作爲一個獨立不羈的天才，不僅是當時中國的異己，更是傳統中國和1949年以後的中國的異己，因而其價值就更顯得可貴。在中國，歷來不乏林語堂式的文人，獨獨最缺少魯迅這樣的具有尼采精神的思想鬥士。當然，魯迅的激進和狹隘需要有另一種品質來平衡，但決不是林語堂和「新月派」式的閒適、高雅、冷漠或逃避，而是胡適式的寬容、平和與清醒。

晚期誤入歧途的魯迅

魯迅的後期確實寫了許多無聊的甚至被毛澤東利用且遺害至今的東西，他沒有堅守住「文學與政治之歧途」的立場，也就自覺或不自覺地放棄了獨立的超然的批判立場，走向「文學的階級性」的歧途。他參加「左聯」是他一生最大的失誤和失敗。他四面樹敵，攻擊胡適等具有自由主義傾向的知識分子，執迷於「香汗」和「臭汗」的教條分野。他把小布爾喬亞掛在嘴邊，以輕蔑的口吻談及在當時的中國非常脆弱的資產階級，他不要寬容，而要痛打「落水狗」、「資本家的乏走狗」等等，但他自己也住在資產階級的租界裡，享受治外法權帶來的安全。還在一些諸如誰拿

了西方帝國主義的英磅，誰拿了蘇俄的盧布上耿耿於懷，幾近於斤斤計較。他早年倡導個人自由，但對西方的自由制度卻充滿了不信任，他實在弄不清什麼樣的價值觀、社會體制才可以保障個人自由的實現。另外，他對當時學院派的攻擊和對西方的偏見，肯定有他個人的心懷嫉恨的因素。胡適他們這些在西洋鍍過金的博士，一去北大就是教授，而魯迅這個去東洋學醫又半途而廢的野路子文人，沒有在西洋鍍過金，當官也就是個科員，去大學只混了個講師。以他當時在文壇上的成就和他自視甚高的自我評價以及不寬容的性格，不嫉恨才怪呢。

魯迅早期對「國民性」的深刻批判，在後期也陷入中國知識分子的民粹主義綜合症，把抽象的無產階級作爲道義基礎，拿下層人民說事兒，把那些自稱是代表下層人民的政黨引爲知己。當然，他當時進左聯，同情延安，也有出於道義上同情弱者的原因，在合法政府(強者)與在野黨(弱者)之間，魯迅這樣的人，往往會不分青紅皂白地站在弱者一邊。最能反映魯迅的戰士性格的一幕，是在他已經感到與左聯的分歧之時，一聽到柔石等五人被殺之後，便毅然公開宣布自己不但是左聯的一員，而且想當左聯的代表。而當左聯的危機一過，他與左聯的分歧已經到了「格格不入」的程度。他已經徹底看透了，自己名義上被奉爲盟主，實際上被完全孤立。他們豈止是把他關在門外，「還要鞭撲不止!」還要「經歷了從背後來的暗箭」。等到兩個口號的論戰之後，魯迅認爲左聯是由「奴隸總管」把持著，拉起大旗作爲「嚇唬別人」的「虎皮」，左聯「這嚇成的戰線」，是根本作不了戰的。

也就是說，魯迅淌過左聯的混水後，就知道了這其中的深淺與險惡，他晚年已經覺悟到了自己當時的選擇是錯誤的，看清了

打著「人民」的道義合法性大旗的在野者的本質。可惜爲時已晚，他的肉體已經不行了，再沒有機會以全新立場繼續思想鬥士的創造性勞作。

有人常常設想魯迅如果活到49年後會怎麼樣?以他臨終前的清醒和決不妥協的、一個也不放過的性格，他的命運決不會比胡風好多少，至多是陳寅恪、梁漱冥的命運。因爲，綜觀魯迅的一生，他對中國政治和統治者的批判立場一以貫之，除了對在野黨的短期同情之外，對「辛亥革命」後的所有政府——從袁世凱到蔣介石，從未有過原則上的妥協。這也是他與胡適等人交惡的重要原因之一。而且對在野的中共，他臨終前已經有了新的覺悟，即便他活到1949年以後，短期的蜜月可能會有，但是長期做幫兇或幫閒卻決無可能。

另外，魯迅身上也有盟主欲，他在當時的文壇上之所以四面出擊，八方樹敵，是因爲那些人不買他的帳。他罵所有文壇上和文化界的有頭有腦的著名人物，因爲這些人對他沒有學生對老師、追隨者對盟主的尊敬和順從。而他對文學青年態度卻和藹可親，像柔石啦、蕭紅、蕭軍啦等等，他在這些尊他爲導師的青年身上找到了誨人不倦的感覺，滿足了他盟主的虛榮心。在魯迅留下的遺產中，能夠最好地證明他的盟主欲和導師欲的文字，無疑是他與許廣平之間的個人通信。他與許的師生關係，從真正的師生一直延續到兩人談戀愛和結爲夫妻。我讀《兩地書》，怎麼讀也讀不出他倆是情人、夫妻，而一直是導師對學生的口吻。這太可怕也太可笑了，從講壇上和文壇上當導師，一直當到了家裡的床上。你還別吃驚，這就是中國知識分子，好爲人師，誨人不倦，管他是同事、朋友還是夫妻、父子，只要給他個臺階，他立馬就

踩上去發表訓令和教誨。九十年代中期風靡大陸的《曾國藩家書》，那副既爲大家長又爲道德權威、既是朝廷重臣又是家庭導師的面孔，最得中國知識人的羨慕、青睞和神往。還有八十年代紅遍文化界的《傅雷家書》，都可以作爲中國大家長的典範教材。

沒有神聖價值的悲劇

魯迅後期的悲劇或者甚至都可以叫滑稽劇，有他個性中的因素，但是我覺得，這種個人因素如此放大乃至於狂妄到失控的程度，有更深層的文化傳統上的原因。我們這個沒有宗教、沒有終極價值關懷的民族，無法給他提供一種更高的甚至絕對的尺度，使生而爲人者有一份宗教性的謙卑和敬畏。我們的文化太世俗化了，沒有西方的宗教性的絕對的彼岸尺度——無論多麼偉大的人在上帝面前都是渺小的。如果我們的文化中能夠提供一種類似西方基督教那樣深廣的宗教背景，或者魯迅如果是個基督徒，那麼在他寫完《野草》之後，當他意識到自己在這個文化中社會中是唯一的孤魂野鬼，是匆匆的過客之後，他就再也不會回到世俗之中與庸人們糾纏了。他的《吶喊》、《彷徨》中的小說以及前期雜文，已經把中國人看透了，他「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的背後是《野草》中的絕望，那種前面只有荒涼的墳的絕望，他在這個文化中已經無路可走，處在一種「荷戟獨彷徨」的狀態中。但魯迅與屈原的「眾人皆醉我獨醒」不同，屈原還相信明主，魯迅則什麼都不信，是靈魂上的虛無主義者——在絕望中把自己看成唯一的絕望者，在孤獨中把自己提升爲唯一的孤獨者；沒有對手的悲哀比有對手的失敗更讓他無法忍受。

處於這種狀態中的魯迅，前面只有三條路：自殺；走向與一切人爲敵的唯我獨尊的狂妄；面向一個更高的絕對價值進行自我靈魂的拷問與對話。在中國這種沒有超越的神聖價值的世俗大背景中，《野草》中的魯迅和魯迅的〈野草〉已經是人生和創作的雙重盡頭了，他的眼中不可能再有更高更神聖的絕對價值，他在世俗中的彷徨、孤獨不可能找到真正的靈魂皈依。他不可能象耶穌精神所昭示的信仰那樣，在虛無中在懷疑中堅信意義堅持尋找，在被遺棄和主動放棄的孤獨中絕望中不放棄希望。所以，當人無法靠自身的努力拯救自己的靈魂、而又沒有超越自身的更高價值時，留給他的只有兩種選擇：不選擇自殺，就只能選擇唯我獨尊的姿態與世俗作戰了。

他當時進「左聯」，既有道義上的原因，更有沈寂多時有機會做一回盟主的原因。進左聯之前，他在文壇四處出擊、得罪多多，幾乎沒有他不與之交惡的。正當他陷於極爲孤獨的處境之時，一些自稱尊他爲導師和盟主的文學青年出現了，他怎麼能加以拒絕呢？他與「四條漢子」的論戰，表層是「國防文學」與「大眾文學」之爭，實際上是「左聯」盟主地位之爭。他進左聯時以爲人家是請他去當盟主的，他進去後才發現，人家請他去「左聯」，不是讓他做說了算的盟主，而只不過是想利用他的名聲，當作黨的統戰工具來用，也就是他自己說的「拉大旗，作虎皮」，嚇唬別人。這與他內心的自我期許完全是風馬牛，他肯定有一種被別人當工具玩了一把的屈辱和憤怒，他的那種「荷戟獨彷徨」的孤傲就必然指向任何他看不上的人和事物，以發泄他深受屈辱後的憤怒。

在中國，傳統中只有狂妄的人格神（聖君和聖賢所構成的聖

人），而沒有超越世俗人格的真正的上帝。在這樣的世俗化傳統中，以魯迅的深度與天才，他怎麼可能不自視爲人格神，自視爲幾百年才出一個的聖賢呢？他的心中沒有上帝，眼中又能有誰呢？正是這種狂妄導致了他晚年的浮淺與刻薄，也導致他在49年後再一次作爲毛澤東及其大小黨棍手中的大棒四處開花。如果魯迅心中有上帝，有敬畏，有謙卑，《野草》之後的他就不會再與庸人作戰，也不會把自己降低爲庸人，而是會寫出類似聖·奧古斯丁的《懺悔錄》或帕斯卡爾的《思想錄》那種超越性的東西。魯迅的悲劇也是整個中國知識界悲劇的縮影。心中沒有超世俗的神聖尺度，沒有對這神聖的真正謙卑和敬畏，我們就會永遠掙扎和沈淪在或苟活在世俗的權力、金錢、地位和名聲的泥潭中。魯迅還是掙扎和沉淪，而大多數人呢？別說掙扎，連沈淪都沒有，有的僅僅是苟活而已。永遠是急功近利的小聰明，不可能有大智慧大悲憫大道義大堅韌。狂妄必遭天責，這種命運，在狂妄得絕對、卑賤得純粹的漢文化傳統中，連集道義、智慧、深邃和堅韌於一身的魯迅也無力倖免，更何況絕大多數不及魯迅者。

「六四」大屠殺的規模和慘烈，遠遠超過七十多年前的「三·一八」慘案；1949年後的極權統治的嚴酷，也遠遠超過民國的任何時期。然而，我們至今還沒有一篇《紀念劉和珍君》，所以，儘管魯迅不是完人和聖徒，但他仍然我們這個冷血的民族最需要的精神資源。

2000年6月13日於北京家中

貳

政經篇：無奈的改革

九十年代中國的政治保守主義

九十年代的大陸中國，由於八九運動的大失敗和六四的大屠殺，不但執政黨在政治上日趨保守和毫無作爲，而且以反對八十年代的激進主義爲標識的政治保守主義在知識界也頗爲流行，它以八九運動的悲劇結局爲口實，所批判的主要物件是八十年代在文化上和政治上的全盤西化(方勵之的全方位開放、《河殤》的藍色文明及劉曉波的民族虛無主義)。然而，明眼人不難看出，時間界限上如此分明的八十年代的激進主義和九十年代的保守主義，二者的更迭並非基於純粹的學理上的競爭，而是以「六·四」血案之後，所謂的「激進主義」的言論空間完全被取消爲前提的。正是執政黨對八十年代推動政治改革的黨內開明派和民間自由派的全面封殺，爲政治保守主義的興起提供了客觀的支撐。正是在「穩定壓倒一切」和「經濟決定論」的官方口號下，在沒有任何公平競爭的畸型言論及學術環境中，政治保守主義才得以獨領風騷。

強調秩序優先的政治保守主義

毋庸置疑，政治保守主義思潮極爲龐蕪和複雜，有官方的、

有大眾文化的，有學界的，有國內的，有海外的。他們或以「國情特殊論」爲經驗根據，或以發源於英國的保守主義爲學理依據；就其動機而言，真誠憂國者有之，借此堅守漸進的自由主義立場者有之，但是，也決不乏借此躋身於官僚集團充任高級幕僚者，或借此成爲官方認可的學界名流，執掌意識形態霸權者。然而，無論其經驗的和理論的根據如何，也無論其主觀動機如何，政治保守主義都在客觀上迎合了官方所倡導的「穩定壓倒一切」，「發展經濟絕對優先」的意識形態導向，而放棄了以自由主義爲核心的人類主流文明價值體系及其制度安排。他們寧可要無自由的強權下的「小康」秩序，而不要通過政治改革而逐漸建立的自由秩序；他們寧要壟斷權力恩賜的麵包，也不要主動去爭取自由權利。秩序優先和自由優先的不同抉擇，才是政治保守主義與自由主義之間的根本分野。

「六・四」剛結束時，頗具投機本能的何新以「新保守主義」一枝獨秀。雖然何新本人以此撈到了政協委員的資本，但是因其學術包裝的過於拙劣和赤裸裸的官方立場而被知識界所唾棄，其影響也如過眼雲煙，迅即消失。鄧小平南巡之後，新一輪經商熱潮所導致的通脹與市場秩序的混亂以及中央權威的削弱，使加強中央的宏觀調控權力的思潮應運而生。值此之時，一批經過歐風美雨洗禮和鍍金的學人，不約而同地走向政治保守主義，其集權傾向的學理化包裝，精巧新穎，洋味十足，既博得了執政黨的欣賞，又征服了一批知識分子和企業家，有些人已經在學界一舉成名之後，迅即被執政者攬爲高級幕僚。

政治保守主義的要點大致如下：

主張以強化中央集權來推進經濟發展

一、他們從中央財政銳減，調控權威和能力下降的角度，或從維護社會穩定的角度，主張以強化中央集權來推進經濟發展，維護社會穩定。最具代表性的當屬胡鞍鋼和王紹光合著的《國情報告》。他們以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西方經濟中政府行政干預的強化和西方人對「東亞模式」的理論詮釋爲參照系，認爲「外塑後發型國家」的現代化不能走西方式的自然成長的道路，而應以強化國家的行政干預和集權、大幅度提高這樣財政在國民經濟中的佔有比例，來自上而下地推動現代化，而且是單純的經濟現代化。

在中國的特定的制度背景和語境之中，他們的主張就是在中央權力已經無孔不入的基礎上，還要強化中央集權，特別是財政和計劃的集權，放棄已經實施多年且成效卓著的分權式改革模式。他們認爲，即便在中國現行的一黨專政的高度集權的體制下，中央權威仍然很弱，必須強化，而無視一黨專政的無孔不入。李澤厚、劉再復、甘陽等人也從不同角度強調強化中央權威的重要性，以防止由社會勢力和地方權力的坐大而引發的失控、動亂乃至國家分裂。那麼，他們就必須回答：就現行的組織系統而言，在地方政權的人事任命權力還牢牢地控制在中央手中之時，地方勢力如何能夠坐大？就社會與國家之間的分化而言，在沒有任何真正意義上的社會民間組織的民間自組織能力真空的情況下，社會勢力如何坐大？

眾所周知，政府權威的建立有兩種模式，一種源於被統治者的同意和授權，也就是憲政民主政治下的政府權威，此種權威的

強化也要經由選民的同意，絕非統治者的任意行爲。如果民主體制下的政府缺乏權威性，那只能或重塑政府的公眾認同，或下臺，讓位於其他更得民意的政黨執政。另一種權威源於統治者的以暴力爲支撐的強加民意，使被統治者在暴力的威懾下別無選擇地服從政府權威，而不是基於民眾的自願選擇，這就是專制政治下的政府權威。此種權威的強化大都是統治者非經民眾授權的任意行爲。如果專制體制下的政府權威衰落或弱化，那只能是民眾對強權的不順從或不完全順從的結果。政府要想強化權威性，或順應民意進行改革，重塑政府權威的來源，或繼續強迫民意和加強控制，維持短暫的、表面的強政府。

所以，兩種不同的政府權威根本沒有可比性，而胡鞍鋼等人卻硬要以西方民主政體中的政府干預來論證中國專制政體中的強化集權的合理性，它不是混淆了最起碼的政治理論的常識嗎？更重要的是，西方的政府干預是在基本的產權制度、市場制度、公民權利和法治秩序健全的情況下進行的。而在目前的中國，既無明晰的產權界定也沒有公平的市場秩序，既無公民諸種權利的保障也沒有真正的法治秩序，還要加強政府干預，豈不是與現代文明背道而馳？關鍵的問題不在於應否強化政府權威和行政干預，因爲中國政府現在仍然是世界上爲數極少的全能型的無限政府之一，其權力無孔不入，中國的經濟市場化進程正因爲政府權力的不正當介入而步履維艱；而在於怎樣通過政治改革來建立法治秩序和限制政府的權力，使其逐漸轉變爲依法行政的有限政府。從自由主義政治哲學的角度講，我們寧肯要一個靠被統治者的授權和同意而建立的有限的弱政府，也不要一個靠刺刀和謊言維繫的無限的強政府。中國人作爲個體已經被這類強政府剝奪了

所有的尊嚴與自由；中國作爲一個民族已經爲認同這類強政府付出了人類歷史上最慘重、最血腥的代價。

還是眾所周知，西方的現代化基本上是循著分權式道路發展的，即便是二戰後強化政府干預也是在充分分權（個人、社會、國家之間，中央與地方之間的權責利有明確的法律規定所保障）的前提下進行的。以「四小龍」爲代表的東亞模式的現代化，顯然是在威權體制下完成了經濟騰飛，但是其基本戰略仍然是國家與社會，中央與地方的分權。臺灣從五十年代開始的土地改革，公營轉民營和縣市自治、地方選舉、有限的言論自由，恰恰是以執政黨放棄經濟上的中央壟斷和政治上的中央統治一切爲前提的。「東亞模式」與「西方模式」的不同只在於：西方的分權是在無任何成熟經驗的條件下，經過自發的、長期的、試驗性的漸進累積完成的，而東亞模式只不過是把西方經由幾百年的探索積累而形成的成熟經驗應用於本土，通過政府權威的全力推進在短期內完成的。「四小龍」的現代化在經濟發展和政體改革上基本受惠於西方模式，甚至二戰後臺灣與南韓的改革方案都是在美國的主持下制定的。我想，即便臺灣和南韓的民族自尊再強烈，也不至於完全抹殺歷史事實，把自己的騰飛歸功於專制主義和東方文化吧。而只有頑固拒絕以自由主義爲核心的人類主流文明的中國政府及其御用文人，才會替臺灣人和南韓人重寫歷史。正像中共抹殺歷史事實，重寫抗日戰爭和國共內戰的歷史一樣。至於「四小龍」中的香港就更是受惠於英國人的百年殖民統治，充分的經濟的言論的自由和完善的個人權利的保障，才是香港成爲「四小龍」之首的真正秘密。而新加坡的經濟起飛沒有美國的扶植和西方的市場也是難以想象的。即便李光耀的威權統治對新加坡的經

濟起飛的有效性，也僅僅由於其統治的經濟制度的基礎，是自由市場和產權健全而已。何況它只是一個「城市國家」，是一個特例。

又是眾所周知，中國的經濟改革也是循著分權道路進行的，鄧小平時代與毛澤東時代的最大區別在於：一是把毛澤東時代無所不包的國家權力，下放一部分（僅僅是極爲可憐的一小部分）給社會公眾，使一部分人開始擺脫全面受制於國家的供給制，獲得了極爲有限的相對自主的私人活動空間；二是把高度集中的中央權力下放一部分給地方，使地方能夠局部地擺脫中央計劃的全面控制，因地制宜地發展自己的經濟。儘管此種放權讓利的改革，實際上只是把極少的一部分所有權租賃給社會，而不是真正的所有權變革，但僅僅是這樣有限的改革，也突破了毛澤東時代的中國大一統的總體國家、全能政府、無限權力的極權主義框架，形成了極爲有限的國家與社會，中央與地方的分權格局，從而激發了國家、社會、中央、地方、團體、個人等多方面的積極性和創造力，導致了經濟的高速發展。

更重要的是，東亞模式的威權主義與大陸中國的一黨專政，在集權的程度上和性質上有著顯著的區別：東亞四小龍都是以私有制爲主，都給民營經濟的發展提供了多種優惠政策（如臺灣對民營經濟實行稅率優惠，外匯額度優惠，代款利率優惠的三優政策），而大陸中國至今仍然沒有在憲法上明確產權關係，對私營經濟的發展設置重重阻礙；東亞四小龍都有一部以自由主義政治哲學爲價值基礎的憲法，這就以國家根本大法保證了其政體改革的未來方向，加之有限的言論開放和地方自治的政策（香港則除了選舉權之外的一切公民權利都得到法律的保障），使其專制權力受到了一定的限制，無法爲所欲爲。而大陸中國至今仍然沒有

這一切。

現在，中國經濟的混亂與失序，一是由於轉型期的新舊交替，國家與社會、個人、中央與地方之間的責、權、利沒有得到立法上的明確規範(如產權和地方權力都不明確)致使短期行爲泛濫，犯規行爲盛行。二是由於集權體制下的行政權力在經濟領域的濫用——權力的市場化和資本化，使自由平等的競爭規則無法建立。形成或法律歧視、或無法可依、或有法不依的失序局面，致使權錢交易式的腐敗，政府行爲的企業化和越權行爲成爲社會慣例。那些握有權力者，不僅能夠名正言順地瓜分全民資產，而且設立各種名目搜刮民間財富(1996年8月，我在山東瞭解到，濟南市政府以建立交橋爲名，強行勒令私營計程車主連續三年每年每輛車交二千元公共交通費，這等於利用權力強行搶劫民眾資產。類似的名目多如牛毛)。在一黨專政體制還沒有發生實質性變化的中國，只談強化中央集權而不談對權力的有效監督和制約；只強調穩定的秩序而不談政治制度的改革，其社會後果極爲可怕，一遇偶發事件，暴烈性的社會動亂將不可避免。

因此，無論是西方模式還是東亞模式，都不可能成爲在目前的中國強化中央集權的論據。恰恰相反，這兩種模式的成功都在告訴我們，中國現代化的成功，關鍵取決於從無限的強權政府向有限的弱權政府的漸進轉變。

把民主和自由流放到遙遠的未來

二、政治保守主義的另一理論是社會發展階段論。他們認爲，中國的改革應以經濟發展爲前提，而經濟發展的前提又是社會穩定，而社會穩定的前提又是政府權威的強化，因而，他們就把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置於壓倒一切的優先地位，進而把強化中央集權置於政治改革的首位，而把民主和自由流放到遙遠的未來。這種觀點的主要代表是李澤厚與劉再復合著的《告別革命》。

此書以反對八十年代的所謂激進主義爲基調，把古今中外幾百年歷史上的革命全部劃歸到應該告別之列：法國大革命、辛亥革命、譚嗣同的殉難、五四運動、大躍進、文革、「六・四」運動、蘇東驟變。換言之，作者以激進主義革命爲批判物件，不加區分地否定了從百日維新到八九運動的中國人爲追求自由民主所付出的犧牲和努力，甚至把五四、六四和文革混爲一談。在此基礎上提出了經濟發展——個人自由——社會正義——政治民主的漸進改良順序，其理論淵源是馬克思主義的經濟決定論加上被歪曲的英國式的古典自由主義。

相對於盧梭式的激進自由主義，英國式的自由主義具有保守的傾向，但是從柏克、洛克到哈耶克、波普爾，這些英國式自由主義的捍衛者所要保守的恰恰是自由主義的精髓——有限政府和個人權利，而不是像李澤厚等人的保守主義那樣，對集權政治情有獨鍾。縱觀全書以及發表於《東方》雜誌上的李澤厚訪談錄，他提出的四步論等於一步論，即在目前的中國，只應該發展經濟而不做其他。似乎當代國人只能或只配要求麵包，填飽肚子，而

公民的言論權，財產權，參政權等自由和尊嚴，國人不配擁有。這種理論是「天地不忍，以萬物爲芻狗」的豬哲學。何況，沒有自由民主制度，如何保障個人自由和社會正義？如何達成保證個人財產安全和社會財富的長遠增長的經濟制度？難道自由民主制度的建立，非要等到經濟發展了、個人自有了、社會正義了之後，才能提上議事日程嗎？如果有了前三項的完成，還有必要進行政治制度的改革嗎？

對此種溫飽哲學，我且不論證離開了政治民主的保障，個人自由和社會正義純屬天方夜譚，僅就中國的單項經濟改革所導致的日益尖銳的各類社會矛盾而言(高通脹、低效率、腐敗猖獗、貧富懸殊、治安惡化、國有資源流失、國有企業停滯、大量失業、價值真空、暴烈對抗)，如果沒有與經濟改革相配套的政治改革是根本無法和平化解的。而且，到1995年，單項經濟改革的正面能量已經釋放完畢，再無潛力可挖，經濟改革處在負面能量強勁釋放和停滯不前的狀態(如金融體制改革、產權改革、市場規範化、國有企業改革、社會保障體制改革都無甚作爲)，其根本癥結就在於政治體制改革的嚴重滯後，如果再不改革嚴重阻礙甚至是窒息經濟發展的政治制度，中國經濟的未來肯定是災難性的。

李澤厚與劉再復的《告別革命》，特別把蘇東驟變作爲其理論的經驗依據，然而他們恰恰忽略了政治體制改革完成後的蘇東經濟，正在渡過混亂低速時期，而進入正常發展。更重要的是，以短期的經濟代價換來的是巨大的社會整體效益，特別是公民的各項政治權利，言論權利的獲得，社會公正系統的建立和健全，人的尊嚴的重新恢復，以及現行民主政體對經濟的長遠發展的切實保障和巨大推進作用。至於蘇聯的解體，只不過是靠刺刀和謊

言所維繫的專制國家的解體，是把本來屬於各民族的自主權還給前蘇聯的各加盟共和國。這不是解體，而是國際正義和住民自治的實現。短暫的麵包匱乏換來的是長久的自由，這種物質代價的付出太值得了。因此，俄羅斯人民在今年的總統大選中，才能義無返顧地把選票投給了自由派候選人葉利欽，他們的選擇標準仍然是自由優先，而不是麵包優先。

總之，在這種無視中國人作爲人的基本價值、尊嚴、自由與權利，而把民族國家的短期目標置於至高無上的地位的國家主義的深層，在這種人爲地割裂作爲社會有機整體的經濟和政治的物質決定論的背後，是喪失了獨立的批判意識和屈從於專制權威的依附人格，是無視人的價值，以國家振興代替人的解放的狹隘的民族主義的復活，是近代以來中國人在現代化過程中的一次次地拒絕選擇以自由主義爲核心的人類主流文明的當代翻版。中國人因選擇文明基本構架上的多次失誤（從百日維新到辛亥革命至1949年中共執政）而付出的代價太慘痛，再不能保守這種傳統了。因爲，以自由主義爲基礎的民主化朝流已成爲人心所向，大勢所趨。

以新馬克思主義為學術包裝的毛澤東幽靈

三、政治保守主義最極端的表現，是以「新馬克思主義」包裝的毛澤東幽靈的復活，相對於鄧力群等老左派而言，這些具有洋博士頭銜的「新馬克思主義」被國內稱之爲「新左派」，其主要代表是崔之元的《以俄國爲鑒看中國》，《中國實踐對新古典主義的挑戰》，《鞍鋼憲法與後福特主義》等文章。這種新毛澤東主

義與老左派的《萬言書》一樣，仍然以毛澤東式的階級分析方法來看待目前中國的貧富兩極分化，並以維護國家安全和平民代言人的名義，向中國的現代化戰略提出挑戰。他們不同於老左派的地方只在於：老左派還是固守原教旨的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而新左派則用西方形形色色的左派的時髦理論來重新包裝了毛澤東思想。

從最善意的角度來理解，如果說，胡鞍鋼等人從財政的角度提倡強中央，還是短時期內的改革策略的選擇的話；如果說，李澤厚等人的保守主義還是在認同政治民主的總目標的前提下，強調改革方式的漸進改良而反對激進劇變的話；那麼崔之元等人的「新毛澤東主義」則把改革的最終目標和中國的長遠發展，全部化爲毛澤東式的社會主義，不僅否定了自由主義在中國改革中的當下價值，而且否定了自由主義的最終價值。

崔之元以西方新馬克思主義中的制度學派的方法爲分析框架，以毛澤東的政治遺產爲思想資源，以目前中國的嚴重兩極分化爲經驗依據，批判了世界現代化歷史上所出現過的所有發展模式：從西方的工業革命到古典經濟學，從自發私有化到新古典主義，從康梁變法到辛亥革命，從東亞模式到蘇東的私有化，甚至目前中國的經濟改革……都屬於被超越或被拋棄之列，唯有經過西方新馬克思主義包裝的毛澤東遺產才是拯救中國的不二法門。於是，人民公社變成了村民自治，大躍進變成了鄉鎮企業的先驅，文革變成了抑制權貴私有化(自發私有化)的試驗，鞍鋼憲法變成了後福特主義的經濟民主，這些因素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的重組會爲中國提供獨一無二的現代化模式——社會主義民主。他甚至極端地認爲，毛澤東時代的中國不是類似史達林治下的蘇聯

的專制社會，反而比驟變後的蘇東更接近美國的平民私有化的資本主義。

但是，歷史的事實是，無論在生命的代價上還是經濟的代價上，也無論是在對人的權利和尊嚴的踐踏上還是在對文化遺產的毀滅上，毛澤東時代的中國相對於史達林時代的蘇聯，都只能是有過之而無不及，史達林的大清洗更注重滅絕人的肉體，而毛澤東的文革不僅肉體滅絕，更要徹底摧毀人的尊嚴和靈魂。比如，僅就生命代價而論，蘇聯三十年代的人爲大饑荒餓死了幾百萬人，而中國五十年代末的人爲大饑荒則餓死幾千萬人。而且，在個人獨裁的框架內，從專家治理和文化保護的角度講，中國做的遠遠不如蘇聯。人家還有傳統的古典音樂和芭蕾，有斯坦尼斯拉夫戲劇和愛森斯坦的電影；我們呢？只剩下八個樣板戲和一個粗俗的御用小說家。

把所有富人的財富指責為社會不公

崔之元所全力推薦的平民私有化或社會主義民主，主要是針對自發私有化或資本主義民主所造成的貧富懸殊的社會分配不公，然而，平民私有化的實現必須以強大的政府權威爲後盾，否則的話，私有化和自由競爭的市場經濟根本無法達成平民私有化，即便是北歐等高福利國家也無法做到這一點。平民私有化實質上是分配的平均主義的現代版，而只有強大的專制權力才能違反人的本性而強制推行平均主義的分配方式。

從社會正義的角度講，真正的平等只有一種，即法律所保障的人與人之間的應得權利平等，這是唯一能夠有助於自由的實現

和保障的平等，而其他的平等要麼與自由無關、要麼以某種方式有礙自由。崔之元的理論把所有富人的財富指責爲社會不公，不管這些財富的積累是否合法合理；在他看來，只要社會上還有貧富之間的差別，就無社會正義可言。那麼，毛澤東式的打土豪分田地以及供給式的平均主義就是社會正義了？懶漢低能者去瓜分勤勞者和高能者就是正義的了？此種平均主義式的社會正義，在二十世紀爲人類帶來的災難對崔之元來說並非災難，而僅僅是試驗所必須付出的代價。那麼，大躍進所造成的饑殍盛野，文革所造成的生靈塗炭都可以一筆勾銷了。自由主義的正義原則——平等地分配基本的權利和義務，通過平等自由的競爭分配社會資源(例如財富和權力)所帶來的不平等，也將隨著崔之元的新毛澤東主義而作古。

更重要的是，崔之元在引證西方新左派時，有意或無意迴避了最根本的前提——美國和中國之間的制度差異：前者已經是成熟的自由制度，根本不存在著權利的初始分配的國家壟斷或一黨專制，美國的分配不平等是權利分配平等的結果，是公平的自由競爭的產物。美國左派的正義分配理論，並不是要改變現行的自由制度，而僅僅是提醒社會更多地關心在自由競爭處於不利地位的弱勢群體，在保證自由(初始權利)的前提下，盡可能地在財富的分配上給社會的弱勢群體以福利性的補償。而在中國，最大的分配不公恰恰不是作爲自由競爭結果的財富分配的不公，而是進入競爭的初始權利的分配的不公，是國家和執政黨對初始權利的壟斷，是競爭的起點、過程、規則、裁判的不公，結果的不平等僅僅是這一系列不平等的結果而已。面對中國的制度性不公正，任何稍有良知的知識分子，都不會對一黨壟斷所有資源和權力的

最根本的社會不公正不置一詞。在中國，談任何問題都不能迴避一黨專制這個制度性前提，而任何迴避這一制度性前提的理論，不論其主觀動機如何，都脫不了助紂爲虐的嫌疑。

要麼是席捲全球的自由主義錯了，要麼就是已經接近墳墓邊緣的專制主義下的絕對平均主義錯了。我想，學理上的澄清遠不如世界史的事實更有力。西方新馬克思主義絕不會是未來人類的選擇，它至多是一種自由主義的補充或平衡，提醒人們爲競爭中的弱者提供最基本的生活保障，在分配社會資源時盡可能地給最少受惠者以補償。崔之元的新毛澤東主義更不會是未來中國人的選擇，它甚至連補充和平衡的作用都沒有，因爲目前的中國還在毛澤東遺留的專制主義陰影的籠罩下，日益懸殊的分配不公絕不是由於自發私有化造成的，而是專制體制下特權階層對社會財富的非法掠奪和侵吞造成的，是維持社會公正的基本系統全部失效的結果。換言之，我們離自由主義的普適性的正義——作爲公平的正義——還很遙遠，還需要一代人甚至幾代人的努力和代價。

老左派對新左派的發言既欣喜又困惑

據說，中國的老左派們和留洋歸來的新左派們曾經共同參加了「社會主義與當代世界」研討會。老左派對新左派的發言既欣喜又困惑，欣喜於留洋博士居然在世界性的社會主義大潰敗中，在目前的中國走向市場化的經濟改革中，還能挺身站出來捍衛馬克思主義和毛澤東思想，實在是難能可貴；困惑於他們根本聽不懂新左派們用洋理論包裝後的新毛澤東主義，不理解這樣的新馬列主義還是不是正宗的原教旨，這樣的新左派能與中國革命的實

踐相結合嗎？然而，二者共同的政治利益會添平一切理論上的代溝，實現政治現實上的利益同盟。

由此觀之，不管當代中國的政治保守主義之間在理論上有多大的差別，但是，在目前一黨獨裁仍然強大的中國，他們都是持反對政治民主化改革和強化中央集權的立場，都以粗俗的唯物主義和經濟決定論爲理論資源，都把強制下的社會穩定置於建立公平競爭的法治秩序之上，都把空洞的民族尊嚴和國家利益置於人的尊嚴和權利之上，都把貧富日益懸殊的分配不公歸罪於經濟的市場化和私有化。正是這種共同點既被官方欣賞又在民間獲得了某種程度上的認同，而一旦此種理論既成爲執政黨的決策依據，又成爲民間不滿情緒的代言者，中國就將重回毛澤東時代。沒有全社會式的文革，起碼「打土豪分田地」的經濟文革也在所難免。

對此，中國的自由主義者必須嚴肅地回應政治保守主義，這不僅僅需要學理上的辯駁，更需要知識上的誠實，道義上的勇氣和責任。因爲九十年代中國知識界的政治保守主義，在很大程度上是「六・四」的大屠殺以及之後的高壓迫害的政治恐怖的直接結果，知識界的內心恐懼必然導致理論上的文過飾非和犬儒主義。

就我本人而言，「六・四」前我僅僅是一個不成熟的觀念上的自由主義者，「六・四」給我的最大恩惠就是：我不僅要在觀念上堅持自由主義立場，而且要以行動踐行自由主義理念，即便再被指責爲激進主義也在所不辭。

1996年7月一稿　9月二稿於北京翠微南里

九十年代中國的極端民族主義

「六·四」血案之後，中共政權的正統意識形態迅速衰落，合法性危機空前加重；鄧小平南巡之後，比「六·四」之前的八十年代更開放的經濟政策，使壓抑的中國大地又被新一輪對金錢的瘋狂追逐所衝破，人們在對政治改革的前景絕望之餘，全身心地投入商海，對麵包的如饑似渴代替了對自由的激情。然而，迅速漫延的腐敗吞食了人們心中僅存的良知和正義感，貧富差距之懸殊又使民眾從切身利益被剝奪的體驗中，加深了對現政權的不滿，價值真空所造成的信仰危機，已經使中國人成爲赤裸裸的短視的狹隘的功利主義庸人；加之申辦奧運的失敗對公眾的民族自尊的傷害和對執政黨虛榮心的打擊，使以美國爲首的西方集團成爲官方和民間共同發泄不滿的物件。在此種背景下，從官方到民間，中國大陸驟然掀起了鋪天蓋地的本土化和民族主義的狂潮，速度之快，來勢之猛，情緒之烈，持續時間之長，爲1949年後官方所倡導的歷次愛國主義運動之最。無怪乎國際輿論驚呼「中國威脅」已露倪端。

中共當局的全力倡導

一方面，中共官方出於凝聚民心的意識形態需要，希望以愛國主義化解合法性危機。執政者制定了《愛國主義教育實施綱要》，動員一切媒體高倡民族自尊，回顧近百年中國在西方列強的壓迫下所經受的恥辱；中共宣傳部門不遺餘力地舉辦以宏揚愛國主義精神爲宗旨的各類晚會、報告會、讀書會、音樂會、藝術節、畫展、祭孔儀式，電視中每天播出一部愛國主義影片，出版社大搞愛國主義叢書工程，從天安門廣場到全國各地的中、小學，每天舉行升國旗儀式。在1996年3月召開的人大會議上，李鵬所作的《政府工作報告》中關於精神文明建設的部分，已經把熱愛祖國提升到「五熱愛」之首，而正統的「愛社會主義」則淪落到「五熱愛」之末。

另一方面，執政者以民族主義周旋於國際舞臺，官方利用加入WTO受挫、申辦奧運失敗，美國國會的年度最惠國待遇審議，知識產權談判，西方國家向臺灣出售先進武器，西方國家指責中國人權狀況和支援西藏精神領袖達賴，李登輝訪美所導致的兩岸危機……在民眾中煽動反西方和仇美情緒。

面對西方社會的制裁和壓力，特別是西方對中國人權狀況的批評，中共執政者以巨大的市場和經濟利益的誘惑爲底牌，以國情、傳統的差異和主權、內政不受外來干涉爲國際法依據，指責西方，特別是美國的霸權主義，替踐踏人權的行爲辯解。1996年3月以來，中共更抓住兩岸關係的危機和香港回歸一周年倒計時的機會，對內激發民眾的愛國主義情緒，對外高揚民族主義旗

幟。然而，奉行功利主義原則的中共高層，絕不會有超越功利之外的國際正義的追求。它也會用金錢收買第三世界國家，在聯合國年度人權大會上屢次擱置了西方國家提出的譴責中共政權的議案；中共也會利用在聯合國的地位拉攏第三世界諸國，在一系列問題上與美國對抗，甚至投棄權票默許戰爭販子海珊的侵略行徑。

而對周邊國家與中國之間的爭端，則採取綏靖的鴕鳥政策，至多外交部新聞發言人提出幾句不痛不癢的抗議或交涉。特別是對中國的宿敵日本，中共的態度格外曖昧，從教科書事件到日本政壇高層參拜靖國神社至最近的釣魚臺島事件，中共對日本光說不練的軟弱，對國內民間自發的保釣運動的壓制，都證明了中共在外交上高揚民族主義的赤裸裸的功利準則。對西方國家亦如此，一邊只表演口頭上的強硬以對抗美國，一邊對其他西方國家大打貿易牌，用大市場和大訂單來交換歐盟國家在政治上的低調。中共控制的傳媒抓住一切機會醜化美國社會，而在暗中，中共高層人士都希望有機會正式訪問美國。

民間的狂熱

在民間，申辦奧運的失敗，加入WTO申請的屢屢受挫，知識產權談判的曲折艱難，兩岸危機中西方國家對中共的指責和美國的武力威懾，英國在香港問題上的自作主張，特別是中共傳媒對這一切的不公正的輿論引導（把中國在國際問題上的挫折全部歸罪於西方霸權的干涉內政），都加深了中國民眾對以美國爲首的西方集團的敵視。

於是，歷朝歷代的帝王將相，才子佳人以及各類嬪妃，太監……紛紛在影視螢幕上盡顯風流；易學、卦書、氣功奧秘、兵法經營學、歷史人物傳記、國學叢書、諸子精華眾書，中華文化精粹叢書遍布大小書攤；錦繡中華園，中華民俗村、炎黃紀念館、古代蠟像館、西遊記宮、三國演義、水滸村寨、大觀園等以傳統文化爲資源的遊樂場所遍地開花；由北京示範，迅速遍及全國的飛簷式建築，把中國的城市裝點得不倫不類，不中不西，新建的北京西客站也因傳統飛簷蓋頂而變成了醜陋的建築大雜燴。漂泊海外的遊子也不失時機地加入民族主義大合唱，以「洋插隊」爲題材的小說、記實文學、隨感錄、影視作品更是獨領一時風騷，遍布北美、歐洲、澳洲、東洋、蘇東的炎黃子孫紛紛把自己的洋插隊經歷變成暢銷品。

這些通俗作品大都表現了飄泊異鄉的艱辛、積怨、鄉愁和自立自強的民族自尊，用淺薄的、扭曲的中西文化對比來諷刺西方文明，宏揚中華傳統。像《曼哈頓的中國女人》，表現中國女人在海外是怎樣經過艱難創業而取得成功，並激情袒露海外遊子的女強人風範和赤子之心；電視劇《北京人在紐約》的火爆創近幾年收視率之最，居然下作到用幹洋妓女和往白種裸體上撒美元來表現民族自尊的程度。在通俗音樂中，紅極一時的是《中華民謠》,《大中華》以及來自民族傳統的愛情歌曲，甚至連電視臺所插放的公益廣告，也以突出五星紅旗、國徽、天安門、青少年向祖國敬禮和宣誓爲主題。

然而，一個信仰崩潰、缺乏價值支撐的民族，根本無法建立民族自尊自強的統一根基，普遍流行的功利主義的動機才是佔有主導地位。在這種表面的民族主義狂熱中，幾乎無人肯放棄去西

方、特別是去美國的機會，非法移居西方國家的中國人仍然有增無減，青年人在消費上仍然以追逐西方名牌爲時尚，商品廣告，店鋪招牌仍然想方設法沾上點兒洋味，北京各大高校附近都有類似「托福餐館一條街」的飲食區，孩子們去麥當勞過生日仍然是愈演愈烈的時尚，好萊塢大片仍然是上座率最高的電影，就連曾引起一時轟動效應的《第三隻眼看中國》的作者王山，也要冒充西方漢學家的名字來推銷自己；以贏利爲目的的大眾文化也把民族主義作爲促銷手段，最近頗爲流行的《中國人可以說不》即是極爲成功的一例，而做這本書的個體書商則是地道的惟利是圖的商人。換言之，中國人追逐功利的墮落已經到了除了比誰無恥之外，再無什麼可比的地步了。

如果說，「六・四」剛過的幾年間，大眾文化的大腕們在比誰平庸，「咱也是個俗人」成爲一時的招牌，那麼到了1995年以後，無恥代替了平庸，專制主義加金錢誘惑、暴力鎮壓加利益收買，已經徹底瓦解了中國人作爲人的僅存的善良。這種無靈魂的民族主義完全可以用利祿來收購，每個人投入的熱情也完全可以做收益與成本的計算，扔給這類民族主義者一疊美元，他們就會像面對權貴時一樣，媚態可掬，頻頻應諾，出賣從靈魂到肉體、從祖宗到國寶的一切，直到再無可出賣的爲止。

越是那些穿一身對襟中式服裝、腳下蹬著黑布鞋的先鋒分子，喝起白蘭地來就越有洋品味，口袋裡的美元自然也就越多。

反對西方文化霸權的知識精英

在這種愛國主義狂潮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知識精英們所表現

的民族主義情緒，其強烈程度爲1949年以來之最。他們既不像官方提倡愛國主義那樣，出於赤裸裸的政治功利目的，也不像大眾文化的民俗熱那樣出於淺薄的金錢功利目的，而是經過了一番精心的學術包裝和道義修飾，因而更具有迷惑性。所以我在此要著重談談知識界的民族主義。

後現代主義和後殖民主義的學術視野，拒絕西方的文化霸權和強勢話語的本土化姿態，批判西方社會的種種弊病的正義立場，似乎都在顯示著中國當代學人的淵博、新潮、良知和尊嚴。北京大學的一批中年教授高倡振興國學，回到前清乾隆時代，以抗拒追隨西方新潮的輕浮學風；張頤武、王一川、王岳川等青年學人，從後現代、後殖民對西方文化的批判中，找到了捍衛本土文化的學術立場，認爲中國學人應該重新標舉「中華性」，以振興衰落的民族精神，重建中國人的靈魂支撐；鄧正來、甘陽、李陀等人在規範學術研究的口號下，強調人文學的本土化乃中國當代學術的唯一出路；林毅夫等留學歸來的經濟學博士們堅信：21世紀的經濟學非中國的經濟學家莫屬，就像當年杜維明等海外新儒家堅信21世紀是中國人的世紀一樣；被輿論界稱爲經濟學「四少」之一的盛洪，堅信只有中華文化能把人類從核威脅的災難中拯救出來，就像當年的李澤厚等人用「天人合一」、「樂感文化」爲世界指明路徑一樣。

圍繞著亨廷頓的《文明的衝突》和薩義德的「東方主義」所展開的學術討論，幾乎涉及到目前中國人文學界的所有重要刊物和中堅人物，《讀書》、《東方》、《戰略與管理》、《中國社會科學季刊》等重頭刊物幾乎每期都有關於民族主義的文章，並且不定期地發表成組的討論民族主義的文章。還有一些八十年代文化界

的名角，出國歸來後大罵西方，似乎西方人出錢請他們出國鍍金就是爲了找罵。一些在八十年代以模仿西方現代派起步而走紅文壇的先鋒作家、新潮藝術家，大都回歸黃土地和悠遠的傳統來尋找靈感和包裝。

最富有戲劇性和諷刺意味的是，捧回了「金獅」、「夏納」等國際電影節大獎，爲中國電影贏得了世界聲譽，專以黃土地爲素材拍電影的張藝謀、陳凱歌，在堅信民族主義的學人的眼中，成了專向洋人獻媚的「後殖民化電影」的典型。他們批判張、陳兩位名導專以展示中華民族的愚昧和醜陋來博得洋人歡心的洋奴心態。而實際上，這兩位導演本身就頗具民族主義情懷，特別是張藝謀專門向人們展示用蒙太奇製作的「精神長城」，但這不過是在中國的制度背景下的生存策略而已。來中國旅遊觀光的老外都要爬爬磚砌的長城，他們自然也要在中國知識人的作品中尋找「精神長城」。然而，這些精致的民俗風情與中國的當代現實毫無關係，完全是一種虛假的黃土地浪漫情懷。至於說他們拍的電影是專門爲了討好老外的，那麼又有幾個中國導演不想參加歐洲三大電影節和奧斯卡，又有幾位作家不想弄個洋獎特別是諾貝爾獎呢？又有幾個學人不想得到國際社會的邀請和承認呢？

這一切民族主義的學術化討論，其鋒芒所向卻極爲直白，直指西方中心論和白種人優越論以及西方文化的殖民主義霸權，直指八十年代中後期文化熱中的西化思潮和民族虛無主義，由此確定文明基本構架的抉擇中的民族主義立場。而頗具反諷意味的是，他們只是空喊愛國主義口號，空懷一腔民族熱情，卻拿不出一項真正像樣的本土化成就來顯示當代中國學人的愛國實績。甚至連他們提倡民族主義的文字都是翻譯文體，問題的出發點也是

由洋理論提供的。

換言之，知識界的民族主義，無論是人文學本土化的學術定位，還是立足於中國傳統的現代化的模式的選擇；無論是把西方文明作爲崇尚物質和武力的惡的文明加以痛斥，還是以崇尚精神與和平的善的中華文明來拯救世界的幻想；無論是抗拒西方文化霸權的民族自尊，還是重新確立中國人的價值信仰的努力；無論是後現代主義的解構方法，還是絕對相對主義的價值立論；無論是經濟學的新穎角度，還是生造術語，從西方移植問題和概念的嘩眾取寵……這一切表現在目前中國的語境中都不重要，而重要的則是骨子裡的自卑、焦慮、失落、排外、無所適從和對現存的專制秩序的認同。如果說，《中國人可以說不》是一種淺薄盲目的民族主義情緒的歇斯底里式的發泄，那麼，知識界的民族主義則是經過學術修飾和道義僞裝的歇斯底里。

其一，知識界的民族主義者，像一切至今仍然貧窮落後的第三世界國家一樣，沈浸在後殖民時代的怨婦情節中，把中國文明在近現代的失敗和落伍，完全歸罪於西方列強的入侵和壓迫，而拒絕檢討自身文化的弊端，更拒絕反抗現存的專制主義秩序；他們把西方人對自身傳統的自我反省和自我批判，作爲中國人維護自身傳統和本民族利益的方便口實。本來，西方人的現代相對主義是針對西方中心論所作的自我檢討，是針對西方的殖民主義擴張所作的自我批判，也是針對西方傳統中形而上學的一元決定論所作的學術突破；本來，西方的後現代主義是對在文藝復興的啓蒙傳統的統攝下的種種現代文化的全面批判和徹底消解，是在解構自身的傳統。這一切，都是爲了以更開闊的視野和更平等的心態來面對其他文明與全球的未來，是爲整個人類尋找相互融合的

共同點的帶有悲愴情調的努力。

而中國知識界的民族主義者們卻把這種嚴肅的自省和人類情懷，理解爲西方的沒落和中國的復興，完全無視自身傳統的弱點和當前專制主義的嚴酷，放棄對自身的批判性反省和對既定秩序的抗爭，一味沈緬於「21是中國人的世紀」的幼稚幻想之中，使發源於西方的現代相對主義和後現代主義的激進批判，變成了中國的保守而犬儒的民族主義。

這種只對外批判而不對內反省，只虛構光明未來而迴避當下黑暗的民族自尊，是一種阿Q式的家奴的自尊。我不相信，一個在家裡每天對主子搖尾乞憐的奴隸，一跨出家門便會有人的尊嚴。我更不相信，一個每天都能目睹到一黨專制殘酷踐踏人的權利和尊嚴的學者，對身邊的非人狀態熟視無睹或因恐懼而不敢公開主持正義的知識分子，能夠真心地關懷整個人類的未來，能夠具有誠實而正直的良知。特別是在經歷過「六．四」泣血悲劇的短短幾年後，中國知識界在白色恐怖下的整體大逃亡，大退卻，大沉默的氛圍中，能夠有幾個人憑良知爲死難者伸冤，爲維持中國人最起碼的生命權而抗爭？千萬別再對大洋彼岸和遙遠的文明擺出一副大義凜然的姿態，因爲在中國知識界的身後，不要說作爲知識分子的道德底線崩潰了，就連知識分子作爲一個人的道德底線也崩潰了。誠實、良知對於中國知識界來說，是太高貴太奢侈的品質，我們根本不配！如果我們還想關懷人以及中國的前途和人類的未來的話，我們只有勇敢面對眼前的制度現實，面對每天發生在身邊的種種野蠻行爲，重新回到作爲一個人的道德底線上站穩後再說。

其二，知識界的民族主義者，以從西方般來的術語、方法、

理論體系來包裝蒼白的民族自尊和狂妄的夜郎自大。只要翻翻近幾年的人文類刊物，內中充斥著故作高深、雲裡霧裡、不忍卒讀的洋術語、洋理論、洋大師，有人把此中概念轟炸和大師泛濫概括爲「洋涇濱文風」。西方的現代文化還沒有弄透徹，就爲了趕時尚而頻頻引用連在西方學界都被視爲閱讀畏途的福柯、達利達等後現代主義大師。近幾年頗爲風光的青年經濟學家盛洪，更以美國經濟學家科斯的門徒自居，從西方制度經濟學中移植方法、原理和概念來重新定義什麼是文明，進而定義什麼是西方文明和什麼是中華文明，再進而便是對西方文明的否定和對中華文明的肯定，最後虛構出以中華文明來拯救世界的結論。當年，我曾向新儒家們請教過這樣的問題：中國文化完美到足以拯救世界的程度，您們作爲它的捍衛者和宏揚者，怎麼就不能從中提煉出一套方法和概念來捍衛和宏揚自己的傳統，而非要從洋人那裡移植呢？一種連整理自身的文化資源的方法、概念都找不出來的文化，其優越和完美何在？值得我們捍衛和宏揚嗎？今天，我還要以此問題來請教九十年代的民族主義者，用西方舶來的主義來發現和肯定中華文化豈不是自甘西化，滑天下之大稽嗎？

盛洪曾經談自己的讀書體會，說他上大學時從亞當・斯密那裡懂得了市場經濟的理論，知道了「看不見的手」；後來他翻閱先秦諸子，才恍然大悟地發現亞當・斯密的經濟學的精髓，早在孔子的《論語》中就已經昭然於天下。就像近百年來中國的學人經歷了無數次的先西後中的幡然醒悟一樣，難怪崔之元在美國知道了「後福特主義」，便如獲至寶地裝進行囊回國尋根，如夢初醒般地在毛澤東主持制定的「鞍鋼憲法」中找到了「後福特主義」的源頭。如果中國的民族主義者那麼自信西方的一切有價值的東

西，都可以在中國的傳統中找到源頭，那又何必留學西方呢？何必用亞當・斯密來肯定孔子，用「後福特主義」來肯定毛澤東主義呢？

其三，中國知識界的民族主義者用絕對的相對主義和以無包萬有的大而化之的定義與比較，來混淆不同層次的文化構成因素，進而否定文明的進步、制度的優劣和正在爲越來越多的民族國家所接受的發源於西方的現代價值系統及其制度安排。他們可以從中餐與西餐無價值優劣之分推論出市場經濟與計劃經濟、私有制與公有制之間無優劣之分；從長袍與西服之間無好壞之分推論出民主政治與專制政治之間無好壞之分；從京劇和芭蕾、水墨畫與油畫之間無高下之分，推論出個人本位主義與國家本位主義之間無高下之分；他們可以從古老的審美象徵和道德象徵至今魅力依舊，推論出工業文明並不比刀耕火種更進步；他們從不區分德國傳統和英美法傳統及政體的根本差異，籠統地把第一、二次世界大戰歸罪於整體的西方文明，他們不願意正視這樣的歷史事實：第一、二次世界大戰的發源地恰恰是極端民族主義加政治專制的德國和日本，而不是以人的自由爲優先目標加民主政體的英、美、法諸國；他們根本無視二戰後連綿不斷的局部戰爭大都發生在狹隘的民族主義國家之間和專制主義國家之間的當代歷史，無視西方的自由世界在近五十年維護世界和平的努力，而只憑臆想天開或以古代今的方式，把戰爭的根源歸罪於引導全世界走向現代化的西方文明；他們更無視中國古代社會從未停止過的征伐夷族和內戰，無視古代中國的帝制在戰爭乃至和平時期對人的殘酷殺戮；他們從不提及二戰結束後，大多數國家都開始致力於和平重建之時，中國的土地上卻爆發了一場絕不次於抗日戰爭

的慘烈內戰，被日本人砍殺過的中國人，還未來得及掩埋屍體、揩乾血跡、醫治創傷，就開始了更殘酷的相互廝殺。中國人自相殘殺的血腥歷史怎麼可以用儒家傳統中的一個「仁」字掩蓋住呢？即便是這個「仁」字本身的歷史，也是魯迅所說的「吃人」的歷史。

同時，這些民族主義者對席捲全球的以工業化、市場化和民主化爲標誌的現代化浪潮意味著什麼卻不置一詞。在聯合國的《世界人權宣言》已經成爲國際正義的公認準則的今天，中國的民族主義者們居然以這種泯滅任何普遍價值和正義標準的絕對的相對主義和多元主義來宏揚中國文化和否定西方文化，其災難性的後果只能由中國人來承擔。他們不僅模糊了中國現代化和文明抉擇上的未來方向，而且使中國人陷於狹隘盲目的民族陷井，失去了和其他民族相互交往，共同制止惡勢力的人類所應共同遵守的正義準則，不知道人類作爲一個整體的基本的共同價值何在。在20世紀末，中西文化之爭的主要性質，已經不再是民族之爭，而是制度之爭，把自由制度和奴役制度之爭轉化爲東方民族與西方民族之爭，恰恰是一切獨裁政權及其幫兇幫閒們最拿手的表演。

換言之，在中國目前的語境中，民族主義用相對主義、多元主義的詭辯所取消的恰恰是我們最需要的、發源於西方的現代性價值及其制度安排；所保存的又恰恰是我們最應該拋棄的專制主義文化及其制度安排。一言以蔽之，對自由主義價值及其民主政治的拒斥和對現行專制主義價值及其一黨專政的默認，才是此種民族主義的真面目。被打垮了脊梁的古代士大夫和當代知識精英，都有一腔「寧爲家奴，不爲外辱」的浩然正氣與自尊，因爲

甘願當家奴可以得到主子的寵愛和實惠，而怒斥蠻夷又能顯示出大義凜然，何樂而不爲呢？

其四，正因爲有了以上的種種特徵，知識精英的民族主義和官方的愛國主義，在拒絕西方文明的理由和說辭上，才能如此地一致：霸權主義，一爲文化霸權，一爲政治霸權。而且兩者都把西方的這種霸權地位的取得，簡單化地歸結爲強大的物質力量和對外擴張的尚武品質——建立在高科技基礎上的經濟強大和軍事優勢以及稱霸世界的野心。換言之，在他們眼中，西方人僅僅依靠金錢加大棒便征服了世界並行使其霸權。他們又回到了洋務運動時代，以「船堅炮利」來理解西方的強盛，似乎完全忘了梁啓超、胡適等人曾經論述過的由西方人所創造的私有化、市場經濟、個人自由和民主政治。歷史的輪回競如此神速，多少在「六·四」前和「六·四」中還高呼民主自由的西化論者，轉眼之間就變成了拒絕西方霸權的民族主義者，就連因「六·四」而流亡海外的甘陽、蘇曉康、李陀等人也加入反省西化謬誤，宏揚本土化的民族主義行列。

如果說，中共官方出於維持既得利益的政治功利主義策略而拒絕接受西方文明還說得過去的話；如果說，大眾文化出於發財的經濟功利主義而用民族主義來推銷其商品還情有可緣的話；那麼，一向以超然的學術立場和強烈的社會使命感爲標榜的知識精英們，也拒絕西方文明、特別是自由主義的價值，就太有辱於知識分子的良知和智慧了。其中的善意者、無私者也許是出於困惑，但是我認爲這類動機純正的知識分子極少，大多數人則是出於攀權附貴、向大眾獻媚的功利動機。因爲，歷經專制主義蹂躪的中國知識界，大都清楚他們的人格、獨立和尊嚴是怎樣被全部

剝奪的，知道半個世紀以來知識分子的屈辱地位，皆源於一黨專制的殘暴對知識、知識分子的仇恨。

著名哲學家波普爾在《開放社會及其敵人》中，專門以黑格爾爲例，論及知識分子的良知。他說：黑格爾在知識上的不誠實，導致了在道義上的不負責任，最後是爲專制現實做哲學辯護的市儈主義和犬儒主義。「凡是現實的皆爲合理的」，就是這種辯護的典型表達。

「六·四」前，我作爲極端的民族虛無主義者和全盤西化論者，既暴得大名又頗受人非議。「六·四」後，我作爲黑手之一被官方定性爲賣國主義者而痛加討伐。今天，仍有當年被我挑戰的學術權威、著名作家批判我的激進主義。而對這一切，特別是面對當前的民族主義狂潮以及喪失了做人的起碼誠實和良知的中國知識界，我只能說：我過去是、現在仍然是堅定的西化論者，因爲我堅信塵世間最可寶貴的是人的自由、尊嚴和創造力，而西方文明的精華——自由主義——恰恰爲維護人的自由、尊嚴和激發人的創造力提供了一整套價值觀念和行之有效的制度安排，發源於此的現代化已成爲人類的共同追求。作爲一個人，我渴望過一種有自由有尊嚴的創造性的眞實生活；作爲一個中國人，我渴望歷經苦難的中華民族能夠順應人類主流文明，埋葬專制政治，在民主政治中獲得新生，成爲無愧於維護人的自由、尊嚴的人類成員。

所以，除西化之外(三百年殖民地)，我別無選擇，中華民族亦如此。

1996年年7月初稿 9月改定於北京翠微南里

九十年代中國的御用經濟學

獨領風騷的經濟學

九十年代的大陸學界，最突出的特徵之一，便是政治體制改革全面停滯、倒退，八十年代中期建立的體制內和體制外的政治研究機構紛紛被關閉或被嚴加控制。同時，1992年後鄧小平重新啓動經濟改革，使經濟學的地位迅速竄升，取代了八十年代各種學術熱點而成爲九十年代的「顯學」，用獨領風騷來描述也決不過分。

八十年代有所謂「四大青年導師」之頭銜(一種說法是方勵之、劉賓雁、李澤厚、劉再復，另一種說法是金觀濤、溫元凱代替了方勵之、劉再復。)的人中，沒有一個是搞經濟學的。而九十年代則不同了，社會上流行的稱謂——理論界的「四老」和「四少」——皆是搞經濟學的。「四老」有吳敬璉、厲以寧、劉國光、董輔礽，「四少」有樊綱、鍾朋榮、魏傑、劉偉(另一說是盛洪、張維迎代替鍾、魏)，他們都在體制中具有比較顯赫的特殊位置，在社會上也享有明星般的殊榮，尤其是他們在地方官員和大公司

老闆們的心中，更是可以利用的象徵性資源，他們也依靠這種學術權威加高級幕僚的優勢，四處講學和提供諮詢，出任大公司的顧問甚至董事，使自己在經濟上成爲知識階層的「大款」。當然，只要不與政治權力與大資本形成黑幕後的結盟，依靠知識致富具有充足的道義合法性，特別是在知識分子長期遭受不公正的對待之後，知識和知識分子的大幅度升值，恰好說明了一種社會的進步。

然而，這些人中除了吳敬璉、茅於軾身上還存有知識分子的道義關懷外，其他的人只不過是政策的應聲蟲而已。現在，中國的經濟學大都緊跟著已出臺或將出臺的政策走，很少用自己的專業知識去追求理論建樹、去引導或影響政策，很少對現實經濟中的黑暗給以足夠的揭露和批判，對國際經濟學的成果也是採取「急用先學」，以求「立竿見影」的功利態度。特別是一些放過幾天洋的學經濟的人，回國後就以經過洋概念包裝的准奏摺理論投石問路。

以占主流地位的經濟學看，整個九十年代大致可以分爲三個時期：早期，畸形制度居然使搞美學出身的何新在經濟學領域一枝獨秀；中期，胡鞍鋼紅極一時；末期，樊綱風頭出盡。表面上，經濟理論的走向是由九十年代早期的馬克思主義到中期的凱因斯主義再到後期的新自由主義和新制度經濟學，但是無論何種外來的主義，一進入中國，就變成了爲中共政權穩定服務的官方決策的註腳。何新爲大屠殺辯護，胡鞍鋼爲宏觀調控辯護，樊綱爲權力市場化和權貴私有化辯護，每一步都與江核心保持一致。這就是中國特色的「經濟學不講道義」的「學術中立」。

速生速朽的何新

「六・四」剛剛結束，血跡還未洗淨，中國的各種媒體中只有一個叫何新的理論「暴發戶」的聲音，他幾乎涉足於所有的領域，經濟、政治、文化、美學，稱爲地道的中共意識形態霸權的代言人。何新寫給中共高層的關於「動亂」的思想根源的內參(方勵之的自由化言論，劉曉波的民族虛無主義和《河殤》的全盤西化)，也成了陳希同的「平暴報告」的一部分。經過編造的何新與日本某經濟學家的對談《世界經濟形勢與中國經濟問題》發表於《人民日報》，使這位八十年代的美學家，搖身一變爲著名的經濟學家。在這個幾乎是何新一個人唱獨角戲的對談中，那位日本經濟學家的恭敬姿態幾近於仰慕者面對大師。何新在重彈中國式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老調的同時，居然把薩繆爾森的經濟學貶得一文不值，還要給扣上一頂帝國主義經濟學的大帽子。他把經濟的全球化等同於殖民主義，把國際新秩序之中國與國的關係，作爲發達國家對第三世界的民族壓迫和民族剝削的不平等關係加以否定，並且代表第三世界向國際社會討還正義和公平(九十年代中期的民族主義狂潮中，經濟學新少盛洪以更學術化的包裝重彈過何新的論調)。何新把社會分配的不平等和權錢交易的腐敗完全歸結自由市場，主張重新確立國家在經濟中的主宰地位(後來，胡鞍鋼的國家主義、「新左派」的毛澤東式的民粹主義，都在不同的程度上用學術化的語言重複著何新的觀點)。爲了替大屠殺作辯護，保持經濟發展就必須維護社會穩定成了當時最具有欺騙性的御用經濟學說辭。何新的努力沒有完全徒勞，官

方也給了何新一些小恩小惠，諸如政協委員、社科院研究員等等。

但是，六四後的經濟危機一觸即發，何新式的辯護只具有意識形態的說教意義，而對消除經濟危機卻沒有任何作用。於是，1992年鄧小平只能南巡，用重新啓動經濟改革來延緩經濟危機的爆發和挽救中共政權的合法性，同時也打破了何新式的輿論獨霸局面。何新的赤裸裸的官方立場和半吊子經濟學，使他很快變成不僅是被知識界所蔑視的出賣靈魂的御用文人，甚至他爲大屠殺辯護的說辭連官方都覺得是幫了倒忙。因爲他不是從「穩定壓倒一切」和「經濟發展優先」的鄧小平理論的視角，而是從帶有原教旨色彩的馬列主義和毛思想出發，來爲大屠殺進行辯護的。何新的「經濟學」近似於強烈的民族主義叫囂和計劃經濟的復活。他的那種對西方的仇恨會嚇跑資本主義的投資，而當時的中國經濟已經對國際市場有很深的倚賴，中共要想度過經濟危機和政治危機，資本家的錢包是不可缺少的。何新的毛式的平等主義會對剛剛發了財的「官倒」們的既得利益構成威脅，而當時的執政階層已經開始形成了各自的利益集團了，他們決不允許有人借助於保證社會主義的純潔性而清算腐敗，以及他們從中撈取的不義之財。

何新太自以爲是了，以爲自己抓住了千載難逢的機遇，從此可以平步青雲。他太不瞭解中共骨子裡的犬儒化了，其用人的標準是多麼沒有原則，又是多麼勢利。當一個太急功近利的投機者面對一個同樣急功近利的主子時，遊戲的結果必然是主子玩弄了投機者。其實，何新的智商決不會如此低下，他的命運是典型的利令智昏，被過度膨脹的貪婪和野心所降低所扭曲的智商，在情急之中往往會把玩到最後可能是血本無歸的遊戲，認定爲一本萬

利的交易。何新像六四時的袁木一樣，在被推上前臺完成了頂雷的任務之後，仿佛只是一夜之間，原本八面威風、聚光於一人的舞臺突然黑了、塌了，晚間的主角在天還沒有全亮時就已經是昨日黃花了。何新無法面對如此尷尬的境遇——從媒體上全面開花的寵兒變成無人理睬的棄兒。他不敢向主子提出抗議，無奈之下就撲向了知識界尋求發泄，急中生智地拋出一本自印的通信集，收錄了一些著名的文化人在八十年代給他的信，重量級的有諸如錢鍾書、李澤厚、劉再復、金觀濤等人對學界新人何新的讚美。他這種一箭雙雕的策略(既誇了自己，又貶了別人)並沒有挽救他的曇花一現的命運。直到現在，儘管何新爲之辯護的大屠殺仍然沒有得到重新評價，但是他也不會被官方攬入受寵倖的高級幕僚之列。何新的命運，也爲其他想在江朱時代躋身於「王者師」之列的文化人提供了反面的示範——想做高級幕僚就不能把執政者的老底赤裸裸地爆光，起碼要保持一付學術面孔。

以胡鞍鋼為代表的國家主義

胡鞍鋼在中國獲得工學博士，後又在美國的三所著名大學做過博士後、訪問學者、客座研究員。他在中國獲得過許多榮譽，是「有突出貢獻的中國博士學位獲得者」。使他成爲經濟學界有影響的人物的論文，是他和王紹光合著的《中國國家能力報告》。此報告被中宣部評爲「五個一工程」的「一本好書」，全國排名第六。胡鞍鋼現爲中國科學院國情分析小組研究員；中國科學院生態環境研究中心國情研究室主任；清華大學21世紀發展研究院教授；中國科學院國土與資源專家委員會委員；農業部軟科學委

員會(第二屆)委員；國家計劃生育委員會人口專家委員會(第四屆)委員；北京科技大學兼職教授。

胡鞍鋼的「報告」於1994年發表，恰巧與政府的宏觀調控同步。在1992年的經濟改革重新啓動後，他對中國經濟的市場化過程做了頗具中國特色的指引——以國家主義爲目標，加強國家從民間汲取財政資源的能力，形成「強中央，弱地方」的大格局。他在「報告」引證了大量發達國家的中央財政在PNG所占的比例的資料，特別是二戰以後的凱因斯主義有關加強國家對經濟的宏觀干預的理論，把中央政府汲取財政資源的能力的低下所形成的「強地方，弱中央」的現象，歸罪於改革中的放權讓利。他從這種經濟研究中引申出中國的現代化之路，即欠發達國家的現代化決不能走西方的發展道路——民間的自然演化，而只能走國家主義的自上而下的推進式道路。這就需要始終保持著一個權力高度集中的政府，也就是所謂「四小龍」模式。

胡鞍鋼比八十年代的「新權威主義」走得更遠，他不但要求在一個威權政治制度框架內，先進行經濟改革，等到經濟的市場化、私有化基本成熟之後，再進行政治改革，而且要求政治改革必須在政府主導下進行，完全排斥民間的自發參與和持不同政見者運動。在借鑒外國的理論資源時，他根本不提從七十年代開始復興的自由主義經濟理論(這種以主張私有化、自由化、削減社會福利「新自由主義」恰恰是針對凱因斯的國家干預論的，這三項政策的落實，其前提就是放鬆國家的控制)，無視全球性經濟的新一輪自由化浪潮，只爲了一種抽象的國家目標而一廂情願抓住凱因斯主義。他的國家主義有意迴避了中國與西方的最根本的制度性差異：在自由體制中的政府干預和專制體制下的政府干預

所導致的結果會完全不同。中國的現實不是經濟太自由了，需要政府的干預來避免市場失靈和分配嚴重不公的弊端，而是權力的市場化造成了經濟混亂和市場無序。貧富差距的迅速擴大的根源不在於經濟的自由化，而在於政治權力對經濟的無所不在的滲透和控制。正是這種政治權力的市場化，才使權貴們一夜暴富，使全民資產被極少數人所瓜分。

胡鞍鋼的國家主義目標甚至把自由市場和私有化，只作爲一種國家強盛的權宜之策，更不要說自由、民主、憲政這樣的政治目標了。他大談怎樣重塑中央和地方的關係，卻只字不提現代化的前提之一——基於個人獨立的民間社會的發育和建設。在他的現代化目標中，只有國家是至高無上的，個人的權利則無足輕重。

在胡鞍鋼之後，以《戰略與管理》爲言論陣地的新國家主義很有市場，趙紫陽時代的高級經濟幕僚王小強等人也加入了國家主義的大合唱。他們仍然重複一個世紀前的論調：改革的目的只有一個，那就是中華民族的強大，任何偏離這一民族主義、國家主義的目標的理論與行爲，都應該動用行政手段加以強制性禁止。他們的文章中最常見的片語，就是「國家安全」和「政權安全」。這讓我又想起了從「洋務派」到「維新派」再到「革命派」，儘管這些不同的派別有著不同的政治綱領，但是其深層目標則完全一致：不是把「人的解放特別個人的解放」當作改革的最後目的，而是把「民族振興和國家強盛」作爲終極目標，即便是以「三民主義」爲綱領的孫中山，要的也只是「民族獨立的國家自由」，而不是「個人獨立的人的自由」。正是由於這一傳統，1949年後，那種「大河沒水小河乾」的總體國家，那種抽象的黨的利益、國家的利益、人民的利益才獲得了充分的道義合法性，而個人的自

由、權利乃至生命則不具有任何存在的價值，遭到了完全的忽視和踐踏。胡鞍鋼等人的國家主義主導下的經濟戰略，在現代經濟學術語的包裝下，所要保守的恰恰是古老中國的一以貫之的國家本位的專制主義傳統。

1998年中國的大水災，胡鞍鋼居然說大水災從經濟發展的角度講是好事，因爲大災後的重建能夠增強內需，刺激經濟，可以使國民生產總值提高幾個百分點。中共執政者的智囊就是說出如此昏話的經濟學家，爲了讓焦頭額的執政者聽到虛幻的喜訊，居然可以在任何事件中找出發展經濟的動力。如果唐山大地震發生在九十年代末，相信胡鞍鋼也會用他的經濟學論證出一片廢墟對經濟發展的巨大貢獻。

樊綱式的「交易成本論」和「腐敗有益論」

樊綱，經濟學博士，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教授；曾任《經濟研究》編輯部主任、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副所長，國家級有突出貢獻的中青年專家，現任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基金會秘書長，國民經濟研究所所長。他在八十年代中期曾赴美訪學，近年來被世界銀行等多個國際組織聘爲經濟顧問。他的理論代表了九十年代後期中國的主流經濟學，其理論趨向比較複雜，他既是推進市場化和產權改革即私有化的新自由主義產權理論的代表，又有以西方經濟學中的「交易成本」來論證中國的制度性腐敗合理性的主將。

1992年以後，中國的經濟改革確實獲得了高速增長，房地產、證券等新興產業的發展尤爲引人矚目。但是，在巨大的泡沫

經濟的刺激下，腐敗也隨之愈演愈烈，貧富差異日益懸殊，加之近年來國有企業的大面積虧損，失業人口聚增，社會的不滿經常以極端的激烈形式發洩出來，集體請願已是普遍現象，群眾衝擊各級政府機構的事件也屢見不鮮。政府在窮於應對的窘境中，其合法性和意識形態說辭已經名存實亡。因爲造成這種社會不公和制度性腐敗的根源，恰恰是無所不在的壟斷權力。正是在此背景下，一批自稱信奉自由主義(主張推進市場化和私有化)的御用經濟學者，借用美國的產權經濟學和制度經濟學的「交易成本論」，來論證轉型時期中國的急劇擴張的分配不公的合理性，提出了「腐敗合理論」——權錢交易式的腐敗是社會轉型或現代化必須付出的代價，而且是目前中國的特定國情下成本最小的代價。樊綱和盛洪從美國的制度經濟學中所移植到中國的「交易成本理論」，成爲中國式的腐敗有益於現代化之論的洋包裝。

他們最喜歡引用的例證就是中國的繁榮和穩定與俄國的蕭條和動蕩的對比，俄國的一步到位的「休克療法」的失敗，在胡鞍鋼看來是經濟的全盤自由化的結果，在樊綱等人看來就是「公共選擇」式改革的失敗。所謂「公共選擇」式改革，具體地講就是指俄羅斯的改革所走的先難後易的突變道路，首先解決的是關係到「社會公正」和「應得權利」的政治制度問題，即從改革舊的一黨獨裁的政治制度入手，建立起足以保證個人權利和社會公正的新的遊戲規則——自由的憲政民主制。在經濟上進行一步到位的市場化和私有化——人人有份的「證券私有化」，在政治上讓每一個公民享有真正的自由權利。而中國所走的漸進式的改革之所以成功，是因爲中國搞的是先易後難的「交易選擇」式的改革，所要達到的首要目標不是社會公正——每個人在交易的權利

上和規則上的平等，而是靠政府逐步地向社會出租一部分完全壟斷的權力和資源，也就是通過政府與社會的權錢交易，達到效率優先的供給增加的目的。此種交易式改革當然也包括公開交易之下的大量幕後交易。

換言之，首先，無論用什麼方式，只要先把蛋糕做大就是成功，就是在促進市場化；至於蛋糕做大了的分配，也是怎麼分都行，只要錢落入私人腰包，就是對經濟私有化改革的貢獻。而這種雙方交易式改革的成本要小於公共選擇的成本，因爲有蛋糕總比沒蛋糕好，蛋糕做大了總比小蛋糕好，權貴們多吃多占的分配不公總比普遍貧困好，更重要的是，這種由權貴們操控的市場化和私有化可以保證社會秩序的穩定，而不公正的穩定秩序總要比公正的不穩定秩序要好。他們之中有的人甚至宣稱：在中國目前的轉型期，讓公共資產的管理人在可以逃避公共監督的條件下監守自盜，「掌勺者私分大鍋，是「交易成本最小」的私有化。這實質上就等於說，靠壟斷的強制性權力處置公共財產，有沒有社會公正都沒關係，改革都可以成功。或者說，只要能走向市場化和私有化，怎麼做都行。當然，在中國現行的體制下，誰有權力誰就有先分和分到大份蛋糕的權利。

以「交易成本論」爲腐敗有理做辯護的另一位言必稱科斯的經濟學家是盛洪。他認爲「賣」比「分」的成本低，並引證科斯的「交易先於產權」來爲權貴隨意處置公共資產、從中牟取私利辯護。他甚至說，權錢交易的「尋租」活動總會有滿足的時候，或者說作爲交易一方的權力總有用盡之時，一旦掌權者滿足了，用完了他作爲交易資本的權力，「尋租」式的腐敗便會自然終止。

恕我孤陋寡聞，從沒有聽到過這樣的經濟學，我只知道中國

的歷史和現實——幾千年的專制權力在掠奪經濟資源上從來既沒有滿足的時刻、也不可能有用盡的時刻，只要沒有從制度上根本改變政治權力的產生方式和行使方式，掌權者可以走馬燈式地更換，但是專制權力本身卻永遠不會改變，永遠貪得無厭，永遠不會過時。在權錢交易中，權力什麼也不用付出，它做的甚至都不是一本萬利的生意，而是無本萬利的生意。陳希同被賈慶林所取代，但是虧本的只是陳希同個人，而不是在北京市一言九鼎的市委書記的權力，賈慶林仍然可以運用這種權力不受限制地牟取私利。權力導致腐敗，沒有約束和監督的絕對權力導致絕對腐敗。這句自由主義理論的名言，在今天已經是人們耳熟能詳的常識了，爲什麼中國的自由主義經濟學家連起碼的自由主義常識都不要了呢？在民主制度下，各種制度化的對政治權力的限制都無法完全根除腐敗，就不用說中國這種沒有任何限制的絕對權力了。

中國式的「交易成本」論，在爲制度性腐敗進行辯護時的最大失誤，是完全拋開特定的制度背景(一黨獨裁制度和多黨競爭的自由制度之間的根本區別)，爲了維護鄧小平的「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單純從經濟效益的角度去計算成本和收益，進而從權貴們的立場出發爲之進行辯護，而忽略了腐敗所付出的綜合社會成本——社會的全面崩潰。這種成本的巨大，不僅是社會公正的喪失、人心的腐爛、潛在仇恨的持續積累，而且對於長遠的經濟發展來說，制度性腐敗也會使經濟發展的動力和資源日益枯竭，做大的蛋糕沒有產生應有的再生產效益，反而造成效益的大量浪費和鉅額流失。

即便僅僅從經濟的角度講，這樣的改革的成本也是極爲高昂

的：①真實價格和補貼價格之差所形成的利潤，要比提高效率、開發新市場和新產品等的利潤高得多。因而，與尋租活動的規模的不斷擴大成比例的，是企業對經濟發展能夠做出的貢獻的損失。②當尋租的巨大利潤把分散的資金吸引過去後，市場的公正規則便被扭曲乃至完全失靈。③即便對於尋租活動的受益群體來說，交易費用也將隨著行賄受賄以及權貴小集團的投機行爲的流行而普遍上升，從而導致社會的交易成本的整體上升。④以上情況使人們對制度創新抱著漠不關心的無所謂態度，從而破壞了對改革作爲制度創新的基礎的信任感和倚賴感。⑤不公正的市場和劫貧濟富式的分配，使在競爭中依靠自身能力的誠實致富者的經營成本過於高昂，以至於致富的方式只能是商業道德的徹底淪喪；不是信譽而是厚黑，成爲商人之間的通行的灰色法則。

正如新制度經濟學在分析改革中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時所說的那樣：由於黨的權力控制和監督制度與官僚管理機構代理人制度沒有根本的改變，雖然放鬆了對企業和市場的控制，但是，不但改變不了動力不足、資訊不准和效率低下的狀況，反而爲代理人的尋租行爲大開方便之門。「從現實看這些國家改革主要是被黨和官僚管理機構的中層代理者們破壞了。」要改變這種監督和市場的雙重失靈，必須讓黨的權力真正退出市場（參見《新制度經濟學》第十章；商務印書館1996年版）。而在「制度經濟學」的故鄉美國，自由制度經過二百多年的發展，已經完全成熟，他們提出的「交易成本論」，是在承認自由制度中產權完整的前提下，對制度進行微觀的調整和完善，以便通過制度創新進一步降低交易成本和提高效率。正如張五常所說：「我們的分析是基於一個自由市場中，在私有產權約束下謀求財富最大化的前提。」（《財產權

利和制度變遷》，頁118；上海三聯書店1994年版）

我認爲，新制度經濟學用於中國現實的分析，它能夠做出的最大貢獻，就是交易中的「制度成本」問題。雖然制度本身並不能產生直接的經濟效益，但是制度卻是任何經濟行爲是否能夠達到低成本、高效益以及交易規則是否公平的保障。一個合理的健全的制度會爲經濟活動提供公平競爭的規則和超然中立的裁判，提供最佳的資源配置、發展動力和足夠資訊，最大限度地降低交易成本，提高經濟效益，而反之則要付出高成本、低效率乃至無效率負效率的巨大代價，最後是由於准入權利和佔有資源的畸形不平等、獲取資訊的不對等，而導致資源、動力和合法性的全面枯竭。在20世紀的共產主義制度和自由主義制度的競爭中，前者的大失敗和後者的不斷自我完善、鞏固和向全球的擴張，恰好證明了專制制度所付出的成本最大而效益最小，不僅是經濟效率上的巨大成本，更是社會公正和人權保障的巨大成本，以至於最後弄到資不抵債，賠光了家底，只能破產關門。而自由制度則相反，以低廉的成本換取了制度效益的最大化，不僅是經濟的持續增長，更是社會公正和人權保障的水平的不斷提升，乃至於到了20世紀末，自由主義價值及其制度安排成爲人類的普適性價值，全人類對此的認同和追求越來越成爲不可阻擋的發展潮流。

再看俄羅斯的「公共選擇」式改革的交易成本。如果從鄧小平的發展理論的角度即單純的經濟成長的角度看，俄羅斯的確付出了過大的經濟代價，改革的成本大於中國。但是新制度經濟學的另一位代表人物諾思，在論及社會發展理論時指出：衡量一個社會的發展的尺度不應該只是單純的經濟利潤指標、而應該是綜合的社會效益指標；制度成本的大小的衡量標準不僅要看是否達

到利潤最大化，更要看社會效益是否達到最大化。從這一角度看，俄羅斯人雖然在短時期內少了點麵包(利潤)，但是他們得到了人之所以爲人的諸種自由和權利(效益)，其社會的綜合效益之巨大，完全可以彌補經濟效益的暫時損失。有了不可剝奪的擁有自己的麵包的權利，遠比擁有產權不明的麵包更可靠、更安全，從長遠的角度講，也會更有效益。我不相信現在的俄羅斯人會爲了得到更多麵包而出賣已經得到的自由權利，爲了「供給」增加或利潤最大化的經濟發展，而犧牲掉能夠提供社會效益最大化的根本制度保障——「應得權利」平等的自由制度。

市場經濟在配置資源、動力和資訊上的優勢，必須以明晰的產權、公平的自由競爭規則和超然的裁判爲前提，有了這一前提，才能得到效益的最大化，才能使權利的初始分配具有起點平等的起碼公證性，才能使結果分配中的收益歸於誠實的企業家和勞動者，而不是歸於靠權力支撐的尋租者，才能使自由競爭所導致的結果的分配差異，得到基於自由優先和權利平等的道義辯護，貧富差異才不至於引起毀滅性的暴力革命，而這一切又必須有政治制度的保障。由此反觀中國，普遍的尋租式腐敗，表面是市場制度本身失靈的結果，而實質上是政治制度維護「應得權利」的初始分配的嚴重不公和縱容腐敗的結果，或者說腐敗和分配不公是專制制度的本性。這種制度不僅效率極低，而且分配中的差異(起點、過程和結果)得不到任何道義上的合法性辯護。因爲在分配中，經濟效益中的大頭，皆被極少數權勢者通過黑箱作業的「尋租」等投機性經濟行爲給瓜分掉。在產權不明晰的中國，這就等於執政黨把全民資產變成「黨產」和黨棍們的個人私產。極而言之，目前中國大款們的財富，幾乎沒有一分錢是乾淨的。而

現在中國的主流經濟學家也從這種權貴私有化中得到了好處，這些人雖然算不上大款，起碼可以是中款。他們的既得利益與現存制度之間有著內在的契合。

更重要的是，這些權貴們並不把他們掠奪到的資產投入到產生社會效益的再生產之中，而是把資產用於個人及其家族的奢侈消費或轉移出境（北京大學經濟學院一位李教授督導的一份156頁報告指出，中國從1997年到1999年外匯流失988億美元）。他們在經濟活動不會動用已經占爲己有的一分錢，正所謂「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也。」在中國，越是大款，就越不用拿自己的錢去投資或作買賣，有權的直接利用權力致富，有錢的通過收買權力致富，國家壟斷的金融機構就是他們的不盡財源，打通關節，巧立名目，套取社會閒散資金，直到把企業掏空，把銀行貸空，把經濟搞跨。現在的上市公司與前幾年盛行一時的各種集資案，實質上沒有任何區別。前幾年，誰能打通關節誰就有權進行社會集資；股份制改造以來，誰能買通權力機構，誰就可以把空殼企業作成上市公司。

我承認，樊綱等人作爲信奉美國的新制度經濟學的中國學者，代表了中國經濟學的自由主義一翼。與胡鞍鋼的國家主義相反，他們主張的經濟改革目標是個人主義的，以推進自由經濟式的市場化和私有化，來實現由整體利益優先的體制向個人權利優先的體制的轉型。但是，面對中國式的市場化改革所造成的經濟混亂和制度性腐敗的現實，他們似乎有苦難言。當他看不到糾正制度性腐敗和建立公正的市場秩序的希望之時，就只能放棄對在權力主宰下的分配不公的道義追問，被迫承認「掌勺者私分大鍋飯」的現實合理性了。也就是，不僅承認財富分配在數量上和競

爭的結果上的不平等具有合法性，更關鍵的是承認追求財富的權利在質量上和競爭的起點上和過程中的不平等。毛澤東時代的政治權利上的準種姓的身分不平等制度，在鄧小平時代又普遍地擴張到經濟領域。於是，以自由主義的「應得權利」平等爲核心的市場化和私有化理論，就變成了「供給」式的增加經濟純量的效益最大化理論，進而變成了黑格爾式「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的犬儒經濟學，最後變成了爲極少數權貴們非法聚斂私人財富的辯護士。

在樊綱等人的經濟理論中，我看到的不只是新制度經濟學的包裝，更看到幾十年的共產主義教育所形成的思維方式——「只要目的正確就可以不擇手段」，「只要目的是高尚的善良的，卑鄙的邪惡的手段就具有現實的合法性。」在毛澤東時代，爲了高尚完美的共產主義目的，可以肆意行使階級鬥爭的暴力手段，可以用家庭出身、階級成分和政治身分把人劃分成三六九等，把一部分人變成不可接觸的政治賤民；在後毛澤東時代，爲了變公有化經濟爲私有化經濟的目的，可以把利用政治特權聚斂個人財富視爲合法的手段，把極少數權貴變成億萬富翁——改革的最大受益者，把絕大多數無權者變成低廉勞動力和失業者——改革的最少受益者。

2000年8月1日於北京家中

老人政治的悲劇性悖論

——鄧小平與政治改革

鄧小平改革的社會背景

大陸中國的啓動改革背景是一個全面奴役的社會，這一現代奴隸社會的極端表現是文化大革命，其根本原因是1949年中共執政後愈演愈烈的一黨專制乃至個人獨裁。

我之所以把它稱之爲現代奴隸制度，就在於這種現代奴隸制和傳統奴隸制的區別，只有統治的意識形態合法性、組織方式及控制手段的不同，而奴役的實質則完全相同，甚至在廣度上和深度上都有過之而無不及。傳統奴隸制，由於統治手段在技術上的落後，不可能在如此廣闊的地域內奴役如此眾多的人口，也不可能只有一個最高的奴隸主所欲爲地號令爲一切。傳統奴隸制，主人和奴隸之間的人身依附關係是赤裸裸的，主人就是主人，奴隸就是奴隸，戰爭中的掠奪所遵循的完全是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沒有什麼堂皇的倫理來裝璜奴役：沒有以「人民公僕」的僞善面

貌而實施奴役的奴隸主，也沒有以「國家的主人翁」的漂亮名譽而被奴役的奴隸。傳統奴隸制，還沒有政黨和國家單位這類高效率的組織系統，可以把所有的人的從生到死全部納入奴隸主的有效而全面的操控之中；傳統奴隸制，也沒有「解放全人類」的意識形態烏托邦，沒有「爲人民服務」、「大公無私」的道德說教，沒有「偉大、光榮、正確」的自我標榜；傳統奴隸制，更沒有既是「道統」教主又是「法統」帝王的絕對個人，沒有「他是人民的大救星」的救世主崇拜，沒有億萬人只有一個大腦的絕對的思想獨裁，沒有表示效忠的「靈魂深處爆發革命」的洗腦，也沒有現代科技所提供的高效的奴役手段。

執政黨控制的國家是現代奴隸制的載體，通過自上而下的垂直控制，形成了等級森嚴的金字塔結構，高居於頂端的黨魁就是總奴隸主，民眾包括執政黨的大小官僚（官僚既是總奴隸主的代理人又是高級奴隸）都是等級不同的奴隸，對領袖個人的絕對人身依附，通過執政黨控制的組織和國家控制的單位的雙重操控，借助於現代文明的科技成果，無所不包無處無時不在地剝奪著個人的一切——物質上和精神上、集體生活上和個人隱私上、出生和死亡、工作和婚戀，通過等級森嚴的組織系統，個人只能別無選擇地依附於國家、黨和領袖個人，只有無條件的效忠和奉獻的義務，而沒有任何反對和索取的權利。絕對獨裁的政治、陷於崩潰邊緣的經濟、物質供應的極度短缺、連沉默權都不允許的強制、普遍的人權災難、無所不在無時不有的階級鬥爭和連夢都不敢做錯的恐懼氣氛……總之，大陸中國進行改革的背景太黑暗太荒蕪太滅絕人性，以至於紅太陽刺瞎了所有人的眼睛，社會主義的草覆蓋了資本主義的苗，剛出生的嬰兒作爲歷史反革命的狗崽

子而被刨腹。

作爲最高奴隸主的毛澤東，由於他擁有至高無上的絕對權力，自然就作爲「人民的大救星」而承擔著維護社會秩序和提供民眾福利的主要責任，並且在這個奴隸體系中佔有了最大的利益份額。然而帝王個人利益的最大化與帝國的官僚集團以及廣大奴隸的利益之間的一致是偶然的，而不一致乃至衝突則是必然的。毛澤東的絕對權力是終身的，他能夠爲所欲爲地追求異想天開的個人嗜好乃至怪癖，使奴隸主的個人及家族利益的最大化與他的代理統治集團、民眾利益的最大化並不完全一致，從而就導致了他個人與代理統治集團和民眾之間的矛盾乃至仇恨。而在他個人與整個社會的反對力量的較量中，其結局總是「一夫當關，萬夫莫開」。他的隨心所欲讓整個社會付出了不必要的巨大代價，而他個人在有生之年卻可以不付任何代價和不負任何責任。毛澤東雖然沒有秦始皇那樣巨大的墳墓和陪葬的千軍萬馬，但是他身後的哀榮遠非任何帝王所能媲美。他所繼承的幾千年一以貫之「秦政」，使他有權力把胡作非爲的代價和風險轉嫁給整個社會與整個統治集團，也同時轉嫁給沒有與他一起進入墳墓的家族。江青沒有殉夫乃是她最大的不幸，她活下來替毛澤東承擔了文革的全部罪責。當毛澤東的遺體被保存在中國的政治中心最具象徵意義的天安門廣場、仍然受到人們的瞻仰和膜拜之時，他的夫人江青早已在秦城監獄中自殺身亡，而且死無葬身之地。

物極必反，毛澤東式的個人獨裁所造成的災難，在文革的後期達到了社會忍耐的極限，全社會的普遍不滿之強烈和忍無可忍，甚至在毛澤東還活著的時候，就通過「四五天安門運動」得到了象徵性的宣泄，「秦皇的封建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的口

號，已經把批判的鋒芒指向了最高奴隸主毛澤東本人。這大概是中共執政27年以來，民眾第一次自發地公開把矛頭指向毛本人的群體抗議，而且是在中共政權的首都，在首都的心臟天安門廣場。1949年之後，這裡曾經只是毛澤東現實他個人執掌絕對權力的地方，是舉行中共執政的周年慶典、重大節日和百萬人集會的地方，是毛澤東在文革中八次接見造反青年的革命聖地。「四五天安門運動」預示了大陸中國的全面奴役化已經到了非改不可的臨界點。即便毛澤東沒有在1976年遭到天譴——自然死亡，也不一定能夠繼續維持住億萬人只有一個頭腦的奴隸制秩序了。事實上，早在1971年林彪事件後，懷疑毛甚至反對毛的社會情緒就已經開始了暗中的醞釀，「四五運動」不過是這一醞釀的公開爆發而已。正是鄧小平被無端地指責爲這一自發的民間抗議運動的幕後黑手，這一運動才爲他的再次執政提供了豐厚的民意基礎。

雖然，首先是全社會的普遍不滿爲社會轉型提供了豐厚的民意支援，中共的政治精英階層才有可能通過上層政變和推動思想解放來發動改革，但是，毫無疑問，從改革之初到目前爲止，推動和主宰著大陸的社會轉型的主要動力，是執政的精英集團。單就精英階層來說，首先是權力精英——中共集團內的被毛澤東打倒的受迫害者——成爲發動改革的主要動力。他們利用老權威毛澤東自然死亡之機和四五運動的民意，清除了毛澤東欽定的接班人以及毛主義的繼承者「凡是派」，通過對文革的清算和平反運動重返政治舞臺，通過思想解放運動獲得意識形態的合法性和公眾的輿論支援，通過肯定農村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發動了經濟改革。

鄧小平改革所帶來的社會變化

與毛澤東時代相比，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打破了一個人的頭腦代替所有人思考的極端個人專制局面，結束了全面的階級鬥爭的內戰，廢除了可以任意剝奪國民的人身自由乃至生命本身的極端人治秩序，使1949年之後的中共體制及其意識形態發生了全面的動搖。

1. 在經濟領域，由全盤計劃向市場、由完全公有制(黨有制)向私有制的漸進轉型已經不可逆轉，經濟增長的高速度、物質供應的豐富、民眾生活的大幅度改善，買方市場的形成，使非國有經濟事實上的主體地位迫使執政黨不能不進行立法上的事後確認，由對私營經濟的合法地位的政策性允許向法律性保障的轉變，已經是指日可待的了。儘管執政黨對經濟還有很大的操控能力，儘管權力的市場化使大陸的經濟自由化變得畸形，儘管對私營經濟還有立法上和事實上的諸多歧視，但是90%的市場定價、非國有經濟對經濟成長和政府財政的壓倒性貢獻，全社會要求行政權力撤出市場和反腐敗的壓力、私營經濟在整個國民經濟中事實上的主體地位以及加入WTO的國際壓力，必然使大陸的經濟制度走上自由化、法治化、私有化的不歸之路。現在要解決的關鍵問題只是：怎樣把權貴私有化的近於「強盜式的資本主義」和平轉變爲公平競爭的「合法的資本主義」。

2. 在思想文化方面，思想解放運動衝破了毛澤東時代萬馬齊喑的局面，執政黨意識形態的衰落和主旋律的無人傾聽，個人意識和自利觀念的覺醒，西方自由主義價值觀的迅速傳播、傳統文

化的復興、港臺通俗文化的全面滲透和文化消費的大眾化娛樂化，已經開啓了文化多元化的大門。在公開的場合，非政治領域的言論開放已經到了可以在媒體上胡說八道的程度，私有化已經成爲經常性的熱門話題；政治性言論的公開表達儘管還有嚴格的限制，但是也不是全無發表的空間，只要在行文上隱晦一點，不直接針對現任當權者，對現行體制的批評和對政治改革的呼喚及爭論，即便在國內的媒體上也可以公開發表；鮮明的政治異見可以通過國際媒體和互聯網反饋回大陸。六四後收聽外國電臺人數的激增和互聯網的日益普及，使執政黨的新聞封鎖越來越失去傳統的效力；在私下的場合，民眾議論政治已經沒有多少風險，甚至拿執政者尋開心和發泄對政權的怨恨，已經成爲老百姓飯桌上常規的娛樂專案。

3. 在國家與社會之間的關係方面，毛澤東時代的整體國家的全面操控已經解體，每一人都被牢牢地束縛於黨組織、單位和人民公社的局面一去不返。人們在擇業、遷移、旅行和私生活方面已經有了很大的自主選擇權，非政治領域的個人自由已經有了巨大的空間。儘管執政黨還不放棄對民間組織的生死予奪的大權，但是非政治性的民間社團畢竟有了一定的活動空間，像民辦的「天則經濟研究所」的學術研究和學術討論，在小範圍的知識圈內已經有了一定的自主性和比較高的自由度。而另一方面，執政黨還嚴格地操控著一切合法的准合法的不合法的民間組織，使大陸的民間社會處在一盤散沙的原子化無序狀態，民間社會的整合力量的真空，使個人自由無法進入良性的自治秩序，民間的利益訴求和不滿情緒得不到制度化程式化組織化的合法表達；民間與政府之間的衝突的解決沒有合法的談判機制和資訊交換的渠

道，沒有自治組織作爲衝突的緩衝地帶，社會穩定的維持只能依賴於執政黨的強制力的剛性整合；民間的利益訴求只能通過自發的分散的暫時的群體行動來引起政府的重視，非暴力的合法的群體事件很容易轉化爲暴力性的非法的對抗，最後的結果只能是，一方面民眾的暫時被鎮壓或被安撫，另一方面政權合法性的進一步流失。這種狀態對於未來大陸中國的社會轉型來說是一把弊大於利的雙刃劍，甚至就是新制度的建立過程中的達摩斯克之劍。

4. 在法治建設方面，從公審「四人幫」開始，就結束了毛時代完全無法可依、「朕即是法」的人治時代。雖然一黨體制保證了執政黨對立法執法的操控，中共的各級政法委仍然是法律實施的最後仲裁者，高層決策者的個人意志仍然可以左右法律實施，社會的遊戲規則仍然主要是灰色的，處在架空法律的權錢交易和人情交易的支配之下；儘管立法的主要道義基礎還沒有實質性改變，仍然是從維護中共政權和黨的絕對領導的立場出發，執法的任意性和有法不依的現象還很普遍……但是，社會管理的法治化已經成爲大勢所趨，就是惡法和不能真正執行的法律也要靠立法來裝點門面。這種狀態在經濟體制的立法上表現的尤爲明顯。黨的意志和政府對經濟的管理越來越向著依靠各種立法來完成方向發展，法院和律師在解決經濟糾紛上的作用越來越大，對私營經濟和私人財產的法規歧視逐漸向一視同仁的平等方向改善，私有財產權的立法保障已經到了非入憲不可的程度，加入WTO將使市場經濟的法治化進程加快。在國民的基本權利的保障方面，不經過任何法律手續就可以任意剝奪人身自由和生命的局面已經有所改變，雖然仍然是有《憲法》而無憲政的人治，個人的政治、言論、思想、信仰、結社、遊行示威等權利還得不到實質保障，

執政黨和政府的權力還得不到有效的制約和限制，但是國民畢竟有了民告官的《行政訴訟法》、有了《消費者權益保護法》，中共政權畢竟在形式上廢除了傳統的收審制度，修改了《刑法》和《刑事訴訟法》，承認了國際通行的「無罪推定」的司法原則，並且正在進行推廣「沉默權」和律師代理權的司法改革。對政治反對派和持不同政見者的鎮壓雖然沒有實質性改變，但是政府在鎮壓時一定要象徵性地走走司法程式，而且殘酷性有所降低。1998年中共還承諾簽署聯合國的保障人權的國際性兩公約。就司法機構本身的改革而言，毛時代的公安一家獨大的局面得到了根本的改變，公檢法之間的相互制約的局面開始形成，司法公開和司法人員的考任制度也在建立完善之中，並且先後制定了約束司法人員濫用權力的《警察法》、《檢察官法》、《法官法》。換言之，鄧小平時代並沒有改變執政黨高居於一切法律之上的人治體制，但是與毛時代相比，在法制建設上的進步僅次於經濟領域。

5. 政治方面：平心而論，鄧小平時代的改革就政治體制本身而言是最保守的，四項基本原則成爲政治改革的緊箍咒，已經形成的大小權貴家族作爲改革的最大受益集團，爲了自身的利益很難主動放棄可以使他們一夜暴富的壟斷特權。但是，經濟、思想文化、社會結構、法治化等方面的變化，都是由執政黨的政治決策推動的，反過來這些變化也從不同的角度和以各自的方式推動著政治的變化。或者說，在一個高度政治化的社會中，社會的每一領域的改革都帶有強烈的政治解放意味，推動社會的非政治化就是重大的政治變化。與毛時代相比，鄧小平時代最大的變化就是社會的非政治化。而當社會走上非政治化之路時，政治體制本身的改革也就成爲必然。在執政黨進行的體制改革方面，從十一

屆三中全會到十三大，政治改革被推進到體制所能容忍的極限，十三大提出的七項政治改革措施因趙紫陽的下臺而中斷實施，體制內的政治改革只停留在終身制的廢除、政府機構的精簡、國家中下層公務員選任制度的改革、農村的村民自治等方面，而在十三大提出的「黨政分離、政企分離」和「建立民主與法制的社會秩序」方面卻沒有任何進展。在鄧小平時代，政治領域的最大變化是在民間，從「西單民主牆」、「大學競選」到「清汙」、「反自由化」的中途流產，從「八六學潮」到「八九運動」，從六四難屬群體的持續抗爭到持不同政見者持續的政見表達，從民主黨到法輪功……民間的政治反對運動貫穿於改革開放的全過程。在這幾種民間反對派中，有些人是自覺選擇民間反對派立場的，有些人是被逼上梁山的，「反自由化」運動和八九運動都把一批體制內的開明派或反對派逼向了體制外，鎮壓準宗教民間組織把法輪功等非政治性的運動變成了政治性的反對運動。雖然這些民間運動之間還缺少自覺的共識和組織上的整合，缺少兼具道義感召力、政治魄力、政治智慧和組織操作技巧的核心精英，但是共同的命運和反抗目標的一致，使他們實際上形成了一種民間政治反對運動的合力。儘管鄧小平時代對這些民間政治反對派仍然實行強硬高壓，使他們的社會影響力受到極大的限制，但是相對毛時代對政治異己趕盡殺絕的局面而言，他們能夠持續存在且能夠進行堅韌的抗爭，不能不說是改革開放爲大陸中國的政治環境帶來的一大進步。

6. 國際關係方面：鄧小平以實用主義的國家利益至上的民族主義立場代替了以解放全人類爲宗旨的國際主義烏托邦，以「決不當頭」的韜晦之策代替了以爭當第三世界的領袖來對抗超級大

國的戰略，以爭取一個和平的國際環境代替了隨時準備應對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基本估計，以廣交朋友的對話代替了四處樹敵的對抗，使大陸中國的外交政策圍繞著國內的經濟建設這一中心展開，對話是鄧小平實施其外交政策的主要手段。鄧小平以民族主義作爲新的意識形態合法性的重要來源，巧妙地把與西方自由制度的對抗轉變民族主義的「振興中華」；他繼承了晚清以來「以夷制夷」和「中學爲體，西學爲用」的對外傳統，在不改變中共的絕對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的前提下，一方面最大限度地爭取國際的大市場、大資本和先進科技對國內經濟建設的支援，另一方面堅決防止西方的自由主義價值觀及其制度安排對中國的「和平演變」，他對西方制度的最大容忍是「擱置姓社姓資」的爭論，把接受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和發達技術作爲最後底線。但是，打開的國門卻爲民間的經濟自由化、政治民主化和文化多元化取向提供了豐富的外來資源，爲民間的全方位對外開放提供了有機可乘的廣闊空間。大量西方的著作、影視、音樂、體育難以阻擋地湧入大陸中國，大量中國人走出國門，西方的一切成爲全社會特別是城市中的年輕人爭相汲取的精神食糧。特別是西方的自由主義價值觀及制度安排，在知識屆和經濟界中的廣泛影響，使中青年精英成爲自由制度的信徒。蘇東的社會主義制度的全面崩潰，臺灣的政治民主化的驕人成就，以及世界其他地區的獨裁者的紛紛倒臺，爲大陸的社會轉型的未來走向提供了正反兩方面的示範。更重要的是，大陸經濟一旦進入國際市場，就要受到來自自由貿易規則的制約，經濟上對國際市場越來越深的依賴，必然帶來普世性的人類正義價值觀和強大的西方國家對大陸政治的示範效應和譴責性制約。可以說，大陸中國的觀念變革之所以呈現

爲疾風暴雨的勢態，民間政治反對派運動之所以與改革開放的進程同步，很重要的動力和保護來自國際社會的支援和同情。可以說，在內部缺乏政治改革的動力的停止狀態中，開放的中國大陸必須面對的國際大勢的道義上和實力對比上的壓力，是大陸進行政治改革的最有力的外在動力。七十年的蘇聯體制已經在國際性的自由制度和奴役制度的競爭中徹底崩潰了，已經延續五十年的中共的一黨獨裁體制，決無再延續二十年的可能！

鄧小平的根本局限

然而，以上所有的進步都不能掩蓋鄧小平本身的根本局限性，他所發動的改革與蘇聯戈巴契夫的改革完全不同，後者的目標從提出「新思維」、「透明性」、「公開性」開始已經非常明確，那就是從根本上葬送現代奴隸制——一黨獨裁、個人獨裁和計劃經濟的舊體制，建立私有化、市場化和憲政民主化的新體制。正如戈巴契夫的自白：「我生活的目的就是消滅對人民實行無法忍受的獨裁統治的共產主義。」從前蘇聯徹底變天到現在，中共高層在討論政治改革時，仍然視戈巴契夫爲共產主義的叛徒，把蘇聯的瓦解作爲最主要的教訓來警示全黨。現在的中俄之間的所謂戰略夥伴關係，只是相互利用的權宜之計，決無再有過去那種制度上的相互支援的可能。

然而，鄧小平只是爲了挽救失去民意支援的中共政權才進行改革——經濟上的放權讓利、政治上的平反和意識形態上的思想解放。隨著改革的發展，執政精英集團內部在改革的方向性問題上，出現了持有不同立場的兩種聲音，一種聲音堅持在維護舊體

制的根本——四項基本原則——的前提下，只進行有限的經濟改革，它的中遠期目標僅僅是物質上的「小康生活」；另一種聲音則要在推進經濟改革的同時，進行舊體制的根本改造，直到徹底廢除四項基本原則，建立類似社會民主主義的市場經濟和憲政民主制度。這種目標上的根本相左所導致的一系列政策分歧，使改革早期形成的「鄧、胡、趙」核心出現裂痕乃至最終消失。胡耀邦被解除中共總書記的職務，表面上的原因是在「清汙」、「反自由化」運動的決策上他與鄧小平有分歧，而實際上是由於胡耀邦力勸鄧小平退休，使鄧感到了一種對自己權力的威脅。正如習仲勳最近的回憶所言，鄧小平對於胡耀邦勸他退位的反映是：「他們不想讓我再過問中央的事了。」這次鄧倒胡完全是毛澤東當年對付政敵的方法之繼續，通過非組織程式的生活會方式就解除了總書記的權力，連黨內的正式規則在權力交替中都不起作用，這說明中共實質上仍然是人治政權。儘管相對於毛澤東時代的黨內爭鬥來說，在胡的處理上要溫和一些，還保留了胡在政治局中的位置，而實際上胡已經被剝奪了主要權力。

接著便是八九運動所導致的公開分裂，趙紫陽被扣上「支援動亂，分裂黨」的罪名，也沒有經過合法的正當的黨內組織程式，就剝奪了又一位總書記的權力。這讓人不能不想起毛澤東廢除他的兩任接班人劉少奇和林彪的人治時代。同樣是一損俱損的古老政治傳統的當代翻版，趙紫陽的黨內外支持者也隨著他的下臺而基本全軍覆沒，還保留著黨籍的趙紫陽被嚴格監控，處在準軟禁的失去自由的狀態中。至此，黨內的極少數敢於堅持根本改革舊體制的權力精英及其幕僚被迫出局，政治改革全面擱置，而在維持舊的政治體制的前提下進行單純的增量經濟改革的多數派全

面掌權。

儘管改革的最早制度創新——農村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來自最基層的民間，但是這一制度創新如果得不到執政黨的支援，就無法成功和長期生存下來；儘管在改革的決策上，民意也有過巨大的影響，儘管執政黨內部一直存在著開明派和保守派之爭，而且開明派曾經短時期地左右過高層的決策，儘管江澤民時代的執政精英集團內部也在改革的策略上有分歧，如在國有經濟的改革、加入WTO和鎮壓法輪功等重大問題上，但是，直到目前，主宰社會轉型的進程和方向的，仍然是固守單純經濟改革的執政精英集團，鄧小平的「兩手抓，兩手都要硬」的遺訓，仍然是主宰著中國式改革的既定方針。鄧小平在復出之時，能夠依靠強大的民意和黨內的支援，迅速清除把毛澤東的遺訓作爲既定方針的「凡是派」；靠著元老集團的欽定上臺的江核心則無力改變鄧所確定的既定方針。而這，正是中共第三代平庸化的最醒目標誌，朱鎔基的所謂魄力在平庸化的第三代整體之中，也不過是色厲內荏而已，他一個人的力量還不足以使第三代變成有所作爲的執政精英，何況他本人在關鍵性的觀念上的陳舊呢！。

由於大陸中國在鄧小平死亡之前，一直處在強人政治的主導下，所以其靈魂人物鄧小平的立場對分析改革的方向性問題，就具有著決定性的意義。鄧小平一直在堅定地維護中共的絕對領導權的底線上左右搖擺。與陳雲、李鵬等人相比，鄧是開明派，主張擱置姓資姓社的爭論，大膽放開房地產和建立股市，逐漸用市場代替計劃；而與胡、趙等人相比，鄧又是保守派，他對毛澤東時代的清算極不徹底，甚至僅僅觸及皮毛，功過三七開的評價說明了他並沒有完全擺脫毛的陰影，因爲他的權力還要依靠黨內毛

派的支援，更重要的是徹底清算毛就等於全面否定中共，而這一點對他來說是絕對辦不到而且也絕對不想做的。他堅持黨對一切重大決策的絕對領導以及個人獨裁，不放棄人治的決策機制和黨化軍隊；爲了保持住他在執政高層的核心地位，他玩弄著忽左忽右的權力平衡。但是，由於鄧本身難以克服的局限以及制度本身的慣性，他對保守派就更溫和，而對開明派則心狠手辣。這也是中共自毛澤東完全掌握大權的延安時代起的一貫傳統：「左」總比「右」安全，不會犯政治方向性錯誤，因而也就更底氣充足。

鄧雖然表面上故作開明，以拒絕出任最高職位來表示他對權力終身制的反感和改造，但是誰都清楚他也像毛一樣，實際地維持著自己在最高決策權上的終身制，廢除終身制是他留給繼任者的政治遺產，而對他本人則另當別論。也許，不在其位卻又具有一言九鼎的權威，才是他自以爲玩的高明和瀟灑之處。現在謀求連任的江澤民，也以鄧小平的先例，爲自己未來的半退進行合法性辯護。鄧小平對自己的權力的貪戀以及內心充滿的不安全感，一點也不次於毛澤東的晚年。這種權力恐懼使他也重蹈毛澤東的覆轍，連續廢掉了自己選定的兩任接班人，對徒手請願的學生和市民大開殺戒。滿腹狐疑的變態心理是所有獨裁者的通病，是專制制度的愛滋，越到晚年就越嚴重。在此制度中，沒有一個執掌最高權力的人能夠具有免疫力，它從心理上甚至從生理上徹底破壞了人對絕對權力的免疫系統。

一黨獨裁所驕縱的權力狂妄

雖然與中共的其他領袖相比，鄧具有過人的政治謀略、大膽

的政治氣魄和審時度勢的務實作風，在毛澤東死後迅速地掌握了最高權力，迅速地清除了毛的勢力範圍，迅速地結束了主宰著全社會的階級鬥爭哲學，迅速地把國家引上了以經濟建設爲中心的發展方向；他大量裁軍，把物質資源儘量用於經濟建設；他在早期就權力過於集中、缺少對權力的有效監督和黨政機構過於龐大的制度弊端，提出過進行與經濟改革相配套的政治改革的初步構想；在對外關係上，他放棄了爭當第三世界領袖的野心，提出務實的和平外交方針，用交往代替對抗，與西方國家全面修好，並且在處理香港問題上顯示了制度創新的能力，也於1992年促成了大陸與臺灣之間的第一次公開對話。

然而，他的智慧、魄力、創造力和務實作風，皆被一種中世紀式的無知狂妄所束縛。老資格革命家的坎坷經歷和毛澤東式的人格無知，使他具有大多數中共黨魁那種根深蒂固的狂妄人格，以爲自己的決策永遠正確。他真誠地相信：只有中共能夠拯救中國和建設中國，只有他能夠領導中共且掌握改革的正確方向、制定出符合國情的改革策略、設計出未來的藍圖；只有他恩賜給人民的生活才是最符合人民利益的、也是人民最想要的生活。任何改革決策只能出自他的口中，即便是採納了別人的改革建議，其發明權也要歸他所有。而任何有違於他意志的政見皆被視爲僭越，皆要在政治上乃至人身上付出慘重的代價。在鄧小平還能夠理政的時期，所有重大的改革決策的「知識產權」都歸於他的名下，其霸道和蠻橫一點也不次於毛澤東——出口就是「五十年不變」，閉口就是「一百年不動搖」。在他死後，所有的極端讚譽都隨著他撒向大海的骨灰而響徹天地，他是劃時代的「總設計師」、他作爲繼「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之後的「鄧小平理論」的創

造者，進入共產聖人的殿堂，「鄧小平理論」成爲指引大陸中國未來發展方向的「偉大旗幟」。他自己說要廢除終身制就是制度創新的改革，而胡耀邦勸他以退休來兌現承諾，就是有政治野心，《深圳青年報》也因爲發表贊成鄧小平退休的文章而被整肅。在極權體制下，獨裁者的喜怒哀樂決定著一切，說不定哪句話就讓獨裁者聽著不順耳，隨之發生的輕則是說話者個人的災難，重則是株連一大片乃至造成一場社會性災難。

極權制度的本質恰恰是嬌縱這種頑童般的無知和狂妄的最佳保姆，極權者不願放棄這種制度，既是因爲既得利益更是因爲放棄這制度就等於放棄了狂妄的資本。與這種制度化的無知狂妄所造成的災難相比，意識形態的陳舊和僵化的危害真的不算什麼。回憶一下史達林時代的蘇聯、毛澤東時代的中國、金日成時代的北朝鮮、紅色高棉的波爾布特……共產制度造就的無知和狂妄讓人類所付出的代價，僅僅是生命一項就高達一億多人。如果再加上希特勒時代的德國，極權制度的狂妄所造成的世界性災難，成爲剛剛過去的一個世紀最慘烈也最恥辱的人類大劫難。

所以，當70年代末發自民間的「西單民主牆」運動，魏京生提出「第五個現代化——民主」、「言論自由」和人權保障的政治改革要求時，鄧小平就毫不猶豫地對民間的持不同政見者進行專政，堅定地重申「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因爲只有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才能保證中共政權的絕對權力，進而保證他那爲所欲爲的無知和狂妄不受挑戰。

所以，當他爲了鞏固其權力、推行其決策時，他就重用胡耀邦、趙紫陽、萬里等黨內的開明派人物；而一旦他們的行爲有違於他的意志、進而使他產生權力危機的恐懼感和虛榮心受挫的恥

辱感之時，他就會聯合其他的黨內保守派將這些爲他衝鋒陷陣的人逐出權力核心，直至收回由他賜予的一切權力，並把這些冒犯了他的人置於失去人身自由的監禁境地。

所以，當決策的實施成功時，主要的功績歸於他；而當決策失誤時，他就把責任推到別人身上。這也是沒有政治責任追究制的極權制度的慣例：最高權力者在生前永遠不會有錯，永遠要找別人來替獨裁者頂雷，成功時他就是唯一對政績負責的決策者，而失誤一定是別人的，責任也要由別人承擔。比如八十年代的硬闖物價關，造成了物價飛漲和民眾搶購的社會緊張，也爲八九運動的發生埋下了導火線。執行者趙紫陽因此受到黨內保守派的攻擊和社會輿論的指責，而決策者鄧小平卻毫毛無損，依然是改革的總設計師。

所以，當他爲了擊敗政治對手和確立自己權力的意識形態合法性時，他就發動「思想解放運動」，讓知識分子爲他的「貓論」進行理論的論證，並昇華到「實事求是」和「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才是真正的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理論高度；而當他意識到知識分子在思想解放的口號下越來越背離他的意志和觀念、進而對他的權威構成挑戰時，他就發動「清汙」和「反自由化」運動，用黨紀處分、行政懲罰乃至監獄等手段，封住那些曾經爲他的意識形態合法性作出過不可替代的理論貢獻的知識分子的嘴巴，進而用專政的利刃割掉社會良知的舌頭。

所以，當他需要民意的支援重返權力寶座時，他就爲「四五運動」平反，並把這一運動稱爲「反四人幫反文革反暴政」的偉大的正義之舉；而當他害怕民心所向的改革要求顛覆其權力寶座時，他就下令開槍，殘酷地鎮壓「八九運動」，屠殺手無寸鐵的

和平請願的學生與平民，流放、處死和監禁所謂的「暴徒、黑手和反革命組織的頭目」，並將這一運動定性爲「反革命的動亂和暴亂」。甚至滅絕人性到不給死者以任何物質上和精神上的賠償，不准六四死難者親屬公開悼念無辜受死的親人。在鄧小平的權威籠罩下，偌大的中國居然沒有一塊死者的墓地，居然不准一滴悼念的淚水公開灑落、一束獻祭的鮮花合法地在亡靈前開放。最近出版的《六四文件》，有爲鄧開脫一部分罪名之嫌，把鄧小平描述成被李鵬欺騙的老人，而實際上這種說法根本無法令人信服。因爲，他當時所倚重的前臺人物是趙紫陽，他爲什麼只聽李鵬的彙報而不聽趙紫陽的說明？爲什麼只相信李鵬而不相信趙紫陽？還是李鵬對八九運動的否定性抹黑，很對他的一貫胃口。更重要的是，李鵬對他的表面恭順讓他感到安全，不會對他的權威和狂妄構成任何挑戰，而趙紫陽對「4．26社論」的置疑和不同於這個社論的「亞銀講話」，無疑是對他的嚴重冒犯。

所以，1989年春天，趙紫陽在與來訪的戈巴契夫會見時說：一切重大決策都要由小平同志最後拍板。不過是對確鑿事實的公開客觀陳述而已。正是這種事實陳述向全世界揭開了鄧小平玩弄的廢除終身制的假面，戳穿了一直隱藏在黑箱裡的政治權謀，損害了他在國際上的開明形象和一手遮天的權力虛榮，才使他最後下決心徹底廢掉由他提攜的接班人趙紫陽。

所以，他才會以豬的智力理解人性，用餵養豬的手法對待人的欲望。他只許諾給民眾以小康的溫飽，卻認爲中國人愚昧得還沒有資格享受自由和民主；他只預言按照他的既定方針發展下去，2050年的中國在經濟上能夠達到中等發達國家的水平，卻無視在不可阻擋的世界性自由化民主化潮流面前中國的另一種未

來，人性的另一種不同於豬的生存方式。難道中國人永遠只配像豬一樣靠統治者餵養的方式生存，只配被關在極爲狹小的豬圈式的空間內，過那種吃飽了睡、睡醒了吃的動物生活，而不配爭取到以自由來安身立命的人的生存嗎？

換言之，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發展的高速和物質生活的改善，使人們在對比鄧的低調實用主義與毛的高調理想主義之時，顯然是褒前者而貶後者。但是，鄧的實用主義的政治智慧所具有鮮明的豬哲學特徵，從長遠的未來發展的角度看，他所描繪的中等發達的「小康生活」，並不符合現代社會關於「發展和進步」的整體觀念，也不符合具有理性和尊嚴的人性的多樣化欲求。這種豬哲學對中國人靈魂以及社會倫理基礎的毀滅性破壞，其程度並不比毛的烏托邦的破壞性小多少。特別是對於堅持一黨獨裁的體制來說，與其說鄧理論是對毛思想的修正或顛覆，毋寧說鄧所倡導的豬哲學正是對毛的鬥爭哲學失效後的最好填補，正如中國古代的皇權一直依靠儒道互補一樣。毛澤東思想和鄧小平理論對於創造一個健康的制度和培育健全的任性來說，都是只能加深疾病的毒藥，而且是致靈魂於癱瘓的劇毒。

1984年中共執政35年大慶時，鄧小平檢閱三軍和接受億萬民眾歡呼時的感覺，從他個人成就的角度講，是他漫長而坎坷的政治生涯的顛峰體驗——既是他在向全中國和全世界顯示他在黨內具有絕對權威的時刻，也是他洗雪了曾被毛澤東玩弄於股掌之恥辱的時刻；既是他真誠相信自己就是救世主的時刻，也是他底氣十足地自以爲絕對正確的時刻。也是在這一年，鄧小平和英國首相柴契爾夫人達成了用「一國兩制」的方式收回香港的協定；還是這一年的年底，鄧小平被美國《時代周刊》選爲年度封面人

物，中共的領袖終於得到了最強大的資本主義國家的輿論認可，又從另一個角度強化了獨裁者的狂妄。

只有極權制度嬌縱的無知和狂妄，才會使獨裁者真誠相信自己的絕對正確一貫正確，才會以個人的權力意志爲唯一標準，不擇手段不計後果地翻雲覆雨。這是一種愚昧的人格，也是一種野蠻的思維方式，狂妄人格在思維上的表現就是全知型的決定論和唯一論，在行動中的表現就是獨斷專行和爲所欲爲。如果說人在上帝面前的最大原罪是目無神聖的狂妄的話，那麼人在世俗之中的最大人性缺陷就是自以爲救世主的狂妄。如果說神性思維的最大惡習是通過對信仰的壟斷來維護政教合一的現實秩序，那麼人性思維的癌症就是用無所不知的全能意志尋找並且自以爲找到了人間天堂。

決不能小看這種獨裁者的無知和狂妄，歷史上的一切極權制度的強人和偉人，都有這種目空一切的救世主式狂妄，自以爲能夠拯救國家和人民於水深火熱之中，在人間建立天堂，其結果卻無一不是把人民與國家置於水深火熱的人間地獄。這種人格和思維，頭上沒有上帝，眼中沒有民眾，四周沒有法律，心中沒有對高貴生命的敬畏和謙卑。它不僅存在於共產主義理論的創始人馬克思、恩格斯的人格中，存在於史達林、希特勒、毛澤東、卡斯楚、金日成等第一代極權者的人格中，而且存在於N代極權者的人格中。回憶一下李鵬在八九運動時期與學生代表對話時的傲慢，江澤民教訓香港記者時的目無一切，朱鎔基在講話時動不動就「我給你……」的句式，無不浸透了這個制度所嬌縱的權力者的狂妄。就連一個縣級法院院長也具有這種無知的權力狂妄，出口就是「你以爲我是誰？我上管天下管地中間還要管空氣」。只

要獨裁制度存在一天，執政者的無知和狂妄就將作惡一天。因爲自由的死地是「強制」和「獨斷」，而這二者皆來自自以爲全知全能的無知和狂妄。

狂妄必遭天責，縱容狂妄的民族也必須承擔這種天責的災難性後果。而非常不幸，中國正是這樣一個屢遭天譴的民族。

結束語：密不透風的監獄和四處漏風的監獄

如果說，毛澤東時代的大陸中國是一間密不透風的監獄，那麼鄧小平時代，雖然一黨獨裁的監獄性質沒有實質性改變，但是這座監獄，不但有了執政黨劃定的放風空間，而且出現社會整體性的灰色區域，這是一種防不勝防的四處漏風的超控制空間，執政黨意識形態的瓦解和各級官僚的自我利益的激勵效應，遠遠大於執政黨操控體制的真正效力。執政黨的任何決策在向下貫徹的過程中，呈現出層層效力遞減的局面，越到基層越失效。這種統治效力的遞減現象幾乎遍布所有領域，即便是意識形態操控也不例外。比如，中共宣傳部和國家新聞出版署禁止發行的許多書籍，都可以在遍及全國各地的個體書攤甚至國營書店中買到；被列入不准在大陸媒體公開發表作品的黑名單的知識分子，仍然公開地在報刊上開專欄、發表談話。

大眾不相信中共政權，瓦解了執政黨的民意合法性基礎；中共的各級官員也不相信自己的執政黨，權貴家族和代理人的普遍腐敗從體制內腐蝕了政權本身的統治能力；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這是一種中共裝模做樣進行統治，而各級官員裝模做樣執行和老百姓裝模做樣服從的狀態。鄧小平開啓了權力與資本共謀的

時代，它的政治後果只能是：不論中共當局想不想主動進行政治改革，中共體制已經處在不可遏制地潰敗之中，而且潰敗的速度越來越快，隨時都有可能因偶發事件而出現多米諾式的崩潰。換言之，現在的中共政權所面臨的，已經不是「紅旗到底能打多久」的問題了，而是先變灰後變白的旗幟能打多久的問題。

2001年1月11日於北京家中

中共第二代的終結

——胡耀邦、趙紫陽的政治悲劇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是中共以胡耀邦和趙紫陽爲代表的第二代領導人執政的年代，鄧小平自稱第二代，是企圖以此抹煞真正第二代的歷史地位，鄧屬毛周一代，即第一代。胡耀邦和趙紫陽在大陸中國政壇上的崛起，沒有鄧小平的全力幕後支援是不可想像的；而鄧小平在國內外如日中天的聲譽的取得，沒有胡耀邦和趙紫陽的鼎力相助也是不可思議的。但是，從另一個角度講，胡、趙後來的悲劇根源早已隱藏在鄧小平的全力提攜之中。胡的主要貢獻在撥亂反正時期的政治方面，趙的主要貢獻是在改革開放時期的舊體制的變革方面。他們二人都具有中共高官最缺乏的人道主義同情心和寬容胸懷。

胡耀邦對政治改革的貢獻

胡耀邦隨鄧小平的再次上臺而復出後，在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和總書記的任上，表現了中共高官所少有的人道精神、寬容胸

懷、廉潔作風和政治上的遠見。他對改革開放的貢獻主要在政治方面。

1. 平反：在毛澤東時代的歷次政治運動中，被整肅的不僅是各類社會精英(有產者、與舊政權有關係的人員、中共各級官員、社會名流和知識分子群體)，而且是大量平民(被定爲「五種人」的政治賤民)。胡在主持平反工作時表現出了中共高官少有的人道主義同情心，他的平反政策不僅惠及社會精英，而且惠及廣大平民，使二者同時獲得解放，終結了讓人永無出頭之日的身分政治歧視，以及由此而來的全面社會歧視的黑暗時代，在政治上爲鄧小平贏得了充分的民意支援，這在剛剛結束了殘酷階級鬥爭局面的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是相當大膽而寬容的政治決策，頗有政府必須對所有人進行平等對待的自由主義政治色彩。

2. 主持和全力推動思想解放運動：他不僅主持了關於「真理標準」的討論，而且在鄧小平的完整地準確地理解毛澤東思想的基礎上，提出了馬克思主義不是僵化的教條，而是隨著時代的發展而不斷進行自我調整，應該承認馬克思主義是特定時代的產物，因而必然有其局限性，無法全部回答今天所面對的問題，要創造性地發展馬克思主義，就必須在理論上勇敢地面對新時代，回答和解決馬克思所沒有提出和沒有解答的新問題。可以說，他的這種有限的馬克思主義論對思想解放的推動，甚至在更深的層次上超越了「真理標準」討論。他還提出執政黨不應該干預文藝創作和學術研究，保證知識分子的創作自由和學術自由，爲思想解放和文藝、學術的繁榮，提供了來自高層決策的動力。這也是他在後來抵制「清汙」和「反自由化」的根據。

3. 他在解決民族問題特別是西藏等問題上，表現了政治上的

遠見和制度創新能力。他與萬里去西藏時，對1949年以來的中共民族政策進行了坦率而真誠的檢討。他的講話雖然沒有超出中共的統治傳統，但是那畢竟是到目前爲止的中共黨魁，放下壟斷一切的架子和從不認錯道歉的惡習，對其執政歷史的自省和民族政策的檢討的極限了。所以，他的那次高原行才能至今在西藏的精英階層中保留著美好的記憶。如果按照胡的思路，中共政權與西藏及其達賴流亡政府之間的關係，決不會陷入現在這樣的毫無進展的僵局，兩岸關係也不會出現如此強烈的敵視。

4. 他對知識界和大學生要求政治改革的熱情和行動的保護。在改革之初，他就出面保護了參與西單民主牆運動的一些人。在思想解放運動時期，他已經對社會名流和知識精英具有很強的人格凝聚力了。在文革後召開的全國文代會上，他發表了關於創作自由講話，令多少備受文字獄之苦的作家感激涕零。當他和趙紫陽共同抵制了「清汙」，使之不了了之，並且由於處理「反自由化運動」和「八六學潮」上的開明立場而被迫下臺之時，他對知識精英以及各界社會名流的人格凝聚力，達到了中共的歷任黨主席或總書記都難以比擬的程度。當時就連在政治改革上最激進的方勵之都對胡耀邦有很高的評價。

5. 政治上的無私：導致胡耀邦下臺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他力主廢除終身制，想用自己和鄧一起退休來作爲全黨的示範，身體力行地讓人民看到中共進行政治改革決心。所以他才贊同並力勸鄧小平退休，允許《深圳青年報》公開發表贊成鄧小平退休的文章。我相信，以胡耀邦的人格而言，他的這種表示完全是出於真心與公心，決不是爲了自己牟取更高權力的虛情假意。所以他的含冤而死才能激起體制內外的廣泛同情和義憤，引發出自下而上

的以大學生爲主體的全民動員的八九運動。

趙紫陽對政治改革的貢獻

趙紫陽對社會轉型的貢獻主要在體制改革和言論開放方面。他與胡耀邦一樣具有人道主義同情心，但是他還有戈巴契夫式的對共產制度的滅絕人性的認識，這主要來自於其父輩的悲慘遭遇。戈氏的岳父母一家受到過蘇共的迫害，趙紫陽的父輩在四十年代末中共的土地改革中遭受了迫害。這種浸滿了家族血淚的意識啓蒙雖然殘酷，但是正因爲殘酷才能深入骨髓。正是這種殘酷的啓蒙，成爲他向往現代民主社會的重要內驅力，使他在改革開放中以悲劇英雄的形象結束了政治生命。在此意義上，我不認爲趙紫陽在八九運動中的表現完全是政治投機的失敗，我相信他的內心深處有著道義支撐和對歷史潮流的遠見，否則的話，便無法解釋從他主政四川到出任總理再到就任總書記，其執政大方向一直符合歷史發展的潮流。

趙紫陽在經濟改革方面的主要貢獻是：1. 推動農村改革。趙紫陽在改革之初主政中國人口最多的四川，成功地解決了農民的吃飯問題，成爲當時與主政安徽省的萬里齊名的中共省一級幹部。「要吃米找萬里，要吃糧找紫陽」的民諺就是對趙之政績的最好概括。2. 推動全面的經濟改革。由於在農村改革中的卓越成就，他於1982年奉調進京，先後出任國務院副總理、總理和中共總書記，他是經濟改革在城市展開後的宏觀決策的主要設計者、推動者和執行者。雖然大陸中國的經濟體制由計劃向市場的轉型，是在1992年以後才取得了一些實質性進展，但是它的整體構

想和基本藍圖則是在趙任總理及總書記時期確定的。市場經濟的改革方向，權力下放、黨政分離和政企分離的措施，逐步放開物價的雙軌制，徹底放開物價的第一次嘗試(物價闖關)，對外開放和加入全球市場的構想(即加入國際經濟大循環)，都是在趙任總理時開始的。在他正式就任總書記的中共十三大上，確立了社會主義的商品經濟「應該是計劃和市場的內在統一」，「國家調節市場，市場引導企業」成爲覆蓋全社會的資源配置機制，國家對經濟的干預主要表現在宏觀政策的調控方面，其他的一律交給市場和價格調節。企業改革按照所有權和經營權分開的原則進行。在六四之後，經濟改革的整體決策的進展，主要是中共十五大提出了「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種進展不過是趙紫陽主政時期的宏觀改革決策的繼續而已，並沒有對趙紫陽框架的實質性突破。

在政治改革方面，趙紫陽的觀念、人格和貢獻即便在中共內部的開明派中，也無人能夠與之媲美。

1. 使來頭最大來勢最猛的「反自由化」運動半途而廢。胡耀邦的下臺，趙紫陽接任，他面對的局面極爲複雜。但是，他硬是頂住了，非但沒有擴大「反自由化」運動，反而使之不了了之。「反自由化」運動之後的趙紫陽主政時期(從他代理總書記到他下臺)，政治空氣的寬鬆、思想交鋒的活躍和言論尺度的開放，都達到了改革二十年之最，說多元化社會的開始出現，是一點也不過份的評價。「反自由化」運動沒有波及全國，沒有影響經濟改革，被整肅的黨內自由派和知識分子也沒有完全失去人身自由，甚至在民間還很活躍，這一切沒有趙紫陽對極左派的遏制和對自由派的開明是不可想像的。

2. 體制內外的良性互動：他主持下的三所一會不僅是經濟改

革的、也是政治改革的主要設計者。通過這一高層決策的智囊機構，體制內和體制外之間的良性互動，社會各界對政治改革的參與，達到了相互駁難相互滲透相互汲取的平衡。事實證明，他所重用的主要智囊大多數具有開明的自由主義價值取向，也都深深地捲入了八九運動，並在八九運動結束後受到了嚴酷的整肅，從而失去了體制內的一切權力。有些人在六四大屠殺過後，成爲堅定的民間持不同政見者，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人物就是前中央委員鮑彤。殘酷的政治迫害非但沒有使他沉默，反而使他通過不斷的發言，徹底與執政黨集團決裂，毫無保留地公開了自己的自由主義政治立場。

3. 言論尺度的開放：在趙紫陽的支援和保護下，緊隨著「反自由化」運動的半途而廢的，是更爲自由的言論尺度的出現。上海的《世界經濟導報》成爲討論經濟改革特別是政治改革的主要言論陣地，其言論的大膽和尖銳，討論的開放和熱烈，達到中共執政五十年之最。北京民辦的「北京經濟科學研究所」及其《經濟學周報》，成爲當時最活躍的思想園地，對民間精英具有極強的凝聚力。方勵之、劉賓雁等人的自由化言論也在民間廣泛傳播。中西方文化的大辯論也由專業刊物走進了中央電視臺等大眾傳媒。西方自由主義經濟學的代表人物弗裡德曼和張五常的思想，通過趙紫陽的肯定性姿態而成爲當時政府幕僚、知識界和民營經濟界的熱門話題。

4. 全面啓動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方案的出臺。在趙紫陽主政期間，他不僅寬容、保護了自下而上的要求政治改革的民間激情，而且在中共十三大的報告中，推出了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方案。趙紫陽所做的十三大報告，不僅確立了經濟改革的市場化方

向，更主要的是提出了七項政治改革的措施，這已經是中共執政五十年來，發自體制內的政治改革最強音了。其中的精華部分就是開啓多元政治的黨政分離和建立民主法制的社會秩序。現在的江核心與趙紫陽主政時期相比，無論是國內還是國際，其執政環境都優於趙紫陽時代。但是，江核心在政治改革方面非但沒有絲毫進步，反而出現了倒退。這就不能不讓人懷念胡耀邦、趙紫陽時代。

5. 八九運動中的悲劇命運。在八九運動的全過程中，從反對「4・26社論」到「亞銀會議」講話，趙紫陽一直以寬容和理性的姿態，保護和支援大學生的民主熱情，主張在民主與法治的軌道上，以對話的和平方式解決問題。在實行戒嚴的大是大非問題上，他是在完全無望的現實條件下，以放棄政治前途和黨內特權來堅持自己的道義立場，親赴廣場向學生們道歉。在中共執政五十年的歷史上，當政權與民間發生重大衝突之時，趙紫陽作爲執政黨的總書記，居然公開拋棄政權立場而站在民間立場一邊，這種道義姿態的確前所未有。可以說，在大陸的制度環境下，八九運動中的趙紫陽，爲了推進政治改革和避免流血，已經竭盡全力了。他的姿態對想在大變革時代有所作爲的執政者來說，既是一種啓示也是一種道義的壓力。

當然，在大陸的體制下，趙紫陽所實施的一切重大決策都要有鄧小平的背後支援才可能進行，這既是他成爲改革的前臺主角的原因，也是他的政治悲劇的最後根源。而趙紫陽在政治上的不成熟或者說對專制政治的遊戲規則的不重視，以及他喜歡張揚的個性，則是他的悲劇的次要原因。經濟改革上的急於求成，使他在時機還不成熟之時就全力執行鄧小平的硬闖物價關的決策和

提出「加入國際大循環」，導致了黨內和社會的普遍不滿；在權力鬥爭中，他在不該韜晦時韜晦（胡耀邦下臺問題上），在應該韜晦時又不韜晦（十三大他剛剛出任總書記之後），他沒有把胡耀邦的命運作爲前車之鑒，從中汲取教訓。他對其幕僚提出「新權威主義」和「走向藍色文明」的公開讚賞，對明顯帶有塑造他的權威地位的電視政論片《河殤》的肯定，正值他個人處在十三大剛結束後的權力峰巔，境外媒體又把這些解讀爲「擁趙倒鄧」。無論趙在內心中是否肯定自己已經可以通過某種方式向鄧的權威進行挑戰，這樣明顯的政治資訊都會被鄧視爲挑戰，肯定要招致鄧小平的不滿，爲早已對他不滿的保守派的倒趙提供得心應手的口實，也爲他自己後來的下臺做了鋪墊。

雖然在「新權威主義」正式出臺之前，趙紫陽就此徵求過鄧小平的意見並得到了鄧的首肯（參見：吳稼祥的《走卒隨筆》），但是鄧小平對自己權力的貪戀和敏感，一旦他意識到來自接班人的某種威脅、哪怕是因過渡恐懼而自我虛構的威脅，翻雲覆雨就是他的政治權謀的必然。這種在太上皇還牢牢控制著最高權力之時的鋒芒畢露，實在是政治幼稚病。在極權制度轉型期的現實中，沒有足夠的政治韜晦修養（耐心）是無法成就劃時代的偉業的。好在通過八九運動的大是大非的檢驗，趙紫陽在現實權力鬥爭的失敗，卻爲他個人贏得了長遠的政治榮譽和道義資源，也爲那些「身在曹營心在漢」高官提供了可資借鑒的從政經驗。

胡耀邦、趙紫陽的悲劇根源

遺憾的是，中共高層開明派的兩位代表前總書記胡耀邦和趙

紫陽，在與獨裁者鄧小平以及他所代表的舊體制的較量中，由於政治環境、政治資源、政治權謀和歷史機遇的不足或缺欠，而成了鄧的犧牲品。他們雖然有著開明的觀念和在大是大非的抉擇面前的良知，但是他們卻沒有能夠擺脫中共傳統所形成的政治人格。他們在掌權時沒有戈巴契夫的自覺意識，即便有那樣自覺意識，也沒有戈氏的政治耐性（在完全執掌最高權力前的忍耐和馴順）、執政環境（沒有垂簾聽政的太上皇及其元老幫）、政治資源（黨內支援度偏低）和歷史機遇（八九的考驗）；他們在失勢後又沒有葉利欽的政治眼光和政治魄力，只是以沉默來表示不滿，而沒有很好地利用這種現實政治的失敗所帶給他們的國際性的和民間性的政治聲譽和道義資源，從而把專制下的個人政治生命的悲劇，轉化爲抗爭這一制度的民間反對派運動的正劇。這就又使他們的悲劇平添了一種無奈的淒涼。在這二人中，從趙紫陽下臺後偶爾發表的言論看，他對堅持自己的立場、對通過漸進的政治改革來結束一黨獨裁的體制，已經沒有任何觀念上的包袱了，他所缺少的是政治魄力。

同樣，如果胡耀邦具有的不僅僅是人道同情心，或只是一個好心的中共高官，他還具有足夠的政治魄力和政治勇氣的話，那麼在還保有政治局成員的高位時，他就不可能只是在倍感壓抑中一味沉默，而是繼續堅持自己的立場並想方設法發出聲音。面對非正義的強制壓迫，道義上的勇氣不僅是高貴政治人格和傑出政治智慧的表現，而且是對政治鬥爭中的暫時失敗者最有效的心理治療，在逆境中能否保持一種樂觀的抗爭姿態，這不僅對社會而且對個人都有積極的作用。只有抗爭，才既能保持一種平衡的健康的心理，不至於因過於沈重的內在壓抑而突然病逝，也能把自

已變成凝聚民意的有力的道義象徵。

在蘇共保守派所發動的軍事政變中，面對政變者的坦克和全副武裝的軍隊時，葉利欽毅然決然的挺身而出，需要的不僅是對民意與歷史機遇的正確把握，更是敢於在千鈞一髮的關鍵時刻不畏個人生命危險的政治勇氣和政治魄力。他走出議會大廈，登上政變軍的坦克發表演講時，並不能保證政變的軍隊中沒有人向他開槍，也許只是慌亂中的偶爾走火，就能結束他的政治生涯乃至生命本身。但他冒險了，而且成功了。即便不成功，對於一個順應大勢所趨、民心所向的歷史潮流的政治家來說，在關鍵時刻挺身而出的悲壯也要比無聲無臭的委曲求全，在道義上更具有長遠的政治意義和生存價值。菲律賓的政治反對派領袖艾奎諾的甘願赴死，就導致了這個國家的馬可仕獨裁政權的垮臺，他的名字也將因此而贏得不朽的道義感召力。

雖然胡、趙所處的政治大環境與前蘇聯及菲律賓有很大的差別，其人格、智慧、意識等個人素質也沒有太多的可比性。但是，我認爲就關鍵人物的政治勇氣在大轉折時代的關鍵時刻的決定性作用而言，二者還是可以進行對比的。在某些歷史關頭，政治勇氣將決定政治家本人甚至一個國家的未來。你可以說，葉利欽的幸運在於：曾經作爲他的主要政治對手的決心埋葬共產制度的戈巴契夫，在此之前已經爲他的成功營造了難以逆轉的大局，但是，如果不是葉利欽而是其他的什麼人，未必都有他那樣的政治勇氣。那種在大勢之中總會有人挺身而出的論調，完全忽略了個人素質的優秀與否在大變革時代的關鍵時刻的關鍵作用，是一種歷史決定論的思維定勢。事實上，傑出人物的歷史作用是不容抹煞也抹煞不了的。沒有聖雄甘地就不會有印度爭取獨立的非暴力

抗議運動。

胡、趙的悲劇命運的確引人同情，二人在八十年代中後期的分歧更令人惋惜。趙紫陽在六四前最遭人病詬的政治污點有兩個方面，一是他兒子的官倒問題，二是他在罷免胡耀邦問題上的曖昧態度，而後者是他政治生涯中最大的污點。但是，這種悲劇的發生，並不能簡單地用趙的政治野心和政治權謀來解釋，也不是一句個人之間的爭權奪利所能了斷的。因爲所有把政治作爲職業的人皆有所謂的野心(我認爲叫做政治成就感和名譽感更準確些)，手握重權者之間的分歧與爭鬥也是正常的。特別是已經走到了胡、趙這樣高位上的從政者，沒有政治野心或兩人完全一致是不可能的也是不正常的。關鍵在於權力遊戲規則是否公開、公正和有法律的保障。

自由社會的政壇也有非常激烈的權力爭鬥和政見分歧，但是多元政治的遊戲規則的好處是：權力爭鬥的成敗贏輸，皆有法可依且具有公開的透明性和基本的公正性，決不會陷於完全黑箱操作的陰謀和人治，也不會把人逼到一山不容二虎的你死我活之絕境，在政見論辯中更不會依靠政治權力把反面意見打入地獄，一個人也不會因爲政治鬥爭的失敗而被剝奪發言權和從政權。在自由制度中，只有暫時的失勢者，沒有永遠的失敗者。而在大陸中國，一山不容二虎和依靠政治權力封殺不同政見、把政敵置於死地的人治傳統源遠流長，並且一代代地重演，1949年之後尤甚。僅僅在毛澤東手中就有多少「同志」兼「戰友」被打入地獄，高崗、彭德懷、劉少奇……。鄧小平時代的黨內鬥爭，雖然在處理不同政見的「戰友」兼「同志」時的殘忍性降低，但是其專制政治的遊戲規則沒有實質性改變，而且到現在仍看不到這種人治的

強權政治和陰謀政治在何時能夠完結的希望。由此出發再看胡、趙之間的分歧，就會超越個人恩怨的視角，進入制度悲劇的深處。

胡和趙相比，胡身上的中共傳統的烙印顯然比趙更深，更頑固，而趙的觀念更開放更現代，其內心深處的想法更接近戈巴契夫，只是歷史沒有給他提供戈氏那樣好的機遇。戈氏在執掌最高權力時，老人集團已經全部退位，他的頭上沒有類似鄧小平這樣的太上皇；更重要的是在他謀取最高權力的韜晦過程中，沒有遇到類似八九運動這樣大是大非的挑戰：一個決心埋葬極權制度的政治家，面對極權制度的全副武裝的軍隊鎮壓和屠殺手無寸鐵、和平情願的民眾之時，還能韜晦下去嗎？也許有人能，但是那將背負著怎樣的道義十字架和歷史欠帳的包袱。更主要的是，這樣的屠殺過後，肯定將是極爲漫長的舊制度鞏固時期，他的政治韜晦也將看不到出頭之日。

而趙紫陽的政治生涯，在胡耀邦問題上韜晦了一下，但是由於他個性中本有張揚的一面，在十三大後很難讓他以低調行事，更由於撞上了必須對之表態的大是大非的考驗，這種考驗的殘酷不僅是對一個政治家的智慧，而且是對其作爲一個人的良知的考驗，結果是人的良知戰勝了不惜一切代價向上爬的政治韜晦，這就注定了他無法韜晦到太上皇自然死亡那天，所以他的政治悲劇也就成爲必然。

如果說胡耀邦是中共傳統中的好人政治家，那麼趙紫陽就是開始超越中共傳統的現代型政治家。即便假定趙的人格不如胡那樣善良，但是二人如果繼續執政，趙爲改革所確立的目標肯定要比胡的更接近世界現代文明的主流。儘管胡耀邦的個人風格在中共高官中很受讚譽，甚至連踏著胡的屍骨坐上最高權力的交椅的

江澤民，爲了玩弄政治平衡術都要對胡表示一定的尊重。但是，長時間的一黨獨裁體制的惰性，仍然在他身上留下了不可避免的權力狂妄的政治遺傳。他在經濟上的計劃思想、在新聞上的喉舌思想、在港臺回歸上的僵硬態度、在權力分配上的一元化思想，是導致胡、趙二人分歧的主要原因。在政治權力得不到有效制約的環境中，黨魁的一時心血來潮就可能變成危及整個社會的政治決策。

胡耀邦的計劃經濟思想、對趕超策略的熱衷以及對經濟的外行，使他在經濟改革上如同胡鬧兒戲的發言，變成了全民追逐高消費的時尚；至今人們仍然以輕蔑的口吻談起，胡當政時搞的幾千名中日青少年的交流計劃。這就必然造成他與當時主管經濟的趙紫陽之間的分歧。當黨的總書記的話在政府總理的行政權力範圍內未必就能變成經濟改革的決策時，政見上或政策上的分歧就會演變成權力上的爭鬥。胡與趙的政治觀點基本一致，最明顯的表現就是二人共同抵制「清汙」和「反自由化」。二人的觀點分歧主要是經濟上的，但是在中共的體制下，作爲黨魁的總書記與作爲行政首腦的總理之間的任何分歧，都必然涉及到黨權對行政權力的過多干預的問題。而趙紫陽主持的城市經濟改革的第一步就是放權讓利，進而要解決黨政不分、政企不分的權力過於集中的問題，所以胡、趙的分歧最後就要扯到是否要進行黨政分離的體制改革的衝突上。趙作爲既主持經濟工作又堅持黨政分離的政治改革的行政首腦，對作爲黨魁的胡耀邦經常利用黨權越界干預行政權力的行爲，肯定不滿乃至採取行動上的抵制。而在堅持黨對一切的絕對領導權的體制下，胡耀邦身爲中共總書記自然認爲他有權干預一切，所有重大決策的最後決定權應該在黨魁手中，

而不是在行政首腦手中。趙紫陽在鄧小平決定罷免胡耀邦的會議上所採取的曖昧立場，除了所有從政者都有的個人政治野心之外，應該也有他想藉以擺脫黨權干預行政的原因。

從後來兩人的政治命運看，鄧、胡、趙聯盟的密約期也是中國改革的黃金時代，三家馬車的分裂標誌著改革的嚴重受阻。這種分裂的第一責任人是以鄧小平爲首的中共元老集團及其堅持的舊體制。而就胡、趙二人來說，胡應負的責任是黨權對行政權力的過分干預，趙應負的責任是在胡遭到不公正的政治迫害時，沒有像習仲勳那樣挺身而出主持公道，而是採取了韜晦之策。這既是他們個人的悲劇，也是大陸中國制度轉型的悲劇，而造成這一悲劇的最終根源則是一黨獨裁的政治體制。

胡耀邦含冤而去，趙紫陽至今仍被高級軟禁剝奪著自由，但是他們留下的政治資源並沒有因此而完全消失，正如眾多來自民間的被剝奪了自由和生命的持不同政見者一樣，每一次代價的支付同時也是一種道義資源和政治資源的積累，何況胡、趙所擁有的政治資源還不僅局限於民間，二人在體制內仍然具有潛在的影響力，是中國官僚體制中一隻極具魅力的「看不見的手。」社會體制向自由化民主化的轉型，都是在與專制制度的長期較量中，靠一次次犧牲所積累的資源完成的。然而，與前蘇聯、東歐甚至臺灣相比，大陸中國人所付出的代價更慘烈，對積累起來的資源的浪費也更觸目驚心。我們付出了太巨大的血的代價，卻沒有換來類似捷克的哈維爾、臺灣的蔣經國和前蘇聯的葉利欽式的政治領袖，也沒有留下一部類似《古拉格群島》那樣的見證歷史的巨著。

半個世紀的苦難和二十多年爲政治自由化民主化所付出的

代價，應該教會我們百倍地珍惜那些來之不易的資源，使之轉變爲道義凝聚和政治動員的整合象徵，而不是沈溺於政治暴發戶的輕率和狂妄之中，揮霍苦難、浪費鮮血、一任寶貴資源的急遽流失，以至於當專制制度的崩潰來臨之時，爲反對這一非人制度而付出了超常代價者，已經沒有了任何可資憑藉的資源來引導民眾投入新制度的建設之中。

2001年1月2日於北京家中

青天的無奈和末路

——朱鎔基與政治改革

尋找「青天」的改革

從表面上看，在大陸中國的社會轉型過程中，從「天安門四五運動」到小崗村18個農民冒著生命危險發起的聯產承包責任制，從79年「西單民主牆」、80年「大學競選」到「八六學潮」、「八九運動」，要求政治民主化的民間動力非常強大，而且一直伴隨著改革的全過程。只是在六四血案之後，民間的推動力和自由主義的政改呼聲才呈日益萎縮的趨勢，甚至已經被逼入無法凝聚民間資源的邊緣的邊緣，處在極少數人自說自話、毫無回應的孤立狀態之中。

然而，實際的狀態是：大陸的改革一直由執政黨主導這一事實並不是六四之後才有的，在政治改革呼聲最高的八十年代就是如此。「西單民主牆」和「大學競選」的主要人物被鎮壓之後的一段時間裡，社會舞臺上已經聽不到民間政治反對派的聲音了，

被判重刑的魏京生、徐文立等人，幾乎被社會遺忘了整整十年，八九運動期間的大學生們，絕大多數根本不知道「西單民主牆」和魏京生的名字。八十年代活躍於社會上的呼喚政治改革的著名人物，幾乎全部是體制內的「自由派」或「開明派」。「反自由化」運動中被整肅的知識分子，也大多數屬於跟隨胡耀邦和趙紫陽的黨內開明派，而且在被整肅之前都曾經掌握著不小的權力。大陸中國的社會現實和中共執政精英集團以及全社會的傳統政治意識的根深蒂固，使尋找「明君賢臣」來推動社會轉型，成爲直到今天的主流期望。無論是國內還是國際，無論是在野者還是當權者，大多數想推動大陸的政治改革的人士，包括海外民運和西方政府，早已對大陸民間出現哈維爾式或瓦文薩式的政治領袖表示失望，越來越寄希望於中共執政高層出現戈巴契夫式或葉利欽式的人物。

大陸改革一直在中共執政精英的主導之下這一現實，也被改革過程的曲折所印證。政治改革的大喜大悲和大起大落都與黨內高層的開明派和保守派之間的權力較量直接相關。從76年四五運動到八九運動，這種發自民間的大規模政治運動最初的導火線和合法性依據，皆是公眾心目中的「明君賢臣」的蒙冤死亡，也都與黨內的權力鬥爭密切相關。一個是「人民的好總理」周恩來，直接關係到鄧小平的復出和毛澤東以及「四人幫」的權力；一個是「人民的好總書記」胡耀邦，與執政黨內部的開明派和保守派之間的爭鬥直接相連。胡含冤而死之時，已經有了「胡青天」的美譽，所有的悼念文章都有「青天」崇拜的色彩。特別是一些受到他恩惠的著名知識分子，更是盡情傾訴痛失「明主」之慟。一些當時已經流落海外的著名異見人士，紛紛發表悼念文章，並通

過越洋電話和電報向胡的家人表示慰問。最著名也具自由主義理念的異己人物方勵之，也稱胡耀邦執政時期，是1949年以來大陸知識分子的唯一黃金時代。

而另一位明君兼賢臣型的總書記趙紫陽，曾在八十年代後期，被他的智囊們和一些具有自由主義傾向的知識分子樹爲「新權威」；著名美籍華裔經濟學家張五常在北京見了趙紫陽之後，也在境外發表擁趙言論，認爲推進全面改革的最好策略，就是必須給趙以獨裁權力。但是，這些動作引起了中共高層的強烈反彈，保守派更是利用了太上皇鄧小平對趙的越來越深的不滿，利用了八九運動提供的時機，把趙紫陽打入冷宮。而趙紫陽，經過頑強的抗爭之後，在民間政治反對運動和他個人政治命運的悲劇已經決定之時，用親赴廣場的行動捍衛了現代政治家的道義形象。但是，這最後的悲壯除了長時間段的道義象徵意義之外，已經沒有可以直接左右當下政治改革的現實力量了。

這種尋找「青天」的主流期待，也與大陸民間的政治反對派中沒有孕育出真正的領袖直接相關。從西單民主牆到八九運動中湧現出的民間的主要意見領袖，或被迫或自願地選擇了流亡，多年積累起來的民間道義資源和象徵性人物大量流失，使本來自組織能力極爲低下的民間反抗運動，更變成了沒有任何凝聚核心的一盤散沙。六四大屠殺，雖然使大陸中國人第一次擁有了不僅是來自國內民意的、而且是來自世界性(政府和民間)的道義資源，也使鄧小平靠改革開放所積累的中共政權合法性大面積流失，它爲大陸中國民間政治領袖的誕生提供了豐厚的資源。但是，我們並沒有從道義上和實際操作上充分利用這些豐厚的資源，主要的道義象徵人物的被迫流亡，使最需要世界性道義支援的大陸中國

的政治反對派，與最具有影響力的諾貝爾和平獎擦肩而過。八九年西藏精神領袖達賴獲獎，並不能彌補持續二十多年的民間政治反對運動的道義資源的嚴重不足和政治領袖的巨大空白。

一方面，對於個人來說，在人們被恐怖所嚇倒和被金錢所腐蝕的整體環境下，從事民間政治反對運動的收益，在六四後呈迅速遞減之勢，而風險和代價卻越來越高昂，過少的收益和過於高昂的代價，使大多數人望而卻步；另一方面，由於執政黨的高壓和民間反對派自身的內耗，致使國內的民間政治反對派運動，既缺少組織資源與道義資源的持續性積累，又缺少兼具道義凝聚力和組織動員力的整合核心，一盤散沙的現狀根本無法構成中共政權的民間政治對手。

在我們最有機會凝聚民間的政治和道義的力量時，我們因缺乏道義勇氣和政治智慧而白白浪費了巨大資源和大好時機。恨鐵不成鋼也好，無可奈何也好，冷酷的大陸現實即是如此，想不想面對都必須面對。這種寄希望執政黨內出現「明君賢臣」的政治偏好，最有力的例證就是中共的每一次最高決策層換屆的前後，國內外關心大陸問題的人，都要被中共高層的人事變動所吸引。朱鎔基剛出任總理時被普遍看好，但是現在，人們已經不再對他抱什麼太高的期望，而把關注的中心提前轉移到中共十六大的人事安排上，特別是江澤民的全退還是半退以及江澤民與其他常委在第四代接班人的人選之爭上了。所以，人們把政治改革的最大賭注押在高層執政精英身上，非常符合中國的寄希望於「明君賢臣」的古老傳統和當下現實。

朱鎔基的「青天」形象

六四之後，整體的倒退和人們的懦弱，使這片土地幾乎變成了死水一潭，也使曾經混雜著興奮與悲憤的國際社會對中國感到茫然——如此大規模的群體運動怎麼就能如此迅速地平息了？在國內，短暫的悲憤過後，人們又一次得出「秀才造反，三年不成」的古老結論，再一次認同了中共反覆灌輸的論調——在大陸，「沒有任何組織能取代中共」，「沒有共產黨將天下大亂」；在國際上，經過了一段制裁之後，甚至就在制裁還未解除之時，西方政府又不得不再次與中共打交道，不得不再次把目光轉向中共高層。於是，國內外不約而同地一起尋找中共內部的胡、趙的替代者或中國的戈巴契夫。也許人們尋找青天的心情過於急迫，剛進入九十年代前期，他們似乎就真的找到了一個「青天」——朱鎔基。

爲了挽救個人聲譽和中共政權的合法性，鄧小平不得不被迫發動第二次改革。正是「南巡」所開闢的局面，導致了無能無德的李鵬失勢和朱鎔基在政壇上崛起。朱鎔基一從上海進京擔任常務副總理和政治局常委，就被國內外輿論界譽爲「中國的戈巴契夫」，由此可見國際社會和國內民眾對他寄以的厚望。其實，朱鎔基的政績在他擔任地方諸侯時就常有所聞。特別是在最嚴酷的六四期間，他接任江澤民主持上海工作，抵制了對上海的軍事戒嚴，和平地控制了大屠殺之後上海的局面；他在八九運動中和在處理八九運動遺留問題上的明智和溫和，似乎使人們看到了當年處理「清汙」、「反自由化」、「八六學潮」時開明的胡耀邦和趙紫

陽的影子。他在九十年代中期出任常務副總理，代替李鵬全面主持經濟工作，收拾「南巡泡沫」所造成的高投入、高通脹、低效率的經濟爛攤子。他主持制定的金融十六條、宏觀調控政策和親任中央銀行行長，使過熱的經濟實現了「軟著陸」（這種「軟著陸」並不像中共自己及御用經濟學家所吹噓那樣成功和偉大），已經顯露出他「經濟沙皇」的集權本性，但是比起既背負六四大屠殺惡名、德才全無而只會玩弄權術的李鵬來說，朱鎔基畢竟給國內外留下了負責、勤政、廉潔、開放、有能力、有氣魄的良好印象。

正是這種政績使他成爲呼聲最高的總理人選，而且如願以償。在就任國務院總理之時舉行的記者招待會，他以中共高層少有的坦率果敢、廉潔勤政的個人風格和甘願赴湯蹈火、萬死不辭的充足底氣，語驚四座。「堅決遏制腐敗」、「國企三年脫困」和「政府機構改革三年完成」的政治承諾，雖然有理性的人會覺得這是不知天高地厚的狂妄，但是大眾聽上去卻會覺得這是不畏仕途深淺和風險的「青天」式諾言。他作爲大陸中國第一任把「可持續性發展」（即環境保護和經濟發展兼顧）列入國家發展戰略的總理，著眼於未來和後代的負責精神，使他贏得了具有遠見卓識的聲譽。他全力推動大陸的資本市場和加入WTO，顯示了他開放的姿態和把市場化改革進行到底的決心。特別是在他就任總理的1998年，江澤民也破天荒地允許現場直播克林頓的訪華演講和記者會。新政府的確帶來了短暫的新氣象，國內出現了六四之後最爲寬鬆的政治氣氛，被輿論界譽爲「小陽春」，更加強了人們對朱鎔基領軍的新政府的期望。

在大陸的體制下，朱鎔基的確具有傳統中共高官所缺乏的魄

力與品質，其中，他的最值得稱道的執政品質就是心中還有民眾。他是高層決策中最在乎保護弱勢群體利益的人，正是在他的強力督導下，救濟城市弱勢群體(失業者、下崗者、退休者)的社會保障體系才初步建立；也是在他的主持和推進下，旨在調整農村分配體系和減輕農民負擔的「費改稅」的制度改革，才得以正式出臺並開始在安徽省試行。從一年試行的實際效果上看，「費改稅」儘管不能真正解決農民負擔過重的問題，但是對於緩解農村問題的嚴重性和農民愈演愈烈的不滿(如減輕農民負擔、緩解土地撂荒、轉變基層政權的職能、精簡政府機構、遏制各級權力對農民的嚴重收刮、落實村民自治等方面)的作用，要遠遠超過多如牛毛的各種行政禁令和領導人的指示。

朱鎔基關注弱勢群體利益的執政品質，特別表現在他對群體事件的處理上。1999年4月25日，萬名法輪功學員聚集北京進行和平請願，朱鎔基親自接見了請願者，他下令釋放了在天津被關押的學員，宣布了「三不」政策，法輪功學員也回報以熱烈的掌聲，輕易而和平地平息了4・25事件。這也是他在處理群體的和平請願和抗議時的一貫風格，在人大會議上他就發出「不要用專政工具對待人民」的告誡，在數次涉及到處理此類事件的講話中，他一直強調不能對老百姓使用暴力。直到最近，在2000年11月15日國務院召開的全國省市黨政負責人緊急電話會議上，朱鎔基做了《必須牢牢把社會穩定、政治穩定工作放在首位》的講話，他把造成社會不穩定的主要原因歸結爲「官僚主義」，對於各級官員來說，任何引發和造成社會的政治的不穩定的情況，「都是極爲嚴重的失職和瀆職。」他宣布的「六不」皆是對各級官員的約束，其中的「第三不」和「第六不」，分別是：「不准濫用權力、

行政命令，把合法的事變成非法、違法」和「不准在處理非政治性遊行示威請願事件中，動用武力手段。」他寧願用對話和中央財政撥款的方式平息民眾的不滿，也不願用粗暴的強制手段保持穩定。同時，他在反腐敗上的態度更是異常堅決，懲治特別兇狠，沒有他的強力推動，不可能有執政黨2000年的反腐敗高潮。朱鎔基在反腐敗問題上的堅決與強硬，不僅表現在他對地方官員腐敗的兇狠整肅上，更表現在他敢於對軍隊腐敗的下手，多年呼籲而多年無效的軍隊經商問題，正是在朱鎔基就任總理後開始有了實質性的動作。他敢於得罪其他人不敢得罪的軍方，特別是自持平息六四之功的軍隊。通過朱鎔基的強硬措施，軍隊與企業脫鉤已經基本完成。由此引起的軍方嚴重不滿，只能靠大幅度提高軍費的政府開支來平息。

本來，在現代社會，民眾採取和平方式向政府提出要求、置疑和抗議，是完全正常的；政府有義務面對民間的不滿、傾聽民眾的呼聲和保障言論自由權利，而且必須以同樣和平的對話、協商的方式來處理民眾的要求。能否傾聽民間的呼聲並給以和平的回應，是衡量一個政府是否文明的重要標誌。然而，朱鎔基如此處理這類事件是由於他本人的執政品質所致，而與中共制度本身無關。僅就此點來說，就更凸現了他是中共高層的開明派，也凸現了他與江澤民之間的差異，特別是二人的政治品質實在不可同日而語。

在國際上，從朱鎔基出任上海市長到就任國務院總理，他的幾乎每一次出訪都贏得了外國輿論的不同程度的讚美。由於中共執政高層在整體上堅持一黨獨裁，所以在外交上經常造成不必要的衝突，朱鎔基在無力改變這一現狀的大格局下，只能以他個人

的魅力進行「消氣外交」。特別是他繼江澤民之後出訪美國所受到的熱烈歡迎和破格接待，會令任何中共高官嫉恨。在與中共其他高層人物、特別是與在他之前訪美的江澤民的對比中，朱鎔基的演講技巧、從容應對和個人魅力對西方人更具吸引力，頗有大國領袖的風采。他是最受西方自由世界歡迎的中共高層人物。

雖然他出訪美國沒有完成中美之間關於WTO的准入談判，但是如果沒有他在國際上的努力，大陸加入WTO的多邊談判，決不會從98年後有實質性進展，並最終於取得突破。在政治改革完全停滯的情況下，改革派和保守派之間的較量就集中在經濟和外交領域，特別在對美國的關係和加入WTO的問題上，高層鬥爭尤爲激烈。儘管他對美國的親善態度，因北約的導彈而受到黨內的猛烈攻擊，但是朱鎔基仍然明智地意識到：在中共現行的決策機制下，以他個人的力量無法改變大陸改革的國內動力嚴重不足的困境，必須尋求外來動力衝開國內的僵硬體制，而加入WTO無疑是最大的外來推動力，就等於把大陸經濟推上了市場化和全球一體化的不歸路。

一時間，國內外輿論都把朱鎔基視爲大陸中國改革開放的象徵和實際領袖——中共黨內開明派的代表，中共高層推動體制轉型的主要政治動力。

無可奈何的朱鎔基

然而，僅僅時隔兩年多，朱鎔基便在2000年3月人大的記者招待會上，除了對臺灣進行言詞威嚇和在回答政改及反腐敗問題時的胡攪蠻纏之外，他只把自己任期內的政績標準定位在一個幹

了幾件實事的「清官」上。語氣和表情之中充滿了無力回天的無奈。而他上任三年時的2001年人大記者會上，儘管聲調還有一點剛剛就任總理時的高亢餘音，但是他在回答記者提問時，上任伊始的坦率和實質性新義已經完全消失了。他對江西小學校的惡性爆炸事件的態度，是在用道歉的方式來爲這個制度的腐敗做巧妙的掩飾。此刻的朱鎔基不再是人人仰望的「朱青天」，而是一個善於強詞奪理和機智狡辯的政客了。而這，才是中共體制下真實的國家總理。

朱鎔基在大陸政壇崛起之時，表面上的個性之強硬和氣魄之宏大似乎遠遠勝過胡、趙，而正是這種表面的個人魅力，既掩飾了他本身的經濟、政治的理念之陳舊，也遮蓋了他在權力爭鬥中不得不委曲求全的窘境。

在經濟上，他堅持集權式改革，強行把稅收的70%集中在中央手中；堅持幾乎所有內行人都反對的而且注定要失敗的糧食流通體制的「新統購統銷」，堅持對國有企業實行財政、信貸、上市的多重優惠，而對剛剛發展起來的民間金融業進行全面圍剿；堅持在不改變產權關係這一根本制度的前提下，只通過加強管理和調整結構的改革就能使國有企業起死回生。他的集權改革方式窒息了私營經濟和地方經濟的活力，在投資減少、外資減少、消費減少的經濟窘境中，只能依靠加大中央投資即積極的財政政策來支撐經濟發展的速度。朱鎔基在「國企三年脫困」的政績承諾壓力下，做的最無道義的決策，就是在不根本改變產權關係和社會保障體系極不完善的情況下，大舉剝離國企的不良資產，以保證其運行安全和保值增值，卻從來不強調保證私營經濟和私人財產的運營安全及保值增值，不顧及弱勢群體的利益的不公正受

損。結果是，防止國有資產流失使私營經濟遭受嚴厲的打擊，以產權不清爲由強制剝奪大量事實上的私營財產，國企得到了虛假的扭虧增盈，而作爲大陸經濟高速增長支柱的非國有經濟卻出現大面積滑坡，虧損、倒閉、破產的不再只是國有企業，市場經濟的寵兒——民營和私營的企業也處在虧損、破產的困境之中。剝離國企不良資產(兼併、轉制、重組和破產)就是政府向社會轉嫁危機，經過層層轉嫁，災難的承擔者肯定是處於社會最下層的弱勢群體，而良性國有資產的佔有者則主要是大小權貴。那些爲國有經濟奉獻了一輩子而只有溫飽回報的職工，現在卻在沒有多少國家補償的窘境中被剝離出去。

在農村，由於新稅制使地方財政的大幅度萎縮，越到基層政權，其財政就越困難，在利益動機成爲主要從政激勵的格局下，沒有錢的官位完全喪失了吸引力。基層政權只有在確保官員的既得利益前提下，才能保證政權的日常運行。那麼想方設法收刮民財就成了基層政權的必然選擇。結果，中央的腰包鼓了，地方政權的口袋也不會太癟，各級官員的私利更是飛躍式升級，苦的僅僅是被「三亂」收刮的農民。朱鎔基主持的新稅制普遍實施之後的時期，恰恰是改革以來，農民收入相對增長率最低、農村「三亂」現象最嚴重的時期。

爲了維持農村的穩定，就必須緩解農民的稅費壓力，減輕農民的不公平負擔，所以朱鎔基在農村開始實行費改稅，經過一年的試點，從2001開始全面鋪開的農村費改稅改革，儘管在一年試點的安徽省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是推向全國之後，能否取得實質性的長遠效果實在令人懷疑。因爲這一改革嚴重損害了農村權貴們的既得利益，基層政權及其官員們將對這一決策的落實進行

全力抵制，並想出其他辦法來繼續搜刮民脂民膏。中央政權統治權威的層層遞減效應已經成爲公認的事實，而且越是於民於國皆有利的上層決策，在貫徹過程中受到的阻力就越大，越到基層就越得不到落實。因爲這樣的決策如果得到切實貫徹，就意味著各級權貴集團的既得利益嚴重受損，所以每一級政權都會根據自身利益的損益程度來靈活應對上級的指示，經過層層靈活應對，最終就把來自最高層的決策消解於無形之中。

一方面，對國企改造的制度支援是以行政權力爲支撐的黑箱操作的債轉股，包裝空殼企業上市，套取社會閒散資金。企業能否成功上市，不取決於企業本身的當下效益和未來潛力在市場上的平等競爭，而是取決於行政權力的審批。2001年初，證券專家許小年在接受中央電視臺的採訪時證實：70%上市國企的經濟效益和給投資者的回報，非但沒有因套取大量資金而好轉，反而持續下滑。著名經濟學家吳敬璉在同一節目中指出：大陸股市的畸形高贏利，無疑進了幕後操縱者的腰包。大陸的股市根本達不到有效配置資金的作用，反而成了權貴們投機爆富的最佳試驗場，而且學費(成本)低廉，有時甚至都不是一本萬利，而是「空手套白狼」式的無本萬利。這樣的股市甚至連賭場都不如，因爲賭場還有被遵守的賭博規則，而大陸的資本市場充斥著背後「看牌」、「偷牌」的幕後交易和黑箱運作。

另一方面，對國企脫困的資金支援主要來自國家財政和壟斷金融的貸款。國家財政靠的是稅收，1999年，非國有企業在整個稅收中所占比重已超過70%以上，用於支援國企的政府財政主要來自非國有企業的利稅。而銀行貸款主要靠老百姓近七萬億的儲蓄，爲了挽救國有企業，政府連續降低信貸利率和存款利率，老

百姓在存款利率上的巨大損失，恰好是通過信貸政策的全面傾斜使國企獲得的大量低息貸款。結果，傳統國企向現代股份制的轉型，既是虛假的扭虧增盈，又是銀行死賬壞賬的同步遽增；既是在資本市場上進行的又一次不公平的掠奪性再分配，也是用全民的公共資產去添一黨私產(國企)的無底洞。受損最大的是無權無勢的人數眾多的弱勢群體，而受益最大的是中共政權及其權貴家族。

在政治上，朱鎔基的主要政績是反腐敗的堅決和兇狠，甚至對自己的親信(如朱小華)也不給予庇護。這既是他完成自己的「朱青天」形象的必須，又是他藉以制衡高層反朱派的王牌。但是集權式的政治思維之陳舊，使他只知道強權支撐下的嚴刑峻法的殺戮，卻提不出從制度上遏制腐敗的政治改革舉措。在回答記者提問時，他反問西方記者「你們就沒有腐敗嗎？你們在反腐敗時殺過這麼多人嗎？」在談到民主和人權等問題時，他居然說自己爲民主而奮鬥的資歷勝過美國國務卿奧爾布賴特，所以美國人無權對中國的人權問題和政治改革指手畫腳；他還恩威並重地想影響臺灣的大選；在出訪德國接受採訪時他又說陳水扁的當選是民主政治笑話；而且多次重申大陸的改革決不會接受國際通行的民主規則，即三權分立、議會制和多黨制等等。

雖然這幾年，從對中共政權和社會秩序的穩定的貢獻上講，朱鎔基是執政黨內的第一功臣，僅僅稅收和中央財政連年的大幅度增加，就能加強中央和地方談判的分量，加強政權應對大規模突發群眾事件的能力。在此意義上，只有朱鎔基有效地落實了鄧小平「發展才是硬道理」的遺訓，成功地實施了「花錢買穩定」的策略。但是，在黨內高層的權力角逐中，他的個人魅力，既是

他贏得聲譽的資本又是必然引起別人嫉恨的誘因；他的一些開明做法屢屢給他的地位製造麻煩，他對法輪功的寬容被江澤民的嚴厲所壓倒，他在美國的風光無限被北約的導彈和國內的民族主義狂熱所詆毀，要不是克林頓在最後一刻敲定了中美關於WTO的談判協定，那麼他的總理任期實際上在1999年底就結束了。他的反腐敗決心儘管取得了一些表面的成果，卻遇到了權貴們和整個體制的有效抵抗，江澤民保護了賈慶林並且使他的兒子江綿恒權錢雙收，李鵬保護了他的家族並使其子女至今逍遙法外。高層兩巨頭的左右鉗制，就等於瓦解了朱鎔基發誓把反腐敗進行到底的決心。我認爲，朱鎔基在黨內之所以受到一系列打擊，其主要原因絕非政見上的分歧，而是權貴家族利益驅動以及某些高層人物的個人嫉恨所致。

對比他上任時擲地有聲的承諾，僅僅是糧食流通改革、國企脫困和反腐敗的失敗，就足以使朱鎔基的個人威信大打折扣。顯而易見，朱鎔基上任伊始想推動現行體制更深入改革的雄心，已經被他個人理念的陳舊帶向了與擴大市場化和私營經濟相反的加強中央集權的方向，也被這一體制的惰性和黨內的爭權奪利消耗殆盡。

看來，相對於專制體制之中的個別位高權重的「青天」來說，體制本身的力量是無窮的，懷著「補天」的宏願與體制進行抗爭的「青天」，其結果只能被他維護的體制所吞沒。一個好的體制可以使壞人做好事起碼做不了太大的壞事，但是一個壞的體制就可以使好人做壞事或一事無成。

雄心沒有了，魄力消失了，智慧耗盡了，能夠保持個人的清廉勤政的形象就是朱鎔基最大的自我期許了。而作爲一個必須對

十三億人口的大國負責的行政首腦，居然只以七品芝麻官的「清官」定位來博得從政聲譽；作爲一個處在社會轉型期的國家總理，居然只能以中世紀的爲官標準來爲自己的政績打分！真不知道出此下策是由於朱鎔基本身的意識陳腐所致，還是出於對現實的無奈？抑或是兩種力量綜合作用的結果？

改革了二十年的大陸和天翻地覆的國際形勢，絲毫沒有改變中國的政治傳統和體制慣性，「明君」和「清官」就是社會對執政者的最高政績評價，也是執政者自身的個人政治成就感和榮譽感的最高自我期許。同時，朱鎔基的這種自我期許暗示了現存制度和吏治的雙重腐敗的嚴峻程度，即大家都在貪，你想保持廉潔是什麼意思？這個制度的現行本質是：必須表面上高喊爲官廉潔和實質上卻不准廉潔。想在官場上混下去且不斷高升，只能隨波逐流；想做一個清官就要有排除萬難、不怕犧牲的決心和勇氣。這種現實，中共的主旋律反腐影片《生死抉擇》表現的再清楚不過了。

中共執政精英的犬儒化

現在，世界已經進入了社會制度的自由化民主化的普及時代，「人權高於主權」的歷史潮流已經不可阻擋，大陸中國的改革也已經進行了二十年，中共第三代執政者更有成爲大國領袖和國際政治家的野心，他們也深知六四屠殺造成了政權合法性的急遽流失，痛感經濟改革的停滯和腐敗泛濫與根本制度的不合理之間的因果關係，但是，無論是世界潮流的道義示範還是實力對比的現實壓力，無論是公眾福祉的正義召喚還是流芳百世的個人成

就感的誘惑，無論是危機四伏的現實還是前途難料的未來，都無法變成推動中共當權者進行政治改革的綜合動力。

如果說，20世紀前五十年以及二戰後兩大陣營的冷戰時期，中國在紛亂的國際形勢下被迫迎接現代化的挑戰，其政治領袖孫中山、蔣介石、毛澤東都先後選擇了列寧的政黨模式，都信奉「一個國家、一個政黨、一種主義、一個領袖」的政治獨裁，還是情勢可原的話，那麼當今世界，大勢已經如此明朗，世紀之交，那些領導國家走上自由之路或完成「變天」的政治領袖所贏得的世界性的尊重、聲望和榮譽，已經作出了充分的成功示範；而那些狼狽下臺的舊制度的維護者，在世人面前的聲名狼籍以及被追究執政責任，也已經提供了眾多的反面教材。即便是仍處於轉型期的大陸中國，以六四爲分水嶺的鄧小平的世界聲譽的起落，也提供了正反兩方面的示範效應。現在，對這一切的領悟，並不需要太高的政治智慧；順應人心所向大勢所趨的歷史潮流，也不需要太大的政治勇氣。爲什麼中共當局仍然不思進取、反而頑固堅守舊體制呢？是意識形態的羈絆還是傳統與國情的限制，阻礙了執政者推動政治改革的決心？

答案只能是：全面腐敗的政治體制和蜘蛛網式的權貴家族的既得利益。即便高官本人有心改革，他的家族及其小集團的既得利益也決不允許。因此，朱鎔基的「清官」式自我期許，反襯出的恰恰是一個極爲犬儒化的執政精英群體，那就是中共的執政精英階層中的絕大多數，在政治成就感和榮譽感的自我期許上，已經墮入委瑣的毫無成就追求的平庸之中，無論是出於無奈還是心甘情願，就連「廉潔勤政」都無法成爲他們爲官一任的政績標準和內在驅動。這既是對豐厚政治資源和大好歷史機遇的揮霍，也

是對政治作爲一種職業的責任感和榮譽感的褻瀆；既是對社會的不負責任，也是對作爲政治精英的個人成就感的玷污。而大陸中國的未來，恰恰就掌握在這樣一個沒有歷史責任感、社會責任感和職業責任感的執政精英集團的手中！

按照政治常識來說，對一個進入決策高層的執政精英來說，最具有誘惑力的利益驅動，應該是名垂青史的政治榮譽感和政治成就感。特別處在一個大變革時代的權力精英，比起執政於一個秩序井然的時代的權力精英來說，在相同的智力和道德水準上，前者更有歷史機會和道義資源來爲自己贏得開創一個嶄新時代並爲後人留下取之不盡的制度遺產的千古英名。在此意義上，「亂世出英雄」的古訓，正是對職業政治精英成就一番偉業的最佳時機的簡潔概括。即便執政精英本身並沒有深厚而強烈的道義使命感和政治責任心，個人的政治抱負也能在大動蕩時刻動員出足夠的政治智慧和政治魄力，使之順應民心所向大勢所趨的時代潮流，成就一番歷史偉業。何況，在大陸中國，對於執政精英們來說，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並沒有什麼個人的身家性命上的風險，他們不必像曼德拉、哈維爾、金大中那樣去坐牢，更不必付出當年匈牙利的納吉那樣的慘重代價，至多像戈巴契夫那樣在競選中接受光榮的失敗，或像趙紫陽那樣失去權勢和被軟禁。但是這種代價也會使他贏得道義英名而名垂千古。

同時，只要執政精英肯於順應歷史潮流和民意，就大可不必爲曾經效力過極權制度和獨裁者而心存恐懼，擔心變天後會受到清算。臺灣的蔣經國、俄羅斯的戈巴契夫、葉利欽甚以及獨聯體諸國元首，都曾爲極權制度服務過，而他們在大變革時代基於道義呼喚和歷史大勢的明智選擇，則使他們成爲創造歷史的傑出政

治家。特別是蔣經國的晚年作爲，對大陸的執政精英更具有示範效應。蔣經國的大半生爲其父的獨裁權力服務，卻在晚年因開創臺灣的憲政民主而名垂千古。民眾是講理的寬容的，他們非但不追究蔣經國過去的種種惡行，反而把他奉爲華人世界的民主之父。如果大陸中國的執政精英能夠學習蔣經國，我想大陸民眾也會學習臺灣的民眾，決不會追究他們個人及其家族的歷史欠帳，也會記住他們開創新世紀的歷史功績。

在一個偉大的轉型時期，當一個執政精英集團從政的內在利益驅動，由事業上的成就感、榮譽感和道義上的正義感、責任感變成既得利益至上之後，這個集團便喪失了真正的道義使命、政治動力和社會責任感，甚至平庸得連政治野心都沒有了，而淪爲利益至上的豬哲學的奴隸。他們把百年不遇的歷史時機和個人寶貴的政治生命，把民眾巨大的期望和可以左右社會進程的公共權力，統統化爲一已私利的犬儒式算計，不僅是當官者本人的物質利益，更是以家族爲核心的壟斷小集團的經濟利益，已經成爲大陸現行政治激勵機制的癌症。「一人得道，雞犬升天」，這句古訓所概括的官本位社會造就了平庸的執政精英集團，可能再一次使十三億人口的大國喪失融入世界主流文明的大好機遇，而一次錯過就又是浪費掉一代人甚至幾代人的光陰；它還將窒息中華民族造就政治偉人和創造歷史偉業的潛力，使之在漫長的追求現代化的過程中所造就的執政精英，除了昏聵的暴君就是奸詐的小人，除了政治狂妄症患者就是政治犬儒症患者，除了患有老年戀權綜合症就是權力恐懼偏癱症的深度中毒，就連「青天」式的政治人格都難以有所成就。

基於此，我們希望中共執政集團主動進行政治改革，但是推

動這種自下而上的漸進的全面改革的開明派核心人物，不應該是朱鎔基式的傳統「青天」，而是戈巴契夫的、起碼是趙紫陽式的具有主流文明意識的現代政治家。他不僅具有自上而下推動政治改革的魄力和智慧，更要具有現代文明所要求的對民間政治反對派的寬容、對民眾的基本人權和利益要求的尊重。但願朱鎔基模式的「青天」人物在改革上的無大作爲，既成爲中共高層開明人物的寶貴借鑒，又使民眾根絕起碼是淡化對下一個「青天」的期望。

2001年2月2日於北京家中

獨裁政治的戲子化

——江澤民和政治改革

權力與資本結合的後鄧時代

雖然以鄧小平爲首的中共元老集團以及首要幫兇李鵬製造了舉世罕見的六四大屠殺，但是大陸中國在1992年之後，仍然發生了巨大變化，特別是在經濟領域，變化的程度遠遠超過了六四之前，市場化已經成爲配置資源的主要方式，事實上的私有化已經不可逆轉。與八十年代相比，這種發生於經濟領域的變化，表面上是深刻的，實質上卻是膚淺的，其主要特徵是量的擴大而不是質的改變和提升。同時，道義上的激情、政治上的活力、思想上的啓蒙和文化上的提升，都遠遠不如八十年代。更重要的是，變化最大的經濟領域，其動力先是來自鄧小平的「發展是硬道理」——爲挽回因開槍殺人所造成的個人權威和政權合法性的急遽流失。而沈悶的氣氛一旦從經濟上被打破，接下來的變革，其主要動力就是從八十年代開始出現的權貴家族牟取暴利的利益

驅動，他們的貪婪攪沸了所有人的金錢夢。

當「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終於被寫進中共黨代會的決議，進而寫進《憲法》之時，市場早已被權力化了；當推進國有企業的改革使產權問題浮出水面之時，私有化早已成爲權貴們瓜分全民資產的特權；懸殊的貧富差異所導致的社會不公正在急遽擴張。當城市居民的收入水平得到提高時，農民的收入水平卻在敲骨吸髓式的層層盤剝下停滯不前；當國有企業通過大規模重組進行剝離不良資產的改革時，3000萬職工沒有得到公平的補償就被作爲不良資產剝離出去。

如果說八九運動所反對的「官倒」，還只是某些太子們的個人行爲，那麼從鄧小平打開了黨政軍警等政府部門齊經商的閘門後，個人行爲的官倒就必然擴展成由體制本身所推動的遍布各個角落的權貴家族。這種由權力和資本的邪惡結合所拉動的經濟高增長，被國際社會視爲東方的經濟奇蹟，被國內主流的經濟學稱之爲成本低廉的「交易選擇」式的漸進改革的奇蹟（不同於蘇東的成本高昂的「公共選擇」式的激進改革），而在實際上，這既不是經濟奇蹟、更不是成本低廉的漸進改革的奇蹟，而是權錢交易的奇蹟、社會不公的奇蹟，不僅是經濟成本，更是社會綜合成本難以估量的高昂的奇蹟——腐敗的奇蹟和貧富急速分化的奇蹟。在產權制度沒有進行實質性改革之前的市場化，不過是利用權力市場化進行權貴私有化的過程，大概只有等到權貴們把所有的全民資產都瓜分完畢爲止。

正是在這種動力的推動下，經濟活躍了，權貴們瞬間發了大財，私營老闆也緊隨其後揀幾粒大小不等的芝麻；思想活躍了，知識分子在經濟學的顯貴中也不再喊「搞導彈的不如賣茶蛋的」

了，官方對知識界壓迫的相對鬆弛，是以知識界的「告別革命」、「告別激進主義」、「擁抱歷史缺席權」爲前提的；文化活躍了，被浸滿虛幻的繁榮和真善美所包裝的意識形態灌輸的平庸化大眾化，成爲回報甚豐的產業，主宰了文化市場，它與主旋律默契配合，營造出由專制制度刻意縱容的享樂，散發著喪心病狂的冷酷和野蠻。

而與這種表面的繁華和穩定、與金錢的嘹亮吶喊和幸福低吟同步萎縮、流失甚至漸趨死亡的，是政治改革的激情、追求自由的勇氣、道義關切的高貴和社會公正的提升。農民的窘迫、失業者的困境、六四難屬的孤獨、法輪功學員的無助、民運人士的無奈、自由知識界在強制壓迫下的失語……曾經被毛澤東剝奪得一無所有的中國人，似乎在改革之初終於看到的一線爭回自己應得權利(首先私人財產所有權)的希望，卻在「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口號下，再一次被權貴家族集團搶先據爲己有的暴富所愚弄所出賣，權貴們幾乎是肆無忌憚地瓜分著由全民資產轉化而來的黨產。八十年代來自黨內開明派、自由知識界、熱血青年、有道義追求的民營經濟界、民間持不同政見者等共同構成的推動政治改革的現實的和道義的合力已經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單純的經濟利益所驅動的單項經濟改革。

中共政權與資本的結盟所產生的權貴私有化早已成爲事實，高層的每個權貴家族無不與境外的大資本精誠合作，共同瓜分大陸的那些高贏利市場。看看每天的電視新聞中，那些中共高官會見大資本家的繁忙，李嘉誠、梅鐸等大資本家，「賓士」、「微軟」、「松下」、「現代」、「波音」、「空中客車」等大公司的擁有者，無不成爲中共決策者的座上賓；再私下去豪華酒店或其他高級娛

樂場所看看，那些美酒佳肴和特殊服務，大都是爲資本家和官員之間的交易準備的。出入「遠華走私案」的主角賴昌星的「紅樓」的人，沒有一個是平民；深圳的「三九」集團的會所中，上海的錦江飯店中、北京的長安俱樂部和長城飯店的夜總會「天上人間」中，每天光臨的人，除了資本家就是官員……中國的改革開放過程，就是一個權力操控市場和權力轉化爲資本的過程。不要說那些沒有黨票的私營業主是資本家，就是黨員中的資本家也遍地開花。而且，真正發了大財的資本家，決不是那些黨外的人，而是中共黨員而且是中共高幹及其家族。當中共黨魁江澤民的公子與臺灣巨富王永慶的公子相互稱兄道弟、聯手開發大陸的高科技市場時，中共的無產階級性質就變得極爲可疑了。所以江澤民才積極推動對私營業主開放黨籍，才會爲了保住董建華的特首職位，而在深圳召見香港的三十幾個大資本家。

正是在這種背景下，江澤民用「三個代表」代替了「三講」，而「三個代表」的實質是：作爲執政黨的中共不能只代表窮人，更要代表富人；甚至中共已經不想代表窮人，而只想代表富人了。特別是在失業職工遽增、農民的相對生活水平急速下降的情況下，如果不改變中共的代表性，那麼執政黨就只能是窮人黨了。御用筆桿子對「三個代表」的連篇累牘的論證，得出的結論是：現在，最能代表先進生產力的群體和最能創造社會財富的階層，不是中共正統理論所突出的工人階級，更不是作爲同盟軍的廣大農民，而是各類老闆(企業家、金融家、房地產業主、股票大王、新經濟寵兒等)，其中私營業主佔有很大的比重。按照中共的正統意識形態，這些人是名副其實的資本家，是剝削者，是革命的物件。而現在，儘管他們在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不大，卻代

表著先進的生產力和巨大的社會財富。在「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口下，中共不能只代表花錢的人，而不代表創造財富的人。從目前對經濟增長和國家財政收入的貢獻上看，非國有企業的產值已經占了總產值的60%和國家稅收的76%，已經事實上成爲大陸經濟的主體，非國有經濟的老闆自然成爲社會精英。從財富分配上看，僅銀行存款一項，20%的富人占了總存款額的80%，屬於最廣大的平民只有20%的存款。換言之，中共政權的經濟基礎已經由國有經濟轉化爲非國有經濟；中共官員的個人主要收入，已經由體制內的國家工資轉變體制外的灰色收入，能夠讓官員們暴富和過上奢侈生活的人只有資本家。因此，無論從政權穩定的角度還是從各級官員的個人既得利益的角度講，作爲獨裁的執政黨，中共怎麼能放棄對先進的生產力和經濟精英群體的代表？怎麼可以放棄對最大社會財富的創造階層的代表呢？

如果說，曾經幫助中共取得政權的工人和農民，在毛澤東時代還有名義上的主人翁地位的話，那麼，在鄧小平的「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口號下，事實上他們已經被中共政權逐漸拋棄了，僅留下越來越空洞的意識形態合法性。而從「三個代表」開始，這些平民在意識形態的合法性上也被中共拋棄了。中共不再把工農視爲政權的基礎，反而在某種程度上變成了沈重的包袱和麻煩製造者。因爲改革的最大受益群體是官員和富人，他們達成默契的穩定共識，最希望維持現狀；而改革的最大受損群體是廣大的工農，他們最希望改變現狀，再來一次劫富濟貧的革命。現在，愈演愈烈的群體性事件，主角都是下層的弱勢群體，正是他們成爲現存秩序的最大挑戰者。

在黨章中，中共還是名義上的無產階級先鋒隊；在憲法裡，

中國還是以工人階級爲領導階級的工農聯盟。但是，如果「三個代表」真的在2002年寫進十六大修改後的《黨章》，私有財產的神聖不可侵犯在2003年的十屆人大的修憲中真的變成《憲法》權利，那麼，中共的性質和中國國體的改變，就不僅在事實上而且在法理上，完成由窮人黨向富人黨、由公有制向私有制的轉變。

江澤民的執政環境

平心而論，從六四血案到1994年鄧小平年病情惡化不能主事這段時間內，要求江核心在政治改革上有所作爲是不現實的，因爲江澤民取代趙紫陽而成爲核心，就完全是由鄧小平爲首的元老集團欽定的，不具有組織程式上的合法性。但是在鄧因病而不能主事、特別是在鄧小平、陳雲和其他保守元老相繼自然死亡之後，江核心的執政環境就寬鬆多了。即便我們不談1992年之後經濟體制改革方面的諸多進展，僅就國內外的政治環境而論，江的執政環境和進行政治改革的條件也遠遠優於趙紫陽時代。

首先是國內的有利環境：

1. 執政環境的最重要改善，就是江澤民的頭上已經沒有了作爲太上皇的中共元老集團，加之這些年他在鞏固自己權力方面所做的頗見成效的努力，完全可以自主地確定他的執政方針。

2. 鄧小平在六四剛結束時就說「十三大報告一個字也不能改」。中共十三大報告的精髓，一是全面啓動市場經濟，二是確定七項政治改革綱領，其中的黨政分離和建立民主與法制秩序尤爲重要。這就爲江核心推進政治改革提供了充分的黨內合法性，他完全可以借此扭轉單純經濟改革的偏向。

3. 在最高決策層的七名政治局常委中，除了江澤民之外的六個人中，只有李鵬是頑固反對政改的保守派，朱鎔基、李瑞環和尉健行都是改革派，李嵐清唯江澤民是從。在這樣的格局下，如果江澤民主動推進政改，一定能得到政治局常委中的多數支援。特別是順應對政治腐敗的全社會不滿，使他有充分的條件以反腐敗爲政治改革的突破口。

4. 江澤民手中還有六四這張民意王牌可打，此牌一出，哪怕是極爲慎重極爲策略地分階段出牌，比如可以從補償死難群體和允許流亡人士低調回國開始，也能夠凝聚政治上和道義上的民間資源，充分動員從上到下要求進行政治改革的廣泛民意，並能獲得國際社會的廣泛支援。即便是鎮壓法輪功構成了作繭自縛的難題，也可以採取暫時擱置的辦法進行淡化處理，起碼不再繼續製造人爲的冤案。

5. 即便假定公開推進政治改革的體制阻力過於強大，一時還不能大張旗鼓地進行，也可以通過迂回的方式——產權改革——來推進。農村的土地承包制已經有20年的歷史，政府出租土地使用權的房地產行業也已經近十年的發展歷史，股市也造就了一批資本市場上的中產階級，92年以後的城鎮非國有經濟的成長非常迅速，已經逐漸取代國有經濟而成爲經濟發展的支柱，私有化的合法性儘管還沒有得到《憲法》的承認，但私有化已經是既成事實，或者叫做事實上的私有化，隨之而來的是產權改革的呼聲越來越高，還有即將加入WTO所提供的絕佳契機，江澤民完全可以從最低調的產權改革入手，通過廢除對私有財產的憲法性歧視來爲政治改革提供最基本的制度依託。

6. 基層自治和基層選舉的逐步擴大。從1987年頒布的《村民

委員會組織法(試行)》到1998年正式出臺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村民委員會組織法》，農村的村民自治的試驗已經進行了十幾年，以立法的形式保障村民不再受中共縣鄉鎮政權的直接行政干預，國家基層政權只是間接的指導村民自治，其模式類似於市場經濟中政府的宏觀調控和市場本身的獨立運作。在此基礎上的民主直選，完全可以提升到鄉鎮一級國家政權，城鎮可以在居民委員會甚至區一級政權中推廣。

7. 黨政分離、政企分離的分權政治改革決策已經提出了十幾年，應該制定可操作的方法使之落實；執政黨可以由鄉縣一級開始逐步推出對人大選舉的操控；民主黨派的獨立性、司法獨立和要求制定新聞法的呼籲也已經有十幾年的歷史，完全可以進行實質性的推進。起碼儘快制定一部符合世界主流文明的「新聞法」，是完全可行的。

8. 非政治性的民間社團已經有了長足的發展，在非政治領域，社會多元化趨勢已經不可逆轉。特別是準宗教的民間氣功組織，參加者以數千萬計；大量下崗職工對組織獨立的民間工會也有著強烈的要求。政府完全可以通過修改「社團法」，以法治的手段對之加以規範和引導，使之成爲民間整合和社會穩定的健康力量，爲一個獨立的民間社會的出現和逐步成熟提供制度依託。

在國際環境就更爲有利：

1. 世界上最發達的國家無一例外採取自由民主制度，對大陸中國朝著自由化民主化方向的任何一點進步，都會得到他們的支援。事實上他們也一直在幫助大陸進行漸進的「和平演變」。而大陸只有進行政治制度的根本變革，才可能最終被主流文明所接納所尊重。也只有如此，大陸中國才會成爲國際社會中健康力

量，對促進人類的自由、和平與發展做出自己的獨特貢獻。

2. 蘇東巨變之後的世界性自由化民主化潮流已經不可阻攔，「人權高於主權」的新世紀人類正義越來越獲得普遍的共識。大陸中國想成爲受到國際社會尊重的合格的世界大國，無論從道義上還是從實力對比上，中共政權都應該順應世界大勢和歷史潮流。在國際上徹底放棄加大軍費和提升軍備以及聯俄抗美的大國戰略，回歸鄧小平的「決不當頭」的務實外交。

3. 在經濟上，加入WTO爲大陸中國的改革提供了強大的外在動力，國際市場的自由規則有助於大陸中國的市場的法治化和公平化；在政治上和人權上，中共政權在1998年已經承諾了加入保障人權的國際兩公約，現在已經有保留地批准了社會文化教育的權利公約，也完全可以儘快批准另一更具實質性公民權利與政治權利的公約，放棄花錢購買無賴國家政治支援的對抗決策，在人權問題上與主流文明接軌，擺脫屢受指責的被動處境，以此確立中共政權在國際上的道義合法性和推進內部的政治改革。

4. 臺灣的兩次大選以及華人世界的第一次政黨輪替的成功，爲中國人的民主政治提供了典範性啓示，臺灣所創造的經濟和政治奇蹟的成功經驗，特別是由蔣經國所發動的自上而下的社會轉型，基本上以和平方式完成，這對於中共既是一種示範又是一種制度競爭的壓力。在最棘手的兩岸關係問題上，臺灣方面早就提出了「民主的和平統一」，而這正是大陸進行政治改革的民族主義動力。大陸一天不自由不民主，祖國的統一就一天無希望。

5. 周邊國家的政治巨變：印尼的蘇哈托獨裁的崩潰，蒙古、柬埔寨等國的全民大選，緬甸政府和政治反對派的談判，南北朝鮮的高峰會談，以及南斯拉夫聯盟的米洛謝維奇獨裁政權的垮

臺……都爲大陸中國的政治改革提供了示範性的優良環境和可資借鑒的豐富經驗。

江澤民的倒退

令人遺憾的是，現在的江核心既沒有政治遠見和政治良知，也沒有政治智慧和政治魄力；既沒有個人的政治責任感和成就感，也沒有動員整合政治資源的能力和駕馭政治風雲的眼光，因此也就談不上什麼政治上的制度創新能力，白白浪費了國內外的豐富資源和歷史機遇。他只不過是在中共政治傳統的巢穴裡，爲了成爲又一代獨裁者而模仿鄧小平的權力平衡術，在黨內玩著一個個置政敵於死地的政治權謀，在社會上依靠暴力強權和利益收買維持政權穩定而已。

具有反諷意味的是，江澤民爲取得政治強人的地位盡了最大的努力，而實際上的效果卻不明顯。自從他被鄧小平欽定爲中共第三代的領導核心之後，他就一直小心翼翼地看著鄧小平和其他元老的臉色行事，直到1994年鄧小平病情惡化、無法主事爲止。江澤民喜歡說大話卻缺少做大事的智慧、氣魄和能力。他動不動就要求高級幹部「要有駕馭複雜而多變的整體局勢的能力」、「要識大體、做大事」、「要從全球戰略的高度看待一切」……但是在他能夠自作主張地控制最高決策之後，除了急欲樹立個人權威和慣於在公眾場合和外交場合作秀之外，似乎沒有做過一件可以讓幾千萬黨員和十幾億民眾滿意的事，別說大事，就是小事也沒有。

1. 作爲執政黨的總書記，他只會在組織上培植私人黨羽和利用反腐敗之名打擊政治對手，在意識形態上搞完了「三講」又搞

「三個代表」,「依法治國」還沒有真正落實，又提出「以德治國」，想繼「毛思想」和「鄧理論」之後，以「江學說」統治一切，爲他個人的獨裁進行輿論造勢和理論辯護。他的「獨裁恐懼綜合症」所導致的「虛構敵人」進而「製造敵人」的能力，並不比毛澤東和鄧小平弱多少，甚至就是一脈相承。換言之，他既想作爲道統的創立者和權威解釋者，又想一人獨攬法統的最高決策權，以便成爲又一代教主和黨魁合而爲一的絕對獨裁者，具有救世主式的強人魅力。

在黨內，他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資源和手段清除政敵，先後把「楊家將」、「北京幫」、「廣東幫」、「喬石派」逐出最高決策層乃至政壇，確立「上海幫」在高層的主宰地位。現在又利用國企改革不利、國際突發事件和法輪功事件，壓制在個人魅力上超過他的總理朱鎔基，用手中掌握的反腐敗資本制衡李鵬家族；利用十六大的機會提拔自己的私黨。

在社會上，他鎮壓體制內外的一切異己力量，從政黨組織的民主黨到準宗教組織的法輪功、中功，從黨內反對派到自由知識界。而這一切被他鎮壓的民間的和體制內的所謂異己力量，恰恰是他可以利用推進政治改革的最大資源。即便只從他所全力維持的社會穩定的角度講，「中功」和「法輪功」曾經也是頗佳的穩定因素。這種準宗教的民間組織，不僅在增長乏力和大批失業的不景氣中，創造了頗具規模的經濟效益和就業機會，更在倫理崩潰的廢墟上，爲彷徨無助的弱勢群體提供了安於命運的信仰。「中功」的創始人張宏堡曾獲得過中共部一級機構的無數嘉獎，得到了許多高官的讚美，在九十年代前期，被請進中央電視臺的春節聯歡晚會表演特異功能和氣功；李洪志也得到過國家體委和其他

政府部門的褒獎。更重要的是他倆的身後有著千百萬虔誠的信徒，且遍布世界各地。對這樣的沒有政治訴求的民間組織，動用暴力專政進行鎮壓，完全是權力恐懼症所造成的非理性野蠻。

從道義上講，這是繼六四之後中共政權製造的又一次巨大的人權災難；從個人政治前途和政權穩定的角度講，這是江澤民自毀前程，進而泱及中共政權合法性的低智商的下流決策；幾千萬信徒最初只是爲了求得身體健康和靈魂平靜的練功，在鎮壓之後變成了對現政權的積怨和對暴政的反抗，這既是一次無辜受難的人格昇華，又是一次爭取和捍衛公民權利——信仰自由與結社自由——的啓蒙。

從執政黨內部來說，4・25中南海請願事件已經由朱鎔基採取和平的方式平息了，完全沒必要再大動干戈。政協主席李瑞環也說：「凡事商量比不商量好，早商量比晚商量好」。在中共高層的七名常委中，朱鎔基和李瑞環的反對是不言而喻的，其他的人也不會完全贊同，只有江澤民個人的一意孤行，從而引起了不必要的高層分歧，特別是江朱體制的裂痕。而當事件演變到屢禁不止和充分國際化之時，即便是當初樂觀其成的人也會在私下裡抱怨，而當初反對的人則一定幸災樂禍。執行鎮壓的各級政府和司法部門，或出於同情或出於無奈或出於疲於奔命卻無利可得，久而久之其內心的抵觸就會演變成消極怠工、應付了事甚至變相抗命。用警察的話說就是：「什麼時候是個頭兒呀。」

從國際關係的角度看，法輪功及中功問題的國際化，在六四問題逐漸淡化之後，使中共一直自稱的人權狀況的改善，又一次變成赤裸裸的謊言，引起全球性的關注和義憤，構成了對「人權高於主權」世界新秩序的挑戰和威脅，使中國本來就頗受病詬的

人權狀況又增添了一個惡劣的例證。對於這樣一個翻雲覆雨的政權，國際上自然會出現越來越強烈的遏制中國的呼聲。

2. 作爲國家主席，江澤民利用一切外交場合進行自我表演，想把個人魅力、大國領袖和有影響的世界級政治家集於一身，彈鋼琴、唱京戲、題字、搶勳章、抱著法國元首希拉克的夫人翩翩起舞，這些利令智昏的「老年戀權綜合症」的拙劣表演，在痛斥香港記者時達到了一個小高潮，因爲以後又有什麼樣的表演把他個人的多才多藝的形象推向顛峰，全中國和全世界心中都還沒數，一切取決於他即興的心情。但是他把接受美國大腕記者的採訪作爲教訓香港記者的資本，中、英、粵多種語言的交替使用時的口形、身段和面部的豐富表情，作爲大眾和傳媒的「開心詞典」，在沒有新節目之前，恐怕要讓人們繼續欣賞一陣子。

同時，他在國際上的表演又具有純熟的兩面派技巧：一方面極力討好西方的政要和大媒體，另一方面又利用一切國際爭端，在國內抹黑美國，煽動民族主義狂熱，從而達到防止和平演變和確立個人獨裁的意識形態合法性的雙重目的；一方面，他向國際社會拋「人權繡球」，承諾簽署聯合國的保護人權的國際公約，在克林頓訪華時開放北大演講和記者會的實況轉播，另一方面，又利用中國巨大的市場和誘人的訂單收買大資本家和有奶便是娘的無賴小國，以減輕國際社會的人權壓力，他在美國的波音公司和歐洲的空中客車之間的徘徊，就足以讓外國政府承受巨大的商業壓力。

但是，無論多麼會玩弄外交平衡術，他抗拒世界主流文明的立場和犬儒化的實用主義手法，就注定了他的外交決策基本上以失敗告終。在伊拉克問題上，投棄權票固然是鄧小平的決策，但

是聯合國對海珊政權長達十年的制裁過程中，中共始終站在伊拉克的立場上與歐美較勁，則主要是江核心的決策。科索沃問題上，先是全力支援米洛謝維奇政權，繼而是使館被誤炸三人喪生和被俄羅斯玩弄，最後又眼睜睜地看著其「親密盟友」米洛謝維奇獨裁政權的垮臺。在亞洲，昔日最大的盟友北朝鮮爲了向美國獻媚而出賣了「用生命和鮮血凝成的戰鬥友誼」；越南也疏遠中國，將外交的重點轉向了西方特別是美國。印度和日本對一黨專制的中國在經濟上和軍事上的急遽擴充也充滿恐懼。

3. 作爲軍委主席，在國內，他一方面利用中共執政50年慶典，檢閱了三軍還不過癮，又在毛、鄧的巨幅畫像後面安排他自己的畫像，個人崇拜之走火入魔不但激起民眾的強烈不滿，也激起了中共內部的強烈反彈，自己由於心虛而一直處在惴惴不安的恐懼之中。另一方面學習鄧小平保持實際權力終身制的辦法，想在中共十六大後保住軍委主席的頭銜，利用軍頭的權力在軍內濫授高級軍銜來收買軍心1994年策封上將19名，1997年10月24日一天提升將軍152名，至今由他冊封將軍多達530名；他把整治軍隊腐敗的得罪軍方的差事交給朱鎔基(禁止軍隊繼續經商和軍企轉交地方)，同時，自1989年之後以二位數的速度連年大幅度提高軍費開支，用於改善軍人待遇和提升軍備水平。他企圖靠中共強人慣用的手法，通過「槍」來指揮「黨」，鞏固其獨裁地位。近日通過的《解放軍現役軍官法》，首次把「忠於中國共產黨」作爲軍官必備的基本條件，而1988年版本的同一法律則只有「忠於祖國」。

在國際上，他利用鄧小平病情惡化不能理政的機會，一改鄧所制定的不稱霸的和平外交戰略和遏制軍隊坐大的裁軍方針，從

94年開始借助臺灣問題大搞武備競賽，在向一些無賴國家秘密出口核技術的同時，又花大量外匯買進任何能夠買到的先進武器，提升中國的軍事實力，並且屢屢以軍事演習的方式威脅臺灣、警告美國。這種窮兵黷武的強國戰略，受到國內一部分狂熱的中青年民族主義分子的歡呼，使「中國威脅論」在國際上越來越流行，不僅引起西方國家的高度警惕，而且造成了亞洲國家的普遍不安，以至於連一貫視駐南韓美軍爲最大軍事威脅的北朝鮮，也不顧中國的一再反對，同意駐韓美軍的留駐。結果，美國布希新政府上臺，一改克林頓的綏靖政策，對中共採取強硬立場，4月1日的撞機事件使美國遏制中共的政策提前付諸實施，對台軍售升級，戰略中心向亞洲轉移。日本新政府也趁火打劫，大肆宣揚重新武裝，積極加入遏制中共的行動。

正是江核心堅持的一黨獨裁，在國際上置中國於孤立的境地，把中國拖進了又一輪冷戰的泥潭之中，而中國既沒有前蘇聯的軍事實力，又沒有當時兩大陣營的有力環境。這一切所導致的國際社會對中國的遏制戰略的受害者，只能是大陸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利益。發展下去，極有可能葬送中國的未來。而近年來江核心與俄羅斯的親近，不過是相互利用的權益之計，一個衰落的超級大國想重溫昔日的稱霸之夢，一個實力上升、急欲想進入超級大國行列的落後國家正在做著有朝一日稱霸世界之夢。但是這種結盟，既不會改變世界主流文明的未來走向，也不可能改變近百年來對中國最野蠻最不講道義的俄羅斯在骨子裡的仇華。

4. 作爲一家之主，他也要繼鄧氏家族之後，把江家經營成目前中國最有權力和最有金錢的江氏王朝。他的妹妹江澤慧當上了中共安徽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外甥下海經商觸犯王法而平安無

事。他的兒子江綿恒在父權的庇蔭下更是權力和資本的雙贏：既當上了副部級的高官，又成爲權貴家族中新經濟的領頭羊；既與境外大資本家攜手運作著巨大的資本，又參與兩岸關係等重大政治決策。甚至可以說，「三個代表」在某種程度上，就是爲了他自己的家族利益而提出。

江澤民的權力恐懼

無論與胡耀邦、趙紫陽相比，還是與朱鎔基相比，江澤民只是在中共傳統政治的權謀方面略勝一籌，而在政治的理念、氣魄、智慧、公益心、責任心和個人魅力等方面都不如前三者。而他的野心、好面子和愛作秀的性格，使中國最大的公共權力變成了他個人表演的資本，他之所以能夠在最高權力寶座上支撐到現在，一是有賴於中共體制的欽定接班人傳統，鄧小平的政治遺囑在黨內具有遠遠超過黨章的合法性；二是有賴於朱鎔基的集權式經濟改革，中央財政的突破性迅速加強，使政權穩定和社會穩定有了充足的經濟資本。三是有賴於其心腹曾慶紅對中共組織系統的控制，誘以權位利祿，大把花錢和大給官職，以換取對他的私人忠誠。在清除了「北京幫」和「廣東幫」之後，地方諸侯再無向他挑戰的能力，反而省部級幹部的烏紗帽全賴江的恩賜。可以說，江澤民在鞏固權力上的成功只是在黨內鬥爭方面，而在民意支援方面，從他成爲真正的「江核心」之後，利民利國的事幾乎沒做，而利己利家的事則成就斐然。他不僅在黨內的權力鬥爭中占盡先機，而且對家族的貢獻也頗爲豐厚。但是，只靠權力和金錢的收買，而沒有法治和道義的依託，效忠肯定是靠不住的，至

多是利益交換的權宜之計。這樣政治上的私人忠誠，無疑是建立在暫時的利益結盟沙灘上的城堡，一有風浪衝擊，便會瞬間崩潰。

這種權力的脆弱最好的證明就是江澤民的恐懼。作爲第三代核心的一切春風得意，都被惶惶不可終日的恐懼感所抵消。爲了防止法輪功的抗議，他幾乎動用了全國的專政工具，並以此作爲各級官員的政績治標，他在國內巡行，所到之處的保安之嚴密，達到了五步一崗、十步一哨的程度。他一出國訪問，就要事先知會接待國政府和中共大使館，以防止民眾對他的抗議，不僅是去西方，就連他去柬埔寨也遭到了抗議。能否阻止和減少這類抗議活動，也作爲使館官員的政績考核標準。2000年年底，他出席澳門回歸一周年慶典，機場上有北京中央警衛局的人和澳門要員保護組的人，層層包裹著江澤民。他抵達澳門前和他在澳門的所到之處，澳門、香港、大陸三地的警方和保安人員，嚴格封鎖可能出現的抗議活動。最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大陸海軍的艦艇在外海閃現，廣東公安邊防部隊的快艇在澳門港外水域巡邏，回歸慶祝活動場地對面的水面，有澳門水警輪駐泊。誰會相信，如此草木皆兵，竟是一個自稱自己統治的國家安定繁榮的元首，光臨自己統治下的一個自治省！

現在，他又陷入了由十六大的權力分配而引發的執政黨內部的爭權奪利之中，接班人危機又一次凸現。集黨政軍大權於一身的江澤民，爲了鞏固其最高決策者的地位，早在中共執政五十年大慶時已經做了精心的安排——檢閱三軍和把自己的畫像排在毛、鄧之後。隨著十六大的接近，江澤民既在組織上(法統)通過其心腹曾慶紅操控人事安排，又在意識形態上(道統)大樹以「三個代表」爲核心的「江澤民學說」，以便在權力分配方案塵埃落

定之前，占盡法統和道統合一的先手。如果「三個代表」成功地被黨內認同爲馬列主義、毛思想和鄧理論的道統繼承者，那麼江澤民作爲中共法統最高權力的佔有者也就順理成章。

然而，即便在中共統治的強人時代，其最高權威也呈遞減趨勢。第一代超強人毛澤東可以隨意選擇任何一個人來接班，如王洪文或華國鋒，而不必在意黨內慣例及他們的黨內資歷和現任職務；第二代強人鄧小平就要受到中共元老幫的鉗制，無法像毛那樣隨心所欲，但是他仍然有在江澤民、李瑞環、陳希同等政治局委員中欽定接班人的權威。現在，強人時代結束了，絕對權威的真空改變著中共權力傳承法統的遊戲規則，造成了黨魁欽定接班人權威不足的局面。江澤民作爲中共第三代的核心，決沒有毛澤東和鄧小平的一言九鼎的權威，欽定接班人的權威嚴重不足，以至於他想把心腹曾慶紅推上政治局正式委員的努力皆以失敗告終。十六大的權力分配上的傾斜，主要取決於黨內各派之間的利益交換和玩弄合縱聯橫的權謀技巧。

對江澤民來說，無論他在輿論造勢、黨羽培植和利益收買等方面的準備如何充分，想連任或通過欽定接班人的方式延續自己的最高決策權，都不是輕而易舉的事，十六大的權力分配肯定有一場惡戰，帶有更明顯的沒有主義而只有利益交換的犬儒色彩，每一次重大的高層決策都要經過反覆的討價還價，才能勉強地達到利益均衡，何況像十六大這樣權力分配的重頭戲，高層的權力鬥爭將更爲激烈和半公開化，肯定是你死我活的爭鬥和一系列陰謀的舞臺。隨著十六大的臨近，圍繞著權力分配的角逐會愈演愈烈，反對江澤民連任的黨內爭鬥和民間呼聲已經半公開化。他繞不過這次權力交接的難點：鄧小平開創的廢除終身制在十五大上

已經成爲中共高層及全黨的共識，在鄧小平欽定的執政期限逼近之前，反對江澤民連任的力量在廢除終身制和任職期限的遺訓下聯合起來，實乃名正言順。何況，江澤民本身的政績，還不足以贏得廣泛的民意支援和黨內威望。他可以充分利用的資源，只有十年來他培植的黨羽和籌備十六大的主導權。

無論從個人利益的角度還是從公共利益的角度，政治局常委們都有充分的理由反對江的連任。朱鎔基和尉健行，既有遵守黨內承諾的合法性優勢，又有遠遠超過江澤民的民望；朱鎔基以其決不戀權的一貫坦蕩，堅決反對超齡的政治局常委連任；李瑞環以年齡的優勢和在民間的開明形象爲資本，挑戰謀求連任的江澤民；胡錦濤有年齡和隔代欽定的雙重優勢，是江澤民的力量難以壓倒的；李鵬則完全根據本人和家族的私利考慮來確定自己的傾向；唯一緊跟江澤民的李嵐清不足以構成最高決策層的多數。還有，喬石等元老要求現任的政治局常委遵守十五大作出的退休承諾；黨內的毛派以正統自居，如鄧力群等人，會像不斷發表的反改革「萬言書」那樣，以毛澤東的遺產爲王牌向江澤民施壓。

對江澤民謀求連任的最具道義性的挑戰，來自黨內的自由派如趙紫陽、李慎之、鮑彤、李銳、朱厚澤等人，李慎之老人寫於中共執政五十年大慶後的《風雨蒼黃五十年》，以自由主義的道義優勢和不畏強權的勇氣與良知，向個人獨裁的皇帝夢和一黨專制發出尖銳的挑戰；中共前總書記趙紫陽則具有深厚的黨內和民間的雙重道義資源，只要他還健康地活著，黨內和民間都會有持續不斷的要求爲他平反的呼聲。最近，胡繼偉已經公開向江核心發出挑戰，要求爲六四和胡、趙平反；何況，即便從中共權力傳承的合法性的角度講，八九運動中解除趙紫陽的總書記職務和江

澤民接任總書記，都是以鄧小平爲首的元老集團的人治決策，在程式上不符合中共的組織原則，根本不具有黨內的合法性。這一切，無疑都形成了對江澤民權力的巨大政治挑戰，加之由強力反腐敗所造成的權力鬥爭的複雜局面和社會的不滿、矛盾的愈演愈烈，六四的舊冤未平又添上了法輪功的新怨……

面對權威不足和多方面挑戰的江澤民，要想在後強人時代保住自己的核心地位，靠的主要不是權威，而是宮廷鬥爭的謀略和政治權力再分配的平衡術。如果江澤民不顧重重阻力而強行謀求事實上的連任，中共十六大的接班人危機就很可能演變成又一次全社會的大動蕩。這種接班人危機是專制體制在權力交替過程中的必然。在中國，執政者一向把最具有公共性的資源——政治權力——作爲黨派的、家族的或私人的財產，過去的帝王如此，今天中共依然如此。欽定接班人的權力繼承方式就是把公共權力變成私家壟斷的資源，私人忠誠高於公共利益，接班人的選定不是出於社會公益和訴諸公開的公眾選擇，而是通過不公開的暗箱操作或陰謀政治才能完成，每一次新主人的最終登場都類似一次宮廷政變的結果，很容易導致殘酷的權力鬥爭和血腥的社會動亂，即便某一次能僥倖逃過血腥，也無法完全克服接班人危機和權力交替過程中的暴力與陰謀，每一次權力交替都是一場或大或小的危機，毛澤東時代的劉少奇、林彪、華國鋒，鄧小平時代的胡耀邦、趙紫陽，都是有目共睹的接班人危機，文革和六四的血腥暴力就是這種危機向社會轉嫁的最好例證。所以，中共的體制本身就隱藏著周期性的根本性的政權危機，政治強人如毛、鄧，尚不能避免這種危機的一次次重演給民眾和國家造成的巨大劫難，何況江澤民已經不可能再成爲中共的又一代強人了。

其實，以江澤民現在的權力和地位而言，他甚至不必具有政治良知和歷史責任感，只要他具有名垂青史的個人政治成就感、中等的政治智慧和一定的政治魄力，完全能夠開創政治改革的新局面，既彌補了過去的非法上臺和執政劣蹟，又使自己不光彩的執政開端有了一個光彩照人的結束。何樂而不爲呢！現在，留給江澤民能夠開創歷史新紀元的時間已經極爲有限，雖然他在1998年已經錯過了本該大有作爲的絕好時機，但是現在他仍然不是沒有機會。明年是十六大的權力交替的關鍵時期，對全國人民做一個負責的有政治魄力的退位交代，是千載難逢的黃金時刻。

如若不抓住這可以名垂青史的最後時機，那麼，在十六大之後，即便他還可以繼續做軍委主席，但是他不可能具有鄧小平式的主導最高決策的權威。而主導最高決策的權力一旦喪失，江澤民就再沒有什麼機會成就他想成爲大國領袖的個人野心，也更沒有機會彌補他的執政劣蹟了。

對於江核心來說，決不是客觀條件扼死了政治改革的咽喉，而是陳舊的意識和貪戀權力的恐懼，窒息了執政者的政治創新的意願。

2001年2月14日於北京家中

強盜式資本主義

——權貴家族與政治改革

權貴家族的形成

中共的權貴家族發軔於是八十年代中後期的「官倒」大潮，鄧小平長子鄧樸方的康華公司是其代表(趙紫陽在六四中的悲壯表現所留下的道義形象，使民眾或忘記或寬容八九運動的「反官倒」的鋒芒所向的大人物之一，就是趙家子女)。接著就是九十年代初房地產熱的「圈地運動」和股票熱的「原始股運動」，以鄧小平次子鄧質方、陳雲的女兒陳偉力、王震的公子、葉劍英的公子以及李鵬的老婆和兒子、陳希同的兒子等眾多中共元老級和現任政治局高官的太子黨人物爲代表；現在又是方興未艾的上市公司和新經濟的熱潮，在圈地運動和證券熱中已經發了大財的老權貴家族和急欲抓住暴富機遇的新權貴家族都紛紛投身資訊產業，這次的龍頭老大非江澤民之子江綿恒莫屬。

在改革開放的二十多年中，中共的壟斷特權造就了遍布各個

等級的大小權貴家族。舉其榮榮大者就有：元老們生出鄧氏家族、葉氏家族(葉劍英)、陳氏家族(陳雲)、王氏家族(王震)、聶氏家族(聶榮臻)、薄氏家族等；新貴們生出江氏家族、李氏家族(李鵬)、劉氏家族(劉華清)、陳氏家族(陳希同)以及各級官員大小不等的家族。與廈門遠華特大走私案相關權貴就有上百個，最近暴光的瀋陽市兩紈綺子弟綁票案所牽涉的權貴，僅這兩大腐敗案大概又要使二個省城的領導層大換血了吧。

1949年中共執政後，依靠手中的絕對權力強制性剝奪全民資產，積累了鉅額黨產，1979年開始的改革開放在某種意義上就是權貴們瓜分黨產的過程。特別是1992年之後，在利益的重新分配中又名正言順地開闢了一個「特種行業」——各級黨政部門以及軍隊、武警、公安、司法全部下海經商，而中共權貴家族恰恰在其中握有大權。比如在官、商雲集的廣東，中央一級的黨政系統、軍隊、武警、國政法系統、群眾團體(全國總工會、全國婦聯、團中央)僅在廣州、深圳、珠海三地公開挂牌的經濟實體就高達1500多家，要是加上中央以下的各級黨政軍法以及群眾團體等系統在這裡辦的經濟實體，那將是一個天文數字。就連中宣部、文化部、教育部以及高等院校、研究所這樣的清水衙門，現在也都變成了經濟實體和利益集團了。這種「有中國特色」的現象，在大陸的每一個經濟比較發達的地區，都有程度不同的泛濫。在這些經濟實體中，當然是來自最高層權貴家族的公司，門面最氣派、實力最強大，因爲它們的權力背景最深。

大陸中國最高人民檢察院反貪局副局長徐海法宣布：自1994年至2000年的六年間，反貪機構共查辦貪污賄賂等腐敗案件27.7萬多件，縣處級到省部級幹部犯罪13678人，省部級幹部就有21

人。每個官員的背後都有一個家族在商場上淘金，並與其他權貴相勾結，形成了巨大的關係網。在中共不但壟斷著腐敗的特權、而且壟斷著反腐敗的特權的現存體制下，當局公布的資料只是冰山的一角，沒有被暴光的黑幕裡，不知還有多少個大大小小的權貴家族集團。據境外媒體報導，成克杰被處決之後，在一次中共高層的內部會議上，保了六十四個有問題的省部級貪官。

不用再多舉例證，中共的大小權貴家族暴富就足以透視出整個大陸權貴們的現狀。近些年暴光的大型腐敗案，儘管在表面上大多只限於省部級官員(陳希同和成克杰例外)，但是誰都清楚每個大案後面的高層背景。比如沈太福非法集資案就涉及鄧小平的女兒、李鵬的妻子；湛江非法集資案涉及整個北京市委；陳希同貪污案涉及到李鵬家族；廈門遠華走私案涉及政治局委員、北京市委書記賈慶林及其妻子，前政治局委員劉華清的女兒、兒媳。再如，原任廈門市委書記、現任省委副書記的石兆彬的太太，現任省委副書記趙學敏的兒子；省委副書記何少川的女兒等，皆因腐敗案被捕。剛剛審理的廳級幹部蔣豔萍的腐敗案，她的家族——母親、弟弟、妹妹和姘夫——全部捲入其中。中共紀委的辦案人員都感歎說：家族腐敗是近幾年的一個突出特點。

作爲名義上的全民資產的各級代理人，從中共執政那天起就把全民資產當作一黨私產來經營。毛澤東時代，他們在一個政治烏托邦的引導下，通過絕對的權力，任意處置、浪費和揮霍著全民資產，毛澤東想做共產主義盟主的個人欲望，就能夠發動勞民傷財的大躍進，浪費幾千億資產，讓千百萬無辜的人活活餓死。毛澤東想整肅政治對手和塑造共產主義新人，就發動文化大革命，不僅冤獄遍地，而且造成了五千億到七千億的財產損失。被

國內外一些經濟學家稱之爲自上而下的通過強制國有化來實現現代化的模式，實際上是完全不顧人的基本權利、尊嚴甚至死活的「屠夫現代化」。在鄧小平時代和江澤民時代，他們又是利用手中的權力把全民資產(黨產)變成家族的私產。其實，用「太子黨」來稱呼權貴們的家族集團已經不恰當了，應該用「家族黨」來重新命名，因爲不僅是太子們，更是夫人們以及所有親朋好友們，一起優先進入贏利回報最佳的市場。中央有中央一級官員的家族黨，各級地方的黨政衙門有地方一級官員的家族黨，甚至一個縣一個鄉一個村都有各自的家族黨。權力有多大，這些家族黨就可以把自己的發財資源擴張到多大。不僅中共執政者的家族集團，就連坐上高位的民主黨派人士的家族，也在急遽擴張。比如榮氏家族的中信公司，從組建那天起就是權貴家族的聯合體；再如亦官亦學的人大常委厲以寧，也是老婆、兒子和兒媳一起下海經商，在短時期內積累起鉅額財富(厲氏家族的深圳市延寧發展有限公司，註冊資金就高達六千八百萬元)。

權貴家族與權力托拉斯

國內大權力和國外大資本之間(如江綿恒與王文洋)之間的結盟，權力與權力(如鄧質方與周北方)之間爲了積累資本的結盟，又使其權力資本擴張爲「權力托拉斯」。任何一個被揭出的大型腐敗案，都要牽連到一個「權力托拉斯」，涉及到黨政軍、公安、司法、工商、稅務、海關、銀行等各個權力部門。如果說，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壟斷是「大資本托拉斯」，那麼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壟斷就是「權力托拉斯」。前者的壟斷通

過激烈的市場競爭，後者的壟斷通過你死我活的官場爭鬥。鄧小平之女鄧榕在談及王震一家時曾毫不隱諱地說：「我和王家三兄弟，便成了無話不談、無事不商，困難之時甚至可以兩肋插刀的莫逆之交。」葉劍英的次子葉選寧用岳楓的化名任會長的「國際友聯」就是權貴家族的俱樂部，鄧小平、王震、楊尚昆、譚震林、鄒家華等人的子女都在「國際友聯」中佔據一個位置。

以政治權力爲核心的家族壟斷性利益集團的形成，完全是官本位的中國特色改革的結果。在由「以階級鬥爭爲綱」向「以經濟建設爲中心」的轉型過程中，執政黨集團始終主宰一切。這個集團握有最大的公共資本——對經濟資源、政治資源和文化資源實行全面壟斷的權力，包括對社會公共資源進行再分配的主導權。中共叫做「國有資產」，實際上是「黨產」，即把全民資產通過壟斷的政治權力轉化爲一黨的私產。這是毛澤東留給執政黨權貴集團的最大遺產，不僅是特權制度，而且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經濟資源。這筆鉅額遺產的積累，完全來自1949年中共執政後對民間資產的強制性剝奪。「三面架機槍，只准走一方」的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使執政黨依靠專政機器完成了黨產(所謂的國有資產或公共財產)的原始積累。這是世界上最迅速最徹底也是最血腥的資本積累，以至於在大陸中國的廣闊版圖內，沒有一寸土地和一分錢是民間的私人資本。幾乎是一夜之間，農民對祖祖輩輩生活於其上的土地不再具有所有權和支配權，商人和企業家通過幾代人的創業而積累的財富變成了執政黨的資產。他們曾經是私有財產的合法擁有者，不但在中共執政後失去了合法性，失去了財產，而且有太多的業主本人及其家族的生命都無力保住。當每個人的基本生活必須仰仗於政府之

時，人就等於被剝奪了一切，只能充當馴順的工具和奴隸。

正是依靠這樣野蠻的原始積累，毛澤東及其中共才自信有資本有能力同時對抗美、蘇兩個超級大國，才不顧老百姓的死活使自己成爲少數幾個核大國。蘇聯爲了對抗美國，把國民生產總值的25%以上的資源用於軍備競賽。雖然大陸中國用於軍備的經濟資源沒有確切的統計數位，但是決不會少於蘇聯的比例。毛澤東爲同時抗衡蘇、美，發動「備戰備荒」的全民運動，浪費的程度已經達到隨心所欲。現在，由於海峽兩岸之間的僵持，中共執政者又開始走毛澤東的老路，江澤民一心要做大國領袖，一群知識精英再次鼓吹強國戰略，因而使這幾年國防開支劇增，僅從俄羅斯購買武器一項，就高達二百億美元。而且沒有徵得納稅人和人大會議的辯論和批准，幾個常委甚至就是一個軍委主席的大筆一揮就撥款了。

作為中國特色改革產物的權貴家族

無論從道義上講還是從效率的角度講，在毛澤東遺留的制度背景下進行經濟改革，其首要目標都應該是還歷史的舊帳——還產於民，而不應該是單純的提高經濟效率，最起碼，應該是還產於民和提高效率同時進行，就是不學蘇東式的一步到位的「休克療法」，起碼也要像當年威權體制下臺灣的土地改革(贖買型)和民營化(政策優惠型：信貸、外匯、稅率的三優惠)那樣。而我認爲，以毛澤東時代的中共所犯下的罪惡和所造成的財產揮霍來說，大陸的改革應該在保證個人應得權利的基礎上進行，即便像蘇東的改革那樣，以經濟效益的暫時損失來換取每個人應得權利

的歸位也在所不惜。從長遠的利益計算著眼，蘇東式的「社會公正優先」的改革所付出的社會綜合成本，肯定要比大陸中國式的「經濟效益優先」的改革小的多。蘇東是用暫時的經濟效益上受損的成本，換取了一步到位的政治上的社會諸權利平等；大陸中國是用經濟上的效益高增長來維護政治上的社會諸權利的不平等。其結果是，蘇東的社會轉型不僅在個人權利方面和綜合的社會效益方面獲得了根本性制度保障，而且在經濟效益方面也達到了長遠利益的保障。而大陸中國的社會轉型只有暫時的經濟效益高增長，而且這種高增長的最大受益者又是占不到總人口5%的權貴們(他們把占國民生產總值20%的財富據爲己有)，而付出的代價卻是占總人口95%的弱勢群體的利益受損，進而是綜合社會成本的超常高昂：競爭的嚴重不平等、分配的畸形不公、人權的沒有保障、政治的普遍腐敗、道德的徹底淪喪、政權合法性的急遽流失、社會仇恨和社會不穩定的幾何級數式積累……

換言之，由計劃經濟舊體制向市場經濟新體制的轉型，在根本上不是一個單純增量改革的舊體制局部調整的過程，而是一個由非人性制度向人性制度的轉變過程，是政治制度、經濟制度和文化制度的同步漸進式改革。這種改革的目標應該是：既有規則的平等又有效益的提高，既有個人致富又有社會公正，其關鍵的第一步是還產於民，使私有產權在法律上得到明確保障，使傳統的所有者缺位轉變爲所有者歸位，因爲它既能夠使應得權利歸位又能夠提供良性的利益激勵。所以，應該是交易的市場化和所有權的私有化的同時進行，即便採取漸進的方式，也應該是二者的同步漸進，而不應該在不改變黨有制的基礎地位和所有權的歸屬真空的框架內，只進行以提高經濟效率爲目標的單項增量改

革——下放有限的管理權和有限的市場調節。這樣的修修補補的改革必然導致壟斷權力對市場的控制，使改革變成掌勺者私分大鍋飯的權貴私有化和代理人尋租式腐敗的制度化普遍化，也就是權貴的既得利益越來越深的制度化，使政府提供「善政」或公正規則和客觀裁判的功能急速喪失，使本來作爲社會公器的政府變成極少數權貴牟取私利的私具，使政府提供的所有公共產品的實際最大受益者皆是極少數權貴家族。

公器一旦變成私具，公共資產就變成了特權者的個人私產，權貴們和各級代理人從這種所有權缺位的增量改革中撈取的利益越大，維護舊體制的頑固阻力就越大，建立新體制的難度也隨之遽增，以致於最後形成一種最大受益獲利集團之間的剛性同盟，非經過暴烈的社會革命而無法打破。到了這一步，就是死結，解開這個結也就意味著社會的全面崩潰。

現在，改革已經進行了二十年，但在還產於民(應得權利歸位)的制度改革方面幾乎沒有實質性的進展，即產權改革仍然沒有進入實質階段。在立法方面，雖然1999年的修憲進一步明確和加強私營經濟的地位，但是私有財產的合法性並沒有明確到所有權的層次，仍然沒有作爲不可侵犯的神聖權利寫入憲法。憲法上只有「國有(公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而沒有「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這種對私有財產權利的憲法歧視是一切相關法規歧視私營經濟的最高法律依據。只要這種憲法性歧視不變，整個制度對私營經濟的歧視、政權對個人的控制和抽象的整體利益對個體權利的扼殺，就不會有根本的改變。

在現實中，產權關係就更不清晰。七十年代末開始的農村家庭聯產承包制已經有二十年的歷史，開始於1984年企業的所有權

和經營權分離改革已經有十六年了，1992年開始的房地產行業的土地使用權交易改革也有近十年了……但是，這些改革直到今天仍然沒有進入實質性產權改革的階段。嚴格的講，它們只是政府把所壟斷的所有權面向社會的部分租賃，農民、企業法人和房地產開發商以及商品房的購買者，只是土地、企業、房產的承租人，而不是產權的擁有者，政府仍然握有隨時收回的強制性權力，一句「國有資產流失」就能中斷租賃合同，使承租者血本無歸。

以「青天」著稱的朱鎔基就任國務院總理之後，在所有權改革方面，喊的最響的改革口號居然是大言不慚的確保「國有資產的保值增值」和「國有資產的運營安全」，而對私營經濟資產的保值增值和安全運營卻漠不關心，對國有資產的產權的未來歸屬，仍然沒有明晰的可操作的處置方案。在最近發布的「十五計劃綱要」中，朱鎔基還信誓旦旦地宣稱：要切實保證國有經濟的主體地位，決不能把國有資產量化到個人。這就等於是在宣布，在中國加入WTO的五年準備期內，權貴們仍然享有優先瓜分國有資產的特權。在中國的體制下，不把國有資產公平地量化給個人，就只能意味著把所剩無幾的國有資產不公平地量化給權貴們。

作為最大受益集團的權貴家族

正是中國特色的官本位改革，使改革的最大受益者都聚集在政治權力的周圍。在改革的全過程中，每一次利益再分配的擴大，他們都是最大的受益者。恢復高考，他們個個都是狀元；平反冤假錯案，他們得到了最優惠的補償；放洋留學，他們想去哪

就去哪；包產到戶，農村的各級政府官員最先擺脫貧困；放權讓利，他們要權有權要利有利；價格雙軌制，他們是最大的倒爺——官倒；房地產熱，他們握有土地審批權和優先的廉價購買權以及炒地權；炒股票，他們得到白送的原始股和大量別人不知道或晚知道的資訊；建立市場經濟，他們有優先的甚至排他的准入證；企業上市，他們都是上市公司的董事長起碼也是董事會成員；甚至在國營企業的脫困中，他們也佔據著最有利的位置，把剝離掉的不良資產轉嫁給社會弱勢群體，把正常上市的或通過債轉股上市的良性資產據爲己有。新經濟興起，他們就紛紛搶先進入，佔據最優勢的位置和最大的市場份額，他們嚴格控制市場，率先得到與境外新經濟巨頭合作的機會，江澤民之子江綿恒就是最典型的實例。還有收不完的「權力稅」，從進出口批文到企業上市，從承包工程到個體書商向出版社買書號，幾乎沒有不受權力操控的市場，找不到沒有准入歧視的行業，政府主管部門既當運動員又當裁判的准黑市遊戲規則主宰著所有經濟行爲。

這些權貴家族所瓜分的全民資產，據官方學者統計平均每年爲9,875億～12,570億之間，占國民生產總值的13.2%～16.8%。而民間學者認爲，最保守的估計也要占到整個國民生產總值的20%。即便不算上每年以將近400億美元的流失速度轉移到國外的資產，僅就國內銀行中六萬多億的存款而論，其中的80%歸富人們所有。再加上吃喝等消費揮霍每年三千億到四千億資產，權貴們在中國的財富中所佔有的總額，將是一個無法想象的天文數字。現在，中國的貧富差異之懸殊已經遠遠超過了國際警戒線，民間調查的基尼係數高達0.59，而國際警戒線僅爲0.4左右。

最近，爲了加強對股市的監督和規範，朱鎔基請來了香港的

金融專家，但是，一種制度性的頑疾，決不是增加幾個廉潔的技術官僚就能醫治的。以朱鎔基爲代表的廉潔勤政的監察官員，不但人數少得可憐，而且他們只有所剩無幾的道義優勢和無法動員、無法利用的民意支援，而那些腐敗的權貴家族卻擁有難以比擬的制度依靠、人際資源和資訊優勢，他們通過官官相護和欺上瞞下的手段來謀取私利的效益之高，甚至培養出一種官場上的賭徒人格，下注之兇狠可以不顧任何後果。而一朝得手便能夠一通百通，幫助他們在官場競爭中獵取更高的權力，編織更大更深的關係網和保護網，獲取更大的私利。

這樣，中共體制內的每個官僚都處在以權謀私、一本萬利的暴富的誘惑和激勵機制之中。想在這樣的體制中遏制這樣的腐敗，即便沒有道義上的阻力而僅僅從技術上也是不可能的，就是傾盡政府財政招攬監督人員和優化監督技術也是難以完成的，因爲腐敗的最大受益者恰恰是各級代理人和監督者。而政治參與渠道的阻塞、獨立司法的荒蕪和言論自由的缺席，則使受損最大監督欲望最強的社會弱勢群體被排除在參與權、監督權和知情權之外。

當一個社會的腐敗案件的公布權、調查權和懲治權都控制在執政黨手中時，不但腐敗成爲權貴們的專利，而且反腐敗也是權貴們的特權，怎麼可能取得治本的效果。另外，道德的淪喪，導致人人渴望能夠腐敗的特權，人人都是潛在的腐敗者，民眾對腐敗的強烈不滿，不是基於正義，而是基於「吃不著葡萄說葡萄酸」的嫉恨心理。民間自發的反腐訴求缺少道義的支撐，恐怖政治之下的風險和利益計算，使民眾無法形成持續的群體性的反腐壓力。而極少數敢於承擔風險的道義之士的挺身而出，不但得不到

政府的保護和支援，而且也得不到民間的公開而廣泛的持久支援，他們的義舉受到嚴酷的打擊和鎮壓就是必然的。

十年前，高新和何頻合著的《中共太子黨》一書，在海外很暢銷，連續十幾次再版。這本書在港臺成爲資本家來大陸市場做生意的進入指南。現在，隨著新太子們取代老太子，中共的權貴家族的權力與資產的規模又有了迅速的膨脹，形成了蜘蛛網一樣權貴家族利益集團。正是在這張網中，那些結網的關節點即呈現於每個大陸人眼前的執政精英，利令智昏的豬哲學使這個執政精英集團整體性地陷入喪心病狂的富貴攀比之中。每一個當官的後面，都有龐大的關係網，爆發戶式的家族資本積累，就在這張網中完成。這是一個絲絲相連的蜘蛛社會，其綱舉目張之綱，就是政治權力。而政治改革必然要觸動這種權力，也就等於是要剝奪權貴家族所享有的各種特權，還有變天過程中或變天結束後被清算的恐懼感，即便執政者本身有改革之心，家族利益也決不會允許。他們怎麼可能主動放棄能夠輕易地佔有國民生產總值的20%財富的特權。

主動洗刷罪惡是權貴家族的唯一出路

所以，大陸轉型的成功與否，取決於執政精英及其權貴家族與民間的一批有理性的自由主義精英和極少數有良知的執政精英之間的合作，一方面進行廣泛的理性啓蒙，呼籲民眾的理智和對未來收益的遠見，以不清算權貴們的不義之財來換取執政精英對政治改革的承諾；另一方面從現在開始，權貴們把他們的不義之財通過投資公益事業逐漸向社會返還，通過建立完善的社會福

利體制，確保弱勢群體的基本利益。同時著手建立公正的市場規則和分配規則，使剩餘國有資產的再分配具有權利平等的社會公正性，使致富者的財富具有充分的法律保障和起碼的道義辯護的理由。用索羅斯勸告俄羅斯的話說，就是怎樣把「強盜資本主義」轉變爲「合法資本主義」；著名經濟學家張五常也曾勸告中國，要搞就搞「自由資本主義」，而不要搞「國家資本主義。」

然而，必須指出，在中國的制度背景下，這不是那種類似西方的基於人道的慈善事業，不是權貴們大發善心，而是掠奪者基於自身長遠利益的計算而進行的交易，即向被剝奪者償還歷史欠帳，以求得自己的財產安全和長遠的保值增值。當然，如果權貴們真有道義上洗刷罪惡的良知和人道之心，那是應該大力提倡和給予社會鼓勵的。

現在，隨著可以帶來暴利的房地產市場和資本市場的回報逐漸萎縮，隨著可以被瓜分的國有資產越來越少，政治特權和壟斷行業給權貴們帶來的預期收益也隨之降低，加之官場上權力爭鬥的險惡，利用經濟犯罪置政治對手於死地的手段之運用越來越頻繁，已經發了大財的權貴們基於長期的利害計算，基於對財產及生命安全的恐懼，未必不擁護政治改革。如果能夠把黑錢洗淨，如果政治改革可以不追究其資本積累的罪惡，推進政治改革對他們來說肯定是利大於弊。而避免追究的最佳方式，就是權貴們主動地實施政治改革。在這樣的背景下，不必有多大的良知，只要有足夠的智慧，就能通過長遠利益的計算，得出必須推進政治改革的結論。

否則的話，由於大陸的權貴們在瓜分和積累財富上過於濫用權力和肆無忌憚，使最廣大的弱勢群體受到了太不公正的對待，

權貴們手中的鉅額資產沒有任何可以從道義上進行辯護的理由，一旦出現局部失控，極有可能使任何理性的、對未來負責的和解呼籲，被民眾長期積壓的不滿所演化出的普遍非理性仇恨和急功近利的短視所淹沒。「新左派」、極端民族主義、國家主義和傳統毛派就會借機高舉民粹主義的大旗，利用民眾長期積累的不滿和仇恨，進行再一次毛澤東式的革命，全面回歸傳統舊體制。

換言之，在人們的利益意識覺醒之後，中共在利益重新分配中的牟利方式，正在成倍地積累社會的不滿、仇恨和高昂代價，而積累仇恨就是種植和培育爆炸性動亂。中共的統治方式正在製造自我毀滅也毀滅他人及整個國家的力量。

也許，中共政權還心存僥倖，以爲在中國的傳統中，古代帝王統治的一個朝代大都能延續幾百年，爲什麼我黨不能？但是，古代帝王的統治是建立在三個起碼的前提上的：1. 完全封閉的對外關係，使其體制受不到任何外來體制的挑戰，因而其政權沒有在開放的對外關係中的那種國與國之間相互競爭的壓力——實力競爭和制度競爭。中國舊體制之所以在被迫打開國門後迅速崩潰，主要原因不是國內的精英和民眾觀念的迅速現代化，而是外來的競爭壓力使然。當人們在不同制度之間的競爭中發現了自身制度的落伍和更優越的制度時，傳統制度的瓦解也就開始了。同時，全封閉的時代，你可以關起門來胡亂折騰，可以按照統治者的意願自說自話，但是只要進入了全球體系，就必須遵守國際規則和全球倫理。現在的國際規則的倫理基礎是「人權至上」，《聯合國憲章》和《世界人權宣言》就是這種全球倫理之體現。2. 小農經濟基礎必然逐漸瓦解。傳統帝制是建立在分散的小農經濟基礎之上的，而一旦進入世界競爭體系，國家之間的國力競爭主要

在現代的工業、高科技、金融業、服務業和資訊產業之上，不管願意與否，要應對外來的挑戰和競爭壓力，就必須放棄傳統的小農經濟而選擇工業化、金融化、高科技化。事實上，中國一百年的現代化就是工業化的過程，中共執政後引以爲自豪的經濟成就也是初步地建立了完整的民族工業體系。所以，在小農經濟逐漸消失的現代化過程中，傳統帝制也將失去長期存在的基礎。3. 大一統意識形態的失效。自從中國第一次打開國門後，傳統的意識形態的觀念整合能力便急遽流失，五四運動使這種量的急遽流失變成了質的意識形態更替，在外來觀念紛遝而至的混亂中，中國人最終選擇了馬列主義的中國版——毛澤東思想。那時的中國人，還並不真正瞭解西方的自由、民主、憲政、人權、議會、三權分離等觀念及其制度安排的真義，毛澤東及其中共用一套民主的華麗辭藻和人間天堂的烏托邦說服了民眾，再次採用暴力強制、閉關鎖國的全封閉模式和大公無私的新人說教來維持著獨裁體制。但是，毛澤東時代的災難也再一次促使中國打開國門，再一次面對落伍的現實和國際競爭的壓力，再一次在國與國的制度競爭中進行選擇，而這次選擇的背景是毛澤東時代的大災難。虛僞的民主裝潢、虛幻的人間天堂和共產主義新人理想統統破產，加之二十世紀末共產主義試驗的全球性失敗，中國人對西方現代觀念的接受和理解已經達到難以被欺騙的程度，中共只能靠暴力所製造的恐懼使人們做到表面上的認同，而在內心深處卻向往自由、民主、平等，特別是人們權利意識的覺醒，使中共的意識形態越來越缺少吸引力了。

國門不可能再關閉，小農經濟不可能再成爲統治的社會基礎，大一統的意識形態不可能再有道義上的說服力和凝聚力。

當中共統治的意識形態的說服力和合法性喪失之後，當人性由無私奉獻的工具還原爲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理性人之後，市場經濟、私有產權和憲政民主等制度的優越性就越來越具有吸引力。自由競爭——不僅是市場經濟，也是政黨之間、學術創新之間、倫理規則之間、思想觀點之間、宗教信仰之間的競爭——所爭的是如何以更完善的法治秩序更好的保障人的基本權利和尊嚴，如何以更低的成本創造更高的效益，從而更充分地挖掘人的創造力和滿足人們的需要。對人的自利本性的正視、理解和尊重，一方面把利益的競爭變成了刺激人的創新能力的競爭，降低成本和提高效益的競爭，技術創新和制度創新的競爭，正是在這種良性的競爭中，社會總體生產能力會隨之提高。另一方面，把個人與政府之間的關係變成了主人與公僕、股東與雇員之間的關係，把政客之間、政府之間的競爭變成爭取民意、降低管理成本的和平競爭，政客越來越尊重民意，政府越來越便宜高效，政治制度越來越具有人性。於是，道義合法性和利益計算之間、社會公正與效率之間達成了良性的平衡狀態。對局部失衡也不必被迫地以大動干戈的強權暴力或革命來恢復，只需要自覺的持續不斷的漸進改良就足以完成。

當對人的各種權利的保障越來越趨於完善，人的創造力的發揮空間越來越自由，人們的生活和福利越來越提高之時，國家的綜合實力也就越來越強大。世界現代史已經雄辯地證明，西方國家之所以成爲全球競爭中的優勝者，主要不是由於自然資源上的優勢，而是依靠制度上的優勢。制度優勢可以彌補資源不足，使其所具有的綜合實力，遠遠超過其人口規模和自然資源的先天競爭力。反過來，制度劣勢只能造成資源的極大浪費，把本來具有

的資源上的先天優勢人爲地消耗成後天劣勢。

如果權貴家族能夠正視歷史趨勢和身邊現實，從現在開始洗刷其權力和資本相勾結的罪惡，拿出通過肮髒的手段積累起來的鉅額資產的一部分回饋社會，並積極推動以建立「社會公正」爲目標的政治改革，那麼象菲律賓的馬科斯家族和印尼的蘇哈托家族那樣的被清算的命運，還不至於落到大陸中國的權貴家族頭上。因爲。從目前已經完成社會轉型的國家所積累的經驗上看，凡是被清算的獨裁者及其權貴都是被迫下臺的，而主動推進制度轉型的執政者，還沒有受到新制度追究的先例。

2001年3月14日於北京家中

孫中山的遺產

——辛亥革命90周年隨想

尊孫抑蔣有「統戰」的意味

中共隆重紀念辛亥革命90周年，江澤民發表長篇講話，把中共的事業稱之爲繼承孫中山的未竟之志；中央電視臺在黃金時間播放有關孫中山的專題片，稱孫爲「國父」。這些舉動與中共執政後的尊孫抑蔣一脈相承，雖然其中不乏統戰之意，但是在更深的血緣上，中共的暴力奪權和暴力極權，也與當年孫中山的政治作爲一脈相承。孫死後，兩個追隨「槍桿子裡面出政權」的梟雄——蔣介石和毛澤東——經過殊死搏殺，上演了又一齣成王敗寇的傳統戲劇。

在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成功之前，以孫中山爲首的革命黨先後進行過10次武裝起義，均以失敗告終；仍然令今人不解的是，最高軍銜僅相當於連長的幾位軍人的揭竿而起，卻掀開了幾千年帝制徹底崩潰的序幕。之後的中國，有過數次步入漸進改

革、走向現代政黨政治和憲政體制的機會，但是，在每一次關鍵性的轉折關頭，皆爲激進的追求暴力革命和中央集權的力量所主宰，而此激進傾向的源頭就是現在被稱之爲國父的孫文。

宋教仁被暗殺代表內閣制的失敗

君主立憲和革命共和：辛亥革命後，面臨著君主立憲和革命共和的選擇，儘管國內的其他政治力量及知識界的許多名流以及西方各國，都贊成走南北議和、君主立憲之路，但是以孫中山爲首的激進革命黨選擇了武力共和，正如孫文所言：「革命之目的不達，無議和之言也」。而在同盟會內部，在孫文於1911年12月26日到達上海之後，核心幹部討論政府組織形式和總統人選時，發生了「面紅耳赤、幾至不歡」的激烈爭論，宋教仁基於對權力過於集中的憂慮而主張採用內閣制，以實位相權限制虛位君權；而孫中山基於集權的好處而堅持總統制，他提出的理由是「在此非常時代，吾人不能對唯一置信推舉之人，而複設制之法度……而誤革命之大計」。爭論的結果，自然是孫中山贏得了同盟會核心成員中的多數支援。在隨後的各省選舉中，孫中山以17省中16票的絕對多數當選「臨時大總統」。

法治秩序和暴力革命：宋教仁被暗殺後，面臨著循法治方式和暴力方式解決問題的選擇，當時的社會環境對循法治方式解決危機非常有利，獨立的新聞媒體已經把袁世凱政府暗殺宋教仁的有關證據爆光於世，相對獨立的司法機構堅持公開傳喚國務總理出庭，即便一直在關鍵時刻站在孫中山一邊的元老黃興，也因堅持應該首先尋求法律解決而與孫出現裂痕。孫中山則不顧國內人

心思定的民意，一意孤行地堅持激進的武力討伐，貿然發動所謂的二次革命，使剛剛具有公開合法性的政黨政治毀於暴力革命的失敗，孫中山再次亡命海外，重建秘密會黨。

聯省自治和中央集權：在晚清的風雨飄搖之際，由於中央權威的統治效力的急遽流失，地方自治獲得長足的發展，四川等地的「護路運動」就是地方抗拒中央的典型案例，辛亥革命之所以一舉終結千年帝制，地方自治意識的覺醒是重要的原因之一。清末的開明人士大都主張地方自治，各省紛紛設立諮議局，辛亥革命之後，各省的立憲派在左右全國政局上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事實上的地方獨立已經使走向聯省自治的聯邦制水到渠成，中央和地方的權力分配問題成爲政制爭論的焦點之一。令人感慨的是，在地方自治和中央集權之爭中，作爲死對頭的袁世凱和孫中山走到了一起，二人皆主張中央集權制。因此，當上了大總統的袁世凱，由當年全力倡導地方自治的開明人物變成了全面限制地方自治的集權者，1914年他裁撤了各省督軍，再把地方選舉各省行政首長制度改爲由中央任命的制度。一向主張集權、一直夢想以武力統一中國的孫中山，與堅持聯省自治的廣東首領陳炯明徹底決裂，最後終於走上了北伐的道路。

孫中山改組國民黨為以黨領政的革命政黨

政黨政治和一黨獨裁：辛亥革命的成功，爲中國的現代政黨政治開闢了光明的前景，同盟會即便不能成爲執政黨，起碼也可以成爲合法的第一大在野黨，宋教仁的努力已經爲政黨政治在中國的大作爲提供了不錯的平臺，可惜隨著年輕的宋教仁被暗殺，

本來就對宋教仁的政黨政治、議會政治和內閣政制不滿的孫中山，更以宋的被暗殺爲理由，開始了激進的二次革命，以革命的獨裁和武力回應袁世凱的反革命的暴力獨裁。當二次革命失敗之後，再次進行組織秘密會黨的孫中山，在俄國的十月革命一舉成功之後，終於看到了他心中的理想政黨形式，那就是列寧式的由一個領袖的主義和權力主宰的一個政黨，再通過這樣的政黨領導武裝奪權，最終達到統治一個國家。

儘管人們一提起孫中山，想到的都是他留下了所謂「三民主義」和「五權憲政」的遺產，但是，對於中國的現實政治來說，他留給後人的真正深入骨髓的政治遺產，是一個國家一個主義一個政黨一個領袖的「黨國體制」，這一遺產的最初繼承人是利用軍事政變奪得國民黨最高權力的蔣介石，最後的繼承人是通過內戰登上執政地位的毛澤東及其中共。按照孫中山死前的一系列政治作爲，如果他能活到可以武力統一中國、君臨天下之時，孫氏天下未必就是他所許諾的「三民主義」和「五權憲政」，極有可能是又一代極權君主，如同毛澤東在奪權時高喊「反獨裁、爭民主」的口號，而掌權之後就變成了「歷代都行秦政事」的獨裁帝王。

今天，孫中山的黨國體制已經在臺灣徹底解體，但是在中共執政的大陸，走出黨國體制的陰影還將有漫長的道路。

2001年10月11日於北京家中

參

時論篇：安慰與恐懼

「嚴打」和大蓋帽的合法傷害能力的擴張

基層政權利用嚴打強行徵稅收費

最近，一位朋友從老家回來，正值又一輪嚴打期間。他在沿途看到許多小市鎮和縣鄉村的公共場合，刷著類似「越級上訪、非法請願，一律屬於嚴打範圍」的標語，基層政權利用嚴打恫嚇住農民的上訪請願之後，還要借助嚴打的特殊時期所獲得的特殊權力，對守法的村民強行徵稅收費，一些非法的稅費也由於嚴打而變成合法的。用一位鄉幹部的話說：趁著嚴打，抓緊提前完成全年的徵稅征糧收費的任務。當然，這其中肯定也有很多部門的和個人的私利可謀。

恰巧，朋友講述的回鄉見聞沒過一周，5月14日的中央電視臺的「焦點訪談」播出了河南省濮陽市清豐縣高堡鄉政府，借助嚴打掃黑之機，下鄉強行徵稅征糧，亂收費、亂罰款，不服者抄家抓人，閉門外出者砸門撬鎖。更絕的是，鄉政府在「重拳出擊

搞嚴打」的口號下，強迫學校停課，並以經濟利益要挾教師參與對村民的嚴打，去與不去、多收和少收，皆與教師的工資、獎金掛鉤。農民們同情這些被逼無奈的老師，也爲了讓自己的孩子早日復課，更爲了家不被抄、家人不被拉進派出所，只能違心地交錢交糧。在短短的幾天內，鄉政府動用大量各部門執法人員，出動車輛幾十台次，強迫近千人次的教師，把嚴打的「從重從速」用於守法的村民身上。「焦點訪談」播出之時，高堡鄉對村民的嚴打仍在進行，那些穿制服的「大蓋帽」們正在逼迫教師們下鄉敲詐，逼迫農民向政府「納貢」。

而且，從5月8日開始「嚴打」由社會治安擴展到經濟領域：①打擊製售假冒僞劣商品、偷稅、騙稅、騙匯、走私、制販假幣等違法犯罪活動。②整頓建築市場。③整頓和規範金融秩序。④嚴肅財經紀律。⑤規範仲介機構的行爲，實行仲介機構市場准入制度。⑥推進文化和旅遊市場整頓。開展「掃黃打非」鬥爭，打擊侵權盜版、製販非法出版物等違法犯罪活動。⑦打破地區封鎖和部門、行業壟斷。⑧強化安全生產管理和安全監察。工商、稅務等部門一起出動，涉及面之廣泛，將使類似高堡鄉的傷害民眾利益的事件不可避免地大量出現。

「從重從速」的尚方寶劍給「大蓋帽」幾乎任所欲為的權力

提起「大蓋帽」，大陸百姓都知道他們是各類具有執法權力的基層官吏。在中國的體制下，各級官員及執法人員的權勢與老百姓的無權無勢，本來就有巨大的不對稱，幾乎就是一方爲刀

俎，另一方爲魚肉。制度保證了執法者對無權無勢者的合法傷害能力，保證了他們經常濫用權力而不被反抗、不受制裁。平日裡，百姓對各類大蓋帽避之唯恐不及，而一到「嚴打」就更令人恐怖，最高決策層授予了各級政府「從重從速」的尙方寶劍，給予了「大蓋帽」幾乎是可以任意所爲的權力。從政府各部門到司法機關、從區域聯防到小腳偵緝隊，從懸賞報案有功者到寬大主動投案者，幾乎是全社會總動員。刑事罪犯被從重從速、快捕快訴地處罰，不夠犯罪的小過失被判爲刑事犯罪，進城務工的農民更是受迫害的主要群體，刑事案件的破獲率成幾倍地翻番，平時長年破不了的大要案迅速告破，在大量罪犯被處以超過平時量刑標準的重判的同時，也造成了大量的冤假錯案。

在新浪網輸入「嚴打」二字，截至5月17日，已經有新聞資訊3207條。請看我摘的下列極爲有限的數位：

廣東在10天內破獲刑事案件8,000多宗，其中惡性暴力事件628起，共有5,485名違法犯罪嫌疑人受到公開處理；廣西在20天裡偵破各類刑事案件7,000多起，查處治安案件15,000多起，抓獲各類違法犯罪人員23,000多人；山東嚴打半個月以來，警方共破獲各類刑事案件6,000餘起，抓獲各類違法犯罪嫌疑人6,000餘名；陝西在嚴打第一天，全省公安機關共出動警力16,770名，車輛2,599台次，共破獲刑事案件334起，抓獲作案成員430名，共清理車站、碼頭、旅社、公共娛樂場所、出租房屋14,507處，檢查要害部位、金融網點、企事業單位等5,083家，整頓治安混亂地區591處，清理整頓特種行業955個；浙江10天破獲刑事案件3,177起，查獲犯罪嫌疑人員8,800餘名；安徽僅5天時間，共清查各類公共複雜場所38,915家，破獲各類案件1,393起；江西10天，破獲

刑事案件6,375起，查處治安案件2,696起，共抓獲各類罪犯7,143人，共清理出租屋15,192戶，清查公共娛樂場所10,079家(次)，網吧984家，旅店17,233家，工地903處；大連市在10餘天中共出動警力35,252人次，盤查可疑人員18,472人次，可疑車輛4,983台次。

看了上面極爲有限的數位，就會理解在嚴打期間，許多家長都告誡自己的孩子晚上少出門，出了門也要盡量早回家，特別是少去娛樂場所，以防被執法人員「合法傷害」。

再看嚴打的「從重從速、快捕快判」的數位：全國的大多數省、市、縣都召開有幾萬人參加的公捕公審大會，遼寧算是這方面的狀元，20多天召開公判大會14場，僅撫順市就當場將9名死刑犯押赴刑場；4月11日，許多省市召開嚴打公開宣判大會，河北公開宣判47名罪犯，溫會強等30名罪犯被依法判處死刑，李曄等17名罪犯被分別判處10年以上有期徒刑、無期徒刑和死緩；哈爾濱市兩次嚴打公捕公判大會，公開宣判重大刑事案件中的53名涉案人，其中43人被依法判處死刑，張連濱等21名被執行槍決；西安市在人民體育場召開嚴打公捕公判大會，牛建民等10名罪犯被判處死刑並執行槍決；鄭州市召開嚴打公判大會，宣判21人，李宗倉等17名罪犯被依法判處死刑並立即執行，其他4名罪犯分別被判處死緩或無期徒刑；福州市中公判了殺人、搶劫、盜竊等7案21人，其中一審判處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14人，7年以上有期徒刑和無期徒刑7人；廣東4月18日公判22人死刑並執行，重判率56.1%；湖南長沙召開四萬人參加公判大會，當場判處18人死刑並立即執行；小小的東莞市審判的重刑率高達97.3%，並在幾天內清查了三無人員4,000人；北京公判大會上執行死刑16人，另有14人被判處死緩、無期徒刑和2～10年有期徒刑。

截至4月20日前，僅新浪網上數位明確的死刑判決就高達161人，還有許多省市的死刑報導無法精確統計；到5月初，此次嚴打，被執行死刑者已經超過400多人，而且還不是準確的死刑上限的統計，相信當嚴打結束時，如果統計起來將會是個讓人目瞪口呆的數位。雲南的一個只搶劫了折合幾百元人民幣的馬克的罪犯被判死刑，如此重判的原因只在於被搶者是德國駐中國的公使。這麼嚴厲的判決連德國人都認爲太過分，向中國有關部門提出了置疑。嚴打期間，僅用一周甚至更短的時間就審結惡性案件並執行死刑了的審判，比比皆是。這樣的嚴打怎麼能夠防止不誤用或濫用法律！

換言之，中共體制最擅長的運動式整頓措施，使這類由制度所保障所鼓勵的合法傷害能力得到超額的成倍擴張。上面提到的高堡鄉政府之所以利用嚴打下鄉強行徵稅收費，就在於他們已經從長期的經驗中知道：嚴打就意味著執法權力的超常膨脹，意味著平日還要有所顧忌有所掩蓋的非法權力，可以在光天化日之下毫無顧忌地行使。

在毛澤東時代，幾乎所有人都處在從未停止過的運動之中，此種合法傷害權力的肆虐達到了無法無天的程度。在後毛澤東時代，隨著經濟利益成爲人們關注的中心，合法傷害便直接與利益驅動相連。每年進行的「稅務」、「衛生」、「工商」、「戶籍」等大檢查，間歇性的「打假」、「掃黃」、「嚴打」等運動，都賦予了政權及其執法者以超法律的傷害能力，「從重從速」的尚方寶劍就是他們進行合法傷害的法律依據。這些運動式的整肅，不僅針對犯罪給予了司法部門更大更靈活的執法權力，也使其他的權力部門有了「搭便車」的巨大空間。特別是針對經常上訪請願的影響

社會穩定的弱勢群體，基層政權借「嚴打」之機進行嚴打。

再看「掃黃」運動。我在幾年前的一天夜裡，曾親眼目睹過執法者們的掃黃戰果。我家離「萬壽路一號」大院非常近，僅隔一條不寬的馬路，據說李鵬等人都住在大院裡面，所以每次有嚴打、掃黃，這裡的路口在夜晚都有嚴格的盤查。那天夜裡將近零點左右，朋友開車送我和妻子回家，一上那條鄰近首長們大院的馬路，就被帶著鋼盔的執勤武警攔住。我們下了車，看見路邊的成排的小樹幹上，用手銬銬著許多男女，一人銬在一棵樹上。女的被懷疑爲賣淫者，都銬在路左邊；男的被懷疑爲嫖娼者，都銬在路右邊。執勤的武警只要見到車中是一男一女就攔住，然後將男女分開審問，沒有證件的，或有證件說不清對方身分的，統統先扣住再說。武警們攔住我們的車，大概也是由於我和妻子坐在後面。還好，開車的朋友是檢察院的，又是合法律師，拿出證件接受檢查後就放行了。我們的車子啓動了，從後車窗看去，又一輛車被攔住，不知道車中的男女能否有我們的幸運，也懷揣著具有足夠權力威懾力的證件，可以順利通過。據說，那些被懷疑爲從事黃色交易而被反銬在路邊的小樹上的男女，如果想盡快走人的話，無論是否有嫖賣行爲，都必須交上令執法者滿意的罰款。我的一個大學同學從南方來北京談生意，就曾在夜晚被執法的盤查者攔截，計程車上又恰好坐著他公司的女秘書，結果是花了三千元擺平走人。

大蓋帽雁過拔毛，強賣老鼠藥

再看「衛生大檢查」。1999年10月29號的《南方周末》的「百

姓記事」欄目裡，刊登過一篇叫做《春天有老鼠》的短文，文章說：每年春天的石家莊市裡，總有成群「大蓋帽」對市場上進行衛生檢查並強賣老鼠藥，價錢由他們信口定，根本不容店主們討價還價，而且主要是針對私人店鋪。這群大蓋帽雁過拔毛，連根本不會滋生老鼠的店鋪也不放過。他們闖進一家眼鏡店強賣鼠藥。那老闆以老鼠不吃眼鏡爲由，硬是拒絕。難道老闆的拒絕理由不夠充分嗎？按常理常情已經很有說服力了。但是在大蓋帽眼裡，你不買他的鼠藥，任何理由都不是理由。一個大蓋帽制不服這老闆，一聲招呼，就上來一群大蓋帽，把他揪上了一輛麵包車，強制要帶他去參加愛國衛生培訓班，交的錢要幾倍於買鼠藥。大蓋帽們邊揪人邊振振有詞地訓斥道：「瞧瞧你這樣兒，一點現代意識都沒有，不配活在九十年代！」那老闆這下服軟了，央求著大蓋帽賣給他鼠藥。

荒唐的是，買完鼠藥還要搭配著買大蓋帽們賣的鼠藥盒，價錢也由他們信口說。如若不買，等到過幾天複查時，即便店主下了鼠藥，他們只要發現沒有鼠藥盒，就以不合統一規定爲由罰款；即便買了鼠藥盒，不符合他們規定的擺放也要罰款，當然這規定像鼠藥的價錢一樣，由著大蓋帽們隨意定。沒過幾天，大蓋帽們果真又來了。在一家禮品店，他們檢查櫃檯下的鼠藥盒，就說：「你這盒子上落滿灰，這麼不衛生老鼠能來吃麼？」沒商量，罰款！而在另一家店裡，他們又以鼠藥盒放的地方不對爲由罰款，其中一個大蓋帽隨手一指訓斥道：「鼠藥盒應該放在那兒，你怎麼放這兒了？」如此隨意的「嚴格」規定，只有一個目的：掏錢吧！

權錢交易式的腐敗令人深惡痛絕，但是它還講個互惠，我掏

錢賄賂你，你給我方便，讓我掙更多的錢。而這樣的以×××類大檢查爲合法性的強徵強收強賣強罰，毫無商量毫無互惠，連黑箱交易都沒有，從民間榨取財富的能力是何等的出類拔萃！完全是單向的通吃遊戲，甚至就是無本萬利，連最低的交易成本都沒有。大蓋帽們靠什麼如此蠻橫而又合法？靠的就是這個制度這個政權所給予他們的合法的、起碼是準合法的傷害能力，用俗話說就是：「我不能給你什麼甜頭，但我可以讓你嘗嘗苦頭。我成事不足，但我敗事有餘。」誰不想被害的生意虧本作不下去就只能掏錢。如果有人膽敢堅持抗命，正中大蓋帽們的下懷，他們又能以妨礙公務再敲詐一大筆，甚至起初的合法反抗最終被大蓋帽們變成了非法犯罪，使抗拒者傾家蕩產。這讓你吃苦頭和敗事有餘的能力，就是大蓋帽們得到甜頭的保證。

最近，《亞洲華爾街日報》發布了「千年世界最富50人」的名單，其中有六個中國人，分別爲成吉思汗、忽必烈、和珅、劉瑾、伍秉鑒和宋子文，出現時間跨度爲800年。成吉思汗和忽必烈時代，中國還沒有現在的版圖，二人屬於中原漢族的武力征服者，是不是中國人可以存疑。在後四位中，伍秉鑒和宋子文是典型的官商，積累財富的主要手段是壟斷和權錢交易的腐敗所賜。而和珅與劉瑾的鉅額財富則主要是靠合法傷害權力榨取的，每個地方官來京述職，每個下去巡查的監察官員回京彙報都要孝敬一筆，否則的話，輕則降職、撤職，重則發配、收監甚至喪命甚至誅滅九族。這批人的總數，以每個職位至少設正副二職計，大約每一個省就有七八十人，搜刮一次便是幾十萬銀兩的進項。劉瑾的財富總計估銀八千萬兩，和坤被沒收的財產總計估銀約二億兩。此二人的財富與那些官場最底層的大蓋帽相比，不知高出多

少倍，因爲皇權賦予了此二人以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超強合法傷害能力(參見吳思《劉瑾潛流》)。

換言之，在中國的體制中，財富積累的多寡與合法傷害能力的強弱成正比，合法傷害能力的強弱又與權力的大小成正比。而「嚴打」之類的制度性抽搐，不僅使這種合法傷害權力有了規律性的任意擴大的機會和空間，而且又爲握有這種權力者提供了不斷地對民間財富進行敲詐的方便。在嚴打製造的暫時秩序底下，是多少無權無勢者的無辜被傷害和被敲詐。這讓我想起了杜甫的著名詩篇《三吏》、《三別》中的古代大蓋帽是怎樣欺壓和榨取百姓的，詩人所處的時代還是盛唐的開元、天寶時期，苛政尚且如此，而那些王朝的衰敗時期的苛政之兇猛又要數倍於太平盛世。

其實，以上現象根本不必大驚小怪，因爲中共的制度本來就是爲了統治者的方便管理而設計的，法律的核心是制裁不願做順民者，而嚴打之類的制度性癲狂，不過是制度化的「七、八年再來一次」的整肅異己者運動，除了打擊刑事犯罪的功能之外，更有警告心懷不滿者的威懾功用。這種政權本位或官本位的制度設計，其改革方向應該是逐漸向民本位基礎上的法治本位過渡，建立並強化個人對政府官員實施傷害的自衛能力，使個人對抗政府的風險和代價下降，使官員們濫用傷害權力的風險和代價提高。而中共制度下的嚴打，恰恰是在強化政權本位的錯誤方向上越走越遠，形成了周期性的執法者合法傷害的權力和能力的強化。

從中我們就能理解，爲什麼從古到今的中國人，遇到查牌或大蓋帽們的不合法刁難，大都忍氣吞聲，認罰了事，就在於這個制度本身是大蓋帽們進行合法傷害的堅強後盾，無力改變這制度，就無力反抗和消除這傷害。在此制度不變的前提下，每一個

平民百姓經過成本與收益，風險與代價的計算，還是覺得不反抗的風險、代價以及成本要小於反抗。

重刑處罰小偷，反而會製造出汪洋大盜

另一方面，從遏制刑事犯罪和社會治安惡化的角度講，特別是從減少惡性重大的刑事犯罪的角度講，重拳出擊的嚴打往往只能造成南轅北轍的效果。英國的賢哲早就說過：當偷十英鎊和暗殺國王都可能被送上絞架時，那麼人們如果想犯罪就寧願去暗殺國王而不做小偷。在這樣的嚴打中，重刑處罰幾個小偷，反而會製造出一打汪洋大盜甚至是專做大案的犯罪集團。西方的文明世界的許多國家之所以取消死刑，保留死刑的國家之所以極爲慎重地動用死刑，很重要的理由之一，就在於死刑既是對犯罪者的威懾，更是對犯罪者的反向激勵，甚至就是造就亡命之徒的最佳搖籃。只要開了殺戒，殺一人是死，殺十人亦是死，所以每一個殺人犯在心理上都渴望多殺人。中國目前的惡性犯罪中，連殺數人的亡命之徒的比例持續攀升，原因之一就是嚴酷的處罰造成的。被媒體炒的沸沸揚揚的張君案就是最典型的例證。

法國大革命前的三十年間，恰恰是法律最嚴酷的時期。在1768年有一個轟動性的案件：一個藥店學徒只因爲買了一本禁書《剝掉基督教的面紗》，就被判9年強制勞動，賣給學徒那本書的書商被判5年強制勞動，甚至連書商的妻子也被判處監禁。這樣的嚴刑峻法反而使社會日益趨於不穩定，政府權威也越來越受到反抗、嘲弄和詆毀，社會在整體上對執法者充滿了仇恨和輕蔑，執法者也因爲自身道義上的劣勢而採取消極的執法態度。結果，

嚴刑峻法加速了社會的不滿和仇恨的積累，最終釀成了大革命。大革命反過來也對君主和貴族實施嚴刑峻法，嚴酷和血腥使這場以「自由、平等、博愛」爲旗幟的革命，直到今天還蒙受著恥辱。後來的人們在總結大革命的教訓時認識到，處罰越嚴酷，實施起來越鬆弛，正是法律的嚴酷造成了法律的無力、社會秩序的崩潰和大革命中瘋狂的報復。

中國目前的情況與那時的法國有很大的相似性，出臺的法律之多之嚴，恰好與有法不依和執法不嚴相互激蕩，嚴打的頻率越來越高（從83年到96年的間隔是13年，從96年到2001年的間隔只有5年），而每一次周期性的各類「嚴打」，造成的只能是成多的失業者和更多的仇視社會的群體，社會治安越嚴打越險惡，假冒僞劣越打假越泛濫，賣淫嫖娼吸毒包二奶越掃越打就越普及，正如腐敗越反就越腐敗一樣。期望用嚴刑峻法來遏制這一切，實乃典型的飲鴆止渴。

在被我們中國人視爲驕傲的唐代，柳宗元曾憤怒地感慨：苛政猛於虎也！在一千多年後的今天，我也要憤怒地感慨：嚴打，嚴打，多少罪惡假汝而行之！

2001年5月18日於北京家中

和平：唯一選擇
民主：最佳前提

1996年臺灣舉行第一次全民大選，中共進行大規模的軍事演習，結果成全了李登輝以高票當選；2000年臺灣舉行第二次全民大選，大陸發表《一個中國的原則與臺灣問題》的對台白皮書，提出「三個如果」作爲動武的條件，其中尤以第三個「如果臺灣當局無限期拖延關於統一的談判……」來提升大陸在失去耐心時不惜一戰的強硬立場。朱鎔基在人大三次會議閉幕時的答記者問，對臺灣擺出一種罕見的強硬而情緒化的姿態。朱的話音剛落，中南海智囊、中國和平與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辛旗，就以比朱總理更強硬的態度聲稱：「臺灣民眾，可以說得重一點，應該說是面臨災難性後果，這一點絕對不是危言聳聽。」他甚至發狠地說：一旦台獨勢力上臺，我們不惜把臺灣打爛重建。這一系列蠻橫的威嚇所導致的，就是大陸最不願意看到的結果：民進黨候選人陳水扁以39.30%的高票當選。大陸當局之所以屢屢想影響臺灣的大選而又屢屢失敗，就在於他們的武力恫嚇是逆世界潮流而動，有違於民意。

但我以爲，文攻還是比武嚇要溫和些，而且大陸當局的表態中也爲自己留有迴旋的餘地，不承諾放棄武力或不允許無限期拖延，並不等於一定要動武，更多只是想讓臺灣盡早地坐在談判桌前。大選之後，大陸當局的態度並不像輿論所預期的那樣強硬，反而顯得有些無可奈何，適得其反的尷尬使其只能選擇「聽其言，觀其行」的低調。

學會妥協

像1996年的導彈引起世界大嘩一樣，今年的白皮書特別是其中的第三個「如果」和朱鎔基的答記者問，也引起了國際輿論的強烈關注。數日來，英國的《泰晤士報》，愛爾蘭的《愛爾蘭時報》，加拿大的《環球郵報》，德國的《德意志時報》與《世界日報》，法國的《世界報》與《費加羅報》，日本的主要報紙，紛紛以社論或專文評論的嚴肅方式，譴責大陸白皮書以武力相威脅的強硬立場。美國的反映尤爲激烈：《華盛頓郵報》、《紐約時報》、《時代周刊》、《新聞周刊》、《洛杉磯時報》等主流大報一致反對武力，呼籲和平。眾議院以高票通過《臺灣安全加強法》，把大陸作爲主要的遏止物件的呼聲驟然響亮，一向對大陸奉行接觸政策的柯林頓總統也第一次表示：在兩岸的關係問題上，任何解決方式都要徵得臺灣人民的同意。最近，美國政府又計劃提升對台軍售的水平。許多國會議員和知名人士呼籲不給中國PNTR，阻止中國加入WTO，把貿易重新作爲敦促大陸改善人權和免於臺灣受武力威脅的外交牌來打。3月11日，30位美國聯邦眾議員聯名提出第二七二號共同決議案（包括14名共和黨，16名民主黨，顯

示了兩黨的共同態度），促請美國政府支援臺灣的大選與民選總統，免受中共干擾；期待與下一任臺灣民選總統合作；堅持臺灣最終地位的確定必須具有臺灣人民明確的共識，且必須以和平方式實現。美國太平洋艦隊司令布萊爾宣布：一旦臺灣受到大陸的武力攻擊，根據《臺灣關係法》美國有義務協防臺灣；國防部長柯恩明確表態：既不支援「台獨」，也反對動武。這也是美國的一貫立場。陳水扁當選後，柯林頓總統立刻表示祝賀，對陳水扁在兩岸關係上所表現出的大度和善意給予了充分的肯定。

儘管國際輿論的反應非常強烈，儘管朱鎔基答記者問時的態度極其情緒化和強硬，但是我認爲這不過大陸想在陳水扁突然堅挺和大選的最後時刻影響選情，打壓阿扁的策略而已。實際上，海峽兩岸的當事者還是相對平靜的。選戰正酣的臺灣和人大會議期間的大陸都在軟化強烈敵對的立場，選舉後大陸並沒有激烈的反彈，這也許是切身利益使然。在臺灣，1996年的大選，應對大陸的導彈演習的，是候選人們爭相強硬的攀比；而這次大選，面對大陸的強硬，雖然有要求美國政府批准《臺灣安全加強法》和增加對台軍售的呼聲，但是三位熱門的總統候選人都爭相向中共發出了善意的資訊，沒有人再提「台獨」、「公投」，甚至連李登輝的「兩國論」也變成了「一個中國，各自表述」；這種軟化最明顯的標誌，就是剛剛當選的、一向以「台獨」著稱的民進黨候選人陳水扁。他在競選期間就發出兩岸最高領導人直接見面的呼籲，並把他兒子放入競選廣告，爲了讓選民相信選阿扁是安全的；見過鄧小平的諾貝爾獎得主、現任臺灣中研院院長李遠哲公開支援陳水扁，既提高了阿扁對其他候選人的競爭力，又減弱了他無法被中共所接受的傳統的激進形象。3月18日晚，當選的陳水扁

仍然保持著對大陸的「善意的對話、積極的溝通、永遠的和平」的態度。並且表示在正式就職之前來大陸進行善意溝通的誠意。臺灣的兩次大選面對大陸的兩種威懾，候選人的態度一硬一軟，這種鮮明對比恰恰是臺灣民意變化所致。

在大陸，儘管軍方的態度一直強硬(朱的表態也有屈從於黨內強硬派壓力的成分)，但大陸當局的基本態度是在軟硬兼施之間維持平衡。白皮書的強硬之後，是江澤民的懷柔「沒有烽火連三月的感覺」，並表示希望訪問臺灣來軟化白皮書的強硬立場；朱鎔基的《政府工作報告》在對台政策的部分中，沒有「三個如果」的字樣。政協閉幕式上，李瑞環的反響強烈的講話淡化了臺灣問題，突出了改革的緊迫感、政治民主化和民意向背的重要性。大陸的最高決策層一再宣稱對台方針「從來沒有變」。即便朱鎔基在人大結束後的記者會上，對臺灣態度極爲強硬和煽情，但主要是針對「台獨」勢力的，想打壓競選風頭正勁的陳水扁，他說，沒有李登輝的「兩國論」就沒有大陸的白皮書；「三個如果」是鄧小平的思想，也是「江八點」的核心原則，大陸對臺灣的態度從來沒有變過，第三個「如果」也沒有什麼新東西。陳水扁當選之後，大陸的基本態度是靜觀其變。

兩相比較，臺灣民眾擁有言論自由，可以通過各種媒體，瞭解大陸當局所有公開的甚至半公開的對台政策的宣示，可以在股市裡收看朱鎔基答記者問的實況轉播；而大陸民眾卻很難知道臺灣當局和人民對大陸的態度，聽不到3月18日陳水扁的當選感言，只能看到經過嚴格篩選的消息。而在這些經過官方精心剪裁的消息中，似乎沒有和平意願和妥協態度，只有「台獨」「兩國論」等危險徵兆。這種兩岸民眾在資訊獲得上的不對等，凸顯的

正是大陸的封閉性和臺灣的開放性，也凸顯了在兩岸關係問題上，大陸當局的道義劣勢與不自信和臺灣當局的道義優勢及其自信。與此相對應，臺灣候選人的態度更具建設性，而大陸決策者的態度就顯得狹隘和霸道。大陸的白皮書公開發表之前，臺灣的三位候選人已經力圖淡化「台獨」的色彩；白皮書發表之後，他們也沒有因此而改變其競選綱領中的大陸政策；對朱鎔基發出的威脅仍然態度平和，沒有以強硬對強硬。在此種差別的背後，兩種制度的優劣便一目了然。臺灣絕大多數人不認同「一國兩制」式的統一，而要求民主式的統一，其理由正當而充足。

所以，在兩岸關係問題上，學會妥協——特別是在力量對比不均衡和還有恩怨的情況下——就是以超越各自的狹隘立場的高瞻遠矚來尋求善意，尋求一種既有道義合法性又有現實合理性的和平方式。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末美蘇對抗的嚴酷的冷戰時期，兩個超級大國的元首都能相互握手，在「和平共處」的原則下，解決古巴的導彈危機、簽署核不擴散條約；七十年代初，在中國受到蘇聯的核威脅的時刻，美國總統能夠踏上被它封鎖和孤立了二十多年的中國大陸，使兩個制度及文化完全不同的敵對國家握手言和。那麼，現在已經是新世紀了，全球一體化的前提就是一種人類視野的寬容、相互尊重和利益共用，更何況同根同種的臺灣和大陸，有什麼恩怨無法在談判桌前化解，非要兵戎相見、魚死網破不可呢？

改革開放以來，中共一再呼籲在處理國際關係上用對話代替對抗，兩岸關係的民族特殊性和歷史淵源，更應該提倡以建設性的對話代替破壞性的對抗。正如柯林頓總統最近在霍普金斯大學的演講中所說：在兩岸關係上「化威脅爲對話」。朱鎔基雖然把

柯林頓的「海峽兩岸」改爲「太平洋兩岸」，但是他沒有改變「用對話代替威脅」。

在今天的自由主義制度成爲人類文明主流的世界格局中，大陸當局在處理國際關係時，不能總是奉行極端的犬儒哲學——遇強者就對話就妥協，遇弱者就對抗就強硬。面對實力強大的美國，中共就打「用對話代替對抗」的妥協牌。鑒於大陸的人權狀況的持續惡化，美國在世界人權大會上提出譴責中共政權的議案，道義劣勢使中共一再呼籲用對話代替對抗，並且在暗中大打貿易市場牌，用利益收買來換取國際支援。而面對實力相對弱小的臺灣，中共就打「不承諾放棄武力」的威脅牌。臺灣提出民主制度無法與專制制度相統一，統一的前提是中共放棄不尊重人權的一黨專制，實行尊重和保障人權的自由民主制度，中共就再不提「用對話代替對抗」了，反而用武力威脅代替對話，最近又加上經濟威脅，明確宣布決不允許支援台獨的商人進入大陸市場。其實，美國與臺灣向大陸政權提出的是同一個要求——放棄一黨專制。中共爲什麼要和美國搞對話、不搞對抗，卻不與臺灣搞對話，而專搞對抗呢？中共口口聲聲尊重臺灣民意，難道只因爲臺灣太小太弱，就連面子上的道義底線都不要了嗎？這種赤裸裸的犬儒主義怎麼能贏得臺灣的民心呢？

朱鎔基在記者會上反覆強調，只要在一個中國的前提下，什麼都可以談，可以讓步——讓步給中國人。四月十二日，大陸外交部發言人關於「一個中國原則」的解說，已經表現出一定的靈活性，不再把一個中國定位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上，而是代之以模糊的「只有一個中國」。但願這是一種基於道義和利益均衡的妥協態度，而不是哄小孩的話語陰謀和犬儒主義。陳水扁也說

他如果當選，和大陸的領導人什麼都可以談，甚至包括把「一個中國作爲議題」也可以談，但是要求大陸不預設任何先決條件，因爲這樣才能體現「對等原則」。但願陳的態度是他就職後處理兩岸關係的真實的政策底線，而不是謀求執政的競選策略。最近，陳水扁也保證，他的就職綱領一定是以最大的善意和誠意來定位兩岸關係，決不會引起新的緊張。

既然兩岸都表示了可以談「一個中國問題」的態度，區別只在於「前提」和「議題」，那麼還有什麼必要以武力相威脅呢？既然白皮書說「臺灣在國際上與其身分相適應的經濟的，文化的，社會的對外活動空間，臺灣當局的政治地位等等，都可以在這個框架內，通過政治談判，最終在和平統一的過程中得到解決。」爲什麼還要擺出逼人就範的姿態、招致臺灣人民和國際社會的反感呢？爲什麼不能通過談判和妥協，在「和平統一」的前面加上「民主的」定語呢？其實，加上這一定語，對中共和大陸人民談不上什麼妥協，而是大陸走向未來的必由之路。臺灣提出「民主的和平統一」，等於爲大陸提供了一個進行政治改革的絕好契機和堵住強硬保守派的嘴巴的方便藉口，爲了祖國統一的千秋大業就必須進行政治民主化的改革。這樣做的結果，最大受益者恰恰不是臺灣、而是大陸本身。

道義的力量

儘管在短期內，兩岸關係不明朗，存在著容易引起緊張局勢的種種不確定性，但是從長遠的目光看，兩岸關係的未來前途除了民主的和平統一之外，沒有其他的選擇。這種唯一性首先是由

民意、其次是由現實決定的。美國總統柯林頓提出要尊重臺灣人民的意願，朱鎔基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也說「寄希望於臺灣當局，更寄希望於臺灣人民」。在記者會上，朱鎔基看重的也是在臺灣大選投票前對民意的影響，寄希望於民意向背在最後投票時刻的關鍵作用。他說中國的統一是臺灣的民意、大陸的民意、全世界華人的民意，他一方面用懷柔的口氣，聲稱相信臺灣人民的政治智慧，能夠做出符合大陸期望的明智選擇；另一方面又用威脅的口吻讓臺灣人民「要警惕啊」，不要拿自己的切身利益作「台獨」分子的政治祭品，「否則將後悔莫及」。陳水扁當選後，大陸政府要求臺灣新政府回到「一個中國的原則」上來，再一次訴諸於渴望安全的臺灣民意。由此可見，無論是懷柔還是恫嚇，無論是大陸當局想用威脅來影響臺灣選情，還是用一個中國的原則作爲與陳水扁的新政府打交道的前提，都要訴諸於臺灣的民意，至少要在表面上打「民意」牌。

大陸政府可以通過輿論控制和黨的喉舌誤導民眾，煽動起狂熱的民族主義，作爲對臺灣動武的道義根據；但是，大陸政府對自身道義合法性的危機也不可能視而不見，它沒有足夠的信心在戰火燃起之後還能把握住民意的向背。道義上的劣勢使中共不僅害怕國際社會的干預，更害怕國內不滿的全面爆發。在十六大的籌備期，甚至中共黨內都有人發出這樣的質問：十六大能開成，十七大還能嗎？只要稍有理智，明知道玩火者必自焚，誰還會偏要玩火呢？現在，大選的結果已經揭曉，恫嚇沒有達到預期的效果，反而幫助大陸最不能接受的人贏得了選舉的勝利。兩次威脅之結果的適得其反，應該使大陸當局認真反省自己的強權政治，從現在開始學習怎樣與民主體制下的政府和民眾打交道了。

其實，大陸根本不必太看重誰當選，在沒有看到新總統的施政綱領和具體政策的情況下，不必急於顯示自己的強硬，否則的話就會反應過敏，做出錯誤而危險的決策。臺灣現在已經是自由民主的社會，民意乃是執政者權力的唯一來源，無論是在大選期間，還是在選舉之後，沒有一個候選人和當選者敢於逆民意而動，民意的向背將最後決定候選人和執政者的命運。大陸的執政者的升降雖然不取決於民意，但是兩岸的民意、國際輿論、兩種制度之間的優劣對比和現實的實力對比所形成的綜合壓力，也會起到類似於民意向背的道義作用，特別是美國及其北約成員國和聯合國的態度至關重要。柯林頓總統頂著美國國內巨大的反華壓力，全力遊說國會給予大陸PNTR，支援大陸加入WTO，重伸一個中國的原則，這種態度也會對因大陸的強硬和陳水扁的當選所造成的緊張氣氛起到一定的緩解作用。

同樣，在一個民主體制下，不論是哪個黨的候選人上臺都必須接受民意的監督，奉行國家利益和民眾利益高於黨派利益的憲政原則。臺灣的民意(87%)是兩岸的和平與大陸的民主，臺灣新總統想在現實條件還不具備的情況下搞「台獨」有違於民意，大陸執政者想在不進行政治體制改革的情況下，以武力和強權征服臺灣也有違於民意，越以武力強加，所招致的反感和離心力就越大。如果大陸政府敢於開放言論自由和公正的民意調查，我想，大陸的民意也肯定是和平與民主。兩岸的民眾都清楚，一旦開戰，最無辜最倒楣不是政府，而是平民百姓。回顧歷史，國共的對抗爲中華民族帶來的只有災難和資源的巨大浪費(戰爭所造成的生命和財產的損失，軍備競賽所消耗的大量經費，爲了加強各自的國際地位而空耗錢財去收買那些沒有任何原則的無賴國

家……）。而美國在抗戰中和抗戰後，都一直在國共之間進行調停和斡旋，其主旨始終是促成國共合作、避免戰爭，在和平的環境下，建設一個自由、民主、富裕的中國。如果不是毛澤東一意孤行，把百廢待興的中國錯誤地拖入由金日成和史達林挑起的朝鮮戰爭，大陸中國就不會與世界主流文明隔絕那麼久，臺灣問題也許早就解決了。

美國的這種熱心既是基於自身的利益，也是基於日益被全人類所認同的普適性價值——人的自由、尊嚴、權利與世界和平。現在，「人權高於主權」所表述的人類正義越來越成爲解決國際衝突的準則之一，在相對正義的國家主權之上，還有《世界人權宣言》所昭示的絕對正義的人權，爲了人類的基本權利，各國在必要時應該出讓一部分主權，這是每一主權國家應盡的道義責任，也是新世紀的國際秩序得以建立和維持的道義基礎。自由、和平和發展才是世界文明的主流與前途所在，而決不僅僅是大陸當局反覆強調的「和平與發展」。正是依靠種道義優勢，西方開放的自由社會才戰勝了以前蘇聯爲首的東方封閉的極權社會，以美國爲首的西方才贏得了20世紀最後十年的三次區域性人道主義的軍事干預的勝利（出兵海灣，遏止了獨裁者加戰爭狂的海珊的企圖獨霸海灣的野心；軍事干預波黑和科索沃，阻止了種族戰爭和種族滅絕）；也正是這種道義要求，才使東歐、亞洲、非洲、拉美的獨裁者在下臺之後，必須接受道義和法律的審判。因爲，如果沒有自由，和平就得不到保證，也不會有真正的發展（發展是以人的生存狀態的綜合質量爲標準的，而決不僅僅是多吃幾片麵包、多儲存幾顆核彈頭）。換言之，兩岸的民意、全世界愛好自由、民主與和平的所有人的民意，就是道義之所在。武力強權

也許可以得逞於一時，但決不會當道於永遠。

我認爲，自由主義價值及其制度安排之所以節節勝利、成爲世界文明的主流和未來的發展方向，與其說是受惠於物質或科技的進步，不如說是得益於人類對道義的追求和堅守。如果沒有這種對自由與和平的持久而堅定的道義立場，人類也許早已毀滅於自己的科技進步了。從古至今，國與國之間的競賽，與其說是科技及自然資源的競爭，不如說是制度的競爭，制度創新可以包容並激勵技術創新，可以更好地配置和利用有限的資源，變不利的先天環境爲有力有利的後天競爭力。顯然，單純的技術創新絕不能涵蓋制度創新，先天的資源優勢也並不必然帶來競爭優勢。決定勝負的最終因素是制度而非科技及自然資源。而制度競爭的說到底則是道義的競爭，誰擁有道義的優勢，誰就是最後的贏家。當今世界，憲政民主制度相對於其他制度的優勢，就在於這種制度的道義立場——實現並保障人的自由、尊嚴和權利，爲人的創造力的最大限度發揮提供最有效的制度激勵。

因此，如果囿於狹隘的主權、內政的原則而罔顧國際正義、人類的共同價值和人的自由；如果僅僅把狹隘的民族主義立場應用於兩岸關係問題，作爲一味敵對、進而作爲武力解決兩岸關係的理由，那麼再強大的武力也會因缺少最起碼的道義合法性而成爲孤家寡人，所謂「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最終的失敗是注定的。不錯，臺灣人是中國人，但是臺灣人首先是大寫的「人」——一個個具有天賦的自由和尊嚴的人。而人的自由和尊嚴是超越地域、國界、種族、文化、階層……的界限的。每一個人都有免於他人(特別是暴力)的侵犯和強制的權利，有選擇自己的生活方式和居住地的自由。臺灣人作爲人類的個體，其自由、尊嚴和權利不僅受到

臺灣憲法的保護，而且受到《聯合國憲章》、《世界人權宣言》和《國際人權公約》的保護。在沒有徵得兩岸人民、特別是臺灣人民的同意(就等於沒有得到人民授權)的情況下，就強制性地以武力解決兩岸統一問題，不僅有違民意和侵犯人權，而且有違人類正義、聯合國憲章和歷史潮流。今天的國際社會決不會忘記20世紀的狂熱民族主義演變成法西斯主義的慘痛教訓，坐視任何可能出現的對人權與世界和平的威脅。同時，擁有了自由和尊嚴的人民，也決不會屈從於武力強權的威脅，因爲反抗強權是世界公認的基本人權，而世界公理就是人心之所向和道義之所在。

現在，一個與中共沒有歷史積怨的新政黨上臺，爲一種沒有敵意的兩岸關係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良機。如果兩個執政黨都能以民意和道義爲重，民進黨的上臺未嘗不是兩岸人民的福音。一方面，陳水扁及其民進黨的執政，使其角色發生了變化，由臺灣社會最大的在野黨和政府的批評者、監督者，變成了被批評、被監督的執政者。在野時的批評者和監督者的角色，使之可以採取相對激進的高調立場，而執政後的被批評者和被監督者的新角色，就要求它必須保持相對保守的低調立場。這大概是成熟的民主社會的常規。何況，陳水扁儘管以接近40%的得票率當選，但他所統領的仍然是個弱勢政府，60%的拒扁的民眾和國會中的劣勢，使陳水扁的新政府的一舉一動都要受制於多方面的、特別是國會和民意的制衡，陳水扁必須保持低調，弱化他本人的「台獨」色彩；超黨派的國家意識和全民利益對執政黨和新總統的要求，也將抑制民進黨本身的「台獨」訴求，迫使陳水扁與民進黨拉開距離，推動他全力尋求緩和兩岸緊張關係與維護海峽安全的可行性的大陸政策。同時，和平統一也是國際社會特別是美國的要求。

爲了在國際上爭取更大的生存空間，爲了獲得美國的實質性支援和國際輿論的道義聲援，執政了的陳水扁及民進黨也要弱化甚至放棄激進的「台獨」綱領。

事實上，陳水扁本人在競選中和當選後，都以高姿態反覆強調與大陸的善意對話和建設性溝通，一再重申國家和民眾的利益高於黨派的利益，他宣布就任後辭去中常委的職務，不再參加民進黨的活動。在請李遠哲出面組閣失敗後，陳水扁力邀國民黨籍的唐飛組閣，贏得眾多讚揚，說明了他對自己的新角色已經有了清醒的意識。陳的當選也帶來了這樣的可能：由於「台獨」在很大程度上是民進黨爭取執政的策略，陳的當選爲民進黨帶來的執政地位，使其政治視野更爲開闊，不再囿於島嶼意識，從而爲修改以臺灣獨立爲政治訴求的黨綱提供可能。最近，臺灣島內不斷有要求民進黨修改「台獨」黨綱的呼聲，民進黨中常委陳昭南已經向民進黨中執會提出「台獨黨綱修正案」，意欲將黨綱中「建立臺灣共和國、制憲」等字眼刪除，改爲由公投來決定是否改變兩岸關係的現狀。如果「台獨黨綱修正案」獲得通過，那就爲臺灣新政府與大陸打交道拓展讓兩岸都有迴旋餘地的積極空間。

另外，民進黨是建立在自由憲政基礎上的多黨制式的政黨，完全不同於建立在蘇聯式獨裁政黨模式基礎上的國民黨和中共，所以，陳的當選使大陸政權必須面對一個完全民選的新政府和一個新的執政黨，不得不接受與最不喜歡的對手打交道的現實，聽一聽來自代表臺灣「草根」民眾利益的政黨的聲音。對民進黨而言，過去它直接面對的是執政的國民黨，它在兩岸關係上的政治訴求只能通過國民黨才能變成政府決策。現在，民進黨作爲執政黨必須接受直接面對中共政權的挑戰，面對面地瞭解這個

以前只聞其聲的威權政黨。換言之，新的臺灣政府和現任大陸政府在兩岸關係上都失去了老對手，而新的對手可以突破老對手的僵化格局，開闢新格局，從而創造這樣一種可能：使大陸政權換一種有別於強權和武力威脅的全新的思路，使民進黨也換一種不同於「台獨」的新策略，在這個新世紀裡，把兩岸關係帶入新天地——用對話代替威脅和對抗。

臺灣的執政黨和在野黨通過全民大選，完成了權力和平轉移的現實，對大陸的道義影響是巨大而多方面：首先，臺灣的一人一票的公正大選，對大陸民眾具有示範式的道義激勵作用，連計程車司機都認爲大陸當局應該學習臺灣。現在，民間出現了強烈要求中共向國民黨學習、進行政治改革、開放「報禁」「黨禁」的呼聲。其次，對大陸知識界，臺灣經驗已經不只是威權體制下的經濟奇蹟了，而是民主政治奇蹟下的持續繁榮和社會穩定，這一事實有力地批駁了「中國人不適於搞民主」的國情特殊論，批駁了以社會穩定爲藉口拒絕政治改革的「先麵包、後自由」的犬儒理論，爲自由主義理論提供了與政治保守主義進行論戰的最具說服力的實證經驗。再次，對大陸的持不同政見者來說，民進黨由被打壓的弱小的不合法的民間政治力量，到合法的最大在野黨，再到今天的執政黨的奮鬥歷程，爲日漸沈寂的民間反對派運動提供巨大的鼓舞和最具親和力的榜樣，既增強了他們面對強權的道義信心，又有了可資借鑒的進行內部整合的操作性資源。

最後，對於至今仍然崇拜「槍桿子裡面出政權」式強權的大陸執政者來說，陳水扁的當選既是一劑道義良藥、又是一種道義壓力，使大陸政府從強權的自戀中、從傳統的「槍桿子裡面出政權」的暴力崇拜中清醒過來，面對民主臺灣的真正民意和全世界

的要求和平與支援民主制度的道義立場，面對臺灣的執政黨和在野黨成功地完成了權力和平交替的現實，面對來自大陸民間的質問：國民黨能，共產黨爲什麼就不能?!當大陸政權意識到武力威脅達不到預期的目的、而真正的武力征服又沒有現實的可行性之時，當中共從這種武力威脅的失敗中，感到自由民主在道義上的力量和優勢與一黨獨裁在道義上的虛弱和劣勢之時，就會尋求和平的方式，坐下來進行真正對等的對話和談判。陳當選後，大陸方面的低調、平靜的反應與此前的聲嘶力竭形成了鮮明的對照，更凸顯了黨內拒絕進行政治改革和主張對台動武的死硬派的極其尷尬的被動處境；也爲黨內主張進行政治改革的健康力量提供一張推進「民主的和平統一」的道義王牌。可以說，臺灣的成功是中國實現全民族的自由民主理想的最大道義資源。維護台海和平，民主制度和自由靈魂所具有的道義力量，比任何先進武器都強大都長久，因爲靠專制強權和野蠻暴力統治世界的時代早已過去。

我相信道義的力量，相信在21世紀的國際秩序中，擁有道義的人，即便手無寸鐵，最終也不會敗在武裝到牙齒的強盜腳下。不是一海之隔天時地利，而是人人心向自由民主的道義凝聚力，才是臺灣人民免受戰爭之災的最堅固的安全保障。否則的話，人類正義與野獸的叢林法則的區別何在？二十一世紀與茹毛飲血的時代又有什麼區別？

無法迴避的現實

從現實的實力對比的角度看，儘管大陸地廣人多、武力比臺

灣強大且擁有核武器，儘管大陸正在急迫地從俄羅斯進口先進武器，儘管中共可以利用不受約束的執政權力集中大陸的所有資源，進行軍備升級和戰爭動員，但是，大陸要想以武力征服臺灣就必須具有相對優勢的制空權和制海權，才能跨越一海之隔的天然屏障。還要有強大的後勤保障能力，才能維持第一次登陸成功後的後續占領。但是就目前而言，大多數軍事專家認爲，大陸對臺灣沒有多少制空權和制海權的優勢，也沒有能夠適應現代戰爭的後勤保障能力，跨海作戰的勝率極低，哪怕大陸有60%登陸成功的把握也不敢貿然行事。同時，大陸想用武力征服臺灣，必須在美國及國際社會不進行人道主義的軍事干涉的前提下才有可能。如果國際軍事干預的可能性存在(幾乎可以肯定，如果大陸武力攻台，國際社會就要進行人道主義的軍事干預)，大陸絕無可能用武力征服臺灣。

退一步講，假設在沒有國際社會進行人道主義的軍事干預、大陸對臺灣具有軍事上的絕對優勢的情況下，即便大陸能夠以強大武力粉碎島內一切有組織的抵抗，從地理上征服了臺灣，也絕對征服不了二千三百萬已經自由了的靈魂，各種形式的反抗會一直持續下去，直到占領者身心俱憊。如果懾於占領的代價太大，而只進行密集的導彈奇襲並配以電子戰，瓦解臺灣的機場和戰情指揮中心，進而逼迫臺灣坐到談判桌前。但是我認爲，在目前的國際環境和臺灣現有的軍事力量以及民眾的道義凝聚力之下，這樣的目的是根本無法達到的。或者說，以臺灣現有的實力和民心，除非與海島一起毀滅，否則決不會停止抵抗。更何況，大陸一旦動武，世界的支援和同情肯定在臺灣一邊。由於道義和現實利益所在，即便以美國爲首的自由世界不進行武力干涉，大陸也

必然要受到全面性的嚴厲的國際制裁和道義譴責，這是國際社會在兩岸處於戰爭狀態之中，能夠向大陸做出讓步的最後底線。聯合國也極有可能置大陸作爲常任理事國的否決權於不顧，接納臺灣進入聯合國，臺灣的流亡政府也會以此爲契機，宣布獨立。而一旦獨立就再無重新統一的希望。

所以，理想和道義也罷，現實和利益也好，走和平民主之路，統一就有希望，中國人也會因此而得到全世界的讚譽和尊重；而憑武力進行征服，臺灣只能別無選擇地獨立，大陸中國不但在道義成爲孤家寡人，而且對國際貿易和外資依賴日深的國內經濟也將陷於困境。戰爭不僅嚇走了外資、外商和招致嚴厲的國際制裁，而且高昂的戰爭經費必將耗盡改革二十年所積累起來的經濟資源。也許，戰爭之初，長期被控制被同化的民眾會陷於或真心或假意的愛國主義迷狂(像北約誤炸使館事件時的狂熱)，但是，在中共的正統意識形態早已失去說服力的今天，民眾的最初大宣泄過後，戰爭所帶來的破壞、傷亡、蕭條和國際孤立等一切災難，就會把民眾的積怨和憤怒轉向他們本來就極爲不滿的腐敗權力，那時的大陸真的就是內憂外患了。

現在的大陸，儘管還有著表面上的穩定，然而，實際上，由於執政者一直拒絕政治改革，體制的陳舊、僵化和腐敗所積累起來的矛盾和仇恨已經到了一觸即發的高危機程度，舊冤未平，新冤累累；僅舉出其中有目共睹的幾項就足以見證：

1. 公開的和半公開的反體制力量：「六．四」事件和「六．四」之後，民間的反體制力量已經公開化(以各種形式反抗著的持不同政見者和六四難屬群體等)，並且得到民眾的各種方式的支援和同情，雖然屢被政府以強權打壓，卻仍然持續不斷，成爲

壓不滅的火種，打不垮的脊梁。這種力量不僅來自體制外而且在體制內也有不可小視的潛力，有些老共產黨員已經走上反體制的前臺(如李慎之、李銳、鮑彤、胡績偉、杜潤生、于光遠、吳江、王元化、王若水、徐良英、朱厚澤、被軟禁的趙紫陽等)，他們的資歷、學識、智慧和良知在知識界和工商界都具有極大的感召力，就連執政者也不敢小視這種道義力量。從民主牆到「清汙」「反自由化」再到「六四」，以及「六四」之後對民運的鎮壓，直到今年四月，中共發動的對李慎之、茅于軾、劉軍寧、樊綱的打壓，恰恰證明了自由主義群體的力量。雖然受到政府各種形式的壓制(監獄、黑名單、竊聽、跟蹤、開除公職、點名或不點名的意識形態大批判……等等)，但是自由主義的經濟知識和政治理念在中、青年的文化界和民營企業家中已經紮根，形成了相當可觀自由主義群體。民主觀念在城市的關心時事的居民中也已經廣爲普及。這些相信自由主義價值的社會群體，已經與一黨壟斷國家權力的體制形成了行動上和觀念上的難以調和的對立。在強權高壓下沉默的大多數決不會永遠沉默。

2. 民眾中的不滿：被打壓的法輪功、中功以及各種民間的自發的准宗教組織，這些組織的幾千萬或上億的信徒前赴後繼的抗爭，在抗爭中覺醒到信仰自由和結社自由的可貴，以及強迫的意識形態統一的反人性；幾千萬失業者(據估計國有企業共有一億四千萬職工，最終失業者將占35%)、被剝奪得最嚴重的億萬農民的集體上訪和請願，在爭取基本人權的行動中，意識到了壟斷權力之下的分配的極端不公正(農村的失業或半失業人口多達二億左右)；流動在各大城市底層的飽受屈辱的上億民工的團夥性破壞性的行爲，用「夜晚政治」變相地反抗著政府在城鄉之間人

爲製造的歧視性政策……現在，這種種不滿已經演變成持續不斷的小規模的衝突甚至暴力對抗(最近，東北的楊家莊子礦區因關閉礦場發放資遣金引發不滿而造成二萬多人的大規模暴動，最後動員了大批軍警才鎮壓下來；廣東省四會市前發生警民衝突，三千人圍市府；鎮江各個地點爆發了大規模的示威集會，抗議政府擅自停還地方債券的本金，京滬線已被切斷)。可以毫不誇張地說，民眾與政府的對抗性衝突每天都在發生。

3. 民族矛盾：西藏、新疆與現政權的衝突由來以久，中共的雙管齊下的懷柔和鎮壓也難以擺平，少數民族要求完全自治或獨立的民族訴求與現政權的衝突愈演愈烈。新千年伊始，西藏的第三號宗教領袖、白教噶瑪巴活佛出走印度，前全國政協委員、新疆「第一富婆」熱比婭，被中共以「非法向境外提供情報罪」判刑八年，更凸現了民族衝突的尖銳。而這些民族問題與臺灣問題有共同之處，即不接受沒有民意授權的強制性的統一——文化同化和制度同化。

4. 全社會對滲透到執政黨每個細胞的無可救藥的政治腐敗的不滿，越來越懸殊的貧富兩極分化所埋下的怨恨(據中國人民大學調查中心顯示，目前中國貧富差別的基尼係數遠遠超過歐美國家，已經達到了就要突破社會承受能力的0.457的水平)，動則幾億、幾十億、上百億的集團性腐敗案，成爲老百姓和官員們都公開談論的話題，最高決策層也把腐敗作爲重大議題，提升到黨和國家的生死存亡的高度逢會必講，但是政府的反腐敗卻毫無成效，最多也就是拿某個人開刀，作作秀而已(胡長清案)。體制的弊端只能使反腐敗變成權力鬥爭的工具(陳希同案)，而普遍的腐敗卻越反越烈……最保守的估計，改革開放二十年以來，權力的

市場化和資本化給極少數權貴帶來的利益至少有三十萬億人民幣之巨。這種制度性的腐敗，使政權的道義合法性所剩無幾，政府權威的維持越來越依靠強制力和利益收買（政府性賄賂不僅是對國內，更是對國外，大陸的巨大市場成爲中共面對國際譴責時最有力的王牌，對港臺及其他海外華人亦如此）。這種腐敗不僅蠶食著中共政權的道義合法性，而且把戰爭年代靠革命信念凝聚的中共，變成了只靠利益交換維繫的犬儒黨。積壓已久的危機將因戰爭所造成的經濟蕭條和政治恐慌而全面爆發。

5. 經濟危機。鄧小平式的單項經濟改革的正面能量早已釋放完了，負面效應在八十年代末就已經極爲明顯，「八九運動」的發生就是針對改革的負面效應的。「六四」之前經濟改革只不過是收拾毛澤東留下的爛攤子，還歷史的欠賬；1992年的「南巡」所掀起新一輪經濟改革浪潮，也只不過是爲了收拾他自己造成的「六四」爛攤子。兩次經濟改革的成就感和對民眾的說服力，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爲改革的背景太黑暗太荒蕪太絕望，晚期毛澤東時代的中國已經沒有一絲光亮，鄧小平的改革僅僅是來自邊緣的微光。「六四」大屠殺是鄧小平親手扼死了大陸僅有希望之火，他想用「南巡」再一次點燃。但是，單項的經濟改革已經無法重燃希望之火了。現在，大陸經濟的高增長期已經過去，經濟發展速度下降，經濟體制改革停滯，制度性的死結（權力的市場化）緊緊扼住經濟的咽喉，表面上的繁榮已經掩飾不住骨子裡的危機四伏。1998年和1999年的經濟增長率實際上遠遠低於官方公布的數位（實際上是爲了政治目的而做出來的數位。四月十一日新華社播發一篇反形式主義的文章，主要是針對各級官僚爲了政績而虛報產值的現象）。國內外誠實的經濟學家估計增長率最多達到5

%。積重難返的國有企業改革毫無起色，股份制改造(債轉股)和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大多是走形式，包裝空殼企業上市(國有企業的負債率高達83%，是名副其實的空殼經濟)，套取社會閒散資金，加強國家的壟斷，以行政權力爲支撐的黑箱操作和信貸傾斜，造成了大量的公共資產流失和極不公平的競爭。

結果，國有企業的改造變成了用全民的公共資產去添一黨私產(國有企業)的無底洞。對國有企業的資金支援主要來自國家財政和壟斷金融的貸款，而國家財政靠的是稅收，1999年，非國有企業上繳的稅收額已經占國家全部稅收的76%。銀行貸款主要靠老百姓近七萬億的儲蓄，爲了挽救國有企業，朱鎔基連續降低信貸利率和存款利率，老百姓在存款利率上的巨大損失，恰好是通過信貸政策的全面傾斜使國有企業獲得的大量低息貸款。企業的兼併和破產，在很大程度上是政府向社會轉嫁危機；剝離不良資產的災難承擔者是大量的失業職工。於是，在朱鎔基保證「國企三年脫困」的政績要求的行政壓迫下，在朱鎔基一貫奉行的集權式改革的操作下，國有企業得到了虛假的扭虧增盈，而作爲大陸經濟高速增長支柱的非國有經濟卻出現大面積滑坡，虧損、倒閉、破產的不再只是國有企業，市場經濟的寵兒——民營和私營的企業也處在虧損、破產的困境之中。

在金融領域，一方面是國有銀行居高不下的不良資產(最保守的估計爲60%)，主要靠民間的儲蓄來維持。國有企業欠金融機構的債，金融機構欠老百姓債，兩種債務的不對稱趨勢愈演愈烈，金融系統的對內支付能力隨時可能瓦解。另一方面，剛剛萌生的民間金融行業也在朱鎔基的全面圍剿下一蹶不振，非國有企業的融資渠道被全面封殺。大陸之所以能逃過亞洲的金融危機，

決不是因爲大陸的金融制度有多麼健全，而是因爲它對世界金融市場的封閉，加入WTO之後才是對大陸金融業的真正考驗。事實上，導致亞洲金融危機的所有隱患在大陸全部存在，甚至更爲嚴重，它的維持全靠政府強制性地對全社會公共資產的剝奪。可以說，大陸的經濟改革最大的受益者既不是國家，也不是老百姓，而是權貴們所組成的利益集團，通過權力市場化達到資本權貴化。

6. 執政黨的危機。去年，政協主席李瑞環在陝西發表講話，提出目前大陸所存在的五大危機的根子全在黨內。春節前，江澤民在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上關於從嚴治黨的講話，經過刪節後於2000年4月2日公開發表。全篇只有一個主題：中共黨內所存在的危機，已經威脅到黨的生存和執政地位，再不從嚴整治，用不了多久就將亡黨。江澤民指出，中共黨內的自由化傾向、信仰真空、道德墮落、意志薄弱、官僚主義、腐敗盛行、組織渙散、政令不暢、唯利是從、勾心鬥角、任人唯親唯錢、跑官賣官買官……甚至在權力鬥爭中出現多起副職雇傭殺手謀殺正職的惡性事件。可以說，這是中共執政以來，公開發表的黨魁對黨內問題的最激烈的批評。雖然江澤民仍然堅持一黨獨裁的立場，認爲只有中共才能治理大陸，從嚴治黨是爲了防止「和平演變」和黨的自我腐爛，但是他所指責的黨的現狀卻是真實的(相信講話的完整原文更爲激烈)。一向只自誇而不檢討、只炫耀成績而不承認失敗的中共，一向自恃「偉大、光榮、正確」的中共，在嚴格控制輿論導向的大陸，公開發表黨魁如此講話實屬罕見，充分證明了中共自身危機的深重。何況，現在中共的強人時代已經過去，再也沒有一言九鼎的核心權威，高層的權力鬥爭將更爲激烈和公開，帶有更明

顯的沒有主義而只有利益交換的犬儒色彩。圍繞著十六大的權力角逐愈演愈烈，反對江澤民連任的黨內爭鬥已經半公開化（在剛結束的兩會上，李瑞環的講話提出的「新三講」，非常明顯是針對江澤民的「老三講」而發的），正如李瑞環指出的，大陸的最根本危機恰恰在執政黨內。這樣的末世執政黨，一旦對台戰爭受挫，黨內危機也會象社會危機一樣全面爆發。黨內危機爆發的危險還在於，目前，由於中共當局全力打壓一切組織化、學術化、宗教性或准宗教性的民間整合力量，致使民間的自組織能力幾乎等於零，大陸社會的整合資源只有喪失了道義合法性的、依靠硬性強制權力和軟性利益收買的執政黨，執政黨的危機一旦爆發，必然導致群龍無首的社會雪崩式的瓦解。

7. 全社會的道德崩潰。更可怕的是，在政權的道義合法性日益瓦解的同時，大陸人在價值選擇上的無所適從和全無底線，唯眼前利益是從。由長期的政治無恥所造成的全社會的道德無恥，已經差不多毀滅了大陸人僅存的人性。從政治運動中的大小陰謀到經商大潮中的各個層次上的暗箱操作，背信棄義和唯利是從的犬儒化，已經成爲統治者和被統治者的行爲方式與思考方式的常態。即便是愛國主義這種最原始的群體感情也日益犬儒化了。去年的使館被誤炸風波，參加反美的示威遊行的大學生們，今天還憤怒地向美國駐中國大使館舉拳頭、喊口號、投擲磚塊和裝滿尿的塑膠袋，過些天就去美國使館辦簽證。今年三月，北京舉行去美國自費留學的教育展，其擁擠程度像每年春運期間的人貼著人的火車站，京城的人們也顧不上斯文了，像進城的農民工一樣你推我擠，致使展廳人滿爲患，主辦者不得不中止展覽。另外，據美國方面透露，大陸的省部級幹部幾乎每一家都有子女在美國或

西方。美國國防部長柯恩參加一個私人聚會，在回答記者關於兩岸關係的提問時說：我們手中有一張中共最害怕的王牌，那就是讓大陸的高幹子女在美國的鉅額財產曝光，向公眾展示他們的豪宅、遊艇、名車……（大意如此）。由此可見，愛國主義像一切官方口號一樣，只不過是牟取黨派的和個人的利益的工具而已。現在的大陸人除了權力和鈔票，除了一己私利之外，什麼也無法真正打動他們。就憑這樣犬儒化的愛國主義，怎麼可能靠戰爭來化解危機和加強民族的凝聚力？在社會危機和精神危機如此深重的情況下，除了中共之外，民間社會還沒有一種兼具道義的感召力、合法性和廣泛的動員能力的有組織的健康政治力量，可以成爲凝聚民意和穩定社會的核心。這樣一個處在道德品質完全腐爛之中的社會，既無力經受對外戰爭的嚴酷考驗，也無法提供新體制創建所需要的人性基礎，所以，危機一旦爆發，就可能玉石俱焚、片瓦無存。那可真就是上帝假自相殘殺的戰爭之手來毀滅我們這個民族了。

明智的選擇

從臺灣的角度看，中國一百多年的現代化努力在臺灣所創造的經濟奇蹟和政治奇蹟，使中國人居住的一個島嶼成爲舉世矚目的自由、民主、富裕的社會而得到世人的驚歎和尊敬，臺灣經驗爲欠發達國家、特別是爲大陸中國提供了怎樣走向現代化的示範，有力地駁斥了中國人不適於民主制度的「國情特殊論」和「文化決定論」。現在，臺灣的民主政治又結束了一黨獨大的不健康局面，開始了政黨輪替的新階段，中國人終於可以期盼自己的第

一個多黨政治時代的到來，標誌著民主政治健全的常規也將隨之建立。在有著幾千年帝制傳統的中國，在一黨統治半個多世紀的黨國體制的臺灣，在大陸的十三億人仍然屈從於威權體制的悲劇下，臺灣的成就實在是來之不易，值得所有的中國人珍惜。

從道義上講，臺灣人民完全有權利根據住民自決原則，通過公投來選擇自己的民族歸屬；但是，就現實而論，在世界上包括美國在內大多數國家都承認「一個中國」而不支援臺灣獨立的情況下，「台獨」決不是臺灣人自我珍惜的最佳選擇。如果民進黨的執政在兩岸關係的處理上，就是把過去的「國共之爭」轉化爲未來的「統獨之爭」，那無疑是陳水扁的最大失敗。既然大陸政權承諾「在一個中國的原則前提下，什麼都可以談」，臺灣政府就可以用承認「一個中國的原則」來交換大陸放棄「一國兩制」的香港模式，而接受「民主統一的原則」。兩岸統一的時間表就是大陸的經濟自由化和政治民主化的時間表。也就是說，只有大陸莊嚴地承諾進行真正的政治改革，臺灣才接受在「一個中國的原則下」的對等談判，「民主的和平統一」是臺灣的最後底線。如果一個只有二千三百萬人口的島嶼，能夠利用統一的契機促成有十三億人口的大陸社會的民主轉型，那不僅是對中華民族的、也是對人類文明的史無前例的偉大貢獻。

從大陸的角度講，歷盡內憂外患(主要是內憂)的大陸中國人，好不容易進入改革開放的時代，所處的國際環境也是一百多年來最好的，珍惜這來之不易的機遇的最優選擇，不是追求以武力爲手段，在短期內把自己的意志強加於臺灣，而是以臺灣經驗爲中國人的驕傲和典範，集中全部精力從事本身的經濟及政治改革。既然對臺灣的任何讓步都是「讓步給中國人」，既然臺灣的

民意是民主式的和平統一，那麼，放棄「一國兩制」的鄧小平模式，接受臺灣提出的「民主統一」模式，恰恰證明了中共的第三代不同於第二代的高瞻遠矚之處。大陸當局應該認清：「一國兩制」適用於香港、澳門，只是因爲那是收回殖民地而已，沒有太多可以還價的餘地；但是把「一國兩制」應用於臺灣這個國共內戰的遺留問題，就有些文不對題、強人所難了。國民黨退居臺灣後，中國分裂成兩個政權是已然的客觀事實。臺灣幾乎是在與大陸完全隔絕的環境下，自主地生存、發展了五十年，創造了舉世矚目的經濟奇蹟和政治奇蹟，如今又進入了政黨輪替的民主政治的新時期，即便拋開生活水準的巨大差距不論，僅從制度的角度而言，人家憑什麼要接受一個仍然獨裁的政權。臺灣人太知道生活在沒有自由的專制制度之下的痛苦，太珍惜靠著幾十年的流血犧牲所爭取到的自由和富足，他們怎麼可能接受一個專制政權的統治——哪怕僅僅是形式上的統治！鄧小平本以爲是寬大爲懷的「一國兩制」，香港人和澳門人的接受已經實屬無奈（因爲這種統一並沒有徵求港澳的民意，只是中英、中葡政府之間的決定），更何況已經自主生活了半個多世紀的臺灣人了。

實際上，「一國兩制」是鄧小平面對社會主義在世界範圍內失敗的事實，而不得不做出的無奈選擇，等於他已經承認社會主義失去了吸引力，大陸的統治模式無法強加於港、澳，只能在實質上放棄制度性的政治強求，以換取在面子上的民族統一。這種社會主義對資本主義的讓步和妥協，本身就是制度失敗的結果。那麼，面對東歐驟變、冷戰結束的社會主義全面失敗的國際大趨勢，面對自主地完成了由威權政治向民主政治的成功轉型的臺灣，江核心爲什麼就不能尊重現實、順應民意和歷史潮流，放棄

「一國兩制」呢？如果大陸政府不想讓臺灣無限期地拖延和平統一的談判，那麼大陸政府也不能無限期地拖延大陸的政治民主化改革。所以，大陸當局最明智的選擇就是放棄鄧小平的「一國兩制」，接受臺灣提出的「民主統一」的對等談判，把「兩制」刪除，只留下「一國」，「一個中國」是大陸的唯一前提。換言之，臺灣的陳水扁政府放棄「台獨」，接受大陸的「一個中國的原則」；大陸的江核心放棄「一國兩制」，接受臺灣的「民主統一的原則」，以和平統一的誠意來感召對方，以自由經濟和民主政治的雙重成就來吸引對方。如果這樣，我相信用不了五十年，統一大業就會水到渠成、瓜熟蒂落。如果這樣，大陸的現行執政者就既在兩岸民眾和國際社會之中贏得了道義上的合法性，又完成了中國的民主化和統一大業，江、朱等人就是超越中共的第一代和第二代的名副其實的第三代，成爲開創中國歷史新紀元的功德無量且名垂青史的偉人。何樂而不爲呢！

道義的責任和現實的要求都指向一個目標——兩岸問題的最終解決：和平是唯一的選擇，民主是最佳的前提。

對此，兩岸都應該懷有充分的信心和足夠的耐心與善意。有堅定的信心才會有從容的耐心和善意。無論現在的中共第三代能否完成民主統一的事業，也不論未來的兩岸關係是統一還是分離，歷史的潮流所預示的中華民族的最佳未來只能是：今日的臺灣就是明日的大陸。

2000年4月於北京家中

中共政權合法性來源的錯位

目前的大陸，正在近於癲狂地爲江澤民的「七一講話」造勢，不僅是輿論的全面渲染，更是組織化的總動員，繼中共政治局常委和委員的表態之後，就是人大、政協、軍委、中央和國務院的各部委、各省委以及工青婦、民主黨派、社會名流的紛紛表態。顯然，在明年的中共十六大上，「三個代表」肯定要作爲當代馬列主義的最新發展和偉大創舉而寫進黨章，說不定還要寫進《憲法》序言，成爲制度化的主導意識形態。

其政權的合法性從來沒有穩定的道義來源

旨在改變中共道統的性質、重塑政權合法性的江學說，儘管相對於火藥味十足的「四項基本原則」具有了些許懷柔的外觀，也許會把無產階級先鋒隊掌控的人民民主專政，變成一個各類權貴精英的俱樂部，但並不能真正賦予中共政權以穩定的合法性，因爲「三個代表」只著眼於維護一黨獨裁的執政策略的轉變，卻沒有從人類文明的主流中汲取道義合法性資源。中共從執政之日起，其政權的合法性首先是靠暴力、其次是靠政績來支撐的，卻

從來沒有穩定的道義來源。與毛澤東時代相比，改革以來的中共政權的暴虐性相對於降低，政績性相對上升，但是它依靠經濟政績和暴力恐怖來維持政權的實質並沒有根本的變化。市場化及經濟高增長、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六四大屠殺及鎮壓法輪功並行不悖，大眾文化的泛濫與嚴密的言論管制及意識形態灌輸互爲表裡，引進外資、高科技及管理方式和堅決防止和平演變同時進行……也就是鄧小平的遺訓：兩手抓，兩手都要硬！

然而，在世界進入現代以後，對於一個政權來說，它的合法性來源，在根本上不取決於執政者的政績，比如在日益普及的憲政民主制度下，總統的低能以及執政的乏善可陳，並不能否定他上臺和執政的合法性，只要他沒有違反憲法，總統再蠢也不能將他中途趕下臺，而只能等到憲法規定的下一次大選。作爲相反的例子，邱吉爾執政時期的政績可謂舉世公認，他領導英國人民打贏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使英國成爲歐洲罕見的沒有遭受納粹鐵蹄蹂躪的土地，但是這樣恢弘的政績並不能保證他在戰後的執政，就在剛剛取得戰爭勝利的1945年年底的大選中，工黨戰勝了保守黨上臺執政，邱吉爾也失去了首相的位置。邱吉爾現象在一個專制國家中是難以理解的，史達林靠反法西斯戰爭勝利的政績鞏固了他的個人獨裁，毛澤東靠內戰勝利的政績登上了個人獨裁權力的頂峰。

換言之，一個現代政黨上臺執政的合法性，即執政權力的合法性來源，在根本上並不是由高速經濟增長或其他的政績賦予的，而是由自然法(天賦人權、自由優先)的道義性決定的，它的現代形式就是由憲法規定的授權方式——選民授權。對遵守憲法的在任執政者，社會輿論只能評價其執政能力的高或低、個人品

質的好與壞，而不能置疑其權力的合法與否。而中共政權合法性的先天缺陷就是只依靠政績的支撐，一遇到危機便只能超常規地動用暴力。中共政權的興盛和衰敗完全取決於它的政績，毛澤東政權從五十年代的如日中天到1976年的「四五運動」的怨聲載道，鄧小平政權從八十年代中期的萬眾擁戴到六四之後的舉世唾棄，在在證明，政績是不穩定的，一個執政黨不可能總是幸運地保持住良好的政績。政績好時大家擁護，而政績差時大家就反對，而要在政績持續下滑的時期維持政權，就只能依靠由暴力支撐的強權。換言之，政績合法性的根本缺陷，就在於它狹隘的實用性和急功近利的即時性，而沒有可以持之久遠的超越暫時功利的道義來源。

中國朝代更迭的歷史，之所以跳不出一亂一治的惡性循環；一個朝代的興衰，之所以呈現出開國時萬眾擁戴而王朝末年則眾叛親離的規律性景觀；其根本原因就在於沒有穩定的權力合法性來源。政績本身的功利性和即時性決定了它的不穩定性，必然導致以政績爲合法性來源的政權的不穩定性，即大陸中國作爲一個極端實用主義的社會，一直沒有找到公共權力合法性的道義之源，也就一直處在以暴易暴、治亂迴圈的悲劇之中。在終極的意義上，這是沒有上帝即超越價值的悲劇，是不信神的實用的平庸民族必須遭受的天譴。

發源於西方的憲政民主政權，之所以能依靠和平的方式基本保證政權的穩定，不會出現朝代更迭時的動亂甚至暴力革命，就在於其公共權力合法性的道義來源的穩定性。西方傳統中的超越性價值一直極爲發達，古代人對上帝的虔誠自然轉化爲現代人對自由的堅守，轉化爲憲政民主政權合法性的超政績的道義之源，

即道義上從上帝法到自然法的演變過程，就是在社會中由教會法到自由憲法的演變過程。美國的《獨立宣言》、總統就職時把手放在《聖經》上宣誓，就是這種珍視和尊重超越價值的傳統的最好例證。

有人會以拉美經驗爲據，強調政績合法性對政權穩定的重要性。但是，拉美式的民主政權由於政績欠佳和腐敗橫行而被軍事政變推翻並取代，其根本原因不在於民主政權的合法性來源出了問題，而在於它的民主制度的不成熟和民眾意識的混亂。但是，即便是經歷過反反覆覆折騰的拉美諸國，軍政權的上臺也只是權宜之舉，根本無法長久地維持政權及社會的穩定。

中共執政後，總把每一點點成績掛在嘴邊

雖然大陸的《憲法》也有民眾授權的條文，但也就止於文字原則，從來沒有得到過現實中的踐行。中共執政後，總把每一點點成績掛在嘴邊，總是讓民眾感恩戴德，總是編造謊言和揮舞刺刀，實在是因爲它對自己政權的道義合法性缺乏信心。中共對公共權力合法性的理解仍然停留在中古時期，把暴力和政績作爲政權合法性的來源。如果中共自身的改造仍然迷戀暫時政績的權宜之計，那麼大陸政權就會永遠處在治亂迴圈的不穩定和以暴易暴的血腥之中，執政者就永遠擺脫不了瘧疾式的合法性危機

古希臘哲人德莫克利特說：我寧可在民主制度下受窮，也不去專制制度下享福。這句話之所以成爲千古傳頌的名言，得到越來越廣泛的世界性共鳴，就在於這句話簡潔地道出了制度合法性之源的優劣——來自道義的合法性優於來自暴力及政績的合法

性。而在目前的大陸，無論是執政黨還是其他精英，無論是大款還是失業者，還無法真正區分出制度及政權的合法性來源的優劣，小康的日子已經遮蔽了二者的根本區別。

在這樣的國情民風之下，能夠出現一代代的劉邦、李世民、毛澤東，卻無法出現一個華盛頓。中國的每代政治強人的開國之功是其合法性的頂峰，之後就是一路衰落，直到被新的王朝、新的君主所取代。如果在衰落的途中，有幸遇上一位英明的接班人，可以做出某種政績，使王朝得以暫時中興，但最終的衰落是必然的。一旦現政權出現政績空白期，那麼就只有經過慘烈的內亂，在血腥的屠戮下將前朝積累的資源破壞殆盡，又一輪「成王敗寇」的所謂政績，支撐起又一個新王朝的君主，而政權本身卻沒有一絲合法性上的根本進步，只有一代代原地踏步的惡性循環。

2001年8月8日於北京家中

中國人眼中的美國形象

2001年4月1日中美在南海的撞機事件，除了加深和強化中美在政治上、軍事上和外交上的敵對、不信任之外，我更爲憂慮的是此事件在兩國民眾的心理上投下的陰影。撞機作爲一個國際事件，不會糾纏多長時間，總會以某種妥協的方式得到解決，但是，此事件在兩國民眾之間製造的敵意，非但沒有隨之減弱，反而越來越深，它在民眾心理上的負面影響則是長久的。在二十四名機組人員離開大陸的海南之後，美國之音採訪的五名美國公民中，有四個人對中國政府不滿，認爲美國沒有責任，中國早該放人，只有一人認爲美國政府有責任。美國的民意調查也顯示，美國民眾對中國的敵意在迅速上升。

美國是經濟強大和政治民主的典範

我不太瞭解美國人對中國的各種看法，但是對中國人對美國的看法還是有所體會。在大多數中國人眼中，美國的形象是分裂的：

一方面，僅就國內行爲而言，美國是經濟強大和政治民主的

典範，是生活富足和個人自由的天堂；這種正面的評價，即便是中共的抹黑術宣傳也不能減損，中共所要防止的「和平演變」，在民眾心目中卻是個正面的進程，中國現在最需要的就是，一要「和平」，二要「演變」。從網友在美國大選難產期間發表的言論和國內媒體的大量報導中，足以看出大多數國人對美國式民主的肯定，對中共抹黑術的清醒透視。這種壓倒性的正面評價，甚至可以從江澤民動不動就引用林肯、傑弗遜的名言中看到。

美國是當今世界唯一霸權的象徵

而另一方面，就國際行爲而言，美國是當今世界唯一霸權的象徵，是不遵守國際法和不尊重弱國主權的蠻橫的國際警察，依靠強大的國力、先進的武器和主流文明話語而四處干預和挑釁。如果說，在海灣戰爭時期，大多數中國人還認爲對付海珊這樣的政治流氓和國際無賴，就需要美國這樣的富有國際道義感的警察。那麼，在科索沃空襲期間，特別是中國使館被炸之後，美國就由捍衛國際正義規則的秉公執法的警察，變成了地地道道的肆意破壞國際法的惡吏，是完全按照弱肉強食的野蠻的叢林規則行事，不尊重別國的主權和尊嚴的國際霸主。這種負面評價正是中共藉以抗衡美國的廣泛民意支援所在。

這樣，美國在中國人眼中成了善惡分裂的兩面神：一面是自由的旗幟，另一面是霸權的撒旦。在國內政治中堪稱民主典範的寬容政府，卻在國際政治中變成了盛氣淩人的霸道政府。

在1999年的使館風波中，少數清醒的自由知識分子的理性呼籲，已經被強烈的反霸權的怒吼所淹沒。一些在國內問題上偏向

自由主義的知識分子，也加入了在國際問題上反對美國霸權的聲討行列。比如一批經濟學家呼籲道：「中國一千多年來一直是世界第一超級大國，被人打敗只不過150年以來的事，最多追溯到300年。即使如此，目前在綜合國力方面，仍舊是除美國以外的，第二流的超級大國。建國50年來的騰飛，民族文化的復興，已經指日可待，憑什麼要在騰飛和瓦解的關鍵時刻，選擇自我瓦解?」另一本集體寫作的《變亂中的文明——霸權終結和秩序重建》在知識界頗爲流行，此書的結語叫做「大國的歷史使命」，像發宣言一樣的　喊道：在新世紀裡，「中國人睜開眼，全世界都會醒來。」中國人要「像我們的祖先那樣，必要時我們也敢於訴諸武力付出碧血」，用血肉建築反霸權的「第二座長城」！

撞機事件為狂熱的民族主義注入新的興奮劑

這次撞機事件，又爲這種狂熱的民族主義注入了新的興奮劑，何況，還有24個美國人和一架先進EP-3在中共手中。雖然表面上沒有使館風波那樣激烈，沒有各大城市的反美示威遊行，但是輿論發出的聲音卻遠比那時更爲一致，知識界再也沒有類似使館風波中的清醒，甚至連微弱的聲音都消失了。面對國內沸騰的民意，中共的輿論造勢集中抨擊的就是美國的國際霸權，美國對中國主權的侵犯，對中國民眾的不尊重以及對中國人生命的漠視。美國總統布希和國務卿鮑威爾在公開發言中，只關注24個美國人的人身安全和美國偵察機的機密安全，卻對至今還不見蹤影的中國飛行員不置一詞。美國新政府的強硬與漠視的態度，不但更激怒了中國民眾，而且恰好給了中共以充足的理由，在輿論上

譴責美國對人權的雙重標準，江澤民的表態，中央電視臺的「焦點訪談」和三大國內網站的帖子發出的是同一個聲音：難道美國人是人，中國人就不是人?! 難道美國人的生命就高貴到無價，中國人的生命卻低賤到不屑一顧?!

你可以置疑江澤民的表態並不是對人命的珍惜，因爲對國內的連續爆炸事件中的那麼多無辜死者，特別是對被炸得血肉橫飛芳林村的孩子們，江澤民並沒有表現出國家主席應有的沈重和歉疚。但是，就算江澤民的表態是一種政治謀略，爲這一謀略的實施成功提供前提的正是美國政府的傲慢和強硬。而登上美國偵察機進行檢查，不僅是中共的必然作爲，也是中國大多數民意的要求。

事件的複雜還在於，國與國之間的關係以國家利益爲核心。一個民選政府所代表的國家利益多少還以民意爲基礎，而一個非民選政府所聲言的國家利益常常與民意南轅北轍。而一旦獨裁政府在國際問題上贏得了民意的支援，那就只能加強獨裁政府對民眾的精神控制。如果美國政府把推廣自由民主作爲國家利益的一部分，那麼此次撞機事件在中國國內所強化的反霸權民意，恰恰有違於美國的國家利益，有利於中共的國家利益。

換言之，從使館風波到撞機事件，美國政府炸爛的，不只是中共的一座大使館和三個中國人，撞毀的也決不只是一架戰鬥機和一個駕駛員，而是美國從1972年開始的對中國的信譽投資，更是經過近三十年的努力在中國人心中建立起的良好形象。很可能使中國人在強烈的反霸權狂熱中，也把美國式的自由和民主一起反掉。而這，正是中共政權最希望看到的結果。

2001年4月5日於北京家中

「韜光養晦」的底線

人放了，機還了，撞機引發的中美關係緊張似乎過去了。三個月的時間內，兩國政府都做了一定的策略調整，特別是江核心在處理中美關係上的一貫低調，加之人機都在中方手中，使美國新政府的強硬態度也隨之軟化。布希總統呼籲國會給予中國最惠國待遇，中美就中國加入WTO完成談判，重申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不支援臺灣獨立，在北京申奧問題上採取中立立場，而且國務卿鮑威爾即將訪華，爲10月份布希總統的訪華做準備，7月4日，借美國獨立日225年慶典之機，中美元首又通過熱線電話彼此表達了善意，似乎爲中美關係的穩定展示了樂觀的前景。

然而，中美之間的實質性分歧以及對抗並沒有因此而縮小，因爲中美之間的對立開始於中共執政，儘管冷戰時期的年代，中美出於抗衡共同的敵人蘇聯而結成暫時的聯盟，而實質的制度及意識形態衝突並沒有消除。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美國政府對外戰略主軸之一，便是遏制共產極權和捍衛自由民主，向世界推廣自由民主的價值觀及其制度安排，一直是美國政府追求的國家利益之一。朝鮮戰爭、越南戰爭及與前蘇聯的軍備競賽，皆是美國爲實現這一全球戰略和捍衛國家利益的具體行爲，在這一點

上，二戰後美國的歷屆政府的對外戰略沒有根本的區別，柯林頓和小布希也沒有實質區別。區別只在於實現這一戰略的具體策略而已。

兩種制度及價值的對立

所以，美國政府與中共政權之爭是兩種制度及價值的對立，特別是在前蘇東的共產制度覆滅後，冷戰時期東西方的意識形態之爭、制度之爭就集中到中美之間，這種衝突是緊密的經貿關係和互惠的商業利益無法彌合的。布希在就任總統後數次公開演講中，反覆重申了「擴大自由就是促進國家利益」這一主題。他說：「美國，從本質上說是自由的象徵。我們必須牢記，自由的擴大就是我們的利益所在。」美國應該「成爲國際社會的自由先鋒和正義力量」，「讓自由的力量遍布全球」。如果硬要說是什麼給了美國充當世界警察的這一霸權的合法性，那麼只能是布希一再強調的「自由」，「自由」以其善待人性的柔性力量，成爲所向披靡的「全球霸權」。美國主導的海灣戰爭、軍事干預科索沃以及協防民主臺灣，其國際合法性皆源於「人權高於主權」的這一自由主義價值觀的道義支撐。

正是在這種宏觀的二種制度的對峙和競爭的大背景下，雖然中美之間的官方關係可以時而緊張時而緩解，但是根本衝突的最後底線則不會變化。只要中共仍然堅持一黨獨裁制度，美國一定會把中國作爲主要的競爭對手加以圍堵，中共也就一定把美國作爲最具威脅的外來顛覆者。就目前而言，美國決不會放棄繼續推行全球自由化民主化的主動出擊的人權外交，中共也決不會放棄

確保一黨獨裁體制的防禦性的主權外交。也正是在此大背景下，中美關係不僅成爲江核心的外交主軸，而且也是大陸媒體關注的優先熱點，所有媒體、特別是網路上的國際專題中，討論最多的就是中美關係。

撞機以來，在經歷了最初的民族主義狂熱的大宣洩之後，現在談論最多的焦點，是當年鄧小平提出的「韜光養晦」之外交謀略，並形成了鮮明對立的兩派，一派贊成，重申「絕不當頭」的種種好處和無奈，號召臥薪嘗膽、忍辱負重；一派反對，大肆鼓吹「主動出擊，有所作爲」的壯舉和勇氣。但是，除了極少數人的言論能夠跳出官方所預設的前提之外，大多數人的發言皆立足於同樣的官方前提：即拋開實質性的制度之爭及道義基礎，而只專注於民族主義的訴求及對實力對比的分析。

中美關係不對等，是江核心的軟弱所致？

反對「韜光養晦」的一派認爲，在中美之間的較量中，即便在中國的國力和軍力遠不如美國的情況下，也從來沒有輸給過美國人，冷戰時期的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就是最好的例證。何況，經過改革開放二十幾年的發展，現在大陸的國力及其軍事威懾力，足以支撐中共通過奇襲臺灣的方式向美國攤牌，即便實力不如美國，但是美國人怕死，政府怕民眾反戰，決不會爲了臺灣而不惜與中國一戰，中國的人口之多足以彌補軍事裝備上的相對弱勢，似乎只要中國作出犧牲幾千萬人的決絕姿態，往美國的本土任何一個地方扔幾個導彈，美國人就會驚呼著放棄協防臺灣。拿下臺灣就等於戰勝了美國。有人甚至重申毛澤東當年的極爲殘忍

的豪言壯志：犧牲中國三分之一的人口，換來美國霸權的覆滅，一雪百年國恥，值得！

這派認爲，中美關係的不對等，決不是因爲道義上或實力上的劣勢，而是江核心的軟弱所致，只要有足夠的勇氣，中國就可以挑戰作爲唯一超級大國的美國，甚至在前蘇聯解體後，中國是當今世界上能夠抗衡美國霸權的唯一國家，起碼可以代替前蘇聯成爲挑戰美國霸權的盟主。這一派攻擊的矛頭，一端刺向美國、臺灣以及日本，罵美國霸權主義，罵日本軍國主義、罵臺灣分裂主義；一端刺向主張妥協的江澤民和朱鎔基，罵江朱奉行的是親美媚美懼美的誤國外交，甚至就是變相賣國的懦夫。有一篇議論起來頭頭是道的文章中，居然夾雜著這樣憋了一口長氣的新式國罵：「美國佬，我操你老母疊你媽捏你媽個奶頭砍母子倆操你媽個叉叉賤種一棍掄死。」

贊成「韜光養晦」派認爲，以大陸現在的實力與美國對抗甚至在軍事上攤牌，無異於以卵擊石、自取滅亡，也就等於間接地讓臺灣獨立，所以大陸現在應該繼續「韜光養晦」，不在軍事上與美國攤牌以及保證一個和平的國際環境，是中國處理中美關係的最後底線。在此底線上，中國在外交上應該採取兩手策略：一方面，積極介入世界的經濟事物，爭取盡快加入WTO，以經貿關係和對臺灣的軍事威懾牽制美國，既能繼續從對美貿易中撈取順差，又能吸引臺灣的資金、消耗臺灣的實力和士氣；另一方面，應該盡量利用世界日趨多極化的趨勢，充分施展合縱聯橫的外交手法，在國際上支援一切挑戰美國霸權的國家，建立廣泛的統一戰線，無論這類國家的制度如何、在國際上的作用如何、對中國的態度如何，只要不買美國人的賬，中國就應該採取或明確或巧

妙的方式予以支援，比如，與俄羅斯結盟的「上海五國」就是一步高棋；在環保、NMD等問題上盡量與歐盟協調立場；在人權問題上繼續奉行已經取得成功的對策，既要分化西方集團又要抓住那些人權記錄不佳的國家，建立共同抗拒美國人權外交的同盟；甚至要利用美國的民主制度的權力分散、多中心、利益集團多元化的制度弱點，採取積極的外交戰略，拉攏和遊說那些不滿於布希政府的利益集團，善待對中共對中國友好的利益集團，特別要利用美國的種族歧視來遊說和收買所有海外華人，分化反共反華力量，盡量爭取一切可以制衡美國政府的力量，以制約進而扭轉現行布希政府圍堵中國的外交戰略。在亞洲，盡量改善與周邊國家的關係，特別是與印度的關係，並利用經貿關係牽制日本，聯合亞洲其他國家反對日本復活軍國主義的右翼勢力。

同時，要集中全力辦好國內的事：一方面，必須保持經濟的高增長，增長速度不能低於7%，對涉及到國家安全的產業繼續實行壟斷性經營，特別要對高科技軍事產業進行大的投入和政策優惠，盡快提高軍力和綜合國力的高技術含量，爲將來打贏一場收復臺灣的現代化戰爭做好充分的準備；另一方面，要在政治上堅持中共的領導核心，加強政府的權威，強化愛國主義意識，用民族主義和傳統文化作爲凝聚民心的意識形態，保持社會的穩定和經濟的持續高增長……總之，一切政策的制定都要服從於國家強盛和民族復興的長遠目標。有人甚至計算出，以現在的發展速度，二、三十年後大陸中國的綜合國力就將趕上美國，起碼和法國持平。到那時，不用我們每天高喊統一祖國，臺灣就會主動走到談判桌前，美國也會主動敦促臺灣與大陸在「一個中國」的前提下進行談判。

第三代領導集體的外交智慧日趨穩健和成熟

像反對「韜光養晦」派一樣，贊成派也把美國及臺灣視爲最大的敵人，但是對江核心現行的國策深表贊同，認爲撞機事件的處理充分展示了第三代領導集體的外交智慧日趨穩健和成熟。即便有所批評，也屬於小罵大幫忙一路。而對美國，講到動情處也要來幾口唾沫，下流一把，有的文章甚至說：「搞不了小布希和陳水扁，起碼可以把他們的的嘻皮女兒或親戚搞上床……」

姑且不論以上想法中有多少一廂情願的幻想的成分和下流的心態，只就兩派的底線而論，大都是與當今國際趨勢的發展方向和主流文明格格不入的陳舊觀念。很顯然，在對實力對比的估計上截然對立的兩派，實質上是一派，二者都把美國當作頭號敵人，皆遵循著完全相同的思維方式，具有基本一樣的功利主義價值觀，兩者的區別只在於：是現在就與美國全面攤牌，還是等實力強大到不戰則已戰則必勝的時候再攤牌。

講到「韜光養晦」，似乎是中國人永遠會引以爲自豪的古老智慧，越王勾踐的臥薪嘗膽和甘爲奴僕的忍辱負重，終於在受盡恥辱之後，使他在與吳王的爭霸之業中，報復成功，一雪前恥。這個故事一直是帝王師們教導皇帝怎樣奮發圖強的經典保留節目，也是當代國人熟衷的歷史典故之一，各類史書、文學演繹、影視改編都把勾踐作爲正面形象加以渲染——能屈能伸、終成大業的英明君主，在某種意義上，勾踐已經作爲一種人格典範進入了國人的集體潛意識。家長們、老師們也經常用這個典故教導孩子的。與此類似的全民教材，還有韓信受「胯下之辱」而終成偉

業的典故。在國人的心中，這類歷史典故充滿了高超的生存智慧，卻從來沒有認真反思過，這類實用的甚至投機的智慧之中潛含的厚黑內核。

「韜光養晦」無法作為國策的道義依託

「韜光養晦」作爲一種人生智慧，所宣講的生存策略或成功之道，缺少最起碼的現代文明品質，根本。首先，這類智慧的前提，只是把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理解爲主奴關係，而且是沒有任何誠信的主奴關係。每一個具有做主子野心的人，在實力不及或時機不成熟之時，甘願充當奴隸，並挖空心思腐蝕主子，讓主子放鬆對奴隸造反的警惕，沈迷於聲色犬馬和玩物喪志之中，直到主子徹底墮落、耗盡實力和意志力之後，奴隸便東山再起，一舉顛倒過去的主奴關係，把主子踏在腳下，使昔日的主子變成今日的奴隸，而昔日的奴隸變成今日的主子，而且要加倍的羞辱曾經羞辱過他的人。其次，就個人本身來說，受欺壓的奴隸雖然抱有成爲主子的鴻鵠之志，但是他從不把人當作人來對待，特別是不把人作爲具有不可羞辱之平等尊嚴的存在來對待，不僅對別人如此，對自己也是如此。他完全無視作爲一個人的尊嚴和人格，不僅忍辱負重，更重要的是教人怎樣自討羞辱和自甘爲奴，要說起謊來決不臉紅，表演的比所有的奴才都更奴才。而他甘願付出的這一切代價，決不是爲了爭取平等的尊嚴，而是爲了有朝一日的飛黃騰達，做人上人，做可以任意羞辱別人的主子。第三，就其對目的和手段的理解來說，這是典型的爲達目的而不擇手段的下流邏輯，是一種陰謀政治和小人心態所養成的蛀蟲習性，在公開

的陽光下完全是以假面出場，而真實的野心和目的卻躲在陰暗潮濕的角落裡窺視動靜、等待時機。在網上，居然有人說，美國的制度是透明的，而中國的制度是黑箱的，所以在中美的衝突中，美國在明處，中國在暗處，這有利於中國對美國的打擊。這是一種怎樣陰暗的智慧，讀之令人不寒而慄。記得美國著名的民權領袖馬丁·路德·金說過：目的的正當永遠不能爲手段的不正當辯護，因爲不正當的手段將使正當的目的脫離其本意，最終，目的就會淪爲不正當手段的手段——用所謂崇高的善良的目的來爲下流的殘暴的手段辯護。納粹的種族大屠殺是爲了達到種族純潔的手段，但是在實施這種手段時，就必須用純潔種族的目來爲種族大屠殺辯護；共產極權體制是爲了實現解放全人類的高尚目標的手段，實際上卻變成用解放全人類的理想來爲維持極權制度進行辯護，最終就變成了一切目的論的意識形態說教，皆成爲獨裁者爲達到不放棄絕對權力而使用的欺騙手段，永保極權體制才是獨裁者唯一的目的。於是，目的變成了手段，手段變成了目的。就韜光養晦來說，就是用復仇的正義或成功的正義等目的來爲放棄尊嚴、自討其辱、戴著假面、背後陰謀等手段辯護，用做人上人的目的來爲自甘於非人的生存策略辯護。而一掀開老底，才看清正是目的的齷齪才導致了手段的下流，手段的下流恰恰是爲了達到齷齪的目的。

把這種古老的中國智慧應用於當代政治和國際關係，就是以極端的民族主義和國家主義爲終極目標，以陳舊的主權高於一切爲人類正義之基礎，「韜光養晦」之手段所要達致的目的，決不是以平等的姿態進入世界主流文明，而是爲了達到民族復興，恢復曾經有過的萬邦來朝的「天朝大國」的地位。他們把中美的對

抗完全歸於民族之間的有你無我的衝突，把抗衡美國完全歸結於捍衛民族尊嚴和國家利益。而人權、自由、民主、住民自決等國際公認的普世價值，從來不會進入他們的視野；在他們眼中，「人權高於主權」的新世紀的新規則，不過是西方人推行政治軍事文化等霸權的表面藉口，是美國企圖建立惟我獨尊的單極化世界秩序的遮羞布。其實，最早提出這一外交謀略的鄧小平，就是一個極端實用主義者，「韜光養晦」不過是他的「貓論」在外交上的應用而已。正如在覬覦最高權力時，他向英明的華主席保證「永不翻案」；在失去權力的恐懼中，他用發展經濟的目的來爲刺刀下的穩定進行辯護。

這種只講實力而不講道義、只講抽象的民族尊嚴而不講個人尊嚴、只講國家主權而不講弱勢民族自決權利、只講群體利益而不講個人自由、只講特殊國情而不講普世原則、只是對內強硬而對外一味韜晦的民族主義和國家主義，在目前的大陸語境裡，要麼是暴虐化的義和團情結，要麼是犬儒化的實用主義，在不損害自身既得利益的前提下，高喊著「把愛國熱情轉變爲強國動力」的口號，加入由執政黨發動的「愛國秀」的大獎賽。這其中的絕大多數人，除了對自己的既得利益有著聰明的計算外，其他方面不過是跟著起哄而已。你怎麼能指望對身邊的強盜俯首帖耳的路人，有一天會爲了民族尊嚴而戰。

中共政權的實用主義，只在乎一黨獨裁權力

在經過半個多世紀的制度競爭中，勝負成敗已經一目了然。現在，中美之間的對抗，中共政權只能採取守勢。當年，鄧小平

提出「韜光養晦」的對外政策，與他力主用「一國兩制」來解決香港問題是一致的。讓香港保留資本主義和言論自由，並不是中共在價值觀上已經認同，而是制度競爭中的劣勢下的無奈選擇。同樣，「決不當頭」的韜晦之策，也是出於這樣的無奈。現在的中共政權已經極爲實用主義了，它可以不在乎什麼主義，但它在乎一黨獨裁的權力。發展經濟也好，花錢買穩定或鎮壓出穩定也好，提倡愛國主義也好，宣示「三講」「三個代表」也好，五十年大慶也好，八十年誕辰也好，反國際霸權也好，保持穩定的中美關係也好，全力申奧也好，捉放間諜玩人質外交也好……中共的核心目標只有一個，那就是保證它的獨裁權力。只要這條底線能守住，怎麼幹都行！這種保權第一的實用主義的最新證據，就是中共建黨80周年慶典前夕的意識形態動作：一方面全力打壓所有不利於政權的媒體和言論，另一方面強制性要求所有媒體爲中共歌功頌德。7・1前後的兩個周末，就連全國各電視臺的娛樂性節目，也全部變成了中共黨史的知識競賽！

然而，以二十一世紀的世界潮流和實力對比而言，如果中共不進行實質性的制度改革和創新，不重新定位政權的道義合法性，那麼中共就只能處在永無出頭之日的「韜光養晦」之中，只能以弱國的姿態在國際上「放下身段」和「忍辱負重」，以出賣人的尊嚴和民族的尊嚴來祈求同情(如此次北京申奧)，只能與那些逆歷史潮流的無賴國家爲伍，因爲現在的國際秩序不是戰國時代的武力爭霸，中國的對手也不是吳王夫差，中共即便有越王勾踐的定力，也無法成就勾踐的復仇事業和稱霸野心。如果中共仍然抱有這樣的信念：在不改變一黨獨裁體制的前提下，經過若干年的「韜光養晦」而強大到足以打敗美國的程度，就純然是一廂

情願的偏執狂幻想了。那樣非但無法強大，反而將使中國人以及中華民族成爲中共政權的殉葬品。

2001年7月1日於北京家中

日本人為什麼不肯道歉？

最近，隨著布希新政府對中共政權的圍堵政策的逐漸明晰，日本新的小泉純一郎政府在外交上也對中共強硬起來，公開參與美國的戰略重心向亞洲的轉移，二戰時期的歷史問題又成爲中日兩國關注的焦點：日本政府不修改歪曲二戰歷史的教科書，不承認強迫亞洲被侵略國的婦女做慰安婦，參拜靖國神社，修改和平憲法以重整軍備……儘管中國不再是東亞病夫，在軍事上也屬於亞洲的強國，但是日本人仍然決不向受它蹂躪過的中國道歉。爲什麼德國人能夠幾十年如一日地反省自己的戰爭罪惡，甚至其道歉已經延伸到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的屠殺平民罪，而爲什麼曾犯下深重的歷史罪惡——從甲午海戰的旅順大屠殺到二戰時期的南京大屠殺——的日本人至今不肯悔罪呢？我認爲，因爲日本人的戰爭觀念和種族觀念仍然是野蠻的、充滿了大和民族優越感及骨子裡的對其他民族的蔑視。而具體到中國，還因爲中共執政後對歷史的僞造。

日本侵略中國失敗只是敗給美國而已

首先，在戰爭觀念上，日本人仍然停留在野蠻的中世紀，即

以武士道精神爲主導的戰爭觀念——只論戰爭的勝負結果而不論戰爭正義與否的道義性質。在這種戰爭觀念的主導下，日本人認爲：二戰期間，從單純的軍事上講，日本人在亞洲並沒有遭到過真正的挑戰，特別是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前，太陽旗插遍亞洲諸國，日本皇軍幾乎所向無敵。它在二戰中的失敗不是敗給了亞洲的任何一個國家，不是被朝鮮、菲律賓、緬甸……等小國打敗的，更不是被中國這樣有美、蘇幫助的大國打敗的，而是敗在太平洋戰爭，敗在廣島和長崎的兩顆原子彈，一句話，是敗在美國人的手中。歷史事實亦是如此。儘管在盧溝橋事變發生後，1937年7月17日，蔣介石和汪精衛在廬山發表了著名的「最後關頭」演說：蔣的「焦土抗戰」和汪的「灰燼抗戰」的宣言，儘管在1939年之前，中國人對日本人進行了頑強的抗擊，但是不要說共軍的小打小鬧的遊擊戰趕不走日本人，就是國軍在正面戰場上的浴血奮戰也趕不走日本人。國軍在上海、南京、長沙、武漢等血腥而慘烈的保衛戰中一敗塗地，1938年6月9日，國民黨政府在沒有預告的情況下，突然炸開黃河大堤，泛濫的黃河水並沒有淹死一個日軍，卻淹死十多萬中國老百姓，二百多萬中國人變成無家可歸、一貧如洗的難民。不久，國軍又在預定撤退的長沙放火，實行蔣介石的所謂「焦土抗戰」，結果燒死平民數萬，卻沒有幾個日本軍人死於大火。國軍的正面抵抗、決堤洪水和大火焦土所付出的生命和財產的巨大代價，都沒有能夠阻擋住日本人長驅直入的腳步。

中國對日戰爭的勝利，不過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盟國對軸心國的勝利的附屬結果而已。沒有盟國的勝利，中國也許到現在仍然是大東亞共榮圈中的臣屬國。中國人從來都是對外戰爭的懦

夫、窩裡鬥的英雄，就像成吉思汗的馬蹄踏破中原、滿人的八旗軍衝破山海關、幾千名八國聯軍就能夠佔領北京一樣。

在亞洲，更令日本人不可一世、不承認戰敗和不肯悔罪的原因是：二戰的失敗並沒有導致大和民族的一蹶不振，反而再一次激發了日本的畸形民族自尊，把戰敗的恥辱化爲振興的動力。它完成了和平時代的經濟奇蹟和政治制度的成功轉型，在亞洲，它不僅是經濟上的第一大國，而且是政治上的第一個成熟的民主國家，後來又在經濟上成爲世界的第二大國。這樣迅速現代化的日本有實力和資本來支撐它的野蠻的戰爭觀念。

其次，日本人之所以到現在仍不肯向中國表示悔罪，就在於他們在骨子裡具有根深蒂固的種族歧視的觀念，認爲大和民族相對於其他亞洲民族，具有先天的優越性，支那人不是人，起碼不是可以與日本人平起平坐的人的觀念，至今仍然是日本朝野的主流。日本，當它在明治維新之後迅速崛起爲世界強國，取得了與西方列強同樣的大國地位之後，它在對中和對俄的戰爭中先後取得了勝利，鞏固了它的大國地位，助長了它的種族優越和向外擴張的氣焰。特別是對中國，從甲午海戰到二戰，中國人皆是日本人手下的敗將。所以，日本人就一直看不起中國人，無論是滿清時期的北洋水師，還是抗戰中的國軍和共軍，中國人在中日戰爭中的表現，也確實爲日本人對中國人的蔑視提供了充足的證據。

滿清時期的泱泱大國之敗於蕞爾小國的日本，論者已多，茲不贅述。同樣，抗日戰爭時期，中國人的表現也給日本人留下的輕蔑中國人的口實——在外敵入侵的情況下，中國人卻因窩裡鬥而四分五裂：日本人可以利用滿清退位皇帝恢復帝制的夢想而建立傀儡滿洲國，可以利用國民黨的分裂而扶植汪精衛僞政權；可

以得意於東北和山東的輕易到手，驚愕於張學良以兵諫的方式逼迫中國的最高統帥進行抗戰，幸災樂禍於國共兩黨的血腥內鬥；可以一個日本兵騎著一匹高頭大馬，扛著挑在刺刀尖上的太陽旗，遇不到絲毫抵抗地佔領一個村莊；可以三個日人兵征服一個鄉鎮甚至一個縣城，接著就是僞證權的建立和漢奸僞軍對秩序的維持。1940年以後，一系列的慘重失敗和中共的內部威脅，使抗戰的主力即蔣介石的軍隊基本停止了與日本人的正面對抗，特別是「太平洋戰爭」爆發、美國對日宣戰後，國軍的抗戰除了湖南的被動防禦性會戰和滇緬地區的戰鬥還有一定的規模之外，蔣介石把主要的精力集中在遏制中共的擴張和坐大上。而中共在國軍腹背受敵的窘境中，抓緊時機在西北的邊緣地區盡量擴充地盤和發展軍隊，特別是在毛澤東執掌中共的最高決策權之後，中共的抗日基本遵循著毛澤東的保存和發展實力的方針，決不與日本人正面對抗，只是在日本人進行大掃蕩的威逼下，爲了自我保存而不得不被動自衛的小打小鬧，很少有主動出擊的戰鬥。表面上形成了國共統一戰線，但是雙方各有對將來中國領導權的自私盤算，蔣介石和毛澤東都準備坐享英、美、蘇同盟對軸心國的勝利，都希望借助於日本人的力量削弱對方、保存實力，以圖將來的稱霸中國。中國所貢獻給反法西斯戰爭的，主要是依靠遼闊的國土和眾多的人口拖住日本人，也就是蔣介石的「以空間換時間」拖延戰略。

這種懦弱而自私的心態，汪精衛在發表慷慨激昂的「灰燼抗戰」的救亡演說時，已經委婉地點到了。他說：「歷史上的元滅宋、清滅明，這兩次被外族侵略而亡，不是侵略者能使我們四萬萬人被殺盡，能將我們的土地毀盡，而是我們死了幾個有血性的

人之後，大多數沒有血性的人，將自己的身體連同所有的土地，都進貢給侵略者，以爲富貴之地……所以我們必定要強制我們的國民一齊犧牲，不留一個傀儡的種子。無論是通都大鎮，無論是鄉村僻壤，必使人與地俱成灰燼。我們犧牲完了，我們抵抗之目的也達到了。……我們如不犧牲，那就只有做傀儡了。」而在內心深處，他清楚地知道：別看國共乃至全國都表面上一致高喊「抗戰到底，犧牲到底」的口號，實際上真的準備爲國家犧牲的人實在寥寥。大部分人希望別人去犧牲，而並不犧牲自己；大部分人不肯像汪精衛那樣老實地承認不願犧牲自己，就在於害怕承擔賣國的罪名和亡國的責任。中國後來抗戰，的確驗證了汪精衛對國民劣根性的悲觀分析，也使這位曾經刺殺滿清大員的血性漢子，變成了侵略者的傀儡。無論是國共兩黨還是全體中國人，大多數人的首要目標是保全身家性命，國共兩黨是保全小集團利益，其最高領袖是保存稱王稱霸的資本，而真正勇於爲國流血犧牲的人的確少之又少。換言之，對日戰爭之敗，在根本上不是敗給了外敵，而是敗在我們自己的手中。

一位日本網蟲在與中國網蟲對話時說：「不管你們怎樣破口大罵，我很高興沒有罵我們大和民族懶惰，沒有罵我們不認真，沒有罵我們貧窮，沒有罵我們官員貪污。沒有罵我們忘記以前為國家利益獻身的你們所謂的「戰犯」，沒有罵我們的女人沒有女人味，沒有罵我們窩裡鬥，這就好像在變相地誇我們啊！看到你們無力的咒罵，我感到很欣慰，因為我們沒有上面的缺點啊。」「我們大和民族不是因為罵人而崛起，我們是靠我們的勤勞，靠我們的認真，靠我們整個民族的團隊精神。」如果拋開情緒化的民族情緒，我們不能不承認這位日本網蟲所說的確是言之有理的。

日本在中國的主要對手是蔣介石

再次，日本人認爲：1949年後執政的中共一直在歪曲中日戰爭的歷史。日本人敗給美國而不是敗給中國已如前述。而在國共抗戰的歷史上，中共簡直就是在撒彌天大謊。日本人太知道，他們的主要敵人是蔣介石而不是毛澤東，對抗他們的主力軍不是共軍而是國軍，日本在盟軍的打擊下的被迫投降，是向國民政府而不是向中共，如若沒有日本人的壓力，憑著蔣介石當時的實力和決心，中共是斷斷不能在中國執政的。但是，中共執政後，中國八年抗戰的歷史完全變成了以中共爲主、在中共領導下的反侵略戰爭，抗戰的勝利也是中共的勝利。而國民黨軍隊在全部正面戰場上對日本人的抗擊，國民黨軍隊與日軍大小會戰二十餘次、較大戰鬥近五萬次、付出近500萬將士的鮮血、斃傷俘日軍近200萬，正是國軍付出了如此巨大的代價，才換來了中國成爲世界四強之一的地位與聯合國常任理事國，才出現抗戰勝利後萬人空巷歡迎作爲民族英雄的蔣委員長的感人場面……這一切在中共僞造的歷史中全部消失了，剩下的只是中共軍隊的「平型關」、「百團大戰」和遊擊戰。似乎擁有現代化的裝備和訓練的日本軍隊是被挖地道、埋地雷、扒鐵路、割電線、伏擊戰……這些打了就跑的遊擊戰趕走的。

實際上，中共的戰爭觀念與日本右翼是一樣的，也是成王敗寇的實用主義的戰爭觀和歷史觀。中共如此歪曲歷史恰恰給了日本人以竄改歷史的口實，日本人會說：不是我們竄改和歪曲歷史，中日戰爭的歷史首先是被中共任意竄改和歪曲的。在要求我

們日本修改教科書的同時，中國爲什麼不修改自己的教科書，還歷史以本來面目！

《鬼子來了》是中國第一部反思抗戰的電影

能夠佐證以上事實的最有力的近例，就是姜文兩年前拍的中日戰爭影片《鬼子來了》在大陸的悲慘命運。儘管《鬼子來了》獲得了法國嘎納電影節「評委會大獎」，但是中共封殺了這部影片，日本人也不喜歡這部影片。之所以如此，就在於影片的真實力量，它同時揭穿中共和日本右翼的雙重謊言。

對中共而言，這是1949年後，大陸出現的第一部真實地反思抗日戰爭的力作，其開掘之深和藝術品味之高，在改革二十多年以來的大陸電影中，實屬罕見。影片首先揭示了中共並不是領導抗戰的政黨，反而是不遵守諾言的見死不救的土匪無賴，如果公映，將在視覺上特別是在普通的百姓中顛覆中共僞造的歷史，使中共不光彩的歷史爆光，有損於中共經過多年僞造而塑造的偉光正的形象；其次，影片繼承了魯迅的國民性批判的偉大傳統，深刻、辛辣、幽默，直入中國人的國民性的底層，揭示了日本人之所以能夠在中國勢如破竹的深層原因——中國人的自私、懦弱、不負責任、在關鍵時刻出賣和背叛自己人的本性，也就是當慣了家奴的國人，一旦面對強大的外敵，就將自動地轉化爲漢奸。影片中的眾多角色，唯一具有責任感和人性之善的男主角，最後卻死在了作爲接受大員的國軍手中，而且國軍是讓日本俘虜來充當屠戮中國人的劊子手！而且還是採取爲了威懾其他國人的示眾梟首的方式！周圍依然擠滿了麻木的看客。這種對國民性的尖銳

揭示，甚至遠遠超過刺激年輕的魯迅棄醫從文的看客們。更重要的是，這部影片對中共死死抓住的最後的意識形態王牌——愛國主義或民族主義——是釜底抽薪的顛覆。所以，中共非封殺不可。

對日本人來說，他們之所以不喜歡這部影片，就在於這部影片真實地再現了：日本侵略者是怎樣對手無寸鐵而又恭順溫和的無辜平民大開殺戒的，而現在日本人不承認南京大屠殺的重要理由之一，就是他們不認爲當年在南京屠殺的中國人是平民。日本人堅持說，在中國他們從未有意識地屠殺非武裝的平民，殺的都是參戰人員，或正規軍或遊擊隊，而這在戰爭狀態下是正常的，絕非反人類罪。中共封殺了這部片子，海內外都不准發行，正中了日本人的下懷，因爲儘管日本人不喜歡《鬼子來了》，如果中共政權不封殺，日本政府和右翼分子無法禁止這部影片在日本的上映。

日本必須承認發動侵略戰爭的罪責

總之，日本人不承認侵略戰爭的罪行，不肯向中國乃至亞洲的其他受害國懺悔道歉，一是因爲日本作爲一個民族，在評價戰爭的問題上不具有起碼的道義感，仍然停留在「成王敗寇」的純粹實用主義的野蠻階段。它認爲在亞洲自己不是戰敗者，而是勝利者，無論是過去還是現在，它從沒有輸給過任何亞洲國家，特別是中國。二是因爲日本人根深蒂固的種族偏見和畸形的種族優越感。日本人認爲自己在上個世紀初是、在二戰中是、現在仍然是亞洲最強大的國家，起碼現在的亞洲，還沒有能夠真正向它進行挑戰的國家，更何況它所面對的唯一有希望在綜合國力上超過

它的中國，又是一個在國際和國內都喪失了道義合法性的政權。三是因爲中共篡改和歪曲歷史，日本的右翼分子和軍國主義殘餘，就能夠以中共僞造歷史爲口實，讓二戰後出生的日本人不相信現在中國人所陳述的歷史。即便中共在國內用謊言愚民而向國外講述真正的中日戰爭史，但是由於其一貫撒謊的本性，也無法贏得別人的信任，日本人會說：一個連自己的歷史都全面篡改和僞造的政權，怎麼可能不歪曲它與外國的戰爭史。

爲了保證將來的亞洲和世界的和平，就必須讓日本人承認戰爭罪責，向亞洲向中國道歉，而要做到這一點，就應該有兩方面的努力：一方面，中國必須呼應韓國的倡議，聯合其他亞洲國家，建立一個以道義和實力爲基礎的各國聯盟，並征得國際上的廣泛的道義支援，一起對日本政府施加壓力，使之在道義上陷於孤家寡人的困境之中；另一方面，中共政權首先要使自己誠實地面對歷史，通過政治改革使中國走出在道義上的弱勢困境，使西方世界沒有在道義上姑息日本而孤立中國的理由，讓日本軍國主義像納粹主義一樣，在全世界範圍內成爲千夫所指的人類公敵，逼迫日本在道義上放棄軍國主義、武士道和種族偏見。這樣，中華民族才盡到對自己、對亞洲、對世界的正義與安全所承擔的責任，才會成爲令文明世界尊重的民族。

中國人現在的口頭禪是「落後就要挨打」，主流輿論主張加快經濟發展和軍事升級，但是，在當今世界，只靠物質力量的強大是不足以服人的，更重要的是，單純的物質主義恰恰無法帶來真正的物質實力上的強大，即便可以在短期內強大起來，也不會有長遠的前途，昔日的德國、日本和蘇聯就是最好的例證。一個國家的強大和一個人的強大是一樣的，其最根本的支撐，首先是

道義上的強大，其次才是實力上的強大。所謂「有理走遍天下，無理寸步難行」，此之謂也。

2001年5月30日於北京家中

盛宴換不來應有的尊嚴

——簡評大陸媒體對APEC會議的報導

APEC已變成江澤民的國際大秀

從輿論造勢到浦江煙花，在大陸喧囂了近一個月的APEC會議終於安全落幕。像任何一次可以顯示中共成就的國際大秀一樣，中共政權借助於此次會議，對外極盡鋪張奢侈的裝扮，以顯示大陸取得的成功；對內竭力宣傳中共政權國際地位的提升，以強化民眾的民族主義自傲感。從10月19日到22日的各大媒體頭條，皆是APEC峰會的新聞，頭版上都有江澤民那笑容滿面的照片。媒體突出的主題無非是江澤民個人——在上海召開中共執政50多年來主持的最高規格的國際會議，是江核心善於駕馭國際風雲的偉大成就；甚至在介紹歷屆APEC會議之時，總是突出江澤民提出了什麼觀點，彷彿每次APEC的主題皆是由江澤民確定的；似乎APEC會議在上海召開，不是輪流坐莊的規則而是大陸的特殊使然。

中共爲什麼對小布希蜻蜓點水式的上海之行如此重視，似乎布希在9・11慘案的非常時期還來上海出席APEC會議，既像是布希對中共政權的乞求，又像是對江核心的恩典，就在於江澤民一心想做大國領袖，想在國際事務中加重自己的份量，所以近年來熱衷於由大陸主辦勞民傷財的各類國際會議，僅今年就有博鰲亞洲論壇，香港財富論壇，上海五國和APEC會議等，但是，江澤民也知道，無論舉行多少次國際會議、出訪多少個國家，想取得大國領袖的地位就必須得到美國的認可。所以，中美關係雖然麻煩不斷，卻一直是江核心外交的中心，無論他怎樣煽動國內的狂熱反美情緒，但是在處理中美衝突時皆採取務實的態度，決不放過任何一次向美國作秀的機會，見不到美國主要的政要，就通過接受美國主要媒體的採訪來支援自己在美國的知名度。小布希上臺後的外交政策的改變，無疑爲江澤民的親美潑了一頭冷水。

9・11事件暫時改善中美關係

恰在江澤民左右爲難之際，9・11恐怖慘案發生，美國的反恐怖之戰需要國際社會的廣泛支援，江核心有了突破中美關係僵局的天賜良機，特別是布希的上海之行尤爲重要，可以借此建立兩國元首之間的個人關係，並通過個人關係來拉近和穩定中美關係，提升他個人及中共政權的國際地位。所以，大陸媒體關注的焦點，僅次於江澤民的就是美國總統布希。中共不僅讓反恐怖主義成爲上海峰會的主題之一，送給小布希一個大禮；而且對布希參加此次峰會的輿論造勢，一反自布希上臺以來的抹黑，對布希的報導幾乎是一邊倒的肯定,恍如讓人重回八十年代的中美蜜月

期。不要說以前對布希的圍堵中共的政策、撞機事件、對台軍售的完全負面的報導和評論，甚至在9・11慘案剛剛發生時，中共官方的態度極爲曖昧，大陸媒體對布希總統及美國政府也極盡冷嘲熱諷之能事……而現在，媒體上出現的布江會，江的臉上，每一刻都充滿笑容。

表面上看這是中共對美政策的大轉變，實際上是小布希政府出於反恐怖的需要而不得不暫時改善中美關係。江澤民的一貫親美世人皆知，這也是他對外政策的唯一明智之處。但這種親美絕非因爲他認同美國的價值及其制度，而是因爲他想做大國領袖的野心使然。所以，布希是否出席這次峰會、出席了將與江澤民談些什麼，成了中共政權重視此次會議的關鍵原因。

9・11之後，大陸媒體在談及中美關係時，突出的重點是布希不會因9・11事件而取消上海之行；隨著APEC會議開幕的臨近，又大肆渲染9・11後的布希首次出國就是到中國上海；布希啓程之前，有大篇幅的《人民日報》記者對布希的採訪；布希啓程之後，重點轉向對布希出訪的安全保障的詳細報導，危言聳聽地大標題是「布希將把白宮搬到上海」。布希到了上海之後，中央電視臺新聞聯播節目幾乎全部給了APEC峰會，而且凡是涉及到布希的畫面，布江會談、兩人答記者會、出席首腦峰會、穿中式服裝、簽字文件、晚宴、觀看煙火……對十九位元國家元首的畫面處理上，給布希的畫面時間都超過其他元首一倍，別人的畫面只是一閃而過，布希的畫面卻總是既有中遠鏡頭，又有特寫。21日的新聞聯播中，最長的一段的新聞就是江澤民及夫人站在大廳中，迎接出席峰會的各國首腦，那種轉播的方式甚至讓人想起萬邦來朝的帝國儀式。電視畫面還特意突出布希與江澤民耳語的

細節。在轉播穿上中式服裝的各國元首在有關文件上簽字時，其他國家的元首都是近景的半身簽字畫面，而布希又一次得到了特殊的優待，從遠景鏡頭拉向近景最後是大特寫，時間起碼比別人多了幾倍。在各國元首對上海的讚美中，反覆突出的也是小布希對上海變化的「驚歎」，對中共領袖的誇獎；媒體上出現的各國領導人會議期間的花絮，第一個提到的肯定是布希；10月22日的幾家媒體，詳細報導了布希下榻的飯店，爲了布希在這裡的三天準備了整整一年，盡力營造出布希家鄉的氣氛，光是布希家鄉的花就擺了6000盆之多，只爲了讓這位德州人一踏進飯店就有回家的感覺。

中共以虛榮帶有自卑的心態不是眞正的大國

從中共的官方發言人和主要媒體的基調看，在如此突出江澤民個人及中共政權的舉足輕重的國際地位報導中，在揮霍納稅人的錢招待各國元首的排場中，在對小布希的特殊優惠中，透出的恰恰不是一個正在崛起的大國領袖的自信，而是一種虛榮而自卑的討好心態。但是，只靠豪華的盛宴和乞求的姿態，而不靠決心加入人類主流文明的誠意和切實努力，即便有再多的美酒鮮花煙火，也得不到國際社會的尊重，更無法在國際事務中成爲負責任的名副其實的大國。

2001年10月22日於北京家中

弱者的「正義」

貧困和弱小並不就天然代表正義

任何戰爭和恐怖行爲，受傷害最大的肯定是平民，因爲他們最弱也最無辜。即便是正義的戰爭，也避免不了大量平民的傷亡。結束殘酷的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是柏林大轟炸和扔到日本的兩顆原子彈，奪取了幾十萬人的生命，其中絕大多數是平民。二戰後的一系列軍事衝突中，都有大量的平民死傷和變成一無所有的難民。現在，中國人喜歡用苛刻的人道主義標準，談論美國的原子彈以及二戰後美國領導和參與的一系列戰爭對平民的傷害，卻對蔣介石炸開花園口黃河大壩造成的巨大平民損失，國共內戰的生靈塗炭，出兵朝鮮和支援北越所造成的平民傷亡，採取比較寬容的原諒態度，更對毛澤東在和平時期造成的更巨大的平民死亡很少譴責。

說到對弱者的不公正的歧視和剝奪，世界上又有幾個國家象中國這樣，對如此龐大的農村人口實施了長達幾十年的准奴隸制的歧視和剝奪，不僅是政府，而且是城裡人、特別是中心大城市

的城裡人，爲了既得利益而參與了由獨裁政府實施的歧視和剝奪。怎麼沒有聽見多少人爲農民鳴不平，爲這一巨大的弱勢群體代言？反而視農民進城爲洪水猛獸！當我們對每天發生在身邊的罪惡視而不見時，那種遠距離的人道關懷就變得非常可疑。當六四大屠殺的冤魂及難屬群體和成千上萬受迫害的法輪功信徒得不到多少關懷時，同情巴勒斯坦人和阿富汗難民的大義凜然，就失去了起碼的誠實，淪爲一種精確計算中的下流聰明：遙遠是安全的，身邊是危險的。人道關懷變成了怯懦者的智力遊戲和攻擊他人的道德利器。

強悍獨裁者統治下的弱勢群體

海珊先是發動兩伊戰爭，企圖借吞併伊朗來達到他成爲阿拉伯世界霸主的目的。吞併未成，轉而撲向科威特，在國際社會的武力干涉下，又歸於失敗。連年戰爭，使伊拉克陷於國際孤立和日益貧困的深淵，但是他本人仍然在國際社會的長期制裁中耀武揚威、盡情享受石油換來的一切，把救命的食物在黑市上高價換成貨幣，修建了十幾座供其享樂和藏身的城堡。賓拉登本人以及一切恐怖主義的幕後元兇，雇傭和訓練眾多的亡命之徒，但是他本人決不會甘願充當人肉炸彈，投入爲了信仰的「聖戰」，以生命踐行弱小民族向超級強權的絕望挑戰。而且，恐怖分子不僅偷襲美國和預謀暗殺教皇，還在利比亞和埃及建立基地，企圖通過軍事偷襲搞政變，推翻利比亞的格達費和埃及的穆巴拉克的合法政府，預謀暗殺約旦王儲阿卜杜拉，還綁架伊朗13名外交人員並殺害9人。信奉回教基本教義的恐怖分子對抗的不僅是基督教文明，他們對其他文明也毫無寬容。

這樣的獨裁者和恐怖梟雄所控制的實力，相對於美國而言確實是弱勢，但是相對於更弱小的國家、本國民眾和手無寸鐵的平民，又是絕對的強者，強悍到除了自己的生命之外，根本不把任何人的生命當回事。越是獨裁者就越以屠殺無辜平民、製造無孔不入的恐怖、訓練爲他獻身的愚忠者加亡命之徒爲樂事，越對生命、文明甚至信仰沒有敬畏和珍惜。9・11事件剛過不久，中央電視臺播出了一段賓拉登訓練恐怖分子的報導，除了類似特種部隊的訓練專案之外，最讓我震驚的是那一張張孩子們的臉，他們只有十幾歲，卻身穿軍服，臉上沒有絲毫童稚和天真，只有即將獻身的莊嚴。賓拉登從來不會吝惜這些幼小的生命，只爲了達到自己的邪惡目的，就從小給他們灌輸仇恨、暴力、對生命的輕蔑和獻身精神，培養他們不擇手段的殺人意志，把他們訓練成不眨眼的殺人工具。說恐怖主義爲信仰和弱勢民族的利益及尊嚴而戰，純屬無稽之談。正像一切極權暴君一樣，理想旗幟舉得比任何人都高，道德高調唱得比任何人都動聽，但是其統治比任何人都下流和暴虐，說他們「以萬物爲芻狗」，「視生命爲草芥」一點也不過分。

現在，當共產主義極權世界全面崩潰之後，對世界秩序、人的生命和自由的最大威脅有兩個，一是以民族主義爲藉口的區域性的武裝衝突，一是以「聖戰」爲號召的無國界恐怖主義。特別是後者，專以手無寸鐵、毫無準備的平民爲偷襲目標。冷戰結束後，力量對比的巨大變化，使全球性對抗程度降低，卻使恐怖主義橫行。近十幾年來，基於政治目的的人質案和人肉炸彈滿世界開花，而恐怖主義主要來自阿拉伯世界，那裡是孳生恐怖主義的最大溫床。對於這種現實，難道阿拉伯各國以及伊斯蘭教主們，

在要求西方國家進行反省時，你們自己不應該也進行反省嗎？

貧困和落伍不是僭越人類正義的理由

爲阿拉伯人進行辯護的最大藉口就是他們貧困、弱小、長期受西方人的欺負。貧困和弱小值得同情，如果這種貧困和弱勢是由於不公平的歧視造成的，就更應該幫助其擺脫受歧視的處境，在條件具備的情況下甚至可以給予特殊優惠，如西方國家的福利制度和貧困救濟，富國對窮國的援助和減免債務；再如美國的「政治正確」就是優惠少數族裔的流行思潮。但是，富人或強者，只要其財富和實力的來源具有道義上、法律上的正當性，並沒有必然的義務資助窮人或弱者。資助是道義善舉，不資助是人性本份。美國在二十世紀的崛起，主要依賴的是自身的制度優勢及自由競爭；美國在二戰後的超強地位，源於領導盟國打贏了一場正義的世界大戰，以及在東西方兩大陣營的競爭中的制度優勢，窮國憑什麼嫉恨美國現在的超強地位？比爾．蓋茨的迅速致富，並不是以強權爲支撐的剝奪或搶劫，並沒有以不合法的手段損害他人的利益，你憑什麼非要人家給窮人以資助？何況，蓋茨的巨大財富所創造的社會效益，遠遠超過其慈善義舉。

馬克思主義爲世界留下的最具破壞力的理論遺產，一是強調階級鬥爭和暴力革命；二是虛構了一個在道義上最先進的無產階級；三是在談到資本家時，只講剩餘價值的剝削性，而不講剩餘價值的獲得在道義上和法律上是否正當，剩餘價值投入再生產之後所產生的巨大社會效益；只講工人出賣體力算作正當勞動，而不講資本家的資金投入和智力投入對生產的關鍵性作用。於是，窮人把資本家或廣義的富人看成是不勞而獲的寄生蟲，仇恨便由

此獲得道義上的絕對正當性。而中國又恰恰是中馬克思的毒很深的國家。毛澤東把這套理論發展成造反有理的痞子革命和對財富的刻骨仇恨。這種仇恨之於國人，當然不是甘願一無所有，甘願貧困並以此爲資本，永遠佔領道義制高點，而是吃不到葡萄就說葡萄酸的嫉恨。

必須分清，這個世界的人與人之間的平等只能是權利上的，而決不會是分配結果上的。因權利的不平等而導致的貧富懸殊是一回事，因能力的高低所導致的貧富差異是另一回事。人類必須爲消除前者而不懈努力，同時又必須承認並保護能力優異者不斷創新和超前的探索精神，因爲正是少數天才帶動著人類的整體進步。如果是基於公平競爭導致的貧富差異，那麼窮人對富人的嫉恨就沒有任何道義上的正當性，反而是人性陰暗使然。因此，貧困和弱小並不天然代表正義和公理，正如富裕與強大並不天然就是邪惡和歪理一樣。物質上貧困而弱勢的群體行爲，並不天然具有道義上的合法性和人格上的高尚品質，也沒有權力僭越起碼的人類道義底線——因爲窮，我偷我搶我殺人放火我甘願充當人肉炸彈……就是理由充足的。馬克思所說的無產者最先進，毛澤東所定義的卑賤者最高貴，即那種「六億神州盡舜堯」的浪漫抒情，純屬異想天開的狂人囈語。

窮人中既有好人也有壞人，正如富人中既有品質高尚者也有道德墮落者一樣。決不能以抽象的群體來作爲進行道義褒貶甚至道義討伐的依據。發動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法西斯政權的兩個獨裁狂人——希特勒和墨索里尼——都出身於窮人家庭，但我們不能因此得出結論說，所有窮人家出生的人都是潛在的希特勒。帶領西方贏得反法西斯戰爭勝利的自由國家的兩位領袖——邱吉爾

和羅斯福——皆是血統顯貴，但我們不能由此推論出所有出身顯貴的人皆是未來的羅斯福。恐怖頭目拉登及其組織的核心人物，恰恰都出身顯貴。

但是，歷史提供的經驗證據向我們表明：通過煽動仇恨來引導窮人進行暴力造反，其邪惡性和毀滅性，決不次於任何其他暴力崇拜的行爲。征諸於中國歷史，有綿綿不絕的歷代農民起義和水滸式造反；征諸於世界歷史，僅舉出二十世紀的納粹德國和共產極權的興起，足矣！這些邪惡的帝國皆以貧窮而弱勢的群體爲政權基礎，並宣稱代表著受剝削受壓迫的弱勢群體的利益，但是這種窮人政權所製造的罪惡舉世罕見。富豪賓拉登也聲稱自己代表具有最高尚信仰的弱勢民族，爲他的滅絕人性的恐怖暴行狡辯。

後殖民時代的貧困及落伍

有人說，這些地區的窮，是由於西方殖民者造成的。但是，美國也曾經是英國的殖民地，現在卻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還有加拿大、新西蘭、澳大利亞、南非等等。又會有人說，這些以白種人移民爲主的殖民地，與以當地人爲主的殖民地受到殖民者的待遇不同，那麼亞洲的香港、臺灣、南韓、新加坡卻是以本地人爲主的殖民地，不是也變成了現代化國家了嗎?!

讓我們看看這個世界：在非洲、在拉美、在中東、在亞洲，當強大的西方殖民者被迫撤離之後，這些地區便陷於無休止的戰亂。同一塊土地上的擁有種族、信仰、文化的同根性的群體，並沒有因此就團結起來、和平共處、同建家園，反而四分五裂、自相殘殺、甚至搞宗教歧視和種族滅絕。那些因不同派別而引起的

血腥的教派紛爭，那些死於爭權奪利的內戰、頻繁的軍事政變的平民，那些因戰亂逃離家園、無家可歸的難民，總不能還讓強大而富足的西方負責吧！而現在，最慷慨地向這些難民們提供人道主義援助的，恰恰是那些強大而富裕的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

中國在1945年擺脫殖民統治之後，並沒有走向強大、富足、統一，反而陷入更爲血腥的貧困、衰弱、分裂之中。先是四年規模超過抗日戰爭的殘酷內戰，接著是中共獨裁統治下的對外赴朝參戰、支援越共、印尼共產黨、紅色高棉、炮轟臺灣、與印度與前蘇聯與越南開戰，對內鎮反、三反五反、胡風集團、反右、大躍進、肅反、四清、文革、六四、法輪功……你總不能把這些導致貧困和落後以及人力物力的巨大消耗的原因，還統統歸罪於殖民者吧！當美國幫助阿富汗逼迫前蘇聯撤軍之後，這個本來就在戰亂中積貧積弱的國家，非但沒有團結一致重建破敗的家園，反而內戰不斷、政變頻繁，直到今天仍然進行著瘋狂的自相殘殺，人民仍然在強悍的塔利班的暴虐統治之下，其野蠻程度遠遠超過中共獨裁政權，近似於波爾布特的紅色高棉。殖民主義擴張是野蠻的罪惡的，但是西方的殖民者決不比本國的獨裁者更野蠻，也不能把已經獨立的前殖民地的所有貧困和落後，全部歸罪到殖民者頭上。英國殖民政府可以容忍甘地的非暴力抵抗運動並最終贏得了獨立，而中共政權卻動用全副武裝的軍隊鎮壓手無寸鐵的和平請願的學生及市民。何況，殖民者也在佔領地做過不少善事，二戰後的西方富國在幫助前殖民地擺脫貧困上更是出力最多者。這點歷史常識，不用放眼世界，只要舉出與大陸人同源的臺灣與香港，足矣！

伊拉克貧窮，但海珊家族富得流油，強悍得可以進行漫長的

兩伊戰爭、強行侵入科威特，在國內隨便殺人；阿富汗貧困，但是來自沙特的賓拉登是億萬富翁，他的恐怖組織的核心成員也大都不是窮人，但是其邪惡的強悍，使整個世界充滿恐怖。塔利班政權在阿富汗境內幾乎無惡不作，不但把所剩無幾的資源全部控制在自己手中，對人民實行嚴酷的全封閉統治，而且扣押聯合國人員和外國記者，搶劫聯合國提供給難民的糧食；不但炸毀了1500年的佛教瑰寶巴米楊大佛，而且通過現代傳媒向全世界示威，以表示其強悍和什麼都敢做的亡命徒姿態。英國作家拉什迪相對於一個國家政權來說，肯定是弱者，而正是一個伊斯蘭政權下令追殺一個只有筆的文人！

以維護信仰爲藉口濫殺無辜是對神的背叛

俄羅斯大文豪陀思朵也夫斯基說過：如果必須在拯救一個受難的孩子和堅持真理之間進行選擇的話，我寧願放棄真理而拯救孩子。而信奉原教旨主義的恐怖分子則恰恰相反，他們爲了信仰就可以蔑視生命，不但是自己的生命，更是別人的生命。毋寧說，他們恰恰是爲了毀滅他人的生命，才把自己的命也搭上。

爲了反抗壓制信仰的強權而獻身，是高貴的殉道者；而用信仰的理由濫殺無辜，特別是濫殺從來沒有干涉過你的信仰自由的平民，就完全是沒有宗教寬容的中世紀時期的極端野蠻行爲。中世紀的宗教不寬容，導致了太多的災難，審判異教徒、濫殺女巫、十字軍東征、政教合一的專制……耶穌被釘死在十字架上，既是殉難者的榜樣，也是不寬容所犯罪行的永恒象徵。這種野蠻的制度在二十世紀的殘餘，一是法西斯主義，一是共產主義極權，一是激進原教旨主義，三者都是以實現信仰爲藉口濫殺無辜的主

義。這樣的主義，與其說有偉大的理想，不如說是以濫殺爲職業爲樂事；與其說是爲了真主，不如說是背叛神的魔鬼。

只有那些除了惡毒的怨恨便沒有任何其他情感的恐怖分子，才會肆意踐踏最低的文明規則，製造9．11這樣的大災難。什麼「聖戰」、什麼「弱小者對強者的反抗」、什麼「爲信仰而獻身的英雄」……統統都不是，統統都是殺人的藉口。無辜的平民(無疑是弱者)，既是他們屠殺的目標，又是他們想免於追究的人體擋箭牌。對恐怖分子的打擊極有可能大量傷及無辜平民，成了恐怖分子在作惡之後的又一個護身符。否則的話，爲什麼偷襲成功了還不敢出來承擔責任？爲什麼想讓反恐怖戰爭找不到具體的目標？就是爲了造成更大規模的災難。這是一小夥充滿變態仇恨、以極端手段追求轟動效應的純粹惡魔，總在尋找對人類文明最具有象徵性的目標下手。他們之所以把仇恨的首要目標對準了美國，因爲美國以其富足、強大和正義而成爲國際反恐怖主義的中堅，更因爲美國世界第一，打垮了世界第一的人就是第一的第一，正如某些專門刺殺名人的變態狂一樣。也如日本作家三島由紀夫筆下的變態少年，就要燒毀日本美的象徵金閣寺。在大陸的網站，不是就有大量賓拉登的狂熱崇拜者，認爲這個頭號恐怖分子才是世界的NO.1嗎？

在人類已經進入宗教寬容的時代之後，不寬容的宗教無異於自絕於人類文明。不寬容的法西斯已經被打敗，不寬容共產極權已經接近全面崩潰，不寬容的原教旨主義也越來越孤立，事實上，即便在阿拉伯世界，大多數國家都在走向宗教寬容，都在由聖戰轉向和平，阿拉法特由聖戰領袖變成諾貝爾和平獎的獲得者，就是最有利的證明。伊斯蘭教的自救絕非原教旨主義的激進

聖戰，而只能是逐漸走向宗教寬容的和平共處。

只要濫殺無辜就是犯罪，無論以什麼樣的名義——國家、宗教、民族、主義的名義以弱小、貧困、受壓迫、復仇、聖戰——都是犯罪！

專制下的落伍國家的「怨婦情結」

如果僅以弱小民族在歷史上的受迫害爲由替恐怖主義進行道義辯護，那麼在人類歷史上，最應該進行恐怖主義復仇的民族應該是猶太人，他們從出「埃及記」失去家園之後，一直是受迫害的無家可歸的流浪民族，猶太聖城耶路撒冷數次被毀，到二戰期間達到種族滅絕的高潮。如果把怨婦情結的發泄和復仇作爲正義，那麼猶太人完全可以爲所欲爲，因爲整個世界欠猶太民族的血債太多了。而伊斯蘭教的命運只是在近代才開始衰落，當年的古波斯帝國，代替羅馬帝國的奧斯曼帝國，都有過不可一世的稱霸歷史。阿拉伯人在西元7～8世紀的對外軍事擴張，就是以「傳播伊斯蘭教」、「反對異教徒」、「建立穆斯林－阿拉伯帝國」爲藉口的聖戰，他們強行武力吞併了北非、西亞和西南歐的大片領土，也曾與中國交過手。到了現代，自從世界離不開石油之後，海灣地區的阿拉伯國家富得流油，只不過那些天賜的財富沒有落到百姓手中，而是被少數王公貴族所壟斷，大把的金錢用於戰爭、揮霍、教派紛爭和恐怖活動，卻很少投入到改善國計民生的有效率產業之中。

所有現代落伍的民族國家，大多是專制政權，都有種解不開的「怨婦情結」。越是落後的專制國家，就越要尋找和塑造一個外來的敵人，越不厭其煩地通過壟斷的輿論權力，向國民灌輸歪

曲了的歷史和現實，把國際關係中的西方國家塑造成忘我之心不死的妖魔，使怨婦情結和仇恨意識成爲國民素質的基本要素，以此轉嫁國內危機和民眾對內政的不滿。美國之所以成爲這些國家怨恨的主要目標，一是因爲美國在世界上，是自由制度的象徵、推廣民主的中堅和維護人權的先鋒，因而必然是所有踐踏人權的專制國家的頭號敵人。這些國家的統治者當然對此非常不滿，便通過壟斷輿論的權力，把制度之爭轉變爲民族之爭，竭盡全力對美國進行妖魔化；二是美國的富足和強大，對於貧困落伍者來說是一種巨大的壓抑，人性本身的嫉恨弱點，又爲獨裁者播種仇恨的種子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三是因爲民眾在長期的奴役中，既積累了太多的冤屈又養成馴順的奴性，既對獨裁政權不滿又相信官方的宣傳(因爲他們的知情權被剝奪)。

而中國人對美國的仇恨，還有一層傳統的以國爲天下的狂妄自負，因近代的落伍挨打而變爲畸形的民族虛榮和自卑自傲，變成魯迅所說的「合群的自大」，動不動就用「五千年文化博大精深、源遠流長」，來貶低只有二百多年歷史的美國「沒有歷史、沒有文化」的淺薄；動不動就拿「漢唐盛世」和「大清國版圖」來證明自己的不可一世，天下第一，把任何華人個人在國際上取得的成就，皆要放大爲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之徵兆，甚至海外華人的個人成就也要尋根到民族歷史的源頭。

所以，一遇到國際衝突，民眾就把所有的仇恨以怨婦訴苦和潑婦罵街的方式對外發泄，似乎全世界沒有一個人對得起他們，特別是那些自由富足的國家。他們很少提及美國幫助中國保住主權和領土的完整，戰勝了日本軍國主義；基本不提在抗日戰爭勝利之後，美國爲了避免中國的內戰全力周旋於國共兩黨之間；不

提中國與前蘇聯對抗之時，也是中國在外交上處於最孤立的60年代，美國堅決反對前蘇聯企圖對中國進行核打擊，並在70年代初主動向中國伸出和解的雙手。美國這樣做的主要動力，固然是聯中抗蘇的國家利益使然，但是在客觀上幫助中國擺脫了國際孤立，並爲後來的開放奠定了外交基礎；不提在中國走上改革之路以後，美國對中國的每一個進步的支援(資金、技術、思想文化、新聞輿論等等)，一直鼓勵和推動中國的改革開放，特別是六四之後，美國盡力幫助獨裁下的大陸人爭取人權，敦促中共善待自己的人民，成爲遏制中共獨裁政權的最重要的外部壓力。

就是這樣的美國，居然成了很多自稱愛國的大陸人發泄怨恨的主要目標：中國貧困落後是以美國爲首的帝國主義的罪惡造成的，申奧不成功是美國人在搗亂，得不到諾貝爾獎是西方文化霸權，關注中國人權是居心不良，保護臺灣免受中國武力攻擊、支援西藏的自治要求是要分裂中國，還有國共內戰、朝鮮戰爭、越南戰爭、誤炸使館、撞機……從現實到歷史，從歷史到現實，喋喋不休的訴苦、抱怨和控訴是他們所向無敵的法寶。而怨婦，一被調撥，最容易轉化爲潑婦,滿肚子的怨恨似乎就是她們撒潑耍混、破口大罵的充足理由，而如今的網路又使怨婦們可以像蒙面的言論恐怖分子一樣，怯懦而不負責任地讓詞語的炸彈遍地開花。而這怨和罵的內在動力，無非是在對外宣泄仇恨的同時，以要挾和敲詐的方式祈求一點可憐的恩賜：「你們讓我們吃那麼多苦，總該讓我們罵罵街宣泄一下，總該拿出點實惠補償一下吧。」

更危險的是，潑婦們在以愛國鬥士的姿態向本國的統治者獻媚的同時，一旦有了機遇就自動變成暴民。正如毛澤東時代，對一切被欽定的敵人進行鬥爭的訴苦大會和批鬥大會一樣。訴苦大

會是怨婦訴苦，不惜編造和歪曲；批鬥大會是潑婦罵街，決不吝惜惡毒和仇恨；最後必然發展爲暴力。而當發財致富代替階級鬥爭，實用主義的利益至上代替解放全人類的烏托邦理想，犬儒化的精確計算代替了愚昧者的盲目戰鬥……之時，美國也由帝國主義變成了霸權主義，對美國的仇恨也由發誓消滅帝國主義變成了對財富和強大的既羨慕又嫉恨，變成了一邊大罵美國，鼓吹超限戰對付美國，一邊想去美國鍍金，挖空心思搞綠卡弄護照，利用國際大資本發財並把財產轉移到西方。

他們內心裡層層淤積仇恨塑造了一種變態而懦弱的人格：不是基於正義而是基於個人的恩怨，不是來自愛而是來自恨，不是尋求平等對待而是想做人上人，不是憑自己的能力加入競爭而是嫉妒他人的成就，不是敢於反抗每天發生身邊的邪惡而是對遙遠的國家進行瘋狂的詛咒。如今，這類怨婦和潑婦不再具有毛澤東時代的愚忠式的樸素和發自內心的仇恨，而是小康時代的小人式的狡猾和作秀式的撒潑耍賴。

中共執政後很少有善待自己人民的時候，塔利班政權對阿富汗人民的殘暴又遠遠超過中共對內的獨裁。遭受獨裁政權的野蠻壓迫的民眾，選擇擺脫貧困和弱小的首要出路，不是甘願接受獨裁者和恐怖梟雄的妖魔化灌輸，把一切責任歸罪於虛構的外部敵人，把仇恨發泄到別人頭上，而是奮起推翻本國的獨裁者。而當民眾無論出於什麼樣的原因而認同和服從獨裁者時，那麼，食不果腹、衣不遮體、無家可歸的悲慘處境，被殺戮、被奴役、被歧視、被剝奪的非人生活，便永遠沒有盡頭。主要的罪責固然要由獨裁暴君來負，但是民眾的愚忠、軟弱及無奈的馴順就一點責任也沒有嗎？

多虧有自由富裕強大的美國

善良帝國戰勝邪惡帝國

再來看富足而強大的美國。自從第二次世界大戰以盟國的勝利而告終，原來局限於自由國家內部的人權原則，便逐漸成爲《聯合國憲章》以及一系列國際法的主要道義來源，越來越多地被應用於裁判國家行爲正義與否的國際法實踐，傳統的獨立國家的絕對主權受到來自具有普遍性的人權的挑戰，國際秩序的建立再也不是基於成王敗寇的功利法則，而是基於超功利的道義法則。而這，正是汲取了以往國際衝突的深刻教訓的偉大成果。

美國在二戰中的決定性領導作用，對前蘇聯、英國、法國及整個歐洲與積貧積弱亞洲如中國者的支援，代表著正義對邪惡的勝利，使它在二戰後成爲與前蘇聯的「邪惡帝國」相抗衡的「善良帝國」。世界的幸運在於：「善良的帝國」最終戰勝了「邪惡的帝國」。二戰後，以美國爲首的自由世界，不僅在經濟上幫助自己的敵人日本和德國在廢墟上重建家園，更重要的是把兩個邪惡帝國——納粹主義的德國和軍國主義的日本——改造成自由世界的合格成員。美國在此過程中的公正執法和慷慨解囊，使之贏得了道義上和能力上的國際公信力。後來的東歐和亞洲的自由化民主化進程，離開以美國爲首的自由世界的援助、壓力和促進是不可想像的。而前蘇聯建立的社會主義陣營之所以最終分崩離析，就在於它的濫用強權和暴力而逐漸喪失了道義上的國際公信力。

這種鮮明的對比標誌著國際關係進入了一個全新的時代，世

界再不是弱肉強食、成王敗寇的叢林社會，而是一個平等對待、道義優先的文明社會。如果沒有道義正當性，再強大的國家也得不到國際社會的尊重；僅靠實力的強悍而濫用暴力的野蠻行爲，無論是發生在國際關係中還是發生在一國的境內，都將受到國際社會的譴責、制裁甚至人道主義干涉。當一個強大的國家以其實力服務於「人權至上」的道義原則時，她就會變得越來越強大、越來越具有國際公信力；而當一個強大國家以其實力維持踐踏人權的主權和擴張侵略性霸權時，就會不僅在實力上日益衰敗，更在道義上受到越來越廣泛的唾棄。兩個超級大國50年的冷戰之結局，已經充分證明的「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真理。

正是在國際法的基礎由實力優先轉變爲道義優先的背景下，也正是在全力推進人類由叢林法則走向文明法則的實踐中，美國所領導的自由世界，幾乎與一切踐踏人權的政權對抗，60年代柏林危機之時，美國總統甘乃迪向世界宣布：「我是柏林人。」代表的正是美國的自由主義立國的普世性的理想精神。美國在二戰後所捲入的主要戰爭，在道義上都有可以辯護的理由。朝鮮戰爭起源於獨裁者史達林和金日成的稱霸野心，首先撕毀國際協定、打響第一槍的是史達林庇護和縱容的北朝鮮。美國出兵朝鮮是爲了維護剛剛穩定的國際秩序，維護國際法和聯合國的尊嚴；導致中國捲入的主導原因是史達林的壓力，次要原因是美軍司令麥克阿瑟的自以爲是的傲慢，使美國政府盡量避免中國捲入的政策歸於失敗。即便如此，當時的現實也並沒有任何道義上和現實上的充足理由，支援中國出兵朝鮮是正確的選擇。越戰也是北方的胡志明首先破壞和平協定，美國在南越政權的請求下才出兵的，但是由於南越政權的腐敗、中蘇兩大國對北越的支援和美國

國內日益高漲的反戰壓力，迫使美國不得不於70年代撤軍。

爲什麼，蘇聯和中國可以支援金日成和胡志明的共產主義武力擴張，捲入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而美國就不可以支援南韓政權和南越政權，進行自由主義武力自衛？難道中國可以支援印尼、紅色高棉等暴力組織屠殺平民，美國就不應該幫助巴拿馬、海地、阿族從獨裁者的暴政下解放出來嗎?!

爲弱小者伸張正義的美國

以色列和阿拉伯世界的衝突，起因於二戰後國際格局的重組，1947年11月聯合國大會通過181號決議，確定巴勒斯坦分治，建立阿拉伯人的國家和猶太人的國家，英國放棄對巴勒斯坦的管轄權，耶路撒冷國際化，由聯合國託管。這是對猶太民族長期受迫害的補償，因爲那裡也是猶太人早已失去的傳統家園。在此之前，發源於十九世紀的猶太複國主義曾先後頑強地與奧斯曼、英國爲首西方殖民者進行鬥爭，爭取到在巴勒斯坦的最初定居點，由於不斷增長的人口壓力而生存空間越來越窘促，便以金錢贖買巴勒斯坦領土，但是這種政策由於雙方的激進而歸於失敗：以色列買來的土地拒絕一切巴勒斯坦人進入，雙方小規模的流血衝突不斷。181號決議對阿拉伯人確有不公正之處，占巴勒斯坦地區總人口68%的阿拉伯人才得到43%的土地，而只擁有32%人口的猶太人卻占了57%的土地。阿拉伯世界不接受這一決議，以埃及爲首的阿拉伯六國退出大會。所以以色列於1948年5月14日宣布建國，無異於火上澆油，致使衝突驟然升級，由此引起阿拉伯世界對以色列的圍攻。以色列建國的第二天，第一次中東戰爭爆發，埃及、約旦、伊拉克、敘利亞、黎巴嫩聯合起來對以色列宣

戰，想通過武力奪回土地。三次中東戰爭的結果，阿拉伯人失去更多的土地。

美、蘇、法、英、中五個常任理事國都支援181號決議，在三次中東戰爭中美國支援以色列，反擊整個阿拉伯世界對立足未穩的猶太國的圍剿，而前蘇聯和中國逐漸轉向支援阿拉伯，使中東問題染上了冷戰的色彩，直到今天，仍然影響著美、俄、中三大國對中東問題的態度。但是，真正主導中東局勢的國際力量無疑是美國，特別是隨著冷戰的結束，美國更成爲巴以和談的主導者。美國的主導原則以支援弱小與促和爲主，先後促成了英埃和談、埃以和談，敘以和談、巴以和談，熄滅了多年的戰火，緩和了中東局勢。對立雙方的兩位元推進中東和平進程的領袖——埃及總統薩達特和以色列總理拉賓獻出了生命。正是美國，使幾乎滅種的弱小民族站穩腳跟，逐漸成爲國際社會的平等一員。即便後來以色列在美國及西方的支援下，取得了對巴勒斯坦的優勢之後，美國在其後的周旋中，也決沒有縱容以色列的過分擴張行爲。正在美國的壓力下，以色列才把戰爭中佔領的土地逐步歸還給阿拉伯人，這就是著名的「以土地換和平計劃。」可以說，沒有美國就沒有中東和平進程的開始，更沒有今天巴勒斯坦爭取建國的前提。9・11後，布希總統又宣布支援巴勒斯坦建國，這在歷屆美國總統中還是第一次。

現在，單就以色列與巴勒斯坦之間的力量對比，以色列無疑是強者，美國的中東政策也有偏袒以色列之嫌。但是，如果把範圍擴大到整個中東地區，相對於阿拉伯世界，猶太人畢竟還是極少數，是弱者。如果再結合歷史上的三次中東戰爭，美國站在以色列一邊，既有歷史的淵源，也是對未來的防範。試想，如果沒

有美國的介入，以色列能夠和整個阿拉伯世界對抗嗎？中東地區會有現在的局面嗎？實際上，美國在中東扮演的是一種極爲艱難的調停人角色。以、巴雙方都無法控制自己內部的暴力激進主義，以色列極右分子刺殺了和平進程最有力的推進者拉賓總理，致使強硬派右翼上臺，最有希望的巴以關係急遽惡化。巴勒斯坦內部的激進組織哈馬斯，屢屢在和平進程的關鍵時刻製造恐怖事件，使本來有希望的談判流產。以色列交給巴解組織的恐怖分子黑名單就高達一百多人。

在中東問題上，美國不僅僅支援歷經迫害的弱小的猶太人，也全力支援過阿拉伯世界，在埃及和英法殖民者的衝突中，美國居然能夠做到不顧北約同盟的共同利益而站在埃及一邊。在英國與埃及的衝突中、在埃及爲蘇伊士運河的控制權而與英法以開戰時(即第二次中東戰爭)，正是美國的壓力，使埃及取得了對殖民者的最後勝利。先是在1954年7月，美國促成了由美國列席的英埃談判，埃及第一次取得對殖民者談判的勝利，英軍於1956年6月以前全部撤出埃及。繼而是在爲爭奪對蘇伊士運河的控制權的第二次中東戰爭中，英法沒有徵求美國的意見，就聯合以色列向埃及發起進攻。令英法感到意外的是，不僅蘇聯反對英法的軍事進攻，而且美國的反對態度更爲強烈，要求英法以立即撤軍，並以停止對英法的經濟援助、通過聯合國對英法進行經濟制裁來施加壓力。英法別無選擇，只能接受聯合國的停火協定，1956年11月6日雙方停火，12月英法軍隊全部撤出，以色列軍隊也撤回到1948年劃定的停火線前。至此，埃及在美蘇兩大國的支援下，贏得了第二次中東戰爭的勝利。

在促進中東和平進程之外，美國還領導了對前蘇聯入侵阿富

汗的聯合抵制、幫助巴拿馬和海地人民推翻了依靠政變上臺的獨裁者，恢復了民選政府和制止了內亂；反擊伊拉克侵略惡行的海灣戰爭，贏得了科威特人民及大多數阿拉伯國家的感激；在科索沃，美國爲弱小的阿族穆斯林向實行種族清洗的基督教政權宣戰，防止了人道災難的進一步擴大，使南斯拉夫走上了真正的民主建國之路……在上述美國的軍事干預中，要麼是趕走非法上臺的軍事獨裁者，要麼是幫助更爲弱小的族群擺脫強勢族群的侵略或歧視。當然，有時出於國際政治的需要，美國也支援過獨裁國家，如沙烏地阿拉伯等，但是，美國在支援世界各國人民反對獨裁者上用力最大，也是有目共睹的事實。

美國，沒有海外殖民地，沒有侵略過任何國家,因爲侵略意味著佔領別國的土地，代替當地人行使主權。美國的每次干預，都是在秩序基本平定之後，把權力完整地交換給當地政府，沒有佔領任何國家的一寸土地，即便留有小部分駐軍也是應當地政府的要求。在道義上，美國的對外用兵大都是爲了保護弱勢族群、懲罰無法無天的獨裁者和侵略者、制止人道主義災難、伸張自由主義式的正義、踐行聯合國憲章的宗旨、維持世界和平。

對於災難深重的阿富汗，美國一直是最大的人道主義援助的提供國。2001年，就在「9・11」之前，美國給予阿富汗的援助就高達一億七千萬美元，大多數用於對難民的人道救助。現在，對塔利班的打擊即將開始，美國又爲阿富汗提供的一億美元的人道援助。而賓拉登、塔利班和一些支援他們的阿拉伯富翁，決不會掏出大把的錢用於本民族的人道救濟，反而把大量的資源用於反人類的恐怖主義，用於把整個世界收編在他認定的宗教信仰之下。現在的塔利班頭目奧馬爾，居然還號召逃離家園的難民們回

來參加反美聖戰。這與其說是爲了讓伊斯蘭教的旗幟插邊全球，不如說僅僅是爲了讓賓拉登的人肉炸彈在全世界開花。如果成功，就是讓賓拉登的政教合一的獨裁統治凌駕於全人類之上。

最有資格充當世界警察的美國

你可以爭辯說任何國家都沒有那麼高尚，其外交政策的核心都是國家利益，美國也不例外。但是，美國的國家利益在外交上的主要表現之一，就是自由主義的立國原則。在諸多現實功利利益之外，美國還把在全球實現超越世俗功利的自由主義理想作爲自己的神聖義務和崇高的國家利益，堅定不移地擴大推廣市場經濟、民主政治和保障人權。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美國政府對外戰略主軸便是遏制共產極權，向世界推廣自由民主的價值觀及其制度安排。朝鮮戰爭、保衛臺灣、越南戰爭、與前蘇聯的軍備競賽及「和平演變」的交往策略，皆是美國爲實現這一全球戰略和捍衛國家利益的具體行爲。在這一點上，二戰後美國的歷屆政府的對外戰略沒有根本區別，甘乃迪和尼克松之間、柯林頓和小布希之間，沒有實質區別。區別只在於實現這一戰略的具體策略而已。正如布希在就任總統後數次公開演講中，反覆重申了「擴大自由就是促進國家利益」這一主題。他說：「美國，從本質上說是自由的象徵。我們必須牢記，自由的擴大就是我們的利益所在。」美國應該「成爲國際社會的自由先鋒和正義力量」，「讓自由的力量遍布全球」。

即便退一步講，就算美國外交政策的核心是國家利益，那麼美國做的事既爲自己贏得收益，又爲國際社會做出貢獻，豈不是雙贏的皆大歡喜。美國是自由國家，是民主世界的領袖，當然希

望促進自由和民主向全世界的推廣，這樣的國家利益與人類利益非但沒有什麼根本的衝突，反而具有高度的一致性，爲什麼就不可以統一呢？爲什麼在啓蒙時代以來的200多年中，曾有許多個帝國以強權和武力對外擴張而統統歸於失敗(拿破侖、希特勒、前蘇聯)，而獨獨美國領導的自由秩序向全世界的擴張成爲不可阻擋之勢？就在於這種擴張的內在動力，在根本上不是來自外力，而是來自人類的共同人性。正如經濟學中的理性人一樣，在以正當的手段牟取最大個人收益的同時也爲社會創造巨大的公益。

是的，美國並不完美，美國人也不是完人，美國犯過許多錯誤，美國充當世界警察也有執法不嚴不公的時候，有些得到事後的改正和補償(比如誤炸中國駐南使館。同樣，科索沃戰爭中，美國誤炸了英國的軍隊；美國也在兩伊戰爭期間遭到過誤炸，1987年5月17日，伊拉克的導彈也曾在公海上，誤炸過美軍的爲科威特油輪護航的護衛艦斯塔克號，造成37名士兵死亡。美國政府和美國人並沒有激烈反應，像5・8時期的中國那樣狂熱，只是要求伊拉克賠償了事)，有些是局勢使然，有些還有待於國際社會的共同努力。而我認爲，美國在二十世紀犯過的最大錯誤，就是在二戰開始時採取孤立主義，如果美國早一點擔負起領導盟國的責任，歐洲不可能姑息希特勒最初的侵略行爲，日本人也不可能在亞洲所向無敵，世界更不可能付出那麼大的代價。直到成群的轟炸機把成噸的炸彈投降珍珠港，才把美國從自顧自的迷夢中炸醒。美國在二戰中和二戰後的表現，正是汲取了這一深刻教訓。但願恐怖分子投向世貿大樓的人肉炸彈，真正炸醒的不只是美國，而是整個世界。在如此邪惡的恐怖主義面前，任何姑息都

是變相的共謀，正如1939年的「慕尼黑會議」上，英、法兩國對納粹的姑息一樣。

在指責美國的外交政策時，有一個角度是必須的：即在美國對世界事務的主導作用的利弊權衡之中來談論這個問題，而不能不加比較地、不顧歷史和現實，一味抓住美國的錯誤不放。美國主導的海灣戰爭及科索沃戰爭，確實在客觀上給平民帶來了不幸，但是，如果沒有這樣的軍事干預，伊拉克侵佔的就不僅僅是一個小小的科威特，周邊國家都難以倖免，這些國家的平民豈不是更加不幸。米洛舍維奇進行的種族清洗之下的弱小阿族，豈不是只能等待做劣等人甚至種族滅絕的命運。綜觀二戰後美國在國際事務中所起的作用，任何不抱偏見的人都會得出這樣的結論：美國主導的世界秩序的利要遠遠大於弊(前面已作論述)。就連著名的《經濟學人》雜誌最近在批評美國的一些失誤時，也不得不承認：「在人類歷史上所有的強權之中，美國恐怕是最少領土欲望的和最富有理想主義色彩的。」「美國領導的對波斯尼亞和科索沃的兩次武裝干涉行動，都是爲了幫助穆斯林受害者而對基督教政權發動的攻擊。美國都沒有獲得任何物質性的收益，也都沒有傳統意義上的主要利益。」

冷戰結束後，全球一體化進程加速，無賴國家和日益邊緣化的民族，爲了挽救不可逆轉的沒落命運，變得格外瘋狂。正因爲有獨裁主義、激進原教旨主義和恐怖主義這樣的國際流氓，就必須有國際警察。放眼世界各國，不由美國充當國際警察，還有哪一個國家能夠和願意擔此費力不討好的重任？正如憲政民主制度：它不可能完善，但卻是迄今爲止人類所能找到的作惡最少的制度。同理，由美國充當國際警察，其作爲不可能十全十美，但

是它能夠做到利大於弊，已經是難能可貴了。美國也不是不能批評，事實上對美國的批評，即便在盟國中也時有發生。如果批評美國，是爲了使之減少失誤、執法更公正更嚴格，這種批評就極爲珍貴(比如對布希退出「京都議定書」的批評，對美國沒有帶頭制止盧安達的種族屠殺、蘇丹的燒殺劫掠的批評)。如果是懷著不可告人的目的而把美國的國際形象妖魔化，就只能延緩合理的世界新秩序的建立，那才是人類的共同災難。換言之，美國在世界上的主導地位，既不是自封的，也不是國際法意義上的聯合國授權，而是人類道義和歷史發展的雙重抉擇授予的。

有人擔心，全球化可能導致世界的單極化。但人類以往的歷史證明；一個自由主義價值及制度安排普及化的世界，恰恰不是一元化的獨尊白種人文明的單級世界，而是多元化的多種族文明的大熔爐。生活在西方的眾多穆斯林並沒有被迫改變信仰，阿拉伯裔的學者賽義德還能夠著書立說，尖銳地批評西方。因爲唯有自由制度，才能夠爲多元化的文化和個人的生存權利提供符合人性的平臺和平等的交往規則，才能鼓勵和保障每個人、每個少數民族、少數群體的自治權利，才會爲世界的多元化提供制度性的根本保障。

西方人確實存在著種族、文化的傲慢，各個國家也不同程度地存在著種族歧視的問題，然而，不抱偏見的人都會承認，由於自由制度以保障人權爲核心，西方人的種族歧視和文化優越感在落實到具體的社會行爲上，就要受到平等對待的觀念和制度本身的強力約束。即便只作爲一種觀念性存在的白種人優越論，也不斷地受到西方人自己的檢討、反省和批判。特別是二戰之後，西方社會在避免和減少種族歧視的觀念啓蒙和制度建設方面，都有

著巨大的進步。如果與其他國家進行比較，自從60年代的民權運動以後，美國在平等對待不同種族上的進步有了質的飛躍，保護少數民族不受歧視成了國家的憲法條文，並通過一次次個案判決落實到生活的細節之中。相比之下，基督教國家在種族平等對待的制度建設上，做得比其他文明要好的多。

世界需要國際警察，國際警察需要公信力，不能因爲警察抓強盜抓殺人犯時誤傷了無辜者而連警察都不要了。大陸人對美國承擔國際警察的責任的極端仇恨，一個重要的原因是：中共政權建立的就是一個警察國家，而警察存在首要目標，不是維護民眾的權利，而是維護一黨獨裁的政權。所以，警察在公眾的生活經驗中，大都是不講理的、濫用權力的、老百姓惹不起的。一個從沒有享受過公正的司法對待的群體，在看待其他執法人員的作爲時，很容易以己度人。明明美國在阻止悍然入侵或種族清洗，中共卻站在入侵者和獨裁者一邊，藉口造成平民傷亡來指責挺身而出與強盜搏鬥的警察。也難怪，國人作惡棍的幫兇和幫閒的歷史太長了，在本國幫助竊國者作惡的人，怎麼能指望他們在國際上不爲世界流氓助威。正是這樣的無賴最喜歡質問：美國爲什麼不軍事干預盧安達種族大屠殺,不出兵制止蘇丹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無所不爲的燒殺劫掠、宗教歧視？這種指責，除了認爲美國的干預不是基於人類道義的公平對待之外，還暗含著一種陰暗的心理——你不是以強大富裕才充當國際警察嗎？那就應該事事都管，只要有一件惡性沒有管，你就不夠警察資格。

維持國際秩序和捍衛基本人權是每個國家義不容辭的責任，能力小的國家可以少出力，但是不能既不出錢出力又在道義上指手畫腳、說三道四。美國再強大和富足，也不可能事事都管，

這裡既有美國的國家利益牽制，又有事件本身對國際局勢的重要性評估之後的先後秩序。美國平衡著大多數國際突發事件，花的都是美國納稅人的錢，而那些一向只作壁上觀的國家及其國民，有什麼資格指責美國。試問：除了美國之外，還有那個國家願意並有能力承擔如此費力不討好的重任呢？既要出錢出力又要秉公執法，而不出錢不出力的國家往往最愛挑剔美國的執法不公。那麼我們回憶一下前蘇聯是怎樣在社會主義陣營執法的，就會得出結論說，美國雖然犯錯誤，但是決不會屢犯蘇聯式的原則性錯誤，犯到沒有絲毫公信力的眾叛親離的程度。

9・11事件的發生，全世界的一致譴責，已經證明了美國作爲國際警察的所積累的聲譽和公信力，在關鍵的時刻發揮了巨大的道義凝聚力。最大的危險不是自由的美國充當國際警察，而是美國如果退回孤立主義的老路，這世界就出現執法真空，而一個沒有警察的世界，必將是各類戰爭狂、獨裁者和恐怖分子泛濫的世界。別以爲有191個成員國的聯合國就能維持現在的國際秩序，如果美國退出，多年來受官僚作風和無賴國家群體之害的聯合國，連在經濟上支撐下去都很難，就不要說有效地維持國際秩序了。同時，美國正在爲自己維護國際和平和推廣自由秩序付出巨大的代價，不僅是生命、財產、心理的巨大傷害，很可能還要付出制度代價。最近，美國的主流民意已經傾向於爲了公共安全的保障而放棄一部分個人自由，政府也以國家利益爲理由干涉新聞自由，眾多可能侵犯個人隱私、限制移民、留學生的議案也紛紛提出……如果因9・11，美國重蹈40年代珍珠港被偷襲後的局面、重蹈50年代冷戰時期的麥卡錫主義的覆轍，那就不僅是美國的悲哀，也是世界的損失。因爲自由的象徵不再光彩奪目，而變

得晦暗不明。

如果有人問，是什麼給了美國充當世界警察的道義合法性，那麼只能是美國歷屆總統一再強調的「自由」。「自由」是迷人的偉大的，因爲自由的核心魅力不是暴力、強權，而是善待人性的柔性和美感——對生命的敬畏、對和平的珍視、對尊嚴的捍衛、對神聖價值的愛。這種魅力不但把美國成就爲最有實力的國家，而且歷史地把美國推向「全球霸權」的地位。美國主導國際事務的合法性，皆源於「人權高於主權」這一自由主義價值觀的道義支撐。美國人中的絕大多數，在「9・11」大災難中所表現出的高貴人性和健康的公民風範，布希政府在準備對恐怖主義的反擊時，所表現出令人刮目的的克制、審慎、理性和成熟，皆來自上帝賜予這塊新大陸的自由。這不僅是政治智慧上的成熟，更是自由制度所培育的人性光輝。

說句粗話：人人都想當老大，比來比去，還就真是老美當得最令人信服。

2001年9月28日於北京家中

最大的安慰和最大的恐懼

——有感於卡斯楚的電視講話

美國「9・11」悲劇發生後，我沒有想到自己在跟蹤事件的過程中，除了悲憤之外，還會逐漸感到安慰；除了對大洋彼岸的人道災難承擔一份遙遠的道義之外，還在自己的國家產生一種道義上的無力感；除了對恐怖主義的恐懼之外，更強烈地感到對本民族的恐懼，儘管這恐懼不是由恐怖分子的人肉炸彈製造的，但是網路上的蒙面們的恐怖言詞，那種冷血的野蠻的幸災樂禍所製造的精神恐懼，對於置身於其中的我來說，甚至超過專制政權及恐怖主義製造的現實恐懼。

9・11事件後美國人展現高文明的風範

使我感到安慰的，首先是大災難中的美國人民和政府基於對生命的神聖之愛，所表現出的無私、團結、理性、冷靜、秩序、決心。紐約市長發布命令，禁止一切報復性和任何性質的暴力，一旦有人首先使用暴力，統統繩之以法。布希總統表示，這次恐

怖主義事件並不能證明大多數阿拉伯人和伊斯蘭教國家以美國爲敵，並呼籲紐約市民不要針對美籍阿拉伯人進行任何報復行動。布希13日說：「不應該認爲某個人是穆斯林，就讓他爲此次恐怖襲擊負責。」之後的14日，在全美國的悼念無辜亡靈和與劫機犯搏鬥的英雄儀式上，世界主要宗教和種族的包括伊斯蘭教和阿拉伯人都共同爲受難者祈禱。15日，美國國會通過了眾議員戴維·博尼奧爾提出的「譴責偏見和暴力」的議案，強烈譴責美國人與阿拉伯裔、穆斯林及南亞人之間的暴力衝突。

這種高度的文明水準更是普通美國人的公民風範，它已經在被劫持的飛機上得到淋漓盡致的表現。墜毀於皮茨堡的被劫持飛機上的男性乘客，在如此險惡的緊急情景之中，居然象大選時期的投票一樣，通過舉手表決的民主程序，一致同意與恐怖分子一決生死。這是怎樣的勇敢！而在勇敢之外，是更偉大文明的普及化！還沒有完全從大災難中恢復過來的美國人卻很理性很清醒很高尚，許多受難者的親人參加救援和鮮血，高達81%的美國人認爲：政府在沒有確鑿證據前，決不能輕舉妄動；許多美國人積極地自發地組織起來，防止一切對伊斯蘭社區的惡意攻擊；滿大街呼籲和平、抗議戰爭的標語，高呼「阿拉伯人不是敵人」、「戰爭決不是解決爭端的手段。」人們舉行的悼念儀式上，只有哀悼、祈禱、相互安慰、表達著愛，而沒有發泄仇恨、血淚控訴；只有燭火和安魂曲，而沒有聲嘶力竭和揮舞拳頭。雖然免不了有極少數人因此仇視阿拉伯人，但是大多數人所表現出的理性和冷靜，不能不令人肅然起敬。想想吧，他們剛剛經歷了大流血、大恐懼、大悲傷，他們有太多的理由憤怒、宣泄、要求「以眼還眼、以牙還牙」！所以，我非常贊同前總統柯林頓的表示：那些恐怖分子

做了周密精心的準備，但是他們低估了美國人民，他們知道自己在做什麼嗎？他們對美國人民的判斷失誤，他們將會知道自己犯了一個多麼大的錯誤。而當布希總統和夫人勞拉手拉手走出一家醫院時，布希強忍淚水告訴記者：「所有的傷員沒有被恐怖襲擊嚇倒，這令我很感動。」

其次的安慰是全世界各國，不分種族、信仰、制度、意識形態，不計較歷史恩怨——哪怕是再深的仇恨和分歧，此刻都被放置一旁——作爲人類的一員就必須堅守的珍視生命這一最低道義底線。在面對這場恐怖分子向人類文明發起的挑戰之時，整個世界站在無辜受難者一邊，發出的是同一個聲音：震驚和悲憤，譴責恐怖主義滅絕人性的暴行，向災難中的美國人民及政府表示同情、聲援、支援。全球各國聯合起來打擊恐怖主義的決心，從來沒有達到過像「9・11」之後的高度共識。因爲這次震驚世界的大災難，發生在和平的時期與和平的地點，針對的是最沒有反抗能力甚至連逃生的機會都沒有的平民，而且恐怖分子是用不明示、不宣戰的手段屠殺平民生命，此乃有史以來最陰險、最卑鄙、也是最怯弱的恐怖暴行。

對於仍然生活的獨裁恐怖之下的我來說，自然對其他專制國家的反應更爲注意，除了無賴的伊拉克政府(因爲伊拉克人民未必都幸災樂禍)之外，其他我們熟知的著名獨裁者的反應都是譴責恐怖主義，其中，北朝鮮的反應最慢也最官樣文章，只是外交部出面表示同情和遺憾並譴責恐怖主義，而美國的宿敵利比亞的格達費和古巴的卡斯楚的反應之強烈和立場之鮮明，遠遠超過我所能想像的最高期待。

美國宿敵格達費與卡斯楚也和美國站在一起

格達費發表電視講話，除了譴責可怕的恐怖事件、表示隨時願意爲美國人民提供幫助之外，還說利比亞和美國之間的一切衝突和分歧，都不能成爲對美國人民提供人道主義的支援和援助的理由。最後，他甚至表現出只有美國的傳統盟國才會有的鮮明態度：「這是我們的義務，我們將和美國人民並肩作戰！」最新的消息，他還呼籲利比亞人向阿拉法特學習，爲美國人獻血。當阿拉伯人的血注入美國人的身體時，穆斯林就是在用鮮血譴責恐怖主義。這樣的表態，大量出現在英、法、德、日、歐盟並不令人吃驚，像法國總統席哈克說：全體法國人民和美國人民站在一起！但是，出自格達費的口中，就不能不讓我刮目相看。

如果說，格達費的表態只見文字而沒有影像，已經足以讓我意外並欣慰的話，那麼古巴的卡斯楚發表電視講話時的畫面，則讓我感到震驚和感動。大陸的中央電視臺在報導世界政要對「9・11」大悲劇的反應時，選擇性極強地給了爲數不多的幾位元政要的畫面，第一是俄羅斯總統、接著是英國首相、法國總統、德國總理、日本首相、北約秘書長，在這些有影響的政要之外，只有兩位元首腦在畫面上出現：一位是巴解組織領導人阿拉法特，一位是古巴獨裁者卡斯楚。

在此之前曾在網上看到過古巴外長的表態，心中便有所觸動，而當我從電視畫面上看到大鬍子卡斯楚那激烈的手勢和表情，聽到他譴責恐怖主義、哀悼無辜死難者、向美國提供人道主義援助和開放機場的聲音時，給我的震撼超過了其他任何政要的

電視講話。譴責、同情、哀悼、人道援助都可以想像，但是開放機場這確實是驚人之舉，它的象徵意義遠遠超過加拿大的開放機場。眾所周知，在此之前，這位拉美僅存的終身獨裁者逢美必反，我在中央電視臺的國際新聞節目中見過的卡斯楚，大都是在浩大的群眾反美集會上發表強硬的近於歇斯底里的長時間演說，印象最深的是「古巴男孩埃連」事件的一系列演說，還有在今年7月7日的一次反美大型集會上演說時幾乎暈倒的鏡頭。

古巴和美國之間存在著近半個世紀的歷史恩怨，直到今天，美國仍然視古巴爲少數幾個無賴國家之一，還沒有解除對古巴的制裁和封鎖；而古巴仍然把美國作爲邪惡的霸權，在國際事務中，採取「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擁護，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反對」的極端立場。讓人萬萬沒有想到的是，在美國遭遇這場震驚世界的大災難時，大鬍子卡斯楚非但沒有幸災樂禍，沒有故作姿態的敷衍，沒有在同情表態的同時，要求美國反省四處伸手的霸權外交，反而立場鮮明的站在無辜受難者一邊，站在人類正義一邊，強烈譴責恐怖主義，願意爲美國提供任何人道主義援助和開放古巴境內機場……我特意查找了新浪網，有關卡斯楚的新聞共171條，對於美國，只有他就「9・11」事件的一條消息是善意的。但願，美國政府能把這作爲美古關係的新開端，在珍視生命的共同道義底線上開始化解歷史恩怨與現實衝突。

中國大陸無恥的幸災樂禍令人恐懼

與這種最大的安慰形成鮮明對比的，則是我在自己的國家感到了最大的恐懼。儘管中共官方的表態在世界性反恐怖主義的高

度共識的壓力下，逐步向人類文明靠近，由最初的低調表態逐漸提高反恐怖主義和提供援助的聲調，但是，充斥於民間的情緒則是離人類文明最遠的幸災樂禍。這種喪失了人所應該具有的最低道義底線的人性墮落，在年輕人特別是大學生中間，表現得尤爲強烈。在北京、上海等地當大學老師的朋友來電話說：置身在「9·11」大悲劇後的大學校園中，如同置身於一個人性全無的深淵：飲酒高歌，相聚慶祝，高喊反美口號，圍攻同情美國的人，甚至有人放鞭炮。

昨天，我突然接到一位很長時間沒有見過面的朋友的電話，他是大學教授，經常作爲電視專題節目的嘉賓，他在電話中的聲音充滿了難以抑止的悲哀、憤怒、恥辱甚至無奈：「曉波，你應該來校園體驗一下，這裡再也不是人文精神的淨土，已經變成了法西斯和犬儒的溫床。這幾天來，我遭到過學生們的圍攻，感到難以想像的孤立，那些年輕學子、還有許多教授，居然連起碼的人性都沒有了，面對如此生命慘劇，居然幸災樂禍，這甚至比恐怖分子更恐怖。所以，我必須表達對此的憤怒，一定要在你們的公開信上簽名。你一定要把我的名字簽上。一定！」

再看充斥各大網站的充滿趁火打劫興致的叫好帖子，「向聖戰英雄致敬」、「這下小布屎該尿褲子」、「王偉冤魂終於得到美國佬的血祭」、「紙老虎就是紙老虎，超限戰可以打垮一切霸權」、「我們應該乘世界革命的東風，馬上行動，炸掉靖國神社，一舉攻下臺灣，徹底消滅藏獨疆獨，進而收復外蒙古……」中國人一向有充當濫殺無辜的看客的下流傳統，但是即便魯迅當年斥責過的麻木看客，也沒有達到像今天這樣喪心病狂、冷酷下流的程度。

強烈反美的網友們，你們對美國的仇恨能否超過古巴人嗎？

你可以基於民族主義，對撞機事件中沈入海底的王偉、中國駐南使館被炸中殉難的三位記者表示持續的哀悼；你可以基於對冷戰後國際秩序的個人觀點，對唯一超強的美國政府的外交政策表示異議；你可以嘲笑自稱最強大的美國，其情報系統和安全保障是何等的無能和低效；你有權站在同情平民的立場上，就科索沃戰爭、長期制裁伊拉克對無辜平民的傷害，質問戰爭的性質；你有權在超級強國和弱小族群之間，在阿以衝突中，選擇站在阿拉伯人一邊；你也有權翻檢歷史，對朝鮮戰爭、越南戰爭以及美國在二戰後參與的所有軍事活動的正義性提出置疑；你也有權基於信仰的理由，把甘當人肉炸彈的恐怖分子視爲殉難的聖徒或英雄；你甚至可以基於對智慧的迷戀，欣賞此次恐怖主義暴行的策劃之嚴密和實施之成功……但是你決不可以踐踏珍視生命的最低道義底線，決不可以用種族、國籍、信仰、歷史、意識形態等藉口，不能用「親者痛仇者快」的思維方式，把某些人的無價生命之無辜毀滅視爲理所當然甚至幸災樂禍，把純粹針對平民的恐怖主義暴行視爲「聖戰」和「殉難英雄」，把歇斯底里的偷襲式謀殺的懦夫行徑視爲戰爭的傑作，你不能無視對於當今世界來說，最大的恐怖莫過於：恐怖主義施暴的無疆界性和陰謀性，國際反恐怖主義遭遇的，正是證據難以收集、甚至找不到具體物件的窘境。

而我，就置身於這樣一個70%的網蟲肆意踐踏最低道義底線的民族中，置身於毫無基本是非善惡標準的年輕一代特別是大學生之中，他們將是未來中國的精英！難道這不是作爲一個中國人的最大恐懼嗎?!世界上大多數專制政府、包括中共政權，在「9·11」上都表現出接近人類文明的努力，而大陸民間的主導情緒卻離人類文明漸行漸遠，遠到讓人對這個民族的未來感到恐怖和絕

望的程度！這決不是使館風波和撞機事件的後遺症所能辯護的。

幸災樂禍的同胞們，環視整個世界，只有海珊在歇斯底里，難道你們只配和這種無賴、狠毒、好戰、獨裁的惡魔爲伍嗎?!

當全世界感到大陸各個網站中的占壓倒性優勢的幸災樂禍的情緒之時，我們這個民族已經在道義上置身於全球之外，我們已經野蠻地無恥地冷血地幸災樂禍地跨過了人類最低的道義底線，墜入萬劫不復的不義深淵，成爲魔鬼家族中的一員。

2001年9月16日於北京家中

肆

自省篇：吶喊與見證

我從十一歲開始吸煙

——爲「文革」30年而作

關於「文革」這一人類歷史上的奇觀，人們爭論最多的還是成年人和紅衛兵的種種作爲，幾乎很少有人涉足「文革」中孩子的生活。籍此文革30年之際，我想從一個小學生的抽煙經歷來審視這場運動，或許能爲人們提供些許獨特的資料和另一種視角——小學生抽煙，也充滿著等級特權和階級鬥爭……

孩子得以掙脱學校和家庭的束縛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發端的1966年，正是我長達30年的抽煙史的開始。我對煙的感情，始於好奇，中經冒險和叛逆，終成一個癮君子。

我1955年生，那時11歲，小學四年級，還沒有資格與大人們、哥哥們一樣帶上紅袖標，投身於轟轟烈烈的革命，只是大辯論、大字報、批鬥會、武鬥、大串聯、打砸搶的看客。兩個哥哥去北京串聯時，我的死乞白賴的請求被他們輕蔑地拒絕了。當時的

我，只能悲歎自己晚出生了幾年，沒有趕上成熟的年齡，徒然錯過了激動人心的大好時光。但是，因爲年齡太小而無緣於轟轟烈烈的孩子，並不能置身於階級鬥爭的整體氛圍之外，也會因一些小事而被捲入革命之中。

學校停課，父母忙於革命或疲於被革命，很少有時間光顧我，這使我在一段時間內，得以擺脫學校和家庭的雙重束縛，充分伸展孩子的天性，沉浸於自己所創造的遊戲之中。回首「文革」，記憶中充滿了新奇、刺激、亢奮、野蠻、殘酷和無拘無束。人的破壞性本能、虐待狂本能和陷害他人以求自保或自娛的本能，得到了淋漓盡致的發揮，能量長期被壓抑的火山噴發了，吞沒了一切，每個層次的人都有自己的革命物件。作爲孩子，我所要反抗的就是老師(公共權威)和父母(私域權威)。而抽煙恰恰是此種反抗的發端。

人分三等，煙分三等

也許，十一、二歲的小學生抽煙，在任何時代裡和任何社會中，都會被大人們視爲劣跡，孩子抽煙在其他社會中可能會導致吸毒。但是，在中國、在「文革」中，孩子抽煙就不僅僅是品行不端，更是資產階級思想腐蝕的結果，而我恰恰又是在「文革」開始時學會了抽煙，遂被家長和老師視爲已經走到資產階級泥坑邊緣的危險分子，再不猛擊一掌，就將墮落爲不可救藥的階級敵人。

「文革」開始後不久，毛澤東號召停課鬧革命，不僅大學和中學，就連小學也必須回應這一號召。我所就讀的東北師範大學

附屬小學宣布停課三個月，老師們革命，學生們放假。我第一次抽煙就是在學校停課的那天下午，抽的是眾多的吸煙者望塵莫及的高級香煙「牡丹牌」。這種煙在當時僅次於「熊貓牌」和「中華牌」，屬於高級香煙中的第三檔次。據說，「熊貓牌」香煙是特製的，只供極爲有限的幾十個最高領導人享用，市場上根本見不到，也沒有市場標價。「中華牌」香煙六角錢一包，供省部級領導人享用，要特供票才能買到，一般的商店裡見不到這種煙，只有到特供商店才能買到。「牡丹牌」香煙五角一分錢一包，是供一般高級幹部（中共規定行政十三級以上爲高幹）以及一些知名的專家、教授享用的。再次之的是「大前門」和「鳳凰牌」，四角錢左右，也屬於高級香煙之列。這些高級煙的顯著標誌是用銀色閃亮的錫紙包裝，都要憑票供應，一般的家庭只有在過節時才能買到一兩包。

在當時的長春市，中等偏上或中等家庭的人一般抽「大生產牌」或「迎春牌」，價錢在兩角錢到三角五分錢之間；下等家庭的人抽一角四分錢的「握手牌」或一角五分錢的「代代紅牌」；社會最低層的家庭或抽八分錢的「經濟牌」或抽葉子煙。

在我們這些抽煙的孩子中，煙的好壞決定著抽煙者在群體中的地位。「經濟牌」當時被戲稱爲「八分損」，抽這種煙被別人瞧不起。從這種煙的分類檔次上看，當時的中國已是一個等級森嚴的社會了。這種等級觀念也直接影響著孩子們對貴賤的意識。由於高級煙作爲高等人或權勢者的標誌而極難買到，就自然要形成販煙黑市，高級煙的奇缺和它的等級特性，使之在黑市上的價格常常成倍高出於市價。比如，「牡丹牌」香煙市價五角一分，在黑市上要一元二角；「大中華牌」市價六角，黑市價一元五角或

二元。越是高檔的香煙，市場上就越是奇缺，黑市價也就越高。但是，當時好像沒有聽說過假冒僞劣。有些孩子就是爲了在同學中顯示其高人一等，竟不惜以非法手段弄錢，然後到黑市上買高級煙，拿到同伴中炫耀。

看來，無論怎樣的社會，只要有利可圖，正規規則之外的非法交易就不可避免。在全民革命的文革時期，恰是城市裡的黑市交易最發達的時期。當時的吉林省長春市，黑市上交易的不僅有高級煙和高級酒，還有各類票證，特別是糧票和布票，全國通用的糧票與只在地方通用的票券之間，在黑市上的差價還真的不小，往往會翻倍。有些孩子爲了有零花錢，就偷家裡的票券到黑市上去換錢花。

將軍的孩子有吸煙的特權

我抽的第一支煙是一個綽號叫「大胖」的同學給的。他爸是少將，屬於高級幹部之列，住在長春市同光路的一幢獨門獨院的小紅樓裡，上下兩層，有七八個房間，院子裡種有各種花草樹木，有保姆洗衣做飯，有勤務兵清掃門庭和警衛。對我這樣的家裡人均生活費只有15元錢的孩子，高幹家庭或有錢人家都有一種特殊的好聞的氣味，由多種好吃的東西散發的氣味混合而成，我小時候管這種氣味叫「富人味」。現在，一回想起那時去高幹或高知(高級知識分子的簡稱)的家裡的情景，第一個記憶就是滿鼻的「富人味」和心裡流出的口水。

「大胖」倚仗他當將軍的父親，在班裡經常胡作非爲，老師和校方也奈何他不得。他惹出再大的事，只要他爸爸的上海牌小

轎車一到，校方只能笑臉相迎。我和「大胖」同樣抽煙，一起被同學告密，他安然無恙，而我卻要在全班作檢查。由此可見，中共之特權的濫用，絕非始於今日的改革開放。在五十、六十年代，特權階層已經形成，一間學校根本惹不起將軍之子，因爲少將相當於省部級幹部，一個省會城市也沒有幾個，誰能惹得起！「刑不上大夫」的傳統和現實，不僅庇護著當權者本人，而且蔭及子孫。

至今我仍然記憶猶新：宣布停課的那天下午，神色慌張而沮喪的班主任剛剛走出教室，「大胖」便跳上書桌，從兜裡掏出印有牡丹花圖案的紅色煙盒在半空中揮舞。他的目光咄咄逼人，發問的口氣不可一世，充滿了挑戰的意味：「誰敢抽煙？這是我偷我爸爸的。牡丹，五角多一包，高級煙。誰敢抽？老子白送。」大多數同學沒有理他，收拾書包，離開教室，留下來的幾個人都是平時的淘氣包，我就是其中之一。「大胖」瀟灑地分給我們每人一支，然後掏出打火機，給每個人點燃。我有些膽怯，非常謹慎地抽了一小口，除了覺得有點嗆人外，並無其他樂趣。「大胖」見我們吸的窘狀，便給我們作示範，怎樣夾煙，怎樣吸，怎樣吐，怎樣玩吐煙圈。「大胖」的煙圈吐得非常好，大而濃的煙圈可以一直滾到天花板，小而精巧的煙圈可以一個接一個地從嘴唇間彈出，不能不令我們這幾個孩子驚奇、佩服。我學著「大胖」的動作，強壓住咳嗽，盡量做得維妙維肖。

從此以後，我就經常和幾個小夥伴湊在一起抽煙，在廁所、在角落、在街旁、在野地，我學會了一口咽下所有的煙，學會了吐各種煙圈，學會了把一個煙頭全部抽光，也學會了爲抽煙而撒謊、騙父母的錢、偷爸爸的煙。

小學生抽煙——階級鬥爭的表現

然而，在那個爭做毛主席忠實的紅小兵和優秀的共產主義接班人的革命時代，任何超出紅色標準的行爲、言論、思想和作風都被視爲大逆不道，小學生抽煙自然被劃歸資產階級的腐朽生活方式，即使不是徹底墮落，也是受了階級敵人的腐蝕和利用。用當時的術語來說，就是被階級敵人的糖衣砲彈打中了，已經走到了資產階級泥坑的邊緣，再不回頭就會陷進去而無力自拔，成爲不可救藥的資產階級的俘虜。的確，大凡抽煙的孩子都有幾分流氓氣，經常與曠課、打架、戲弄老師、搶軍帽、搶紀念章、偷東西、攔女孩子等劣跡相關。這些行爲至多屬於品德敗壞之類，無論如何與階級鬥爭搭不上界。然而，當時上綱上線的思維方式扭曲了人們對生活的價值判斷，一切都是用階級鬥爭的尺度來衡量，小學生抽煙自然也是兩個階級爭奪下一代的鬥爭之一。

我因抽煙而被批鬥

無拘無束的自由時光隨著「復課鬧革命」的號召而結束。重新返校，頓覺一片壁壘森嚴的肅殺之氣。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簡稱工宣隊）進駐學校，實行軍事化管理。而大學裡不光派駐工宣隊，還要派駐軍宣隊（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實際上就是「軍管」。整個中國，各省市、各大機關、各大工廠、各大專院校的第一把手，皆爲軍人。我們學校的那個工宣隊隊長姓馬，後腦勺長了個大包，私下裡調皮的同學戲稱他叫「馬疙瘩包」。此

人極爲嚴厲，全校的老師和學生都怕他，因爲他手中握有處理全校師生的大權。有時幾個小夥伴正湊在一起商量鬼主意，老遠看見他的影子，就會立刻提醒大家：「快走！馬疙瘩包來了。千萬別讓他看見。」

同時，公檢法被砸爛後，各單位與社會的秩序的維持和管理，除了軍宣隊和工宣隊之外，還有代替了公檢法的「無產階級群眾專政指揮部」（簡稱「群專」）。能夠進入群專的人都是經過嚴格挑選的，出身好，革命覺悟高。「群專」的組織方式效仿解放軍，分成連、排、班，統一吃住在學校，進行各種准軍事訓練，在「工宣隊」的指揮下，負責對敵人的專政和維持紀律。「群專」在學校裡的權力甚至比公安局還大，他們可以任意搜查、審問任何一個可疑的物件。同時，「少先隊」也被「紅小兵」所取代，紅領巾換成了臂章。

爲了純潔校風，我所在的小學，實行搜身制度。早晨上學時，「群專」的人站在校門口檢查每個學生，不僅檢查風紀（如衣扣一定要扣嚴，書包一定要斜挎肩上，穿夾克的要用別針把領口別嚴，帽子一定要戴正等等），而且要搜遍全身。一旦搜出小刀、彈弓、黃色書（小說之類）、香煙之類的物品就統統沒收，送進學校開辦的「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展覽館，和那些走資派和地富反壞右的變天帳、毒草文章等贓物一併供人參觀，教育人們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因爲資產階級人還在、心不死，每時每刻都在用香煙之類的糖衣砲彈腐蝕下一代。同時，被搜出贓物者，認錯態度好的要寫檢查，在全班同學面前宣讀，態度不好的要開批鬥會。批鬥會的規模視罪行的嚴重程度而定，大致分爲四級：一級爲班級批鬥會，二級爲年級批鬥會，三級爲全校批鬥會，四

級爲幾校聯合批鬥會。有罪者在批鬥會要低頭認罪，批判者要咬牙切齒，每個批判者發言完畢時都要高呼口號。這些程式的處理還屬於人民內部矛盾。對那些屢教不改者就要實行專制，犯罪者被「群專」抓去拘留審查，關進「群專」監獄，每天叫家人送飯。關押時間的長短視被關押者認罪態度而定。被關押期間犯罪者不僅要忍受輪番轟炸式的審問，還要忍受體罰、毒打。因爲一旦被定爲拘留者，矛盾的性質就由人民內部矛盾轉化爲敵我矛盾。革命者不再視之爲可挽救的犯罪者，而是視之爲不可救藥的階級敵人，是罪犯。當他們認爲犯人已完全認罪，下決心痛改前非之後，就以一個大型批鬥會來結束犯人的拘留生涯。我已經記不清自己因抽煙、打架、曠課而做過多少次檢查、關押和被開過多少次批鬥會了。

父母這樣對待我的抽煙

如果說抽煙在學校裡被視爲階級鬥爭的動向，那麼在家庭中小孩子抽煙則被視爲學壞的開始，父母對此非常警惕。我爸爸抽煙，但是他認爲抽煙是成年人的當然權力，小孩子抽煙則是品行不端，一旦發現，必須及時糾正，將其扼殺在搖籃中。父母發現我偷著抽煙，很少和我講階級鬥爭之類的大道理，他們的方法簡單粗暴，非打即罵。最難受的是他們要反覆追問煙的來源。如果得不到滿意的答覆，這種連誘供帶威脅的審問就會永無止境，直到問清楚爲止。

第一次被媽媽發現我抽煙，是她嗅出了我身上的煙味，接著又從我的文具盒裡翻出了半截煙。媽媽當時的憤怒令我終身難

忘。她先是聲嚴色厲地盤問，見我不說，便抄起掃帚劈頭就打，打了幾下，我仍然沉默，她竟扔下掃帚，抄起鋼筋作的爐鉤子。情急之中，我奮力向媽媽一頭撞去，她被撞倒後，我便奪門而出。那是冬天，我自知這下鑄成大錯，回家肯定要挨頓暴打，於是決定不回家。瑟瑟寒風中我四處遊蕩，直到天黑了，我凍得受不了了，才躲進儲存過冬大白菜、土豆、蘿蔔的菜窖裡。事後媽媽說，當她和爸爸在菜窖中找到我時，我像隻小狗，蜷曲著身子，蓋著草袋子，頭枕一棵大白菜，睡得很死。

從此以後，我每天放學回家，媽媽都要搜查我的衣兜和書包，讓我張開口嗅我嘴裡的氣味。而我也自有應對的方法。回家前拼命漱口或吃幾瓣大蒜，進家門前先把煙藏在某處。再後來，我插隊成了知青，回家也可以公開抽煙，學校和家庭的雙重束縛徹底擺脫了。當爸爸第一次給我抽煙時，我的心底裡突兀地升起一種解放感，那也是我平生第一次如此深切地感受到父愛。

1996年4月17日於北京家中

他如果當選，和大陸的領導人什麼都可以談，甚至包括把「一個中國作爲議題」也可以談，但是要求大陸不預設任何先決條件，因爲這樣才能體現「對等原則」。但願陳的態度是他就職後處理兩岸關係的真實的政策底線，而不是謀求執政的競選策略。最近，陳水扁也保證，他的就職綱領一定是以最大的善意和誠意來定位兩岸關係，決不會引起新的緊張。

既然兩岸都表示了可以談「一個中國問題」的態度，區別只在於「前提」和「議題」，那麼還有什麼必要以武力相威脅呢？既然白皮書說「臺灣在國際上與其身分相適應的經濟的，文化的，社會的對外活動空間，臺灣當局的政治地位等等，都可以在這個框架內，通過政治談判，最終在和平統一的過程中得到解決。」爲什麼還要擺出逼人就範的姿態、招致臺灣人民和國際社會的反感呢？爲什麼不能通過談判和妥協，在「和平統一」的前面加上「民主的」定語呢？其實，加上這一定語，對中共和大陸人民談不上什麼妥協，而是大陸走向未來的必由之路。臺灣提出「民主的和平統一」，等於爲大陸提供了一個進行政治改革的絕好契機和堵住強硬保守派的嘴巴的方便藉口，爲了祖國統一的千秋大業就必須進行政治民主化的改革。這樣做的結果，最大受益者恰恰不是臺灣、而是大陸本身。

道義的力量

儘管在短期內，兩岸關係不明朗，存在著容易引起緊張局勢的種種不確定性，但是從長遠的目光看，兩岸關係的未來前途除了民主的和平統一之外，沒有其他的選擇。這種唯一性首先是由

的失誤，也就是在反省他自己的失誤。是的，任何八九運動的參與者，在運動的性質還沒有得到公正的評價，受難者的冤屈亦未獲補償之前，都應該爲運動的正義性和偉大意義進行辯護，其責任實乃義不容辭。但是，這種辯護決不能成爲「護短」，而是嚴肅地自省、總結經驗特別是反面的教訓。至於有人說，以王丹的醒目身分進行這樣的反省，有被中共利用推卸罪責的可能。此類擔心，儘管動機純正，但實在是小看了八九運動本身的力量之所在。而由當年的學運領袖來反省自身的失誤，恰好表現了他對運動的正義性的充足信心，更說明了他在道義上敢於面對自我的勇氣，在政治智慧上的開拓和成熟。但願，王丹的自省態度不止於他個人，而且成爲「天安門一代」的共識。因爲，任何來自其他方面的反省和批評，都無法代替每個人自己的、進而代替「天安門一代」的自我反省和自我成熟。

至於談到八九運動中學生們的失誤和不成熟，我從1989年的「六二絕食宣言」就開始指出學生的缺點，在1992年出版的《末日倖存者的獨白》中還有更苛刻的批評——特別是對當時的學生領袖。現在，王丹的自省反倒使我覺得有些批評過於嚴厲，既不客觀又不近人情。我在苛責學生的同時，更應該審視知識界自身，我們這些「長鬍子的黑手」又做的如何呢？當年的王丹們，只有二十歲左右，也是第一次面對如此大規模的運動，既沒有多少以往的經驗積累，又無事前的充分準備，運動一下子就起來了，怎麼可能要求他們的成熟呢？被苛以成熟要求的，實在不應該是學生，而應該是黨內開明派和自由知識界。

八九運動的失敗使中國的政治改革完全停滯

不錯，「六四」的鮮血和八九運動的失敗，對於大陸中國的負面影響是多方面的、整體性的：它中止了八十年代勢頭正盛的全面改革，使之變成了政治保守而經濟突進的跛足者，而經濟改革本身又變成了權力市場化和權貴私有化。八九運動所要求的政治改革完全停滯，所反對的「官倒」非但沒有絲毫收斂，反而發展成以腐敗的各級權貴家族爲核心的利益集團。「六四」，葬送了中共政權的合法性，使推進政治改革的黨內開明派從此一蹶不振，而固守於單純經濟改革的保守派主宰高層決策至今；「六四」，使體制內外的自由派全軍覆沒，特別是自由知識界，他們曾擁有的在現實中高層決策智囊的位置，在道義上作爲民間的啓蒙者和代言人的角色，現在統統失去了。這種整體失敗，又一次重演了延續幾千年的中國知識分子群體的悲劇，其極端化就是惟利是圖的冷血。面對中共對弱勢群體法輪功的野蠻鎮壓，自由知識界的整體沉默實乃懦弱到冷血的最新例證。

更令人痛心的是，「六四」，使民間的政治壓力幾乎全部喪失。首先是大學生群體，再沒有八十年代的「以天下爲己任」的單純的社會責任感了，而變成了中共的「以經濟建設爲中心」的附屬物，「小康生活」成了他們追逐的主要目標。從五四運動開始的中國現代化過程中，大學生群體始終是最主要民間政治推動力之一，而八九運動似乎成了一個分水嶺，使這一傳統在達到高峰的同時，也迅速地跌入低谷。現在的大學生，除了富於理想主義的極少數在單打獨鬥之外(如楊子立、余杰、任不寐等人)，已

經很難形群體性的民間壓力集團。他們的不滿主要不是指向國內的獨裁制度，而是一致對外地指向美國霸權的民族主義狂熱，在中共刻意把愛國主義作爲政權合法性來源的今天，大學生群體已經成爲中共的主要民意王牌。反霸權就有官方批准的大學生示威遊行，反法輪功就有全國性的「校園拒絕邪教」運動的如火如荼。看看互聯網上的那些大罵美國的帖子，一大半來自大學生群體。這實在是「六四」流血大悲劇後的最大悲劇，所謂「哀莫大於心死」，此之謂也。

而來自受壓榨的農民和城鎮失業者的民間不滿，儘管呈日益高漲的趨勢，但是，這種不滿已經主要不是八十年代對政治改革的公眾熱情，而是對經濟利益的追求。由權貴們主宰的不公正分配，使弱勢群體的既得利益嚴重受損。對此，中共採取的兩手政策也不同於八十年代，它不是在整體的政治寬容中的適當壓制，而是赤裸裸的暴力鎮壓和利益收買，是強權鎮壓出的和花錢買來的社會穩定。

這種負面影響至今還左右著整體局勢。最近，英文版《天安門文件》和中文版《中國六四真相》的出版，雖然使六四話題在海外再次成爲熱點，但是在國內，非但沒有促成政治局面的寬鬆，反而使執政者陷於緊張和恐怖之中，對黨內的和社會上的異己力量的監控與鎮壓更趨強硬。一個在血泊中成爲執政核心的高層特權集團，並不能真正理解大屠殺對他們意味著什麼。他們仍然礙於狹隘的既得利益和政治犬儒症，只從負面來看待「六四」及八九運動，彷彿「六四」翻案之日，就是他們受到整體審判之時；彷彿人們不斷地提起「六四」，就是心術不正，妄圖推翻現行政權。而他們從來不會想到：解開「六四」這個結，對他們、

對每個人、對這個民族的巨大正面意義。

再回到八九運動中的學生。我認爲他們在當時對現存制度的自發反抗，其聲勢之浩大、秩序之井然和動員之廣泛，已經爲中國社會的整體轉型提供了非常有利的民間平臺，成年的黨內開明派和自由知識界，完全可以在這種充分的民意支援下，一展身手和大有作爲。可惜的是，由於各自的局限，黨內開明派和自由知識界在如此豐厚的民意基礎上，卻沒有表現出應有的政治上的智慧和魄力、組織上的能力和技巧、策略上的成熟和明智、道義上的良知和勇氣，致使巨大的民間資源和百年不遇的時機被白白浪費。難道學生們發動的運動規模還不夠大嗎？難道各階層市民的支援還不夠熱烈嗎？難道他們的勇氣和堅韌所持續的時間還不夠長嗎？難道他們的和平的非暴力抗爭還不夠理性而有序嗎？

「八九運動」和「五四運動」之比較

回顧中國一百年的現代化歷程，何時出現過像八九學生運動這樣廣泛而持久、和平而有序的民間動員，就是著名的五四運動也難望其項背。五四運動之所以成功，一是有賴於當時社會整體的外抵列強、內懲國賊的強烈要求，二是全社會對學生運動的廣泛支援，三是當時政治統治上的混亂和失控局面。其中，社會名流基於道義的挺身而出顯得特別寶貴和重要，不僅是言論聲援而且以實際行動參與，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先生的挺身而出，就是最具象徵性的行動示範。而八九運動被鎮壓之後，社會名流們幾乎是一片死寂。

再看八九運動。與五四相比，唯一不同的就是執政集團對社

會控制程度的差異，軍閥政權無力對全社會實施全面的嚴格控制，而中共政權則牢牢控制著全社會的主要資源。但是，這種可以控制的社會局面，在黨內存在著身居要職的開明派、社會上存在著全力支援政治改革的自由知識界及工商界，民眾中又有已經自發動員起的巨大民意基礎的情況下，如果這三者之間保持著必要的觀念上、資訊上的溝通和策略上、行動上的合作，其結果可能會比缺乏控制的社會更積極。因爲可控制的局面，不會使民間的大規模自發運動失控，造成權威真空的無政府式的混亂。

大多數人皆承認，大陸完成社會轉型的代價最小的方式，顯然是在強大民意支援下的中共主動推進政治改革，形成民眾、社會名流階層與中共內開明派之間的良性互動，以避免人爲隔駭造成某一方做出單方面的錯誤判斷。而在政治改革風頭正盛的八十年代，體制內外確實有一股巨大的合力推動著政治改革。當時，以胡、趙爲代表的黨內開明派與自由知識界和民眾之間，在總體立場上有著基本共識。而八九運動失敗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在運動的全過程中，種種複雜的人爲阻力，使學生組織、知識界自由派和黨內開明派之間缺乏必要的溝通、互動與合作。

事實上，黨內開明派在以前並不是沒有任何準備。據在六四後被關進秦城監獄的趙紫陽的智囊們中的一些人說，在1988年下半年，趙紫陽的智囊們已經預見到中國可能出現自發的民間運動，並制定了在大規模自發的民間運動還未出現之前，就開始實施積極的對話和溝通的應對策略，以防止不可控制的街頭政治的出現。但是，這種主動溝通、對話的策略卻被莫名其妙地擱置了，在八九運動開始時、甚至學生代表在人民大會堂前跪呈請願書之後也沒有啓動，反而弄出個致使運動進一步升級的「4·26社論」，

直到運動發展成了聲勢浩大的「4・27大遊行」之後，官方才開始被迫實施對話策略。但是，第一次對話，官方派出的袁木與何東昌，以一副教訓晚輩的權力傲慢，除了就事論事的敷衍和詭辯之外，再無任何實質性內容。後來，官方頑固堅持「4・26社論」的定性，再次導致運動升級爲「5・13」群體大絕食，黨內開明派才爲了控制衝突升級和事態擴大，更爲了迎接即將到來的中蘇峰會，而派閻明復出面與民間進行極有限的實質性對話。另一次有點實質內容的對話，是在新聞界因對「4・26社論」的強烈不滿而組織了5月初的大遊行之後，胡啓立才到《中國青年報》召開的一個座談會。

1989年5月13日晚，我也參加了在統戰部由閻明復主持的對話。必須承認，閻明復確實是中共難得的人才，他的真誠、謙遜、長者風範和控制局面的能力，即便在黨內開明派中也屬於佼佼者。遺憾的是，閻明復並不是決策者，他出面召集對話是奉命行事，所要達到的目的極爲現實而明確：要求學生在戈巴契夫到京前撤離廣場。由於長期以來官方對民間力量的忽視、不尊重甚至進行迫害與鎮壓，更由於此前袁木等人出面的對話，給學生們留下了過於惡劣的印象。這種主要由官方製造的人爲隔膜，使民間缺乏對官方的起碼信任。何況大絕食開始之後，官方主動與民間的溝通以及對話，既是極端實用主義的又是不平等的。這種對話，即便由閻明復這樣的開明人物出面主持，即便在現場說服了大多數學生和知識分子(用當晚王軍濤發言時的話說，就是閻部長的真誠感動了上帝)，但是，由於其對話的基礎不是出於對民意的真正尊重，而是出於解決戈巴契夫訪華問題的實用目的；不是雙方平等協商基礎上的妥協式合作，學生的要求沒有一個得到

了實質性滿足和兌現(這也有開明派在黨內的實力不夠強大的原因),而更多是官方居高臨下的要求,即便有一定的妥協也帶有恩賜的性質。所以,雙方不可能有良性互動。在此意義上,即便八十年代是黨內開明派和社會上的自由派的蜜月期,也無法在八九運動把它發展成良性互動,就是必然的。

必須承認,趙紫陽爲了以和平的方式控制局面,在黨內已經竭盡全力了,他的開明已經是中共歷任黨魁中的極限了。但是,同樣必須承認的是,中國的長期政治傳統和中共的幾十年的壟斷性特權地位,已經養成了執政者的居高臨下的「父母官」人格,即便開明和肯傾聽異見如趙紫陽者,也不習慣於放下執政者的架子,以平等的姿態面對民意。如果黨內開明派從運動的一開始,就不是只在黨內力爭以和平的方式解決問題,而是通過某種方式保持學運、社會名流與官方之間的資訊溝通、策略共用,其結果可能就會完全不同。比如,在趙紫陽發表「亞銀會議講話」之前,通過某種渠道向學生充分解釋黨內開明派的意圖,而不是在黨內鬥爭失敗,趙自己的政治悲劇命運已經決定之後才親赴廣場,大概就不會有運動的逐步升級,支援黨內開明派的民間運動更不會起到幫了倒忙的作用。在此意義上,幫倒忙的決不是學生們,而是開明派及其幕僚自身。

知識分子的懦弱傲慢是八九運動失敗的主因

自由知識界呢?八九運動的發生與自由知識界思想的啓蒙有正相關關係,自由知識界名流應邀去北大「民主沙龍」的演講,在胡耀邦逝世之前的二、三月份,他們連續發表三封公開信,要

求釋放魏京生的行動，都會對後來的學運產生影響。同時，他們也確實深深捲入了八九運動。但是，他們參加運動的方式極具怪異的中國特色，即在整個運動中，最有投入熱情的自由知識界和大學生之間，始終有一條不便挑明的界線，將動口者和動手者的觀念及行動隔開。這條界線既是政府有意製造的(如堅持要抓長鬍子的幕後黑手)，也是在運動早期自由知識界和學生雙方默守的(如方勵之爲了避嫌從未介入)。

不錯，學生中是有少數人對知識界的過深參與，懷有一種狹隘的「篡奪學運勝利果實」的警惕心理，對此我本人就有體驗。但是，具有這種小心眼的學生絕非學運的主體，更不是主要學運領袖的想法。在「5・13絕食」之後，學生領袖王丹和吾爾開希勸不走絕食的學生，無力兌現他們向閻明復的承諾之時，就已經明確向知識界發出邀請，希望他們公開出面領導運動。這種請求，王丹和吾爾開希對我就提過幾次。他們還說，知識界能夠說服學生的最好方式，就是以行動加入到學生們中間。戒嚴之前，在王軍濤等人的動議下才成立了「首都各界維憲聯席會」，但是，知識分子也僅止於參加會議，並沒有加入到廣場的絕食學生之中。聯席會於5月18日的開始籌備，於23日正式成立，等到5月底的會議，參加聯席會的人員由開始的一百多人銳減到二十幾人，而離開的主要成員是知識分子。

由此可見，雙方默守的界線的背後，主要原因絕非爲了避免授中共政權以進行鎮壓的口實，而是知識界固有的傲慢、特別是懦弱的心態。即便在他們公開參與之後，也放不下精神領袖的架子，也一刻不停地在玩弄見風駛舵的小聰明。他們從來未把自己的政治身分確定爲與其他階層平等的公民，並通過參與到學生之

中來支援或勸說學生，而是始終把自己定位在民眾的啓蒙者或精神導師的角色上，以俯視的姿態進行幕後指導和理論說教，擅自宣稱自己可以代表學生與政府談判，或代表黨內開明派向學生提出單方面的要求。5月27日的社科院政治學所的聯席會議做出撤出廣場的決策，因廣場指揮部的不執行而失效後，王丹曾對我感慨說：如果老師們也加入學生的絕食，那麼在戒嚴前後就有可能把學生帶出廣場。

更重要的是，有些知識分子，特別是還具有幕僚身分的知識分子，他們在八九運動中的主要立場，更傾向於在學生中爲黨內開明派的行爲做辯護，其角色是代表開明派來說服學生，一味讓學生爲開明派的困境著想，而不是同時也站在學生的立場上向政府施加壓力，說服政府也做一些實質性的妥協。這種立場，直到大屠殺過後甚至直到現在，仍然爲一些人所堅持。

從學生的角度講，他們已經爲推進政治改革提供了足夠的民間的動力和壓力，該輪到自由知識界和黨內開明派付諸於行動的時刻了。而且，學生們一直在行動，一直是運動的先鋒，甚至不惜以年輕的生命爲代價，喚起全社會的良知和行動，特別是呼喚社會名流們拿出實際的行動來，而自由知識界卻一直不肯加入到他們的行動中來，黨內開明派也不肯真正與他們對話溝通。所以，他們認爲自己是八九運動的主體和正宗，很難接受黨內開明派的居高臨下的俯視姿態，更難以接受自由知識界那種只動口而不動手的懦弱姿態，就是再正常不過的反應了。無怪乎柴玲曾經不無偏激的說：「什麼是水平？勇氣就是水平。」政治勇氣，在大轉折的關鍵時刻，的確會起到關鍵的作用。

八十年代，在意識形態上，自由知識界的主體仍然在體制之

內，他們既作爲中共的改革政策的主要支持者，又作爲民間社會的主要代言人和啓蒙者，這種雙重身分使他們在八九運動中的整體角色，常常變得曖昧不清。更重要的是，在運動突然爆發之前，他們既沒有明確而深入的自由理念而更多的是期盼「青天」的心理，也沒有什麼精神上和組織上的準備；在運動開始之後，他們既沒有駕馭自發群體運動的組織能力和技術操作的經驗及應對突發事件的有效策略調整，也沒有平等的公民意識及參與精神；而他們最缺少的，無疑是在大恐怖面前的堅定的道義立場和無畏的良知勇氣。

運動開始時，他們大多持觀望態度，其理由居然是不給官方以打壓運動的藉口；隨著運動迅速擴大並達到大絕食的最高潮時，還有一些人只想充當政府與學生之間的周旋者，去廣場擅自宣布代表學生與政府談判；他們中的積極投入者所成立的類似學生自治組織的知識界聯合會，也主要是聲援性質的，並且在沒有和學生充分溝通的情況下，發表了「5・17宣言」，把運動的主要矛頭指向了鄧小平，使運動的目標過早地轉向了「擁趙倒鄧」，給了保守派以罷免趙紫陽的極有利口實，讓鄧小平堅定了實行戒嚴的決心，由此鑄成了策略上的大錯。我甚至以爲，這個錯誤遠遠超過學生們犯下的任何策略上的錯誤。在宣布戒嚴後的一片恐怖之中，他們中的大多數便率先臨陣脫逃，而在最嚴峻的大屠殺時刻，只有極少數人與學生和市民站在一起，面對劊子手的坦克和槍口；在最嚴酷的六月四、五兩日，當無數市民走上街頭搶救死傷者、抗議中共的法西斯暴行之時，風雲人物們早已逃向了安全之處。在六四之後的恐怖整肅中，沒有逃亡和進監獄的知識分子，大都屈從於中共政權的淫威。

始終不肯放下架子的傲慢、一廂情願地寄希望於「明主賢臣」的慣性思維和見風駛舵的投機之心態，使八九運動中的自由知識界，上演了從猶豫觀望到熱情聲援至大面積逃亡或背叛的完整三部曲，淋漓盡致地顯示了這一群體政治上的不成熟和道義上的無底氣。政治上的不成熟還可以得到理由充足的辯護(諸如無經驗)，而對道義上的無底氣的辯護該訴諸怎樣的理由，生存第一的說辭嗎？那也僅僅是一己的生存，而絕非捍衛生命本身的權利。要不然，怎麼可能在別人爲捍衛生命本身的權利而做出巨大犧牲的時刻，他們卻逃之夭夭了呢！因而，訴諸於一己生存的理由而爲臨陣逃脫做辯護，只能證明辯護者在整體上的懦弱。

在這裡，我要提到陳子明和王軍濤，他倆在八九運動中的行爲方式不同於其他知識分子。儘管他倆注意保持與黨內開明派的智囊人士的經常性溝通，其政治觀點也比較溫和，但是，因爲他倆一直堅持獨立的民間立場，從「四五運動」到「西單民主牆」、「大學競選」，從創辦「北京經濟科學研究所」到全面參加八九運動，幾乎捲入了七、八十年代所有的民間政治反對運動。他倆也從頭至尾深深地參與了八九運動，其命運與這一悲劇運動緊緊連在一起。中共政權自然視之爲「職業反革命」，所以六四大屠殺之後，陳、王二人不僅被作爲頭號黑手判刑13年，而且研究所被查封，上千萬資產被強行沒收。遺憾的是，由於沒有應對如此大規模民間運動的經驗，他們從頭至尾的介入，並沒有在關鍵的時刻減緩運動的逐步升級傾向。

在八九運動中，雖然自由知識界並沒有付出慘重的生命代價，但是他們作爲一個群體的失敗則最爲慘重，他們與黨內開明派的聯盟破碎了，與學生們之間的精神紐帶斷裂了，與民眾之間

本來就極爲脆弱的關係更是蕩然無存。他們用自己的行爲玷污了作爲社會的道義良知的崇高角色，也親手葬送了自己作爲民眾的啓蒙者的寶貴地位，而淪落爲一群極端功利化的犬儒分子。現在，極少數仍然堅持自由主義信念的知識分子，也只能處在自說自話的單打獨鬥之中，根本無法形成像樣的民間壓力。

以六四的血腥悲劇結局而落幕的八九運動，真正證明的：不是學生的不成熟和特權意識，而是黨內開明派的不成熟和特權習慣；不是學生們的居功自傲和盲目輕率，而是自由知識界的名流意識和盲目輕率；不是學生們幼稚的英雄主義，而是自由知識界懦弱的犬儒主義。嚴格的講，八九運動的失敗，不是學生及廣大民眾的失敗，因爲他們已經爲這個社會提供了足以改變歷史進程的民意基礎，他們做的最多、付出的鮮血也最多，而是黨內開明派和自由知識界的整體失敗，因爲他們沒能有效地珍惜和利用這寶貴的民間資源。

八十年代的年輕大學生們，曾經爲中國社會的整體變革提供了絕佳的民間舞臺和百年不遇的歷史時機，但是，由於長著鬍子的人們的整體不成熟和懦弱，使年輕生命所付出的代價和提供的時機至今沒有結成正果。中國人還會有這樣百年不遇的時機嗎？還會有八九運動那樣有序而理性的民眾運動嗎？如果有，但願長鬍子的人們能做的好些！

八九運動給中華民族的最大啓示：無論是處理偶發性的棘手事件，還是保持社會的長期穩定，一味對抗，致使本來溫和的矛盾不斷升級，直至達到雙方在心理上(因爲現實往往並非如此，而是人爲的內心恐懼使然)的毫無退路的激化狀態，然後動用強制力甚至暴力暫時解決問題，不僅在道義上是野蠻的，更是在實

際效益上代價最大的方式，而且其效果往往是本末倒置的，對具有道義性合法性的被鎮壓者如此，對失去道義合法性的鎮壓者更是如此。而在大陸中國，民間與執政者的衝突，無論是對抗的產生、激化，還是解決衝突的方式的粗暴和野蠻，其責任主要應由制度本身的暴虐性來負。

2001年5月6日於北京家中

心牢中的女人

與楊子立同時被北京市國安局秘密逮捕的徐偉，我從未見過，但是在他們被捕之後，我與徐偉的女朋友王英卻見過幾面。徐偉被抓時，她只有21歲，第一次她與路坤來見我，二個小時她幾乎一句話沒說，只是默默地流淚。我開始還安慰她，但是，任何安慰都阻止不住她的淚水，反而越安慰她就越傷心，哭的越厲害。她當然知道徐偉無罪，固執地認爲審查清楚就會釋放，所以她不想像路坤那樣站出來呼籲，怕因此加重對徐偉的處罰。

隨著時間的推移，徐偉的釋放毫無希望，王英對政府及北京國安局也有了新的認識。後來的幾次見面，還是她和路坤一起，雖然也會流淚，但終於有話說了，偶爾也會有笑容。王英的笑靦腆，一笑會有兩個淺淺的酒窩。通過交談，才知道這個21歲的女孩對愛情的忠貞和倔強。爲了得到徐偉的消息和抱著能夠見上一面的期望，王英曾經多次去大紅門北京市國安局看守所，開始是與路坤一起，後來乾脆就是她一個人去。白天上班沒時間，她就下班後去。她反覆哀求看守和辦案人員，讓她見徐偉一面，或者給徐偉捎個口信或便條，讓徐偉知道她是多麼愛他、關心他，爲他每日憂心如焚、以淚洗面。

王英聲聲呼喚卻始終見不到徐偉一面

當這些合理合法的要求無法實現時，她繞著看守所的高牆邊走邊呼喊徐偉的名字，一聲聲、一遍遍，常常喊著喊著就哽咽的喊不出聲來。即便這樣，她還要喊，她相信深深相愛的人會「心有靈犀一點通」，相信徐偉能聽到她的呼喚，知道她是多麼想他念他爲他寢食難安。常常，王英甚至一個人在看守所外徘徊到凌晨一、二點鐘，希望以耐心和誠意來感動看守人員，讓她與徐偉見上一面，至少讓他們把自己經常來看他的資訊傳遞進去。但是，制度是野蠻的，高牆是絕情的，看守是冷酷的，每一次她都要受到看守人員的斥責甚至強行驅趕，受到諸如「你再來搗亂就把你遣送出北京」的威脅。即便如此，王英仍然不放棄，仍然去呼喚徐偉，每一次她都是懷著幻想而去，帶著失望甚至絕望而回。可以想像，當她一個人拖著疲憊的身子和喊啞了的喉嚨回家時，那種在深更半夜裡獨自行走時的沈重，那種只有路燈下的影子相伴的孤獨無助，使人窒息。

每一次與王英見面，都有路坤相伴。由於徐偉和子立，經過近半年的患難與共，王英和路坤已經成了苦難中的好友，在共同的等待中抗爭中相互扶持。但是，每一次王英都會說羨慕路坤，因爲她畢竟是有名分的妻子，在法律上有探視子立的權利，官方有關子立的情況也理應向路坤通報。而王英，作爲徐偉的女朋友，無論兩個人怎樣不可分割地相愛，也無論她在以淚洗面中度過了怎樣憂心如焚的日子，在中國的法律中，她仍然是個局外人，不可能以直系親屬的身分見到徐偉，國安局也不會向他通報

徐偉案情的進展情況。

去外地回京後的第二天，我又見到了王英和路坤，她們說律師見到了徐偉和子立，他們被以「顛覆罪」起訴已經成爲定局，這是意料之中的事。王英也已經失去了她原來的工作，正在另尋機會。她說起徐偉還會流淚，但是她一改前幾次見面時的軟弱和消極等待的態度，她皺起的眉頭比以往嚴峻了，表情比以往堅毅了，口氣比以往果決了。

她說：「我以前從沒有和警察打過交道，對他們抱有天真的幻想，現在我必須從頭學習面對殘酷的現實。以前我對徐偉作過的事不太瞭解，對徐偉的行爲和國安局的無故抓人都不理解，只知道做個溫柔的女友愛他照顧他，一心想做賢淑的女人。現在，我開始醒悟，徐偉從未犯法，卻強行被抓，被延期關押，不審判、不釋放，現在又要被起訴，且罪名之重，讓人不寒而慄。律師告訴我，獄中的徐偉非常堅強和坦然，堅信自己無罪。我也爲徐偉那坦蕩寬闊的胸襟，以及堅強無畏的精神而感到驕傲。同時，我回想起自己的淚水、軟弱、悲傷，感到萬分羞愧，我尚且是自由的，怎如此不堪一擊？」

王英在這樣說時，眼中仍有淚光閃爍，但那是與徐偉一起堅強的決心，一起向邪惡的制度和法律挑戰的勇氣。她說：「在走投無路之時，唯有抗爭才是唯一的出路，我決定拿起筆，把這一切告訴每一位關注中國人權、中國司法制度的人，告訴每一個關心徐偉、楊子立等人命運的朋友。同時，我也想告訴有關執法機構，防錯於未然，才是上策。這齣天大的鬧劇雖以悲劇悍然開幕，但能以喜劇圓滿結束，也不失法律的神聖性、權威性和執法機關的嚴肅性，亡羊補牢，猶未晚也。倘若有關執法機關明知是錯，

還將沿著這條錯誤的邪路走到底的話，那麼，尊敬的執法人員，你們將何顏面對天下的百姓？何顏面對自己神聖的職責？何顏面對自己的良心？莊嚴的國家法律，還有何公正性、嚴肅性、權威性、神聖性可言？標榜依法治國的政府，還有何信譽取信於民、於國際社會？如果你們執意要把法律當作權力的奴僕，給徐偉、楊子立等強加一個罪名，故意製造冤案，那你們真正是民心失盡，你們終將要爲這嚴重的錯誤付出代價！」

我在監獄的時候，曾經有一位香港記者幾次看望過劉霞，第一次是採訪，以後就是單純的看望。當他知道了王英和路坤的現狀時，在給我的信中寫道：「知道了王英的遭遇，特別是她到看守所外佇立到凌晨，在高牆外呼喊徐偉的名字，我的鼻子真的很酸。我不認識她，更不知道她跟徐偉的關係，但我可以想像到，一對戀人，因爲這樣而被迫生離死別，我真的感到悲哀，也想起了劉霞跟我說的那段經歷：由於政府的阻撓，她跟你結了婚卻一直沒有履行合法的手續，所以監獄方面不讓她見你，即便是見上一面，也不許。你們沒有正式的結婚手續，在官方看來就毫無關係。我聽了，看了她的神情，真的差點掉了眼淚。心想，如果我坐牢了，我女朋友(當時還沒結婚)會不會一樣的見不到我，雖然我們已相愛了七年多。所以，王英原來又重複著另外一個女人走過的苦路，會不會還有李英、陳英將來也重複王英的命運，遭受同樣不公正的對待和經受同樣刻骨的煎熬呢？」

王英的抗爭為使其他女人免於重複她的命運

正是爲了反抗警察國家對人權的肆意踐踏，反抗徐偉和自己

受到的不公正對待，王英才決定公開站出來。也許她這樣做只是出於對徐偉的深愛，但是她所做的一切，正是爲了使其他的女人、妻子、女友免於重複她的命運而進行的抗爭，避免繼續出現李英、陳英重蹈被迫分離和無望等待之苦。正如王英對我的自述：「徐偉被捕時我還不到22歲。半年過去了，我現在已經22周歲整了。前21年，我似乎什麼都不懂。僅僅半年時間，我感到自己一下就長大了！我應該有個22歲的樣子了！」

面對王英由張皇失措、以淚洗面到頑強堅毅、以筆抗爭的過程，儘管她在表示自己的決心時，臉上仍有未脫的稚氣，眼中仍不時有淚光閃爍，但我知道她已經做好了更漫長更艱巨的抗爭的準備。22歲的王英，25歲的路坤，多好的年齡，多沈重的命運，你們以如此年齡承擔著如此命運，不能不讓我這個自以爲經歷過滄桑的中年男人，對你們肅然起敬。

還有一切政治犯的妻子們、女友們，中共獨裁政權把她們的男人關進了有形監獄，同時也爲她們製造了更爲令人窒息的無形的靈魂牢獄。像徐文立的妻子賀興彤，經歷了12年的獄外心牢，現在也許還將經歷高達13年的等待。她們的忠貞和堅韌，無疑是這個人性淪喪的社會中高貴人性的閃光。即便仍在獄中堅守信念和良知的男人們，也應該爲她們的高貴而驕傲，也必須獻上一份虔誠的敬意！

2001年8月31日於北京家中

社會良知的整體失敗和腐爛

——自由知識界與政治改革

推動大陸的社會轉型的主要動力之一是自由知識界——文革中的「臭老九」，他們在毛澤東時代的卑賤地位，使其主體成爲改革的主要受益者之一，他們自然成爲推動改革的執政精英的主要支持者與溫和的批評者——站在執政者的立場上批評現狀。自由知識界與中共之間的關係，經歷了八十年代中、前期的密月，八十年代後期的決裂，六四後的高壓恐懼與利益收買之下的失語。在中共的打壓下，他們由對當局的改革開放的整體性支援，分裂爲四種類型：反叛型、幕僚型、個體型和學院型。

雖然他們都持有自由主義信念，都堅持經濟改革和政治改革的同步進行，但是對體制轉型的動力定位和策略設計，卻有著體制內和體制外之別。相對而言，占主流傾向的體制派，主張以中共內的開明派爲主體而以民間爲配合，推動自上而下的體制轉型。非體制派一直處在邊緣位置，即便在八九運動中，自由知識界的主流傾向也是支援以胡、趙維代表的黨內開明派。

知識界與中共的蜜月期

在毛澤東時代，知識分子無疑是受迫害最深的群體之一，從中共執政之初的「洗腦」運動、「批判《武訓傳》」運動到50年代中後期的「反胡風」運動和「反右」鬥爭，對知識分子的批判和整肅從未停止過，文革則是最高潮。與毛澤東時代相比，改革開放的鄧小平時代的確給了知識分子又一次生命。

當胡耀邦主持的平反運動全面展開，特別是當鄧小平在全國科技大會上提出的「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和「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的口號之時，大多數在毛澤東時代的歷次政治運動中被打入地獄的社會名流（著名的知識分子和民主黨派人士），重新贏得他們在中共執政之初的「諍友」的地位。在思想解放運動中，知識精英成爲中共倚重的「高級幕僚」；在文革後召開的全國文代會上，以丁玲爲代表的右派作家重新登上主席臺，胡耀邦和胡啓立代表中共發表的講話，提出黨不應該干涉作家的創作自由，當年整肅知識分子的前臺人物周揚，基於文革時期也被打倒的親身體驗，向所有在他主持下被整肅的知識分子道歉，這一切曾讓多少屢遭文字獄之苦的知識分子感激涕零。會議的主旋律是對毛澤東時代的控訴和對改革開放的激情支援。

當數學家陳景潤通過徐遲的報告文學成爲全國的新型勞模時，當右派作家的舊作以《重放的鮮花》出版而成爲轟動性的社會事件時，當《天雲山傳奇》和《人到中年》等描寫知識分子命運的小說成爲全社會的暢銷書時……知識分子便由地獄中的臭老九變成了新的顯貴，張賢亮小說中的知識分子主人公的命運變

還是極爲典型的——由政治賤民變成全國人大代表，從鄉村土路踏上人民大會堂的紅地毯；緊隨著輿論造勢而來的，就是中共對知識分子的封官晉爵：當費孝通等人享受到全國人大、政協層次的國家高級領導人的政治榮譽和政治特權之時，當方勵之成爲最有聲望的大學校長時，當孫冶方、于光遠、吳敬璉、厲以寧等人成爲胡、趙內閣的高級幕僚時，當胡績偉、王若水、劉賓雁執掌黨的最重要喉舌《人民日報》時，當欽本立主持的《世界經濟導報》得到趙紫陽的大力支持時，當王蒙、鮑昌、劉心武、劉再復等人執掌了文化部、文聯、作協、文學所以及《人民文學》等中共意識形態機構的領導權時，當包遵信主編的《走向未來叢書》成爲青年一代的思想啓蒙的主要食糧時，當李澤厚成爲哲學界和美學界的新權威時，當胡、趙主持的三所一會吸收了一大批知識界的年輕才子時……大陸自由知識界的整體立場不可能是民間的。在思想解放運動中，他們與鄧小平路線精誠合作，爲使改革開放的治國方略成爲主流意識形態而奔走呼號，成爲中共改革開放政策最熱情的鼓吹者，成爲中共制定大政方針的高級幕僚。

即便70年代末純粹發自民間的「西單民主牆」運動中沒有被判刑的成員，如胡平、陳子明、王軍濤等人，一方面保持著民間的特色和立場，另一方面也成爲改革開放的支持者，他們都與體制內的開明派保持著密切的關係。當時影響遍及全國文學青年的民辦文學刊物《今天》，作爲文學界最受歡迎的「朦朧詩」派，其大部分成員後來也成了官辦《詩刊》的作者及其「青春詩會」的貴賓，北島還榮幸地成爲中國作協詩歌創作組的五位成員之一，是成爲與艾青等德高望重的老詩人平起平坐的唯一年輕詩人。

當1976年「四五天安門運動」的民眾抗議，隨著鄧小平復出

而變成政權的民意資源之後，基於民間立場的自由知識界就只是孤獨的極少數，捲入「西單民主牆」運動和「北大競選」運動的人，大多數都是二十多歲的知識青年和在校大學生，嚴格的講還不能算作自由知識界。他們在受到鎮壓之時，其家人曾奔走於支援改革的自由知識界之間，希望得到正值大名如日中天的知識分子的幫助，但是大都失望而歸。當年官方對《今天》進行強制停刊時，芒克與北島曾經向許多已經平反的著名知識分子發出過求援呼籲，但是得到的無一不是冷漠和規避。於是氣憤的《今天》主要同仁發誓不與官方合作、不參加官方文學團體，而到八十年代中期，只有芒克一人堅持到底，兌現了這一內部承諾。這種現象一直延續到「八九運動」。即便是在八九運動中，自由知識界中的主體也是基於推動中共的開明派所主持的改革才捲入運動的，「首都知識界聯合會」在天安門廣場所發布的「5・17宣言」，明確提出「擁趙倒鄧」的口號就是最好的證明。直到戒嚴乃至開槍，才有一少部分知識分子被迫與執政者決裂。

在這裡，我對於自由知識界的體制內和體制外之間、官方立場和民間立場之間的區分是中性的，沒有道義上的褒貶之意。事實上，大陸社會轉型的代價最小的方式，顯然是在強大民意的支援下，中共主動推進政治改革，形成民間與中共之間的兩性互動，以避免由於人爲的隔離而使雙方做出單方面的錯誤判斷。而在政治改革成爲熱門話題的整個八十年代，中共內確實有一股開明力量推動著政治改革。雖然中間出現過針對知識界的「清汙」和「反自由化」運動，但是由於中共內的開明派胡耀邦、趙紫陽的寬容政策，執政精英與自由知識界與民眾對於改革開放的總體立場有著基本共識。自由知識界對鄧、胡、趙聯盟的支援，在道

義上和利益上都有能夠爲之進行辯護的充分理由。

自由知識界與中共的歧途

有地位和影響力的自由知識界與中共的歧途，與執政黨內開明派和保守派之間的分歧激化和公開化幾乎同步。八十年代中前期執政黨發動的針對知識界的「清汙」和「反自由化」等運動中，黨內開明派的代表人物之一胡耀邦下臺，與此同步的是自由知識界受到整肅，而且主要的被整肅者都是執政黨的中高級成員，他們主要任職於教育和意識形態等部門，比如方勵之、劉賓雁、王若望、吳祖光等人被公開開除出黨，胡績偉、王若水、蘇紹智、李洪林等人受到黨內處分。這些人之所以被整肅，其主要原因是：他們作爲體制內的反對派或自由派，在執政集團內部的主要支持者總書記胡耀邦失去了黨內的權力。

儘管如此，由於黨內的另一位開明派趙紫陽，仍然執掌著總書記的大權，對「反自由化」運動進行了限制和淡化，使之不了了之。當時，整個社會的觀念解放和中共的開明派執掌大權，使黨內保守派的打壓政策，在政治改革的呼聲日益高漲的整體氛圍中，已經沒有毛澤東時代置人於死地的實際效力。中共政權對異己知識分子的公開批判和行政處罰，變成了被整肅者的政治廣告，他們非但沒有像「民主牆」時期的魏京生、徐文立等人那樣被判重刑，從而逐漸被社會遺忘，反而在打壓中變成了明星般的英雄，受到國內外的高度關注。他們個人仍然具有一定的人身自由，甚至在民間還非常活躍，出入於各類知識界的聚會。如在文學領域，對《苦戀》的批判，使白樺名揚國內外，對「三個崛起」

的批判，使謝冕成爲新詩的理論權威；而被官方最高層欽定開除黨籍的頭號自由化分子方勵之、劉賓雁，成爲思想界的明星和青年導師。劉賓雁能夠出國，北京大學的民主沙龍邀請的演講者都是當時知識界的名流，方勵之也前去演講過。1989年初，由王元化主編的《新啓蒙》雜誌在北京「三味書屋」舉行的首發研討會，成爲大陸知識界的一大事件，參加者大都是自由化分子，方勵之也應邀赴會。胡耀邦逝世後，《世界經濟導報》和《新觀察》聯合舉行悼念胡耀邦的座談會，參加者也大多是受到不同程度整肅的知識界名流。更引人矚目的是在此之前的2、3月份，由方勵之率先示範，自由知識界名流發起了一場要求釋放魏京生的簽名活動，先後有三封33人簽名、42人簽名和34人簽名的公開信，參加簽名的包遵信和嚴家其等人，也成爲參加八九運動的著名黑手。而以上所有自由知識界向中共政權的明顯挑戰舉動，都沒有受到當局太嚴厲的鎮壓。當局反而採取比較溫和的方式回應自由知識界的挑戰，連續組織了《司法部有關負責人發表談話》、《對魏京生定罪判刑理由很充分》、《知情者談魏京生》等回應文章在傳媒上公開發表。

所以，在反自由化之後的趙紫陽主政時期，自由知識界非但沒有沈寂，反而比以前的任何時期都更爲活躍。包遵信、嚴家其、蘇紹智、于浩成、戈揚、戴晴等人的大膽言論屢屢見諸於各類報刊，上海的《世界經濟導報》、北京的《新觀察》和民辦《經濟學周報》、廣東的《深圳青年報》、《蛇口通訊報》等媒體，文學刊物《中國》、《收穫》、《人民文學》等，理論刊物《讀書》、《文學評論》、武漢的《青年論壇》等，皆以觀念開放和大膽敢言而名噪一時；一批鋒芒畢露的年輕知識分子以極端的反傳統之名脫穎而出，從文化上和政治上激烈地批判現存體制；電視政論片《河

殤》借助大眾傳媒，把反傳統和要求西化的體制改革的呼聲推向高峰；吳稼祥和蕭功秦等人提出的「新權威主義」，被海外輿論解讀成以趙紫陽爲首的開明派向以鄧小平等元老爲首的保守派的挑戰。參加過「四五運動」、「西單民主牆運動」和「大學競選運動」成員仍然很活躍，陳子明和王軍濤創辦了民辦的「北京經濟科學研究所」，出版了《經濟學周報》，吸收了各個學科的青年知識分子，成爲體制外民間知識界的凝聚點，並且與體制內的三所一會保持著密切的聯繫。

換言之，由於體制內的開明派仍然擁有巨大的決策權，整個自由知識界就可以在上層權力的支援下，獲得一個比較寬鬆的言論環境，他們與中共的開明派之間在推進政治改革上是一致的。而自由知識界與中共的歧途則只是局限在一定的範圍內——即在要求進行政治體制改革的自由知識界與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黨內保守派之間——還沒有達到整體上徹底決裂的程度。除了方勵之等極少數人之外，他們中的大多數人的言行還沒有超出中共所能容忍的極限，即便像劉賓雁這樣的著名異己分子，他的言論在當時還是只停留在「第二種忠誠」的層次上，他仍然聲明自己信仰馬克思主義，並沒有對中共的絕對領導權和社會主義制度提出根本置疑。

這種現象出現的原因，既有中共的改革開放政策所創造的社會大環境，更有中共內握有重權的開明派的支援；既有備受整肅的知識界在逆境中反省後的觀念自覺，又有整個知識界重獲發言權後的對中共的感激；既有心有餘悸的言語策略上的考慮，也有知識界本身在觀念上的固有局限性。現在看來，在中國特定的傳統和制度環境之下，八十年代自由知識界的主流與中共內的開明

派之間的相互支援，所達到的推動社會轉型的實際效果，是符合國情的最佳選擇。正是這種黨內開明派和自由知識界的相互支援的改革，才引發了持續一個多月的八九運動，在中共專制四十年的歷史上，創造了發自民間的非暴力反抗的最悲壯也最慘烈的輝煌。

而八九運動的失敗的很原因之一，就是在這一運動的全過程中，種種複雜的人爲阻力使民間自由派和黨內開明派之間缺乏必要的溝通和合作。直到「4・26社論」導致運動升級爲群體大絕食之時，黨內開明派才爲了控制衝突升級而出面與民間進行極有限的溝通。但是，由於長期以來雙方之間的人爲隔膜，更由於官方對民間力量的忽視、不尊重甚至進行迫害與鎮壓，使雙方缺乏起碼的相互信任。何況大絕食開始之後，官方主動與民間的溝通以及對話，既是極端實用主義的又是不平等的，不是雙方平等協商基礎上的妥協式合作，而更多是官方居高臨下的要求，即便有一定的妥協也帶有恩賜的性質，所以，不可能有良性的互動。在此意義上，八十年代的蜜月期無法在八九運動中發展成良性互動就是必然的。

自由知識界與中共的決裂

自由知識界整體上與中共的決裂發生於八九運動，八十年代在思想界非常活躍的知識分子幾乎全部深深地捲入八九運動。在中共內部，以鄧小平等元老爲首的保守派戰勝了開明派；在社會上，中共陷於丟失政權的恐懼之中，徹底撕下了「爲人民」的假面，動用全副武裝的軍隊鎮壓手無寸鐵的進行和平請願的民眾。首都北京的血腥屠殺過後，隨著趙紫陽在體制內的徹底出局，體

制內的開明派和體之外的自由知識界，下臺的下臺、逃亡的逃亡，進監獄的進監獄……他們被徹底邊緣化了。這些人坎坷的政治命運，是在黨內複雜而激烈的權力鬥爭的背景下的被迫出局，充滿了「逼上梁山」的無奈和無力「補天」的淒涼。

六四悲劇，就中共而言，既反映了其保守派的頑固性和獨裁制度的野蠻性，也反映了其開明派的弱勢和不成熟；就民眾而言，既表現了強烈的正義感、參與熱情和道義勇氣，也暴露了大多數人的搭便車心理和民間自組織能力的低下。而就民間社會向專制政權的挑戰而言，在八九運動中表現最糟的群體無疑是自由知識界。

作爲改革開放時期黨內開明派的意識形態的主要支持者，作爲民間社會的主要代言人和啓蒙者，大陸的自由知識界既沒有明確而深入的自由理念和應對突發事件的策略調整，也沒有駕馭自發群體運動的組織能力和技術操作的經驗；既沒有平等的公民意識和參與精神，更沒有在大恐怖面前無所畏懼的道義立場和良知勇氣。在運動開始時，他們大多持觀望態度；在運動迅速擴大達到最高潮時，他們中有人全身心投入，想操控作爲運動主體大學生，有人想充當政府與學生之間的周旋者，有人成立了類似學生自治組織的知識界聯合會，並且在「5・17宣言」中把矛頭直指鄧小平，使運動的目標過早地轉向了「擁趙倒鄧」，在策略上鑄成大錯。在戒嚴的恐怖之中，他們中的大多數便開始臨陣脫逃，而在最嚴峻的大屠殺時刻，只有極少數人與學生和市民站在一起，面對劊子手的坦克和槍口。大屠殺開始之後，當無數市民走上街頭搶救死傷者、抗議中共的法西斯暴行之時，自由知識界早已逃向了安全之處。大屠殺之後的整肅期間，留在國內的大多數

自由知識界向政治強權的高壓屈服，而逃往國外的人把苦難作爲資本，任意地揮霍死難者的鮮血。

在整個運動中，自由知識界和大學生之間始終有一條不便挑明的界線，這條界線既是政府有意製造的(如長鬍子的幕後黑手)，也是知識界和學生雙方默守的。但是在「5・13絕食」之後，學生領袖王丹和吾爾開希已經明確向知識界發出邀請，希望他們公開出面領導運動，於是誕生了「首都各界維憲聯席會」。從1989年5月18日的籌備到23日正式成立再到5月底的會議，參加聯席會的人員由開始的一百多人減少到二十幾人，不再參加會議的主要成員是知識分子。由此可見，在界線的背後，既有爲了避免授中共政權以進行鎮壓的口實的原因，也有知識界固有的傲慢而又懦弱的心態。他們不是把自己作爲平等的一分子，通過參與到學生之中來支援或勸說學生，而是把自己當成學生們的精神導師，以俯視的姿態進行幕後指導和理論說教，擅自宣稱自己可以代表學生與政府談判。而從學生的角度講，他們認爲自己是八九運動的主體和正宗，很難接受知識界那種只動口而不動手的俯視姿態。作爲例外的是陳子明和王軍濤，中共政權視他倆爲「職業反革命」，因爲從「四五運動」到「西單民主牆」、「大學競選」，從創辦「北京經濟科學研究所」到全面參加八九運動，他倆幾乎捲入了七、八十年代所有的民間政治反對運動。他倆在保持與黨內開明派的智囊人士的經常性溝通的同時，一直堅持獨立的民間立場，並且從頭到尾深深地參與八九運動，他們兩人的命運與這一悲劇運動緊緊連在一起。六四大屠殺之後，不僅陳、王二人被作爲頭號黑手判刑十三年，而且研究所被查封，上千萬資產被強行沒收。遺憾的是，由於沒有應對如此大規模民間運動的經驗，他們從頭至尾的

介入，並沒有在關鍵的時刻減緩運動的逐步升級傾向。

八九運動的悲劇結局，證明了大陸自由知識界的整體失敗，他們與黨內改革派的聯盟破碎了，他們與學生之間的精神紐帶斷裂了，他們與民眾之間本來就極爲脆弱的關係更是蕩然無存。從猶豫觀望到熱情參與至大面積逃亡或背叛的三部曲，充分顯示了這一群體在政治上的不成熟和道義上的無底氣。政治上的不成熟還可以得到理由充足的辯護，而道義上的無底氣就只能證明這一群體在整體上的懦弱。以至於到現在，當年參加運動的風雲人物中，連一個能被國內民眾和國際輿論公認的道義象徵都沒有。現在，六四悲劇在國際上最有影響的道義象徵，不是任何八九運動的風雲人物，而是以丁子霖爲代表的難屬群體及其「天安門母親運動」。

六四的鮮血不僅葬送了中共的合法性，而且從道義上葬送了自由知識界作爲啓蒙者和代言人的角色。這是中國延續了幾千年的知識分子群體整體失敗的當代翻版。這種懦弱的極端化就是冷血，面對中共對弱勢群體法輪功的野蠻鎮壓，大陸自由主義知識界的整體沉默，就是懦弱到冷血的最新例證。

知識界的集體失語

直到目前，大陸中國的社會轉型的進程和方向，仍然操控在經濟上適度開放而在政治上絕對保守的執政精英手中。六四之後，大陸的知識界處在整體的失語症中。只有極少數被中共定爲異己分子的八九運動參與者，繼續扮演著制度反叛者的角色。他們無工作無自由無公開言論權，處於越來越自說自話的孤立之中。而大多數知識分子仍然留在了體制內，或充當中共的幕僚、

或在高校和科研院所做學院派，或變成脫離體制的寫作個體戶，還有人脫離體制下海經商。但是其主體仍然依附於體制，即便「心在漢」者也不得不爲生計而「身在曹營」，受到既得利益和政治恐怖的雙重束縛。

大陸的高等院校和學術院所的意識形態、體制語言、機制運作、資源分配，對於知識分子來說仍然給予的、既定的。雖然中共意識形態已經沒有了實際的說服力，但是它仍然可以借助工資、住房、職稱、合法的社會地位、其他福利等既得利益左右知識界的言行，知識界的主體仍然是附於皮上的毛，只是這種依附較之毛澤東時代有了一定的彈性空間，不至於「皮之不存，毛將焉負」。甚至連香港的著名報人金大俠也是一臉媚態、滿身酥骨地貼向中共政權。曾經發出「天下沒有白坐的黑牢」的臺灣著名的思想鬥士李敖，在六四大屠殺過後，他非但對中共的暴行沒有義憤，對無數坐了暴政「黑牢」和死難者沒有起碼的同情，反而爲「大屠殺有理」的論調進行辯護。最近，他又在大陸的《中國青年報》發表文章，支援江核心對法輪功的鎮壓。他在自由的臺灣四處出擊，逮誰罵誰，而一說起大陸就極爲乖巧，與中共獨裁保持高度的一致。這也是一些定居海外的大陸知識分子的姿態——在自由世界裡批判專制體制下艱難抗爭著的自由知識分子。

如果說，毛澤東時期的中共是一個連沉默也犯罪的只准擁護的政權的話，那麼鄧小平及江澤民時期的中共就進步爲一個只准擁護和沉默的政權。於是，面對大陸的嚴酷現實，總結六四悲劇的教訓，由海內外知識界共同發動了反「激進主義」的思想運動，通過對古今中外一系列政治大變革的反思，他們總結出的居然是「歷史缺席權」、「言論沉默權」、「消極自由」和「道義中立權」

的寶貴價值，而仍然執著於持不同政見者立場、反抗一黨獨裁的知識分子，在某種程度上越來越被作爲政治怪物或「反政府的危險分子」，成爲避之唯恐不及的瘟疫，在大陸，他們已經沒有資格享受知識分子的稱謂了。

這一趨勢又被流亡的法籍華裔中文作家高行健榮獲2000年度諾貝爾文學獎事件所升值。對高行健的獲獎，儘管中共政權愚蠢地自討丟臉和難堪，儘管大陸知識界對高的作品真正感興趣的人不多，但是他的文學觀卻很合現在的大陸主體知識分子的口味，諾貝爾獎這一巨大的世界榮譽和廣告效應，使他的基於個人主義價值觀的「冷的文學」爲許多知識分子所樂道。高行健認爲，在一個沒有言論自由的專制社會中，一個良知未泯作家(也可以廣義地理解爲知識分子)只有兩種選擇：一是沉默，二是逃亡。這種辯解，對於已經擁有法蘭西國籍、生活在自由世界的高行健來說，或許有他純個人的充足理由，但是對於曾經在大陸生活過的那位高行健來說，就是用爲逃亡的辯護來嘲諷堅持反抗的姿態；而對於仍然生活在大陸的知識分子來說，認同高行健以文學理由爲逃亡進行的辯護，就是一種狡猾而市儈的生存策略。難道除了沉默和逃亡之外，知識分子的良知就再沒有其他的選擇的可能？選擇繼續以寫作來反抗專制體制，就是置文學於政治化的泥潭之中？就是知識分子的救世主情結和英雄情結所致？

何況，在高行健對自己的大陸文學生涯的回顧中，在他對中共迫害知識分子及文學的譴責中，還有曖昧地炫耀苦難和自我美化的成分，依稀使人聯想到八十年代的右派作家群體的創作主流。在殘酷的專制之下，每個人都有選擇逃亡的權利，逃亡並不是道義之恥，對逃亡進行道義審判是不公正的。除非逃亡者的道

義自省之外，沒有人有權利把逃亡者置於道義法庭的被告席上，即便坐著專制黑牢的受難者也沒有這種權利。但是，這並不等於可以炫耀逃亡，可以把逃亡知識分子的個人主義上升爲真正文學的理由，可以借助世界性大獎的光環，對在專制制度下堅持反抗的人，採取一種居高臨下的俯視立場，非但沒有起碼的同情和敬意，就連一種平等的姿態都成爲奢侈。如果逃亡者意欲超越政治的文學理由就是這樣的個人主義，那麼我只能稱這種超越是「僞超越」，稱這種個人主義爲「冷血的個人主義。」

六四之後，政治改革被全面封殺，單項經濟改革和全民經商熱潮，使經濟學成爲九十年代的顯學，經濟領域發生的一切成爲知識界必須面對的事件，即便非經濟學界的知識分子也常常涉足於經濟學。占主流地位的經濟學，是爲政府決策提供奏摺和進行辯護的幕僚派，主流經濟學和非主流經濟學關於經濟學應不應該講道義關懷的爭論，關於權貴私有化和社會公正何者優先的論戰，凸現的恰恰是主流經濟學界的無奈和僞善，即便是其中具有自由主義取向的經濟學家(如厲以寧、樊綱)，也不得不遷就眼前的現實，在呼籲加快推進市場化和私有化的同時，也不能不強詞奪理地論證權貴腐敗和權力資本的現實合理性。透過這種爭論，我們看到的與其說是學理上或改革策略上的歧途，不如說是特定現實中幕僚派和學院派之間的社會角色的分野以及道義上的棄守之別，而更重要的是既得利益的驅動。這些爲腐敗和權貴私有化進行辯護的主流經濟學家，有著亦學亦官的雙重身份，他們在利用權力瓜分全民資產的權貴私有化過程中，跟在主子的後面也分得了一定的份額(如厲以寧的妻子和兒子都在經商，而且已經聚斂了相當可觀的財富)。在幕僚派經濟學家中，吳敬璉是難得

的既堅持自由主義取向和道義底線而又被中共所容忍的人。

被官方認可的變形的自由主義經濟學，雖然主張推進市場化和私有化，但是他們強調市場化的代價最小的方式是容忍甚至縱容腐敗的權貴家族私有化，故而在道義上失去了民眾和其他知識分子的認同，遭到了來自以社會公正爲旗幟的兩方面的抨擊。一方面是新老左派從毛澤東遺產出發的民粹主義和國家主義，另一方面是具有社會民主主義取向的自由派。前者用「鞍鋼憲法」式的經濟民主來改造和維護公有制和平均主義的分配方式，以民族主義和國家利益來抗拒西方資本主義的霸權；後者以「權利平等」、「公平競爭」來宣揚和捍衛基本的自由主義式的「社會公正」，以充分全球化來促進傳統體制的轉型。吊詭的是：捍衛毛澤東遺產的左派和借助西方新制度經濟學的右派(即主張容忍權貴私有化的主流經濟學)，都拒絕蘇東式的自由優先和權利平等優先的公共選擇式的改革，即政治民主化和經濟的市場化、私有化同時進行的整體性社會轉型，而只有堅持社會民主主義傾向的自由派，才全力爲蘇東的改革方式進行辯護。

在新世紀之初，中國知識界一批經濟學家和新左派，與老左派的輿論喉舌《真理的追求》遙相呼應，把保衛公有制和反對美國霸權稱之爲「世紀之戰」。他們認爲：由於前蘇聯的解體以及俄羅斯經濟的不景氣，加之其政治體制的民主化(西化)，使現在的俄羅斯越來越成爲西方文明的一部分，喪失了冷戰時期遏制美國霸權的能力。在未來的新世紀裡，無論從文化的差異還是從現行社會體制的差異上看，無論從現在的發展速度還是從未來發展的潛力上講，唯一能夠遏制、進而終結美國霸權的是正在崛起的中國。在此宏偉的國家主義目標的指引下，他們繼承毛澤東的制

度和理論的遺產，抵制權貴私有化和資本主義經濟方式的和平演變，把政治上的強國戰略和經濟上的民主管理以及分配上的平均主義列爲國內改革的優先目標。而要達到上述目標，在私有化已經成爲法律之外的普遍事實的前提下，必須把保衛國有資產提升到「世紀決戰」的高度，終止繼續瓦解國有經濟的私有化進程。他們宣稱：「中國一千多年來一直是世界第一超級大國，被人打敗只不過150年以來的事，最多追溯到300年。即使如此，目前在綜合國力方面，仍舊是除美國以外的，第二流的超級大國。建國50年來的騰飛，民族文化的復興，已經指日可待，憑什麼要在騰飛和瓦解的關鍵時刻，選擇自我瓦解？」另一本集體寫作的《變亂中的文明——霸權終結和秩序重建》在知識界頗爲流行，此書的結語叫做「大國的歷史使命」，像發宣言一樣的吶喊道：在新世紀裡，「中國人睜開眼，全世界都會醒來。」中國人要「像我們的祖先那樣，必要時我們也敢於訴諸武力付出碧血」，用血肉建築反霸權的「第二座長城」！

這已經不是經濟理論或治國戰略了，而是類似當年義和團的狹隘的民族主義和盲目的夜郎自大了，而且充滿了血腥的氣息。可以說，這種民族主義狂熱是六四後大陸知識界的主流立場。人文學界的知識分子也不例外。他們先後經歷了以抗拒西方文化霸權的學術本土化呼籲、後現代主義熱、人文精神失落的討論和東方主義熱等事件，儘管他們之間有許多不同之處，但是在拒絕全球化、抵抗西方霸權和呼喚民族強盛這一點上則具有高度的認同。

百年恥辱的壓抑，凝固成自卑和趕超的雙重情結，在又一次強國機遇中膨脹爲不顧人的基本權利的國家主義和稱霸世界的民族主義野心，而這正是自「鴉片戰爭」以來中國知識界階層的

「精神鴉片」。正是在這種「精神鴉片」的麻醉下，他們才會在40年代讚美「打土豪，分田地」的「痞子運動」，在50年代歡呼「三面架機槍，只准走一方」的野蠻掠奪，才會論證「人民公社」式的強制土地國有化的優越性，才會把「大躍進」視爲趕超戰略的前所未有的偉大實踐，才會擁護以犧牲人的權利、生活和生命爲代價發展重工業和核武器的強國之策，才會在文革中參與全民總動員的對人的基本權利、尊嚴和生命的肆無忌憚的踐踏，才會在六四之後高舉國家主義和拒絕西方霸權的民族主義旗幟。似乎真應了百年一個輪回的迴圈，「中體西用」、「師夷制夷」的古訓，在「人權高於主權」的新世紀降臨之時，再一次成爲大陸知識界的主流意識。

我認爲，在大陸中國特定的制度背景下，如果說毛澤東時代靠強權和意識形態動員完成的國有化和初步工業化，是不顧人的權利、尊嚴和死活的「屠夫經濟」的話，那麼在當今時代，任何罔顧人的基本權利和尊嚴的理論，任何爲國有化和強權下的平均分配進行的辯護就是「屠夫經濟學」，它甚至要比那種爲「權貴私有化」和普遍腐敗進行辯護的「御用經濟學」更違反起碼的人性，其冷血和殘忍，無疑於經濟法西斯。

總之，八十年代的知識界在整體上並沒有明顯的分化，其主流思潮是推動走向自由民主的經濟改革和政治改革。大屠殺之後的九十年代知識界則四分五裂、各說各話，但是龐雜的各種聲音中的最強音，是強調中央集權式改革和提倡民族主義兩種思潮的相互結盟，特別是在中國駐南斯拉夫使館被北約誤炸和臺灣民進黨上臺執政之後，由官方所鼓勵的、由知識界所煽動的盲目、激進、情緒化的民族主義，甚至直接訴諸於「亡國滅種」的「生存第一原則」的藉口，獨佔意識形態的制高點和話語霸權，變成壓

倒其他不同聲音和價值取向的最強音。這種聲音似乎在知識界變成了對每個人的良心發出的無形的「絕對命令」：救亡就必須強國，強國就必須優先發展經濟，優先發展經濟就必須保持社會穩定，保持社會穩定就必須一方面拒絕西方的和平演變，一方面維持和加強現行政治體制。像歷史上一切極端民族主義一樣，只要有一個藉口，在國家利益和民族利益的要挾下，政治強權下的暴力鎮壓的升級和不顧國力而盲目提升軍事競爭力的決策，就成爲執政者的必然選擇。而經過六四鮮血洗禮的大陸知識界，居然再一次充當了專制政權的幫兇或幫閒。

我認爲，民族主義是極爲危險的群體心理，當它以多數或國家利益的面貌出現時，對任何人都是一種無理的卻是強有力的要挾甚至敲詐。無論多麼傑出的智慧，只要第一次吸食民族主義的精神毒品，就要越陷越深地馴順於這種要挾和敲詐，自願出賣人的起碼良知，先在視野上變成井底之蛙，最後甚至變成狂熱的好戰分子。

自由知識界的孤獨抗爭

儘管血腥屠殺閹割了中國人的主動而積極地爭取自由的政治激情，儘管普遍的腐敗、對金錢的貪欲和對社會正義的麻木，使唯利是圖成爲九十年代的最醒目時尚，儘管近於非理性的國家主義和民粹主義成爲知識界的主流，但是仍然有極少數自由知識精英以各自的方式堅守著自由主義立場，尋找一切可能的機會發言，喚醒社會的良知，以推進大陸的政治改革。

這批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分爲三個年齡層次，形成了相互銜接

老、中、青三代。老年自由知識分子主要來自體制內，他們大都是中共黨員，曾經在體制內擁有一定的權力，在社會上享有一定的聲譽，六四後基本被中共以各種藉口排除在權力體系之外，現在處於退休或半退休狀態。儘管他們還都享受著體制內工資和其他福利待遇，但是他們在信念上已經和中共意識形態及其體制決裂。他們的經歷可以用李慎之老人的自述來概括：年輕時一定要信仰馬克思主義並加入中國共產黨，中年時一定要變成「右派」，晚年一定要走向自由主義之路。現在，雖然他們在觀念上有著基本的共識，但是在與中共之間的關係又有所不同，有些人表現出公開決裂的態度，如鮑彤、李慎之、丁子霖、蔣培坤、包遵信、王若水、徐良英等人，有些人的態度比較溫和，如李銳、胡績偉、朱厚澤、杜潤生、于光遠、吳江、王元化、秦川、茅于軾、曹思源、邵燕祥、戴煌、王貴秀等人，但是他們都秉持自由主義信念，認爲大陸的政治體制已經到了非改不可的程度。這批人既有革命資歷又有深厚學識，既有良知又不乏智慧，既有體制內的銘心刻骨的親歷又大都經過五四運動的啓蒙，他們六四後走上反對現存體制的前臺，在知識界和工商界都具有極大的感召力。特別是丁子霖、李慎之、鮑彤，其態度之鮮明、人格之高貴、底氣之充沛，實可爲新世紀大陸知識界的良心。他們的言論通過國際媒體和互聯網，在國內外都具有廣泛的影響，就連執政者也不敢小視他們的道義力量和輿論動員能力。最近胡繼偉也突破了一向低調的立場，借「天安門文件」一書出版之機，在海外刊物上公開針對江核心執政集團發言，要求爲六四血案和胡耀邦、趙紫陽平反，要求進行政治改革。這種充滿道義勇氣的聲音，是繼李慎之老人的《風雨滄黃五十年》之後，老年自由知識分子向中共政權發出的

又一次勇敢的挑戰。

中年一代自由知識分子大都有文革、知青和文革後進入大學的經歷，他們幸運地趕上了改革開放的時代，激情四溢地投入八十年代的思想啓蒙運動和八九運動，有些人在八十年代的知識界就有一定的影響力。他們的自由主義信念形成於八十年代中前期，堅定於成熟於六四大屠殺之後。最令人扼腕惋惜的是：八十年代在思想文化界脫穎而出的大部分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六四後都流亡國外，其中的一些人由自由主義變成了新左派和民族主義者；而留在國內的極少數人則失去了公開發言權。現在大陸有一定影響且有公開發言權的中年自由知識分子大都成名於九十年代，主要來自體制內的大學和科研機構，有些人還具有高級幕僚的身份，只有一小部分是來自體制外的自由撰稿人，王小波(已故)、王力雄、廖亦武、劉軍寧、何清蓮、秦暉、朱學勤、徐友漁、錢理群、許紀霖、陶東風、林志賢、黨國英、謝泳、雷頤、吳思、丁東、汪丁丁、趙誠、樊百華等人，他們所從事的專業研究幾乎涉及到大多數人文學領域，但是無論進入哪一個領域，他們寫作的自由主義立場是非常清晰的。他們把西方成熟的自由主義價值觀及其制度安排，應用於解決大陸中國的現實問題。

在民族主義問題上，面對由中共當局所鼓勵的、由左派知識分子論證的、由盲目的青年一代追隨的愛國主義狂熱，他們保持著一種開放的胸懷和一份清醒的冷靜，主張用全方位的全球化來重新確立中華文明，那是一種以尊重每一個人的基本權利和尊嚴爲價值核心的文明，是和平的而非好戰的、平等的而非自卑自傲的、多元的而非單一的文明。在社會穩定和政治改革問題上，他們主張在漸進的憲政民主化、市場化和私有化的過程中建立公平

的秩序，而堅決反對依靠強權暴力、意識形態灌輸和利益收買來維持不公正的暫時穩定。在社會公正和反腐敗等問題上，他們主張以國民基本權利的平等代替強權下的分配結果的平等，以准入權利平等的自由競爭代替政治權力的市場化，以保障每一個人的私有財產權代替權貴私有化，以對社會弱勢群體的適當補償來代替「劫富濟貧」的革命，以法治建設、民選政府、權力制衡、言論自由來從制度上遏制腐敗。

他們在學理研究、歷史清理、現實應對和常識普及等方面，都有著超過八十年代的貢獻。與八十年代相比，在缺少激情和勇氣的同時，也少了些浮躁和淺薄，多了些冷靜、深入和策略。

青年一代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大都畢業於九十年代的「六四」大屠殺之後，受到過八十年代啓蒙思潮的影響和六四血案的震撼，感受了經濟大潮之中盛行於青年一代的物質主義和功利主義。他們崛起於1998年所謂的「思想小陽春」時期，其突出的代表人物是任不寐、楊子立、余杰、葛紅兵、摩羅、駱爽、笑蜀、黃綺、李勇剛、賀雄飛、余世存、孔慶東等人。他們對八十年代的思想啓蒙時期有著不同於中年知識分子的美好記憶，而對九十年代的文化思想界的懦弱和無恥則充滿了年輕的激憤甚至輕蔑。他們中間，除了葛紅兵的文字比較學術化之外，其他的人則以魯迅爲榜樣，採用激烈、尖銳、短小的思想隨筆的形式，批判現實和弘揚自由主義價值觀，爲社會弱勢群體的悲慘遭遇進行輿論救助，他們對中國知識分子的批判尤爲激烈，認爲1949年後是知識分子整體失敗的半個世紀。他們的出現爲沈悶而平庸大陸思想文化界，帶來了騷動而清新的批判氣息，是對大眾文化的輕浮和禦用思想的無恥一種矯正和平衡。

更可貴的是，他們在自己的基本人權受到專制政權的侵犯時，能夠聯合起來相互支援，以一個聲音公開向執政者挑戰。余杰被不公正地剝奪了工作權之後，首先是他自己公開向御用的中國作家協會挑戰，接著得到了摩羅、葛紅兵等人聯名支援。他們還在中共禁止高行健作品在大陸公開出版的事件中，聯名向御用的中國作協發出挑戰。雖然相對於中年知識界而言，他們在理論上並沒有太獨特的建樹，但是他們的這種反抗方式，比起中年自由知識群體各自爲戰的寫作，卻具有更獨立的行動力量，他們不僅在觀念上是自由主義者，而且在行爲方式上也在力爭策略地做一個自由主義者。其中黃綺、李勇剛和楊子立還通過辦網站來傳播和踐行自由主義觀念。在互聯網時代，黃、李、楊三人所起的作用要遠遠大於各自爲戰的寫作。

1998年再次趨於活躍的自由知識界，隨著中共對民主黨和法輪功的鎮壓，也受到了又一次的思想整肅。中共非常清楚誰對現政權有利，所以整肅的物件全部是持自由主義立場的知識分子，其整肅手法仍然是傳統的一套：監獄、黑名單、竊聽、跟蹤、開除公職、點名或不點名的意識形態大批判……等等。鮑彤從出獄之後一直處在嚴密的監視之中，李慎之、茅于軾。曹思源等老一輩被警告，劉軍寧被剝奪了社科院的職務，秦暉、何清蓮、錢理群等人也在不同程度上，受到所在單位的整肅，余杰這個剛剛畢業的碩士也被剝奪了合法的工作權利。李勇剛的網站「思想的境界」被迫停止，黃綺的網站「天網尋人」和楊子立的「羊子的思想家園」不僅被迫關閉，而且黃綺本人和楊子立本人也因此身陷牢獄之災。

中共的權力恐懼使它擺脫不了依靠強權進行打壓的統治傳統，但是它在不可阻擋的歷史潮流面前又倍感心虛，不得不顧忌

政權合法性的損失和國際輿論的壓力，加之其統治權威的層層遞減，遂使這種打壓在威懾力上和實際效果上大打折扣，例如中共中央宣傳部三令五申的禁令，並沒有完全封住自由知識界的口和筆，他們仍然能夠在大陸有影響的報刊上公開發表言論，有的人還可以在知名大報上開專欄，而這恰恰證明了自由主義群體的力量。經過二十年的觀念啓蒙和八九運動的實踐洗禮，自由主義的經濟常識和政治理念在中、青年的文化界和民營企業家中正在逐漸普及，民主觀念在城市裡的關心時事的居民中也廣爲人知。這些相信自由主義價值的社會群體，儘管在行爲方式上不得不委曲求全，但是在觀念上和內心裡已經越來越難以認同一黨獨裁體制，他們以各種消極的方式來應對中共政權的統治，心口不一已經成爲大陸人普遍的生存策略。雖然這種犬儒化的雙重人格無法爲新制度的建立提供健康的倫理依託，但是就目前而論，這種普遍的人格證明了中共統治的合法性在民眾靈魂中的瓦解。正如捷克現總統哈維爾曾經指出過的那樣，強權高壓之下沉默的大多數，恰恰是捷克的「天鵝絨革命」獲得成功的基礎。

在此意義上，自由知識界的頑強抗爭不會是無果之花，正如法輪功的非暴力抗爭所顯示的那樣，強權高壓和利益收買之下沉默的大多數決不會永遠沉默。歷史發展的大勢和世界文明的主流已經不可阻擋，只要自由主義的聲音在大陸不完全滅絕，只要經濟自由化繼續成長，民主常識就會越來越普及，政治改革的要求也會越來越高漲，捷克民眾能夠如此，大陸民眾爲什麼就不能?! 臺灣的中國人能夠創建政治奇蹟，大陸的中國人爲什麼就不能?!

2001年1月於北京家中

只配跪著接受皇恩的民族

1949年10月1日，毛澤東第一次登上天安門之後，「他是人民的大救星」的歌聲唱遍大陸，且歷久而不衰，直到今天，還是人們發泄不滿時的懷舊工具；1984年10月1日，鄧小平走下天安門檢閱三軍、接受「小平您好」的真心擁戴之後，「總設計師」一揮手，就恩賜給小民以奔小康的機遇，「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在經濟上獲得有限的解放； 1999年10月1日，江澤民在檢閱了三軍之後，儘管遭到來自各方面的抨擊，但他仍然穩坐「繼往開來的領路人」的核心位置，進行了又一次皇恩浩蕩的理論創新，讓那些發了大財的資本家加入中共，在政治上獲得欽定的解放，不再只是人大、政協中的統戰物件和政治花瓶，而成爲中共的一員。

中國人民站起來？站起來的只有毛澤東一人

每年的10月，中共執政的慶典時期，被輿論界反覆渲染的一句著名口號，就是毛澤東向世界宣告：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而在事實上，在毛澤東時代，眞正站起來的只有毛澤東一個人，其他的人、包括與他一起打天下的中共元老全部匍匐在他的腳

下，高呼「萬歲！萬萬歲！」在鄧小平及江澤民時代，沒有毛澤東式的絕對獨裁者，但是眞正站起來的也只是極少數中共高層具有決策權的寡頭集團和權貴家族。

中共的三代核心，其民意支援一代不如一代，毛澤東贏得的是子民們被紅太陽照耀得眼花繚亂，被感動得五臟沸騰，只有狂熱的歡呼。鄧小平贏得的是子民們被小康承諾購買來的擁戴，即便他一手製造了舉世震驚的大屠殺，被極端實用主義教養出的唯利是圖之眾，在強權鎮壓和利益收買之下，也保持了犬儒式的聰明和沉默。而最受非議的第三代核心江澤民，除了鎮壓法輪功的轟轟烈烈之外，政績平庸之極，但是他只要稍稍觸動一下中共舊體制，就立刻變成善於駕馭複雜多變的局勢的英明核心。不僅大陸的經濟發展贏得了國際社會的普遍讚譽，而且江澤民的「三個代表」和允許資本家入黨，作爲偉大的理論創新，把經濟精英和知識精英欽定爲「先進生產力」的人格代表，雖然遭到保守毛派的激烈抨擊，卻贏得國際主流社會及海內外期望政改的精英們的支援。如同毛澤東在執政之初對社會名流們許以高官厚祿，大有唐太宗李世民「天下英雄盡入吾彀」的得意。就連美國前總統克林頓都不惜把溢美之詞用於江澤民，前前總統卡特也對大陸農村的基層選舉做了「非常好」的評價，並說：「我能來觀摩這次村民選舉感到非常的榮幸。」

中國人像需要照顧的嬰兒，只會等待明主出現

我不否認中共執政集團內，會有想善待人民和具有一定現代政治意識的高官，比如胡耀邦和趙紫陽，在當政之時也確實做過

不少善政，並爲推進政改而甘冒風險。但是，即便如此，百姓的權益也只能等待自上而下的恩賜，何況，這樣的好官在中共體制下難以長存。退一萬步講，如果國人能經常遇到明主，或皇帝的開恩不是偶然行爲，而是隔三差五地浩蕩一次，等待恩典的民族惰性，儘管有辱做人的尊嚴，因爲得到了實惠也還情有可原。可悲的是，國人歷經諸多苦難和漫長等待，才會偶然遇到一個賢明的君主或一次極爲吝嗇的開恩，得到的總是遲到的微薄補償和可憐安慰，爲什麼仍然只會仰視皇冠？何況，在中國，王朝迴圈的歷史上的每一次皇恩浩蕩，要麼發生在百廢待興的開國之初，要麼發生在危機四伏的末年，在根本上不是爲了民眾的福祉，而是出於鞏固政權、維持政權或挽救政權的政治需要。而國人仍然像完全需要成年人照顧的嬰兒，只會等待明主的出現。難道國人真的就永遠長不大、永遠人格殘疾和弱智，宿命般地只配跪著祈求和接受皇恩?!

毫無疑問，鄧小平和江澤民治下的大陸，比之於毛澤東時代，國人得到了溫飽的實惠和極有限的個人選擇空間，「三個有利」的鄧理論和「三個代表」的江學說，比教條而剛性「階級鬥爭」的毛思想，也具有了靈活而柔軟的彈性，特別是「三個代表」的提出，對於中共的自我改造和啓動漸進政改，具有一定的正面意義(也必須指出其負面作用也很大，對於弱勢群體的悲慘處境和遍地腐敗的愈演愈烈來說，無疑於火上澆油)。但是，這一切變化，都沒有在根基上改變國人的基本生存狀態；這塊土地上的統治者和被統治者之間的關係，仍然是千古一系，單傳至今。那就是：人的權利、國家的命運、社會的任何進步和老百姓生活的任何改善，主動權和決定權皆牢牢握在獨裁者的手中，皆是自上

而下的恩賜，需要子民們三呼萬歲，以示百姓的忠誠和感恩；需要社會名流扮演同舟共濟的諍友，需要御用文人妙筆生花的辯護和讚美，以示君主的英明和戴德。

而民眾自下而上的爭取做人尊嚴和自身權益的運動，不是被陰險的獨裁者作爲奪權和建立新王朝的工具而利用，就是被野蠻的專制機器徹底剿滅，一場場揭竿而起的大規模民間反抗運動，無論是傳統的暴力反抗的改朝換代，還是現代的和平抗爭的政治反對運動，都無法撼動專制制度和奴性文化的根基。在愚昧而盲目的群氓心中，被利用等於被解放，等於重獲新生；在懦弱而聰明的犬儒身上，被鎮壓就是被征服，就等於從此做幫兇、做幫閒，起碼做沉默的順民。國人何時嘗到過當家作主的真正解放的滋味，中國何曾走出過專制王朝的治亂迴圈的歷史怪圈。直到今天，中共執政的日子，仍然以「解放以後」和「新中國成立以後」的表達方式，以「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的說辭，成爲一代代人最基本的歷史常識和語言習慣，深深地沈澱在民族的集體記憶中，普遍地應用於人們的口語和書面語中。就是那些對中共歷史了如指掌的知識分子和黨內開明派，在揭露中共執政後的累累罪惡時，也要習慣性地用上述辭彙來爲歷史劃界。

同樣，現在的百姓談起八九運動和六四大屠殺，絕大多數人隨口說出的詞仍然是「動亂」或「暴亂」，即便是親歷了浩大的和平遊行和血腥大屠殺的北京市民，也大都用官方定性的辭彙；即便官方已經悄悄地在公開媒體上用「政治風波」代替了「動亂」和「暴亂」，人們的語言也並沒有隨之改變多少。近兩年，「邪教」一詞正在民眾中、特別是大中小學生中迅速普及。前幾年，我每次聽到熟人講起八九運動用「動亂」一詞時，都要予以反駁和糾

正。這種糾正，開始是憤怒，繼而是嚴肅，最後是無可奈何，時間一長便聽之任之了。強勢的意識形態灌輸進入長期被奴化的頭腦，遂使記憶和語言定型化。

思想怪傑維特根斯坦的語言哲學認爲，語言絕非傳統意義上的表意工具，語言就是行爲本身，選擇什麼樣的語言表達方式，就是選擇什麼樣的思維方式；選擇什麼樣的思維方式，就是選擇什麼樣的生活方式。由此引申，習慣於感恩戴德的語言表達方式，就必然造就出救世主意識，救世主意識必然導致等待自上而下恩賜的奴性生存方式，離開了救世主便惶惶不可終日，比喪家之犬還要狼狽。

國人一次次地把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希望，寄託於新上任的執政者，但是每一次皆以失望告終；荒謬的是，一次次失望，仍然沒有滅絕人們對中共主動改革的近乎於絕望的希望。爲什麼？通常的回答是國情使然：有人說，偌大的國家，必須靠威權制度才能控制和治理；有人說中共過於強大，擁有的壟斷性資源太多，除非中共自我改造，否則任何其他力量無法挑戰；有人說，民間政治反對派在各方面都不如中共，他們上臺，還不如中共；有人說，首先要發展經濟，之後才是政治改革，而要保持經濟高增長就必須保持社會穩定，只有中共執政才能維持穩定；有人說，大陸人口太多且素質低下、愚昧無知，只配接受精英們的恩賜性指導，只能進行自上而下的變革……所有這一切辯護，無非就是爲了證明：沒有了中共或中共下臺，誰能代替它有效地統治中國？海內外的民運人士和持不同政見者，不是經常遭遇這樣的質問嗎？所以，等待恩賜的幸福就是平民百姓的唯一選擇。

當國人不爭取、甚至壓根不準備自我做主之時；當爭取自身

權益的鬥爭，還未真正開始就已經放棄努力之時；人們就會普遍地虛構出一個下意識的假設：離開了現行執政者，必然天下大亂。這樣的假設，既來自中共長期的強制性的意識形態灌輸，也來自國人至今不改的奴性。最近，江澤民在接受《紐約日報》採訪時不是也說：在12億人口、還有1億文盲的國家搞西方式的多黨制、議會民主，將會吃不飽，天下大亂，無益於世界的和平穩定嗎？但是，綜觀現代極權制度和現代自由制度之間近百年的制度競爭的歷史，慘絕人寰的大饑荒，無一不發生在極權體制下，蘇聯的二、三十年代的強制集體化，餓死了五、六百萬人；中國的五十年代的大躍進，餓死了至少三千萬人；朝鮮的九十年代所奉行的軍事優先國策，餓死了二百萬人。這樣的大悲劇並不能使獨裁者自我反省和珍視生命，反而被輕描淡寫地說成必要的代價或交學費。而對於民眾來說，越是迷戀於等待明主降臨、乞求專制者發善心，統治者就越不把人的生命、權益、尊嚴當回事，越肆無忌憚地蔑視生命、剝奪權益、踐踏尊嚴。

用1%的善政來為99%的惡政辯護的中國人

獨裁者有理由無視歷史事實而提出這樣的假設，因爲他們的所有決策和言說的最終目的只有一個——保住絕對權力。而民眾卻沒有任何理由相信這樣的假設，因爲這假設所維持的制度，恰恰是不把人當人來對待的秩序。國人一旦忘記歷史事實而相信了這樣的假設，就會心安理得地等待天上掉下餡餅，就會雖九死而猶未悔地尋找明君賢主，就會把所有自下而上的民間反對運動、爭取自身權益運動，視爲幫倒忙的「添亂」，就會在執政者幹了

九十九件大壞事而只作了一件微不足道的善事時，用1%的善政來爲99%的惡政辯護。即便被屠殺、被餓死、被監禁、被流放、被剝奪、被歧視……獨裁者仍然「偉大光榮正確」，小民們仍然千恩萬謝。

白居易有詩云：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此千古名句決不適於描述敢於挺直腰身的國人，卻是對習慣於優雅跪姿的國人的絕妙寫照。金鑾殿下，文武大臣齊刷刷跪成一片，三呼「萬歲！萬萬歲！」天安門城樓上，獨裁者一揮手，全世界最大的廣場就變成了子民向救世主歡呼的海洋。清王朝覆滅以來的國人，特別是中共執政後的國人，雖然不再像古人那樣做肉體上的跪拜，但是靈魂上的長跪不起更甚於古人！

做人的箴言云：人，生而自由平等。導致普遍的奴役和不平等的，決不是因爲統治者過於強大或過於英明，而是因爲被統治者們的跪下。難道三叩九跪的皇權時代已經廢除了一百多年的今天，國人還自我作踐，找出種種理由爲自己的跪姿辯護？僅僅是小康的恩惠和允許富人入黨的開恩，難道就使國人只會以下跪叩謝來顯示獨裁者的高大和恩典嗎?!

2001年9月10日於北京家中

附錄

《零八憲章》全文

——2008年12月10日公布

一、前言

今年是中國立憲百年，《世界人權宣言》公布60周年，「民主牆」誕生30周年，中國政府簽署《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10周年。在經歷了長期的人權災難和艱難曲折的抗爭歷程之後，覺醒的中國公民日漸清楚地認識到，自由、平等、人權是人類共同的普世價值；民主、共和、憲政是現代政治的基本制度架構。抽離了這些普世價值和基本政制架構的「現代化」，是剝奪人的權利、腐蝕人性、摧毀人的尊嚴的災難過程。21世紀的中國將走向何方，是繼續這種威權統治下的「現代化」，還是認同普世價值、融入主流文明、建立民主政體？這是一個不容回避的抉擇。

19世紀中期的歷史巨變，暴露了中國傳統專制制度的腐朽，揭開了中華大地上「數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的序幕。洋務運動追求器物層面的進良，甲午戰敗再次暴露了體制的過時；戊戌變法觸及到制度層面的革新，終因頑固派的殘酷鎮壓而歸於失敗；辛

亥革命在表面上埋葬了延續2000多年的皇權制度，建立了亞洲第一個共和國。囿於當時內憂外患的特定歷史條件，共和政體只是曇花一現，專制主義旋即捲土重來。器物模仿和制度更新的失敗，推動國人深入到對文化病根的反思，遂有以「科學與民主」爲旗幟的「五四」新文化運動，因內戰頻仍和外敵入侵，中國政治民主化歷程被迫中斷。抗日戰爭勝利後的中國再次開啓了憲政歷程，然而國共內戰的結果使中國陷入了現代極權主義的深淵。1949年建立的「新中國」，名義上是「人民共和國」，實質上是「黨天下」。執政黨壟斷了所有政治、經濟和社會資源，製造了反右、大躍進、文革、六四、打壓民間宗教活動與維權運動等一系列人權災難，致使數千萬人失去生命，國民和國家都付出了極爲慘重的代價。

二十世紀後期的「改革開放」，使中國擺脫了毛澤東時代的普遍貧困和絕對極權，民間財富和民眾生活水準有了大幅度提高，個人的經濟自由和社會權利得到部分恢復，公民社會開始生長，民間對人權和政治自由的呼聲日益高漲。執政者也在進行走向市場化和私有化的經濟改革的同時，開始了從拒絕人權到逐漸承認人權的轉變。中國政府於1997年、1998年分別簽署了兩個重要的國際人權公約，全國人大於2004年通過修憲把「尊重和保障人權」寫進憲法，今年又承諾制訂和推行《國家人權行動計畫》。但是，這些政治進步迄今爲止大多停留在紙面上；有法律而無法治，有憲法而無憲政，仍然是有目共睹的政治現實。執政集團繼續堅持維繫威權統治，排拒政治變革，由此導致官場腐敗，法治難立，人權不彰，道德淪喪，社會兩極分化，經濟畸形發展，自然環境和人文環境遭到雙重破壞，公民的自由、財產和追求幸福

的權利得不到制度化的保障，各種社會矛盾不斷積累，不滿情緒持續高漲，特別是官民對立激化和群體事件激增，正在顯示著災難性的失控趨勢，現行體制的落伍已經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

二、我們的基本理念

當此決定中國未來命運的歷史關頭，有必要反思百年來的現代化歷程，重申如下基本理念：

自由：自由是普世價值的核心之所在。言論、出版、信仰、集會、結社、遷徙、罷工和遊行示威等權利都是自由的具體體現。自由不昌，則無現代文明可言。

人權：人權不是國家的賜予，而是每個人與生俱來就享有的權利。保障人權，既是政府的首要目標和公共權力合法性的基礎，也是「以人爲本」的內在要求。中國的歷次政治災難都與執政當局對人權的無視密切相關。人是國家的主體，國家服務於人民，政府爲人民而存在。

平等：每一個個體的人，不論社會地位、職業、性別、經濟狀況、種族、膚色、宗教或政治信仰，其人格、尊嚴、自由都是平等的。必須落實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落實公民的社會、經濟、文化、政治權利平等的原則。

共和：共和就是「大家共治，和平共生」，就是分權制衡與利益平衡，就是多種利益成分、不同社會集團、多元文化與信仰追求的群體，在平等參與、公平競爭、共同議政的基礎上，以和平的方式處理公共事務。

民主：最基本的涵義是主權在民和民選政府。民主具有如下基本特點：（1）政權的合法性來自人民，政治權力來源於人民；

（2）政治統治經過人民選擇，（3）公民享有真正的選舉權，各級政府的主要政務官員必須通過定期的競選產生。（4）尊重多數人的決定，同時保護少數人的基本人權。一句話，民主使政府成爲「民有，民治，民享」的現代公器。

憲政：憲政是通過法律規定和法治來保障憲法確定的公民基本自由和權利的原則，限制並劃定政府權力和行爲的邊界，並提供相應的制度設施。

在中國，帝國皇權的時代早已一去不復返了；在世界範圍內，威權體制也日近黃昏；公民應該成爲真正的國家主人。祛除依賴「明君」、「清官」的臣民意識，張揚權利爲本、參與爲責的公民意識，實踐自由，躬行民主，尊奉法治，才是中國的根本出路。

三、我們的基本主張

藉此，我們本著負責任與建設性的公民精神對國家政制、公民權利與社會發展諸方面提出如下具體主張：

1. 修改憲法：根據前述價值理念修改憲法，刪除現行憲法中不符合主權在民原則的條文，使憲法真正成爲人權的保證書和公共權力的許可狀，成爲任何個人、團體和黨派不得違反的可以實施的最高法律，爲中國民主化奠定法權基礎。

2. 分權制衡：構建分權制衡的現代政府，保證立法、司法、行政三權分立。確立法定行政和責任政府的原則，防止行政權力過分擴張；政府應對納稅人負責；在中央和地方之間建立分權與制衡制度，中央權力須由憲法明確界定授權，地方實行充分自治。

3. 立法民主：各級立法機構由直選產生，立法秉持公平正義原則，實行立法民主。

4. **司法獨立：**司法應超越黨派、不受任何干預，實行司法獨立，保障司法公正；設立憲法法院，建立違憲審查制度，維護憲法權威。儘早撤銷嚴重危害國家法治的各級黨的政法委員會，避免公器私用。

5. **公器公用：**實現軍隊國家化，軍人應效忠於憲法，效忠於國家，政黨組織應從軍隊中退出，提高軍隊職業化水準。包括員警在內的所有公務員應保持政治中立。消除公務員錄用的黨派歧視，應不分黨派平等錄用。

6. **人權保障：**切實保障人權，維護人的尊嚴。設立對最高民意機關負責的人權委員會，防止政府濫用公權侵犯人權，尤其要保障公民的人身自由，任何人不受非法逮捕、拘禁、傳訊、審問、處罰，廢除勞動教養制度。

7. **公職選舉：**全面推行民主選舉制度，落實一人一票的平等選舉權。各級行政首長的直接選舉應制度化地逐步推行。定期自由競爭選舉和公民參選法定公共職務是不可剝奪的基本人權。

8. **城鄉平等：**廢除現行的城鄉二元戶籍制度，落實公民一律平等的憲法權利，保障公民的自由遷徙權。

9. **結社自由：**保障公民的結社自由權，將現行的社團登記審批制改爲備案制。開放黨禁，以憲法和法律規範政黨行爲，取消一黨壟斷執政特權，確立政黨活動自由和公平競爭的原則，實現政黨政治正常化和法制化。

10. **集會自由：**和平集會、遊行、示威和表達自由，是憲法規定的公民基本自由，不應受到執政黨和政府的非法干預與違憲限制。

11. **言論自由：**落實言論自由、出版自由和學術自由，保障

公民的知情權和監督權。制訂《新聞法》和《出版法》，開放報禁，廢除現行《刑法》中的「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條款，杜絕以言治罪。

12. **宗教自由：**保障宗教自由與信仰自由，實行政教分離，宗教信仰活動不受政府干預。審查並撤銷限制或剝奪公民宗教自由的行政法規、行政規章和地方性法規；禁止以行政立法管理宗教活動。廢除宗教團體（包括宗教活動場所）必經登記始獲合法地位的事先許可制度，代之以無須任何審查的備案制。

13. **公民教育：**取消服務於一黨統治、帶有濃厚意識形態色彩的政治教育與政治考試，推廣以普世價值和公民權利爲本的公民教育，確立公民意識，宣導服務社會的公民美德。

14. **財產保護：**確立和保護私有財產權利，實行自由、開放的市場經濟制度，保障創業自由，消除行政壟斷；設立對最高民意機關負責的國有資產管理委員會，合法有序地展開產權改革，明晰產權歸屬和責任者；開展新土地運動，推進土地私有化，切實保障公民尤其是農民的土地所有權。

15. **財稅改革：**確立民主財政和保障納稅人的權利。建立權責明確的公共財政制度構架和運行機制，建立各級政府合理有效的財政分權體系；對賦稅制度進行重大改革，以降低稅率、簡化稅制、公平稅負。非經社會公共選擇過程，民意機關決議，行政部門不得隨意加稅、開徵新稅。通過產權改革，引進多元市場主體和競爭機制，降低金融准入門檻，爲發展民間金融創造條件，使金融體系充分發揮活力。

16. **社會保障：**建立覆蓋全體國民的社會保障體制，使國民在教育、醫療、養老和就業等方面得到最基本的保障。

17. **環境保護：**保護生態環境，提倡可持續發展，爲子孫後代和全人類負責；明確落實國家和各級官員必須爲此承擔的相應責任；發揮民間組織在環境保護中的參與和監督作用。

18. **聯邦共和：**以平等、公正的態度參與維持地區和平與發展，塑造一個負責任的大國形象。維護香港、澳門的自由制度。在自由民主的前提下，通過平等談判與合作互動的方式尋求海峽兩岸和解方案。以大智慧探索各民族共同繁榮的可能途徑和制度設計，在民主憲政的架構下建立中華聯邦共和國。

19. **轉型正義：**爲歷次政治運動中遭受政治迫害的人士及其家屬，恢復名譽，給予國家賠償；釋放所有政治犯和良心犯，釋放所有因信仰而獲罪的人員；成立真相調查委員會，查清歷史事件的真相，釐清責任，伸張正義；在此基礎上尋求社會和解。

四、結語

中國作爲世界大國，作爲聯合國安理會五個常任理事國之一和人權理事會的成員，理應爲人類和平事業與人權進步做出自身的貢獻。但令人遺憾的是，在當今世界的所有大國裡，唯獨中國還處在威權主義政治生態中，並由此造成連綿不斷的人權災難和社會危機，束縛了中華民族的自身發展，制約了人類文明的進步——這種局面必須改變！政治民主化變革不能再拖延下去。

爲此，我們本著勇於踐行的公民精神，公布《零八憲章》。我們希望所有具有同樣危機感、責任感和使命感的中國公民，不分朝野，不論身分，求同存異，積極參與到公民運動中來，共同推動中國社會的偉大變革，以期早日建成一個自由、民主、憲政的國家，實現國人百餘年來鍥而不捨的追求與夢想。

中國第一代民主鬥士

魏京生前傳

周勁恆　著

魏京生，筆名全生，原籍安徽巢縣，1950年生，是中國「解放」後的第一代；父母均為共產黨員。

- 1978年12月，魏京生在北京西單民主牆張貼大字報，主張「第五個現代化：民主及其他」，震動中共中央。
- 中共當局眼中，魏京生1979年以「洩漏國家軍事機密」及「反革命活動罪」判處十五年監禁；1994年以「陰謀顛覆政府罪」被判處十五年徒刑，先後二次被關在獄中長達17年6個月。
- 柯江白宮會談的話題，1997年11月遭受中共當局以「保外就醫」的名義放逐到美國的「中國頭號政治犯」。
- 魏京生主張：凡未經民主選舉出來的政府，都是不合法；五度獲得提名角逐「諾貝爾和平獎」的民主鬥士。

魏京生前傳　25開320頁　定價320元

胡溫元年

—中國的第二次轉型—

章敬平　著

- 2003年3月，中國十屆人大先後推選胡錦濤為中國國家主席，溫家寶為國務院總理，以「胡溫體制」所組成的第四代領導人正式接班，開啓了「胡溫時代」的新紀元！
- 第一次轉型所指的是，1978年11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在鄧小平主導之下，實行經濟改革開放政策，經過25年的努力，經濟有長足的成長，但也產生嚴重的社會、經濟問題，如貧富懸殊、城鄉差距、東西部經濟不協調等諸多問題，這些都是現階段中國大陸社會之隱憂所在。
- 《胡溫元年》係作者以第一手採訪之心得論述2003年3月至2004年3月，中國新政府如何面對重大社會、經濟問題。這些社改、經改乃至政改，被若干學者認為是中國大陸繼1978年以來，第二次的轉型。
- 目前中共在大陸東南沿海各省部署至少2000枚導彈來威嚇台灣！中國未來之走向，直接或間接會影響台灣之生存和發展。你可以不同意《胡溫元年》的觀點，但是你不能不注意！不關心！

胡溫元年　25開本360頁　定價320元

走向共和

——從清末～民初(1889-1917)

盛和煜・張建偉　著

- 清末朝政自「祺祥政變」(1861)以來，悉由慈禧太后掌控；對內平定「太平天國之亂」及「捻亂」，對外也經歷「中法戰爭」，政局大抵安定。光緒十五年(1889)，光緒帝親政，因海軍經費被挪為頤和園之用，導致中日甲午戰爭(1894)的失敗；代表李鴻章所領導的自強運動的大潰敗，也堅定了孫中山以革命的手段來「驅逐韃虜，恢復中華，建立合眾政府」的決心。
- 戊戌維新(1898)的失敗，慈禧太后重新掌政，仍不知如何變通，又迷信義和團「扶清滅洋」的神話，導致庚子八國聯軍之禍(1900)；隨後辛丑和約的簽訂，中國也幾乎淪為列強的次殖民地。
- 孫中山的革命事業，從興中會到同盟會，歷經十次起義的失敗，終於在辛亥武昌之役獲得成功，並結合袁世凱對清廷的逼宮，中華民國得以迅速又和平的確立。
- 中華民國的共和政體，歷經「宋教仁事件」、「二次革命」後，國民黨又再次淪為叛亂團體，孫中山再度流亡海外；袁世凱雖妄圖變更國體，但主流民意已心向共和、厭惡封建帝制。終於在蔡鍔發起「護國運動」之下，袁世凱的「中華帝國」僅僅八十三天就無疾而終。爾後「張勳復辟事件」也只是北洋軍閥彼此權力爭鬥的一環而已。

走向共和 上冊　定價200元
走向共和 中冊　定價300元
走向共和 下冊　定價300元

我所認識的蔣介石

馮玉祥　著

- 蔣介石是中華民國政治史上最重要的人物；中華民國中央政府遷來台灣，其原因為何？追根究柢，都是蔣介石治國無方所造成。蔣介石的歷史評價，至今在台灣仍然沒有公允的說法。
- 本書原名《馮玉祥回憶錄》，係馮玉祥於1947年在美國口述，由其夫人李德全筆錄而成。記述馮玉祥自1925-1946年，二十多年間與蔣介石相交共事的種種情況。由於馮玉祥在1928年即與蔣介石換帖結盟為兄弟，並擔任行政院副院長、軍事委員會副委員長等要職，對於國民政府高層，有近身的體驗與感受。
- 本書敘述生動，披露了不少蔣介石鮮為人知的事蹟；對於研究蔣介石，本書是一本不可或缺的重要史料。

我所認識的蔣介石　25開320頁　定價300元

認識中國系列

1. 中國官場學(點校白話本)	[清] 汪龍莊等著	定價300元
2. 城市季風——北京和上海的變遷與對峙(增訂版)	楊東平著	定價390元
3. 北地胭脂——北京、東北、四川、武昌女子的性格與風韻		定價240元
4. 南國佳麗——上海、杭州、長沙、廣東女子的性格與風韻		定價240元
5. 妖魔化中國的背後	李希光、劉康等著	定價320元
6. 心香淚酒祭吳宓	張紫葛著	定價360元
7. 魏京生前傳	[德]周勁恆著 葉慧芳譯	定價320元
8. 一笑了之(單格漫畫書)	康笑宇著	定價200元
9. 雍正王朝(電視小說)	上中下三冊 二月河原著 劉和平編劇	定價699元
10 成吉思汗(歷史小說)	上中下三冊 朱耀廷、俞智先著	定價699元
11 反三國演義(古典小說)	周大荒著	定價390元
12 雍正王朝之李衛當官(電視連續劇)上下二冊	劉和平・毓鈺著	定價629元
13 向良心說謊的民族——劉曉波文集	劉曉波著	定價320元
14 晚清第一智庫——曾國藩的幕僚們	成曉軍著	定價320元
15 乾隆王朝(電視連續劇)上下二冊	陳亞先、水靈運、姚遠著	定價550元
16 包青天——包拯文集	[宋]包拯撰	定價平裝180元 精裝300元
17 網路爲王	胡泳・范海燕著	定價320元
18 網路商戰	何海群・徐勇著	定價300元
19 吃一碗文化(亞洲週刊美食專欄)	薛興國著	定價250元
20 走向共和——滿清末代王朝 上中下三冊	盛和煜、張建偉著	定價800元
21 大陸臺商企業交叉文化管理：理論與實務	吳金土著	定價320元
22 大宅門第二部(小說)上下二冊	郭寶昌著	定價480元
23 上海俗語圖說	汪仲賢著 許曉霞圖	定價360元
24 胡溫元年：中國的第二次轉型	章敬平著	定價320元
25 漢武大帝(歷史連續劇)上下二冊	江奇濤編著	定價600元
26 收藏實用手冊	池宗憲著	定價250元
27 喫茶趣：如何買壺與品茗	池宗憲著	定價200元
28 大陸台商經濟理論與實務	吳金土著	定價320元
29 我所認識的蔣介石(回憶錄)	馮玉祥著	定價300元
30 紅頂商人胡雪巖	徐星平著	定價400元
31 大陸台商經營戰略理論與實務	吳金土著	定價320元

捷幼出版社

社址：台北市信義路四段134號11樓

郵撥帳號：1485552-2號 ☎(02)27002735

本書要目

・向良心說謊的民族
・作秀與戲子中國——從大陸傳媒作秀談起
・沉默即死亡——我看錢鍾書
・中共第二代的終結——胡耀邦、趙紫陽的政治悲劇
・獨裁政治的戲子化——江澤民和政治改革
・中共政權合法性來源的錯位
・日本人為什麼不肯道歉
・弱者的「正義」
・真誠自省是最好的紀念——「六四」十二周年作
・只配跪著接受皇恩的民族

ISBN 957-8523-56-4

00320

9 789578 523562